

夏商周文明研究

■ 李学勤 著



SINCE 1897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夏商周文明研究

李学勤 著



创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5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夏商周文明研究 / 李学勤著.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5

ISBN 978 - 7 - 100 - 09102 - 2

I. ①夏… II. ①李… III. ①文化史—中国—三代
时期—文集 IV. ①K221.03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305879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夏商周文明研究

李学勤 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 - 7 - 100 - 09102 - 2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开本 710 × 1000 1/16

2015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28 3/4

定价: 96.00 元

目 录

上编 论文、演讲

一、古史研究

由清华简《金縢》看周初史事	5
清华简关于秦人始源的重要发现	11
谈秦人初居“邠墟”的地理位置	15
清华简《系年》“奴馭之戎”试考	19
从尧舜禹谈到高邮	22
清华简《系年》解答封卫疑谜	28
在“中华三祖文化与黄帝城遗址公园建设高层论坛”上的发言	31
中国青铜时代与古代文明	34
中国早期文明史上的虞舜	37
五千年文明史是文化创造源泉	43
解读文明历史 增强文化自信	45
清华简的文献特色与学术价值	51
出土文献与古史重建	55
具茨山与上古历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59
陶寺遗址与尧都传说	66

二、甲骨学研究

论凤雏卜甲中的周王与楚	71
-------------------	----

再论周原任家村腹甲卜辞	76
释读两片征孟方卜辞	80

三、青铜器研究

再谈青铜器与山西古代史的关系	87
谈枣庄徐楼村宋公鼎	97
纣子武庚禄父与大保簋	100
山东高青县陈庄西周遗址笔谈	104
清华简《祭公》与师询簋铭	106
试释翼城大河口鸟形盃铭文	110
翼城大河口尚孟铭文试释	114
膳夫山鼎与周厉王在位年数	118
随州叶家山西周墓笔谈	124
谈单氏人名	126
西周早期颂方彝考释	129
试说叶家山M65青铜器	133
斗子鼎与成王岐阳之盟	136
释金文“亡尤”等词	140
新见楚王鼎与“曾国之谜”	142
谈新出现的妇妊爵	146
论芮姑簋与疏公簋	149
试谈楚季编钟	153
由沂水新出孟铭释金文“总”字	157
日光镜铭新释	161
石鼓山三号墓器铭选释	165
“九紬”与“九律”	169
疑尊、卣别解	173
由清华简《系年》释读沫司徒疑簋	177

研究晚期青铜器的必要	181
------------------	-----

四、战国文字研究

关于清华简中的“丁”字	187
记《古镜写影》有字秦镜	189

五、简帛学研究

清华简《楚居》与楚徙郢郢	197
清华简与《尚书》、《逸周书》的研究	200
论清华简《耆夜》的《蟋蟀》诗	209
清华简对学术史研究的贡献	216
《系年》出版的重要意义	219
新整理清华简六种概述	222
由清华简《系年》论《文侯之命》	235
论清华简《说命》中的卜辞	240
论清华简《周公之琴舞》“寔天之不易”	243
论清华简《周公之琴舞》的结构	247
清华简《筮法》与数字卦问题	251
试论《系年》第一章的思想内涵	258
读《系年》第三章及相关铭文札记	261
重说《保训》	264
再读清华简《周公之琴舞》	267
《归藏》与清华简《筮法》、《别卦》	270

六、学术史研究

从《系年》看《纪年》	277
由清华简《系年》论《纪年》的体例	280

下编 序跋、杂文

读爱因斯坦给后世的信	287
李均明等《当代中国简帛学研究》序	311
燕昭安《解读朝歌》序言	313
报纸上的学术文章要力求简明	315
陈青荣、赵缙《海岱古族古国吉金文集》序	316
孙赫男《左氏会笺研究》序	319
夏商周年代学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322
王世贤《古今文字学博览》序	324
《炎帝古庙》序	326
《吕思勉研究纪念文集》序	328
《常见文物生僻字小字典》序	331
关于“中国文化从这里走来”的感想	333
文化传承创新的重大责任	335
《西部美术考古丛书》总序	338
在“重走孔子周游列国路”新闻发布会上的致辞	341
《周易溯源》重印附记	343
袁俊杰《两周射礼研究》序	345
李兴盛《中国流人史》增订本序	348
《中国56个民族神话故事典藏》序	349
《马愉手札》序	351
阎晓君《秦汉法律研究》序	352
《李学勤讲演录》前言	354
《缙云第三届黄帝文化学术研讨会》序	356
彭适凡《中国南方青铜器研究》序	358
《贾文忠金石传拓集》序	360
《柯俊传》题辞	362

张守中《张家山汉简文字编》序	363
刘绍刚《孔子论学八体书册二种》序言	366
《〈史记·五帝本纪〉讲稿》后记	369
礼学在今天的价值和意义	372
钟林《金文解析字典》序	375
张国骥《清嘉庆道光时期政治危机研究》序	377
《邵望平史学、考古学文选》序	379
华表《善斋集》序	382
吴镇烽《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序	384
致曲春皓谈石鼓文函	387
李文放《秦始皇巡游纪功颂德刻石》序	389
欧阳红国学“口袋书”系列序	392
俞筱尧、沈芝盈《诸侯异政和百家异说》序	394
在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成立大会上的致辞	397
《张永初读吴太伯世家》序	399
《字源》序	400
邢文《前经学时代》序	402
周建亚《甘露堂藏战国箴言玺》序	404
《嬴秦始源》序	406
《中原文化研究》创刊贺辞	408
赵平安《秦西汉印章研究》序	409
王震中《中国古代国家的起源与王权的形成》序	411
《初识清华简》后记	414
《华夏文明在甘肃》序	415
李均明《耕耘录》序	418
单周尧《勉斋论学杂著》序	421
《多视角的赵文化研究》序	423
嬴秦始源与秦文化特点	425

《汉镜文化研究》序	428
丘光明展览序	430
在首届汉语人文学学术写作终身成就奖颁奖典礼上的致辞	432
李玉洁《黄河文化与日本》	434
杜勇《中国早期国家的形成与国家结构》序	436
《美成在久》题辞	438
《科学画报》是我的良师	439
孔子文化奖获奖感言	441
为往圣继绝学	443
在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	445
《中国易经哲学研究》试刊号贺词	447
《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丛书》前言	448
后记	450

上编 论文、演讲

一、古史研究

由清华简《金縢》看周初史事

清华大学2008年秋入藏的战国竹简，通称清华简，已经引起学术界的广泛注意。清华简的一种主要内容，是《尚书》及与《尚书》体裁相类的文献。在2010年末出版的竹简整理报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①，共收录竹简九篇，其中前八篇都是这一类的典籍，但只有《金縢》一篇于传世今古文《尚书》中都有，也就是说既见于汉初伏生所传今文，又曾见于孔壁发现的古文。

《金縢》记载周武王伐纣之后患病，周公祈祷欲以身代，以及武王死后管蔡流言，造成成王与周公间存在芥蒂之事，为《史记》和各种史籍所依据，对周初史事研究有重要关系。由于篇文古奥，有种种费解的问题，历代学者多有异说，迄无定论。现在有了清华简本，在不少方面提供了解决的线索，这里试举几点，望能得到大家的指教和讨论。需要说明的是，下面引到的传世本，系用中华书局影印阮刻《十三经注疏》内的《尚书正义》本。

整理报告已说明，清华简这一篇原有篇题是《周武王有疾周公所自以代王之志》，不称《金縢》，然而与传世本《金縢》对照，虽然有若干文句差异，但首尾完具，属于同篇异本是没有问题的。按《金縢》篇文，先秦古书罕见征引，篇名则见于《尚书序》。清华简不用《金縢》篇名，很可能是未见《尚书序》，这一点在整理报告注释里已作解释，对百篇《书序》写成时代的探讨有参考价值。

简本《金縢》的出现，证明该篇在战国时期已经流行。过去有学者以为《金縢》是在较晚的时候才形成的，如清代孙星衍的《尚书今古文注疏》主张《金縢》“秋大熟”以下是《书序》所载《亳姑》的逸文，近年论著也有类似看法^②。简本《金縢》把这一类怀疑统统消除了。至于篇中包含神话色彩，反倒是该篇成形较早的证据，有些学者，如梁玉绳《史记志疑》所引明代王廉的《金縢非古书辨》，清人袁枚的《金縢辨》^③，从传统道德伦理观念推论周公作为圣贤不应

如此行事，就不必在这里澄清了。

简本《金縢》与传世本对校，有许多有重要意义的异文，以下分几个问题来讲。

第一，关于周武王有疾与卒世的年代：

传世本《金縢》首句为：“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史记·鲁世家》据此云：“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集，武王有疾，不豫。”这句话非常关键，因为司马迁在同书《封禅书》中说：“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宁而崩。”武王克商后只在位二年之说，后来有许多论著沿用，特别影响重大的，是王国维的《周开国年表》。王先生说：“案《史记》所记武王伐纣及崩年根据最古。《金縢》于武王疾书年，于其丧也不书年，明武王之崩即在是年。《史记》云：‘武王有瘳，而后崩’，可谓隐括经文而得其要旨矣。”^④

清华简本的首句是“武王既克殷三年，王不豫有迟。”作“三年”，不是“二年”，武王克商后在位二年说的基础于是动摇。

说《金縢》“于其丧也不书年”，是由于传世本在周公祈祷后“王翼日乃瘳”之下云“武王既丧”。简本不是这样，没有“王翼日乃瘳”一句，而说“就后，武王力（陟）”，“就后”即是终后，意味时间较长，这虽然没有标明其中距离，总不会是同年紧接的时候。因此，历代学者提出的三年、四年、六年、七年、八年等说^⑤，都与《金縢》没有矛盾。

第二，关于“丕子”一词的解释：

《金縢》传世本周公祷辞，对先人太王、王季、文王说：“惟尔元孙某遭厉虐疾，若尔三王是有丕子之责于天，以旦代某之身。”其中“丕子”一词注释家意见纷纭，以致顾颉刚、刘启钊先生的《尚书校释译论》专设很长一节加以讨论^⑥。种种异说，这里不能备引。

简本此处作：“尔元孙发也，遭害虐疾，尔毋乃有备子之责在上？”特点如注释所说，是反诘的语气。“毋乃”即古书多见的“无乃”，裴学海《古书虚字集释》云：“‘无乃’，犹‘得无’也。”举例有《左传》隐公三年的“无乃不可乎？”又僖公十九年的“今君德无乃犹有所阙？”由此足见“备子”即“丕子”一定是有贬义的词。孔颖达《尚书正义》引郑玄云：“‘丕’读曰‘不’，爰子孙

曰‘子’。元孙遇疾，若汝不救，是将有不爱子孙之过，为天所责，欲使为之请命也。”简文的“备”字与“丕”通假，“尔毋乃有备子之责在上”是说三王也要负不慈爱子孙的罪责，郑玄之说应该是正确的。

第三，关于周成王继位时的年龄：

简本于武王死后云：“成王犹幼在位”，传世本没有这一句，但是司马迁在《周本纪》和《鲁世家》引据《金縢》的地方，都说“成王少”，这和简本可以说是相应的。不过《鲁世家》在“成王少”下又讲“在强葆（襁褓）之中”，就过分了，不仅于情理不合，在《金縢》中也有反对的内证。梁玉绳指出：“《金縢》曰周公以诗貽王，而‘王亦未敢诮公’，则成王非不识不知之孩稚矣；曰‘王与大夫尽弁’，则成王已冠矣。……先儒说成王即位之年虽异词，而其非居强葆明矣。”这一点，下面还将说明。

这里必须指出，古代所说的“幼”，其年龄概念与今天有很大不同，《礼记·曲礼上》：“人生十年曰幼，学；二十曰弱，冠。”是说十岁到满二十行冠礼之前称为“幼”，而孔颖达《礼记正义》更放宽一些，说：“幼者，自始生至十九时；……二十成人，始加冠。”可知简文讲成王“犹幼”，年龄不一定太小。

据古书记载，当时天子、诸侯由于特定的政治原因，有提前行冠礼的规定。提前多少，有两种说法。

《左传》襄公九年记鲁襄公送晋悼公，“宴于河上，问公年，季武子对曰：‘会于沙随之岁，寡君以生。’晋侯（即悼公）曰：‘十二年矣，是谓一终，一星终也。国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礼也，君可以冠矣。’”高诱注《淮南子·汜论》，郑玄注《金縢》，都据此认为天子、诸侯十二而冠^⑦。

《荀子·大略》则说：“天子、诸侯子十九而冠，冠而听治，其教至也。”杨倞注：“十九而冠，先于臣下一年也。虽人君之子，犹年长而冠，冠而后听其政治，以明教至，然后治事不敢轻易。”清代郝懿行认为《荀子》所说是古法，《左传》晋侯所论失之太早。

按《大戴礼记》中的《公符（冠字之误）》篇载有“成王冠，周公使祝雍祝王”的祝辞，也见于《说苑·修文》和《孔子家语·冠颂》，表明成王的冠礼在继位以后。汉代古文《尚书》说正是根据这些，推断武王崩，成王年十三^⑧，虽

然没有确切证据，却应说是合理的，可谓不中不远。

清华简《金縢》在传世本“王与大夫尽弁”句处刚好有缺损，不过“弁”字仍能保存。其下云“大夫縶”，所以“弁”一定是指成王而言。这同传世本一样，证明当时成王已冠，前引梁玉绳的论证是成立的，成王继位时绝非在襁褓之中。

第四，关于周公东征：

《金縢》传世本在叙述管叔等制造流言之后说：“周公居东二年，则罪人斯得。于后，公乃为诗以贻王，名之曰《鸛鸛》，王亦未敢诘公。”简本则作：“周公石东三年，祸人乃斯得。于后，周公乃遗王志（诗），曰《周鸛》，王亦未逆公。”文句出入不是很多，却非常重要。

传世本“周公居东二年”，“居”字似有和平居处之义，“二年”又与其他文献所记周公东征三年不合，以致有注释家认为“居东”与东征是两件事，“居东”的“东”也不是“东征”的“东”^⑩。这样，当时史事就陷于混乱不清。

看简本，问题便很明白。“周公石东三年”的“石”，当即楚文字常见的“适”，即“适”字，意为前往。周公前往东国三年，正是东征之事。

周公东征得胜，作《鸛鸛》送给成王。《鸛鸛》简本作《周鸛》，“鸛”、“周”古音同纽。该诗存于《诗经》中的《邶风》。《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载，吴季札到鲁国，见叔孙穆子，“请观于周乐”，“为之歌《邶》，曰：‘美哉荡乎，乐而不淫，其周公之东乎！’”杜预注：“乐而不淫，言有节也。周公遭管蔡之变，东征三年，为成王陈后稷先公不敢荒淫，以成王业，故言‘其周公之东乎’。”

看《毛诗序》的《邶风》部分，所说正与周公东征相应，例如：

《七月》：“陈王业也。周公遭变故，陈后稷先公风化之所由，致王业之艰难也。”

《鸛鸛》：“周公救乱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为诗以遗王，名之曰《鸛鸛》焉。”

《东山》：“周公东征也。周公东征，三年而归……”

《狼跋》：“美周公也。周公摄政，远则四国流言，近则王不知……”

将这些与《左传》结合起来，更可以看出《金縢》简本的优长。

这里应当附带提到，《墨子·耕柱》有：“古者周公旦非关（管）叔，辞三公，东处于商盖（奄）。”这很可能是受了“周公居东”之说的影响，看来“居东”的文本很早即有流传。孙诒让《墨子间诂》试作解释，讲：“此谓周公居东，盖东征灭奄，即居其地，亦即鲁也。”其实周公何曾居鲁，这种说法对于“辞三公”也没有考虑，实属曲说。

第五，关于秋熟天变的年代：

传世本《金縢》在周公以诗贻成王后，即说：“秋大熟，未穫，天大雷电以风，禾尽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于是成王启金縢之书。这是什么时候的事，与前面叙说的《鸛鸣》诗事是否同年，注释家说法不一。

王充《论衡》的《感类》篇云：“儒者说之，以为成王狐疑于周公。欲以天子礼葬公，公人臣也；欲以人臣礼葬公，公有王功。狐疑于葬周公之间，天大雷雨，动怒示变，以彰圣功。古文家以武王崩，周公居摄，管蔡流言，王意狐疑周公，周公奔楚，故天雷雨以悟成王。”这大致概括了汉代两种看法。按前一种看法始于汉初的《尚书大传》^⑫，《史记·鲁世家》之说与之近似，把成王心里的疑虑说成针对周公的埋葬，后来成王亲迎的成为周公的灵柩，实在是奇怪的。

清华简本《金縢》完全否定了这种看法。上面已引到，简文在周公遗诗之下说“王亦未逆公”，是指周公东征将归，成王并未决定迎接，这与下文亲迎紧扣，不能作两件事理解。更重要的，是简本在“秋大熟”前有“是岁”二字，“是岁，秋大熟”，很清楚是同年的事件，《尚书大传》以来的汉儒今文家说就不成立了。

其实，《尚书大传》等的解释本来即不合情理。清段玉裁《古文尚书撰异》已云：“案今文之说最为荒谬。……岂有为诗贻王之后，秋大熟之前，间隔若干年，若干大事，不书周公薨而突书其薨后之事，人读罢不知其颠末者？”^⑬看清华简本《金縢》，前后贯通，少有疑义，这种异说归于消除，简本的珍贵价值也由此彰显。

清华简中，还有不少篇章与周初史事有关，有的和《金縢》有密切关系，

在全部整理发表后，一定会使这方面的研究有很大的进展。

注释

- ①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中西书局，2010年。
- ② 参看杨朝明：《周公事迹研究》，第238—239页，中州古籍出版社，2002年。
- ③ 梁玉绳：《史记志疑》，第877页，中华书局，1981年。
- ④ 《王国维遗书》四《观堂别集》卷一，第1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 ⑤ 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卷四，第8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 ⑥ 顾颉刚、刘起钎：《尚书校释译论》，第1253—1260页，中华书局，2005年。
- ⑦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970页，中华书局，1990年。
- ⑧ 王天海：《荀子校释》，第1091—109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
- ⑨ 方向东：《大戴礼记汇校集解》，第1271—1272页，中华书局，2008年。
- ⑩ 参看同⑥，第1237页。
- ⑪ 孙诒让：《墨子间诂》，第396页，中华书局，1986年。
- ⑫ 黄晖：《论衡集释》，第788—789页，商务印书馆，1938年。
- ⑬ 同⑥，第1244页引。

（原载《中国经学》第8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

清华简关于秦人始源的重要发现

2008年7月入藏清华大学的战国竹简，性质主要是经、史一类书籍。其中有一种保存良好的史书，暂题为《系年》，一共有138支简，分成23章，记述了从周武王伐纣一直到战国前期的史事，将作为竹简的整理报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的第二辑发表。我们在整理过程中发现，《系年》有许多可以补充或者修正传世史籍的地方，有时确应称为填补历史的空白，关于秦人始源的记载，就是其中之一。

大家都知道，西周覆亡，周室东迁以后，秦人雄起西方，先是称霸西戎，随之逐步东进，终于兼并列国，建立秦朝，成就统一大业。秦朝存在的期间虽然短促，对后世的影响却相当深远。特别是秦人的文化，有其独具的特点，伴随着秦人的扩张发展，广被于全国各地。研究中国的传统文化，在很多方面不能不追溯到秦人，而秦人是从哪里来的，其文化有怎样的历史背景，历来有种种看法，是学术界争论已久的问题。

关于这一问题，长期以来的主流意见，是秦人出自西方。司马迁在《史记·秦本纪》及《赵世家》中，曾经详述秦的先世，讲到商朝晚期有戎胥轩，娶邠山之女，生中湣，“在西戎，保西垂”，看来秦人当时已在西方，并且与戎人有密切关系。蒙文通先生的《周秦少数民族研究》便据此认为“秦为戎族”。

然而也有一些学者持不同意见，比如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主张“秦之先世本在东方，为殷诸侯，及中湣始西迁”。这是由于《秦本纪》提到：“秦之先为嬴姓，其后分封，以国为姓，有徐氏、郟氏、莒氏、终黎氏、运奄氏、菟裘氏、将梁氏、黄氏、江氏、修鱼氏、白冥氏、蜚廉氏、秦氏。”这些国族，凡可考定的都在东方。近年这种东方说的代表作，是林剑鸣先生的《秦史稿》一书。出版于1981年的这本书，以为中湣只是“曾率一部分秦人替殷商奴隶主保

卫西方的边垂”，不能说明秦人即是戎族。

中湣的儿子是飞（或作蜚）廉，飞廉的儿子是恶来，父子三代都是商朝末年的著名人物。《秦本纪》说：“恶来有力，蜚廉善走，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纣。”他们助纣为虐，史有明文，但他们给秦人带来怎样的命运，却没有文献记载。

清华简《系年》的第三章，具体回答了这方面的疑问。简文叙述了周武王死后出现三监之乱，周成王伐商邑平叛：

飞曆（廉）东逃于商盍（蓋）氏。成王伐商盍（蓋），杀飞曆（廉），西迁商盍（蓋）之民于邾虚，以御奴貳之戎，是秦先人。

“飞曆”就是飞廉，“曆”字从“甘”声，“廉”字从“兼”声，古音相近通假。“商盍氏”即《墨子·耕柱篇》、《韩非子·说林上》的“商蓋”，也便是称作“商奄”的奄。关于飞廉、恶来，《秦本纪》云：“周武王之伐纣，并杀恶来。是时蜚廉为纣石（使）北方，……死，遂葬于霍太山。”这和《系年》所记不同。

《系年》的记载，可以参看《孟子·滕文公下》：“周公相武王，诛纣。伐奄，三年讨其君，驱飞廉于海隅而戮之，灭国者五十，驱虎豹犀象而远之，天下大悦。”和《系年》一样，是说飞廉最后死在东方。

飞廉参预三监之乱，失败后东逃到奄。奄也即是《秦本纪》讲的运奄氏，属于嬴姓，飞廉向那里投靠，正是由于同一族姓。当时今山东到苏北的嬴姓国族都是反周的，《逸周书·作雒篇》说：“周公立，相天子，三叔（管叔、蔡叔、霍叔）及殷、东、徐、奄及熊盈（嬴）以畔（叛）。……二年，又作师旅，临卫政（征）殷，殷大震溃。……凡所征熊盈（嬴）族十有七国，俘维九邑。”这充分讲明了嬴姓国族在这场战乱中的地位。

奄是东方大国，是商王朝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根据古本《竹书纪年》，商王南庚、阳甲都曾建都于奄，然后盘庚才迁到今河南安阳的殷。奄之所以称为“商奄”，大概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据《左传》说，周初封鲁，“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于少皞之虚”，杜预注：“商奄，国名也。少皞之虚，曲阜也。”传统上认为奄国即在今山东曲阜。不过奄的国境范围肯定要大多得多，有学者主

张奄相当周期的鲁国，同奄一起反周的蒲姑相当周朝的齐国，可能是差不多的。

由《系年》简文知道，商朝覆灭之后，飞廉由商都向东，逃奔商奄。奄国等嬴姓东方国族的反周，飞廉肯定起了促动的作用。乱事失败以后，周朝将周公长子伯禽封到原来奄国的地方建立鲁国，统治“商奄之民”，同时据《尚书序》讲，把奄君迁往蒲姑，估计是看管起来。但在《系年》发现以前，没有人晓得，还有“商奄之民”被周人强迫西迁，而这些“商奄之民”正是秦的先人，这真是令人惊异的事。

秦国先人“商奄之民”在周成王时西迁，性质用后世的话说便是谪戍。所以把他们遣送到西方，无疑也和飞廉一家有关，因为飞廉的父亲中湣正有为商朝“在西戎，保西垂”的经历，并且与戎人有一定的姻亲关系。中湣、飞廉一家，本来也是自东方出身的。周朝命令“商奄之民”远赴西方御戎，完全不是偶然的决定。

认识到秦的先人是原在东方的商奄之民，以前与秦人始源相关的一系列问题都得到解释，例如：

在文献方面，《史记·封禅书》载：“秦襄公既侯，居西垂，自以为主少皞之神，作西畴，祠白帝，其牲用騊驹、黄牛、羝羊各一云。”秦襄公为什么自称主少皞之神，是由于少皞嬴姓，《说文》：“嬴，帝少皞氏之姓也。”《左传》讲得很清楚，封鲁的奄国之地又称作“少皞之虚”，秦襄公只是没有忘记国族的来源而已。

在金文方面，西周中期的询簋和师酉簋都提到“秦夷”，还有“戍秦人”。来自东方的商奄之民后裔自可称“夷”，其作为边戍之人又可称“戍秦人”。

在简帛方面，马王堆汉墓帛书《战国纵横家书》的“苏秦谓燕王章”云：“自复而足，楚将不出沮漳，秦将不出商阬（奄），齐不出吕隧，燕将不出屋注。”所说是指各国的始出居地。秦出自商奄，正与《系年》所记吻合。这几句话后世的人们不懂，所以传世本《战国策》把“商奄”等都错误地改掉了。

《系年》的记载还有一点十分重要，就是明确指出周成王把商奄之民西迁到“邾虚”这个地点，这也就是秦人最早居住的地方。

“虚”在战国楚文字中常通读为“吾”，因此“邾虚”即是《尚书·禹贡》

雍州的“朱圉”，《汉书·地理志》天水郡冀县的“朱圉”，在冀县南梧中聚，可确定在今甘肃甘谷县西南。

西周初秦人的最早居地在这样的地方，由近年考古工作看，是非常合理的。甘谷西南，即今礼县西北，正为早期秦文化可能的发源地。2004年以来，早期秦文化联合考古队在礼县一带西汉水上游进行了遗址普查。2005—2006年，又做了有针对性的调查，确认或发现了西山、大堡子山和山坪三座周代城址，见该队《甘肃礼县三座周代城址调查报告》（《古代文明》第7卷）。其中西山的时代相对较早，从遗址来说，其秦文化出现的时间约为西周中期，城的使用年代则在西周东周之际。2005年以来，在西山的发掘成果丰富，见《中国文物报》2008年4月4日所刊《甘肃礼县西山遗址发掘取得重要收获》一文。

西山位于礼县县城西侧，西汉水北岸的山坡上，还不是最早的秦文化遗址。由这里往北，没有多远便是“邾虚”的可能位置，有待勘查探检，这为今后的考古研究提供了珍贵的线索。

既然秦人本来是自东方迁来的商奄之民，最早的秦文化应该具有一定的东方色彩，并与商文化有较密切的关系。希望这一点今后会得到考古研究的验证。

（原载《光明日报》2011年9月8日；《新华文摘》2011年第22期；《赢秦文化研究》2011年第2期；《甘肃省第二届简牍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又陈鹏宇英译，见《世界古代文明研究》第28期，2013年）

谈秦人初居“邾豳”的地理位置

—

在《清华简关于秦人始源的重要发现》一文中^①，我已经介绍了清华简《系年》记载周成王在杀飞廉后，把商奄之民西迁到“邾豳”，即是秦人的先世。“豳”字在战国楚文字中常通读为“吾”，因此“邾豳”就是“朱圉”或“朱圉”。这个地点在今天什么地方，以下想做一详细讨论。

“朱圉”一名，最早见于《尚书·禹贡》的导山部分，说：“西倾、朱圉、鸟鼠，至于太华。”《孔传》云：“西倾、朱圉，在积石以东；鸟鼠，渭水所出，在陇西之西，三者雍州之南山。”^②并没有指明朱圉的准确位置。

确切指出其地理位置的，是《汉书·地理志》。志文于天水郡冀县下云：“《禹贡》朱圉山在县南梧中聚。”颜师古说：“‘圉’、‘圉’古通用。”冀县据王先谦《补注》引《清一统志》，在伏羌县南^③，伏羌县即今甘肃甘谷县。

《水经·渭水注》于渭水“又东过冀县北”下云：“南有长铎谷水，次东有安蒲溪水，次东有衣谷水，并南出朱圉山。山在梧中聚，有石鼓，不击自鸣，鸣则兵起。……石长丈三尺，广厚略等，著崖胁，去地二百余丈，民俗名曰石鼓，石鼓鸣则有兵。”杨守敬疏引《通典·州郡四》云朱圉山“俗名白岩山”，又《元和郡县志》：“朱圉山在伏羌县西南六十里。”^④

《通典》、《元和志》这两条，清初胡渭的《禹贡锥指》已经引用，并以《伏羌县志》所说：“朱圉山在县西南三十里”，又“石鼓山在县南四十里，西连朱圉，盖即其别峰”等相对照，说明朱圉距县彼云“六十里”，此云“三十里”，是由

于“县治移向西南，故山较《元和志》近三十里”。

胡渭还讨论了朱圉山的范围问题。他说有人“谓县西南锦缆、石鼓、木梅、天门等山，皆朱圉之随地异名者也”。阎若璩曾对他讲：“据《汉志》山在梧中聚，夫一聚可容，则其陞不甚广，安得有如上所云云者。吾尝亲经其山，在今伏羌县西南三十里。山色带红，石勒四大字曰‘禹奠朱圉’。”^⑤

阎若璩的意见，已写入他的《尚书古文疏证》卷六下：“朱圉山，向所登陟者山最小。《元和志》所谓朱圉山在伏羌县西南最合。近遍征之：《通典》天水郡上邽县有朱圉山，《九域志》秦州成纪县有朱圉山，岷州大潭县有朱圉山，何朱圉之多也？说者遂谓朱圉山连峰叠嶂，绵亘于伏羌县之西南，皆可以朱圉目之，予以为否。班氏明于冀县下注曰‘朱圉山在县南梧中聚’，一村落中所有之山，他县宁得而附会去耶？”

关于朱圉与县治的距离变化，阎若璩所说比胡渭更为明确：“今之县治乃宋熙宁三年以伏羌寨为城者，在秦州西九十里，见《九域志》，与《元和志》云县东南至秦州一百二十里者，移却三十里矣。”^⑥

这里附带提到，胡渭《禹贡锥指》还驳斥了蔡沈《书集传》。蔡书说：“朱圉，《地志》在水郡冀县南，今秦州大潭县也，俗呼为白岩山。”胡渭指出，“大潭故城在今西和县西南三百里，本汉陇西县地，《蔡传》谓冀县即大潭，谬甚。”^⑦

阎若璩和胡渭主张朱圉只是指一处不大的山，就传世文献来说，无疑是正确的。不过以《系年》简文而言，周成王把商奄之民迁徙到朱圉，抵御戎人，所讲朱圉不会仅指一处山峰，应该是以朱圉山为中心的一片地带。这可能包括汉代冀县县治，一直到渭水这样一块地方，即现在的甘谷大部。大家知道，到西周衰亡，平王东迁之时，该地乃是冀戎所有。《史记·秦本纪》载，秦武公“十年，伐邽、冀戎，初县之”，即为冀县的原始。现在知道周初秦人本在朱圉，秦武公的行动也可说是收复失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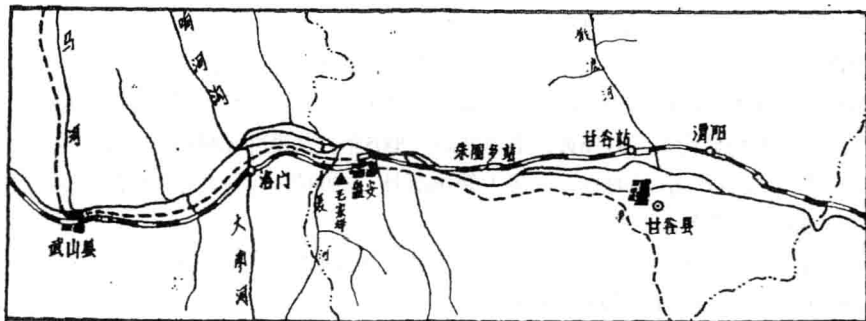
查《秦本纪》，西周秦人居地只能上溯到孝王时的非子，所处犬丘即汉陇西郡西县，《清一统志》云其故城在今甘肃天水西南一百二十里。非子养马有功，得为附庸，邑于秦，在今甘肃清水东北，而其父大骆的嫡子成一族仍在犬丘。非子递传秦侯、公伯、秦仲，已到厉王时，大骆一族为西戎所灭。宣王以秦仲

为大夫，伐西戎而死，又命其子庄公兄弟再伐西戎得胜，于是将犬丘也赐予庄公，为西垂大夫。此后襄公、文公，据《秦始皇本纪》，都葬于西垂，文公先死的太子静公也应葬于西垂^⑧。甘肃礼县大堡子山的大墓，现在多数学者认为是文公、静公之墓。没有想到的是，周初自东方迁来的秦的先人，竟居住于在清水、天水、礼县西北的甘谷，以朱圉为中心的地带。相信今后这一点很快会得到考古工作的证实。

二

在以上小文写好之后，我着手查阅考古文献，赫然发现能够与《系年》简文所示的秦先人初居地点相呼应的线索，其实早已经存在了，这就是甘肃省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甘谷毛家坪遗址^⑨。

毛家坪遗址位于甘谷县盘安乡毛家坪村，在渭水南岸第二阶地上，东距县城约25公里。遗址与今河道相距约0.5公里，其间有陇海铁路及天兰公路，其与铁路甘谷站之间有小站即朱圉乡站。遗址东西长约300米，南北宽约200米，面积约6万平方米。其南部地势较高，为墓葬区，北部低平，为居住区。



毛家坪遗址位置示意图

这处遗址是1947年裴文中先生在渭水流域调查时发现的。1956年，甘肃省

文管会张学正等先生再做调查。1982—1983年，甘肃省文物工作队和北京大学考古学系进行两次发掘，报告见《考古学报》1987年第3期。

上述发掘报告认为，毛家坪遗址主要有三种文化遗存，即以彩陶为特征的石岭下类型遗存，以绳纹灰陶为代表的“A组遗存”，以夹砂红褐陶为特征的“B组遗存”。其中“A组遗存的文化性质可分成前、后两段：前段包括一、二期土坑墓和居址一、二期，为西周时期；后段包括三、四、五期土坑墓和居址三、四期，为东周时期”，“居址一期的年代可早到西周前期”。A组遗存前段的文化面貌不全同于西周文化，“它虽有西周文化的因素，但有些特点又不见于西周文化而与东周秦文化有某些联系。……毛家坪A组遗存前段中的某些因素与东周秦文化相似，而且A组遗存前、后段之间有较强的连续性。”

毛家坪遗址的发掘表明，在朱圉一带确实有早到西周前期的遗存，看来在那里寻找秦先人的居地真是大有希望。

注释

- ① 李学勤：《清华简关于秦人始源的重要发现》，《光明日报》2011年9月8日。
- ② 《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第39页，中华书局，1980年。
- ③ 王先谦：《汉书补注》，第796页，中华书局，1983年。
- ④ 杨守敬、熊会贞：《水经注疏》，第1478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参看《杨守敬集·水经注图》，南五西六，湖北人民出版社、湖北教育出版社，1988年。
- ⑤ 《皇清经解》卷十二《禹贡锥指》，第43页，1888年沪上石印本。
- ⑥ 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第46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
- ⑦ 同⑤。此外王树柅以为朱圉即今甘肃卓尼，“卓尼”乃“朱圉”音转，见顾颉刚、刘启钊：《尚书校释译论》，第776页，中华书局，2005年，其说并无根据，在此不论。
- ⑧ 李学勤：《缀古集》，第9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又：《文物中的古文明》，第343—344页，商务印书馆，2008年。
- ⑨ 甘肃省文物工作队、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甘肃甘谷毛家坪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7年第3期。以下有关资料均引自该文。

（原载《出土文献》第2辑，中西书局，2011年）

清华简《系年》“奴𡗗之戎”试考

清华简《系年》第三章记载周武王死后，出现三监之乱，成王伐商邑平叛，原为商朝重臣的飞廉东逃到在今山东的商盖（奄），于是成王东征，杀死飞廉，“西迁商盖之民于邾𡗗，以御奴𡗗之戎，是秦先人”。这是关于秦人始源的珍贵史料，足以补充传世典籍的阙文，我曾有小文简要介绍^①。简文中商盖之民所迁居的“邾𡗗”，就是《尚书·禹贡》和《汉书·地理志》等书中的“朱圉”或“朱圉”，在今甘肃甘谷西南，这是没有问题的，但什么是“奴𡗗之戎”，却很难考定。本文想就此作一试探，未必有当，只能充今后研究的参考而已。

“奴𡗗之戎”，词例同于《后汉书·西羌传》注所引《竹书纪年》商末武乙、文丁时周人征伐的“燕京之戎”、“余无之戎”、“始呼之戎”、“翳徒之戎”等。朱圉一带从来是戎狄羌人等部族居住活动的地区，而“奴𡗗之戎”使我们联想到商末甲骨卜辞里屡次出现的“𡗗方”。

“𡗗方”或作“𡗗方”，见于无名组卜辞及黄组卜辞。最近的研究证明，无名组卜辞中的较晚者可与黄组卜辞并存，同卜一事^②，涉及𡗗方的无名组、黄组卜辞应该是同时的。由于黄组卜辞最早是文丁时的，这些卜辞只能属于文丁以至帝辛（纣），也即与《纪年》所述“燕京之戎”等同一时期。

黄组卜辞《甲骨文合集》36528云：

乙丑王卜贞，畀巫九𡗗，余作𡗗，启告侯甸册𡗗方、羌方、羞方、𡗗方，余其从侯甸𡗗伐四邦方。

商朝所要讨伐的，以𡗗方为首，与羌方等合称“四邦方”。看无名组卜辞《合集》27997和27990，与𡗗方并举的还有系方与𡗗方，都是商朝的敌人。不过，黄组

卜辞《合集》36530却说：

己酉王卜贞，余征三邦方，惠競命邑，弗悔，不作□□在大邑商。王占曰：“大吉。”在九月，遘□□五牛。

惠獻命。

这把“四邦方”减到“三邦方”，而且卜问是否命獻作邑，即建设城邑，看来獻方是已经降服商朝了。

杨树达先生曾提出，卜辞中的“獻方”便是《诗·大雅·皇矣》里的“徂”，他在《释獻方》文中说：“按卜辞屡见獻方，且恒云伐獻，其为国名甚明，顾经传未见有国名为獻者。以声类求之，疑即《诗·大雅·皇矣篇》之徂也。《皇矣》五章云：‘密人不共，敢距大邦，侵阮徂共。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以笃于周祜，以对于天下。’毛传释‘侵阮徂共’云‘侵阮遂往侵共’，训徂为往，认为动字。郑笺云‘阮也，徂也，共也，三国犯周而文王伐之，密须之人乃敢距其义兵，违正道，是不直也’，是郑以徂为国名，与毛异义。后来学者于毛、郑二义各有偏袒。……今按两方各执一义，以文义论，侵阮往共，于文理难通，毛义本有罅漏，然非有强证，不足以折之。今用甲文勘校《诗经》，知獻之与徂，文虽殊而事则一，……二千年来之纷争，或者从此可以息乎！”^③按据《毛诗正义》引张融说，郑玄以阮、徂、共为国名本出自《鲁诗》，实系渊源有自。徂国在文王时，也与卜辞獻方的出现时期相当。

《皇矣》各国的地理方位大致可考。密在今甘肃灵台西，是准确的。清人朱右曾《诗地理征》认为“泾州今有共池，即共也，……共池在今泾州北五里”，“《地理志》安定郡有爰得县，爰重言之为阮，故城在今泾州东南”，他所说泾州，即今甘肃镇原东南。总之，共、阮以及徂国，都应在甘肃东北部泾水上游一带。

有关卜辞獻方的材料还有许多，读者有兴趣可参看我的旧作《殷代地理简论》和孙亚冰、林欢的新书《商代地理与方国》^④，这里不能具引。孙、林所论有一点很有意思，就是将獻方同西周共王时金文史墙盘的“狄廬”联系起来。

史墙盘(《殷周金文集成》11141)铭文叙及武王“逖征四方,达殷俊民,永不巩狄虘,惩伐夷僮”。徐中舒先生读“巩”为“恐”,指出“狄虘”就是《国语·晋语一》的“翟祖”^⑤。按《晋语》载,晋献公田猎,“见翟祖之氛(禋氛,即凶象),归寝不寐”,次晨以不寐事告诉大夫郤叔虎,郤叔虎转告士芻,士芻指出翟祖君臣“各饬其私”,可伐而克,献公于是进攻翟祖,翟祖灭亡。翟祖地理位置无考,因为晋国征伐所及,推测应在陕北到晋北区域。

如果以上各家学说不误,《系年》的奴𡈼之戎确即卜辞的𡈼方、《诗经》的祖国、金文及《国语》的狄(翟)虘(祖)的话,我们可以将之综合,描绘出这样一幅历史图景:

商朝末年,𡈼方即祖本在今甘肃东北部泾水上游,先后受到周文王、武王讨伐,向西退到今甘肃中部渭水源头一带,以致成王迁来秦的先人在朱圉地区防御。到西周晚期,王朝力衰,如《后汉书·西羌传》所言:“戎逼诸夏,自陇山以东,及乎伊洛,往往有戎。”从而翟祖在晋陕北部出现,这正是蒙文通先生所说的“狄来秦晋之北”^⑥。至于秦先人戍守的渭水源头一带,仍为少数部族据有,即《西羌传》所说“渭首有狄、獠、邽、冀之戎”,直到春秋战国,才逐步被秦人征服吞并。

注释

① 李学勤:《清华简关于秦人始源的重要发现》,《光明日报》2011年9月8日。

② 李学勤:《帝辛征夷方卜辞的扩大》,《中国史研究》2008年第1期。

③ 杨树达:《积微居甲文说》,第67—6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④ 李学勤:《殷代地理简论》,第77—82页,科学出版社,1959年。

孙亚冰、林欢:《商代地理与方国》,第275—27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

⑤ 徐中舒:《西周墙盘铭文笺释》,《考古学报》1978年第2期。

⑥ 《蒙文通文集》第二卷《周秦少数民族研究》,第108—109页,巴蜀书社,1993年。

(原载《社会科学战线》2011年第12期)

从尧舜禹谈到高邮

—

我们常说，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五千年是从五帝时代开始的。中国的正史有二十四史，二十四史从《史记》开始，《史记》头一篇就是《五帝本纪》，第二是《夏本纪》，第三是《殷本纪》，第四是《周本纪》，这样排列下来。五帝之后就是我们说的三代，即夏商周。关于五帝时代的研究，其实涉及到中华文明的起源问题。五帝第一个是黄帝，黄帝是人文初祖，黄帝时代代表着文明起源的时代。因此，对黄帝的纪念就是对中华文明产生、形成过程的探索和忆念。

在这里，我特别要说的是，禹，既可以说是五帝时代，也可以说是夏商周时代的代表，他是介于二者之间的。我之所以要强调这一点，是因为从我们历史学的角度来看，五帝时代应该和夏商周时代是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五帝时代里面的内容，神话的性质更为强烈，而具体的史实和世系之间的关系，都有待于更多更深的探讨。可是从夏开始，夏朝的世系非常清楚，17个王，每一个王叫什么名字，他们互相的关系怎么样，他们都做过什么重大的事情，这些在古书里面非常清楚。从夏禹以后，中国古代的历史进入另外一个重要的阶段。所以今天我们研究夏禹，纪念夏禹，召开有关夏禹的种种学术文化会议，须知禹不只是属于五帝时代，也是属于三代的开始。这一点对于我们的研究特别重要，为什么这么说呢？现在我们从全世界人类发展的历史来看，文明的起源是一个较长的过程。拿古代埃及、古代两河流域来说，开始萌生文明的时期都是在考古学上说的铜石并用时代。这一点在我们中国极少有人这样说，他们总认

为国家和文明的起源一定是在青铜器时代。

五帝时代，可以说是史前时期和后来的时期交界的地方。我们过去说历史时期、史前时期，历史时代、史前时代，大家知道，在二十世纪中叶以后国际上通行的说法不是这样的，产生了另外一种说法，就是说史前时期之后有一个原史时期（protohistory）。史前时期、原史时期、历史时期。历史时期是以文献记载为主的，史前时期是没有什么文献，而是以考古学、人类学或者其他的研究方法为主的，其间的原史时期，则是文献与考古等并重。那么到底中国多长的时期叫原史时期呢？我个人觉得夏禹的时期应该是我们原史时期的开始。在这个时期，我们可以说，除了考古学、人类学、文化学、民族学种种方法之外，我们还是有相当多的文献依据的。这样看来，夏禹对我们研究历史、尤其是研究先秦历史的人来说，我感觉是很重要的一个界线。

最近我们看到，在史学界有几位先生写文章主张把唐尧、虞舜、夏禹都划为史前以后的阶段。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时候，杨向奎先生就写过一篇文章，叫《给有虞氏一个历史地位》，把虞，包括唐尧，尧舜禹时期也算作史前以后。最近北京大学的吴荣曾先生，也专门写过文章，发表在《炎黄文化研究》上。

所以，尧舜禹这个时期，我个人觉得，是不是可以用中国的原史时期，或者史前以后时期的一个开端来定义。对于这个开端，我们要特别探讨研究，这关系到我们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与发展。那么中华文明的起源问题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其实这个问题不但与我们中国人，乃至与整个世界的文明发展都有密切的关系。全世界起源最早而且独立的古老文明，除了中国，还有古代埃及、古代两河流域、古代印度，但是这些文明，包括希腊和罗马的文明，后来都中断了。只有中国文明绵延不绝，五千年没有中断，这在全世界是惟一的。因此对于整个人类历史发展来说，中华文明的起源具有特别的意义。我们中国人积累的历史经验和历史教训，对于整个人类历史发展有什么贡献，对于阐释人类的进步和人类的未来有什么样的意义，都是特别重大的问题。

禹，大家都知道。我们的一个著名的史学界老前辈——王国维先生，1925年的时候在清华开了一门课，叫“古史新证”。在这门课里，他讲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他说有些人信古，信古有过，就是有不对的地方。他又说，疑古也有

不对的地方，为什么呢？他特别指出疑古的人，甚至对尧舜禹的人格和存在都不承认了，这是不行的。可见在王国维这样的学者眼光中，尧舜禹是确有其人的。王国维先生说，中国古代的历史和世界的是一样的。古史中总是有神话的，可是它是和历史事实结合在一起，所以尧舜禹不是完全子虚乌有的。大家知道，1925年的时候中国现代考古学还没有起步，因为中国现代考古学的标志是中国人自己主持的考古发掘，第一次是1926年，王国维先生多少参与其事，是李济先生主持的在山西夏县西阴村的发掘。王国维讲课的时候是1925年，比发掘早一年，王国维先生当时只能举传世的一些东西，他举了两件青铜器，一个是秦国春秋时代的秦公簋，一个是齐国春秋时代的叔夷钟。他说秦公簋和叔夷钟里面都谈到了大禹的故事，所以他说春秋时代东西两个大国，一个是秦国，一个是齐国，两个大国都承认有夏朝，有禹。到1929年，郭沫若先生在日本的时候，他写了一本书叫《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在这本书里面他也谈到了夏，也谈到了禹，对于这一点有更深入地阐述，所以，我们是否可以这样地认为，从春秋时代的人来说，夏禹的存在和他的历史事实是没有问题的。

那么究竟禹的传说是本来就有的，还是后来什么时候才出现的？这个问题有种种的说法，有人说是后人编出来的，因为甲骨文里没有见到禹，就是商代还没有禹的说法，西周也没有。在2002年的时候，我们在北京看到一件青铜器遂公盨，这件青铜器有人说是河南出的，是西周中期的，铭文里面详细叙述了大禹的情况。它一开头就说：“天命禹敷土，随山浚川。”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大吃一惊。大家知道，“禹敷土”这三个字是见于《尚书·禹贡》，而“随山浚川”见于《禹贡》的序。序比《禹贡》要晚，可是这四个字，其他古书里都没有，只是在《尚书序》里面才有。所以这里明确证明了《禹贡》和《尚书序》是有根据的。所以这个发现以后，有人说我们可以把禹的传说上推到西周，当然这是没有问题的。这件遂公盨现在在北京的保利艺术博物馆。这件东西的存在从文体、内容上证明了《尚书》的头几篇，包括《尧典》、《皋陶谟》、《禹贡》这几篇，是有根据的。这几篇有根据，那么我们古史的很大一段就活了。这一点，我想我们还需要再进一步讨论。

可以说，尧舜禹的历史根据是《尚书》的记载，春秋时代孔子这么讲，诸

子百家也这么讲，用的就是这几篇，可见《尚书》对于中国古史、对于古代文明、对于我们今天讲的尧舜禹文化都非常重要。

我们要讨论的中国古史，不是从中国这块大地上人类的出现讲起，而主要是指中国文明由萌芽形成到其早期发展的历史。传统上一般认为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这是以司马迁《史记》等传世文献关于炎帝、黄帝的记载为依据的。现在看来，自炎黄以下，不妨划分为三个大的历史段落：

第一个段落是炎黄到尧舜，即所谓“五帝时代”。大家公认，这属于传说时期，然而如王国维所言，“传说之中，亦往往有史实为之素地，二者不易区别，此世界各国之所同也”。刚才讲了，尧舜或许还可以向下划。

第二个段落是夏朝到西周，这属于近年学者讲的原史时期。其间又可以商代盘庚迁殷划一界线，其后由于有甲骨文、金文，我们运用“二重证据法”的机会更多。

最后的段落是东周到秦的统一，由于存在大量传世文献，已属于严格意义的历史时期，但出土文献的意义仍然不可低估。

相对于黄帝来说，有关尧舜的文献神话色彩要淡薄得多。上海博物馆1994年入藏的战国楚简《容成氏》和《子羔》两篇，都强调舜出身民间，没有什么感应神迹；1993年湖北荆门郭店一号楚墓竹简《穷达以时》，2008年清华大学入藏的战国竹简《保训》对舜的描述也是如此。《古史新证》批评疑古派学者，主张尧舜是实有人物，可能是有道理的。

王国维在1925年时曾称他那时为“发现之时代”，今天我们所处的更可称为“大发现之时代”。出土文献的整理研究，一定会在新世纪里发挥越来越明显的作用，使我们对中国早期文明的认识不断深入和更新。

二

近些年，在史前一直到文明形成时期的考古学研究上，有一项重要的成果，就是纠正了过去以中原为中心的单源论观点。以中原为中心的单源论的形成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当时的考古工作大多局限在中原地区。

后来考古范围发展扩大，也便自然而然地开拓了人们的眼界。现在看来，中华文明的起源不能是单源的，文明起源的各个因素不是在一个地区产生，而是在若干地区分别酝酿和出现的。至于文明在什么地方形成和突破，是另外的问题，至少从起源来说，必须看到若干地区的交互作用。这就是讲，中华文明是我们辽阔幅员之上多民族共同创造的辉煌成果。

长期以来，大家讲黄河是中华文明的摇篮，这句话今天在一定意义上仍然是正确的。特别是作为文明早期的几个朝代，确实都建都在黄河流域。可是谈到文明的起源，考虑到近年的考古成果，应该认为长江流域有着同样重要的作用。长江地区从考古文化来看，是相当进步的，绝对不是一个落后的地区。我想这一点凡是关心中国考古学发展的人都会有同样认识，所以有的学者提出中国也有一个“两河流域”，就是黄河与长江。黄河流域的文化和长江流域的文化，有联系又有区别，互相影响、沟通和融会。这个观点恰好与炎黄二帝居处的两个地区一致，看来并不是偶然的。

2007年5月，我到江苏高邮参加“尧文化发祥地高层论坛”，并进行了实地考察。来高邮之前，我从未把帝尧与高邮联系起来，说明受中华文明单源论观念的影响，尚未把目光投向东方地区。考察了高邮龙虬庄遗址，看了陶器、玉器、石器、先人遗骸及葬俗等陈列，使我大开眼界。如龙虬庄陶片上一看就是符号，在公元前2100年至前2000年之间，与文字有关，成行的，是用右手在陶片上刻的，我不能不由衷地赞叹。高邮的龙虬庄龙山文化是淮河中上游王油坊龙山文化迁徙而来，而龙山文化晚期就与帝尧时代相当。

帝尧与高邮有非常密切的关系，这是皇甫谧的说法，他肯定也不是第一个说的。司马迁写《五帝本纪》不是仅仅依靠文献资料，还很重视实地考察，他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又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峰，等等，可见他对东方各地的情况是考察过的，当时他肯定听到过江淮一带有尧、舜、禹的传说。高邮有丰厚的文化资源，高邮是古代史中有关帝尧传说的重要地点，同时也是研究和探索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重要地点。传说伊祁氏在三阿，而三阿就是古高邮。以往我对司马迁的《史记·五帝本纪》读过很多遍，《索隐》的记述自然也看过，就是没有注意帝尧与高邮的关系，可

见过去读书之粗疏。

跟希腊、罗马等古代文明的神话一样，帝尧有神话内容，而我们要看到神话里面有历史的背景。高邮是古代有关帝尧传说的重要地点，也是研究探索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重要地点，希望将“高邮：尧文化发祥地”问题进一步深入讨论。将来条件成熟了，可以由中国先秦史学会和高邮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开一个全国性的研讨会。

（耿葆根据李学勤教授2007年5月在江苏高邮“尧文化发祥地高层论坛”学术研讨会上演讲以及实地考察谈话整理。）

（原载《高邮：尧文化发祥地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

清华简《系年》解答封卫疑谜

清华简是指2008年秋天清华大学入藏的一批战国竹简，由于媒体屡有报道，想来大家不会觉得陌生。清华简连同其残断的在内，一共约有2500枚，经过缀合排比，有60多篇，主要是经、史一类典籍，十分珍贵重要。由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著的整理报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第一辑在2010年底问世，国内外学术界有很大反响。2011年12月，《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第二辑也出版了，有关讨论正在学者间展开。

与报告第一辑包括竹简《尹至》、《尹诰》等九篇不同，第二辑只发表竹简一篇，题为《系年》。《系年》的篇幅很长，由138支简组成，原有简序编号，保存相当良好，只在个别地方有一点缺损。这是前所未见的一种断代性质的史书，分作23章，概述了从周初武王伐纣直到战国前期的历史大事。书的作者可能是楚国人，成书的年代估计为楚肃王时（公元前380年—前370年），也就是说比西晋时发现的魏国史书《竹书纪年》还更早一些。

《系年》的出现，对于古代文献和历史的研究有非常重大的意义。书里面的记载，许多地方能够印证、补充或者纠正传世古书，特别是解决学术史上长期存在的一些疑难问题。这些当然需要对《系年》做持久深入的分析研究，并不是一朝一夕所能达到的。在这里我只想举一个例子，聊供读者参考。

周初分封诸侯，成立所谓“封建”的国家制度，奠定周朝几百年的根基，是古史上的大事。《系年》第四章说：

周成王、周公既迁殷民于洛邑，乃追念夏、商之亡由，旁设出宗子，以作周厚屏。乃先建卫叔封于庚丘，以侯殷之余民。卫人自庚丘迁于淇卫。

讲的是成王和周公在敕平三监叛乱之后，把反周的所谓殷顽民迁到在今洛阳的

东都成周，同时吸取夏、商两朝覆亡的教训，将王室亲属分封为诸侯国，作为王朝的屏障，而首先建立的便是卫国。卫国的第一代国君是叔封，他是武王、周公的弟弟，成王的叔父。

《系年》的记载，正好与《左传》定公四年祝佗所说互相对照。祝佗是卫国的大祝，字子鱼，《论语·雍也》把他的名字写作祝鮀。在《左传》里，祝佗追述了周初分封鲁、卫、晋三国的经过，下面只摘录涉及卫国的部分：

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选建明德，以蕃（藩）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分康叔以……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铸氏、樊氏、饥氏、终葵氏，……聃季授土，陶叔授民，命以《康诰》而封于殷虚。

祝佗乃是春秋晚期卫国大臣，他回忆卫国的初封，应该还是比较可信的。同《系年》相对照，只要了解康叔就是叔封，殷民七族就是殷之余民，两者的一致是很清楚的。

祝佗提到的分封卫国时的诰命《康诰》，并没有像封鲁的《伯禽》、封晋的《唐诰》那样早已佚失，却作为《尚书》这部经籍的一篇，经过历史的长河保存至今。有些经学家绎读这篇《康诰》，提出种种诂难，竟成为千年不决的谜团，争论不休。

原来，《康诰》篇文的开头是：

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东国洛，四方民大和会，侯、甸、男邦、采、卫，百工、播民和见士（事）于周。周公咸勤，乃洪大诰治。

紧接着是诰命本文：

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

纪时的“惟三月哉生魄”，据《尚书·召诰》、《洛诰》知道是在成王七年，开始营造成周洛邑之时。当时各地方国都来会集，为这一大事服役，所说“播民”正是被迁的殷民。因为成王那个时候还没有亲政，实际是由周公代行诰命。“洪

大诰治”的“洪”字，郑玄即训为“代”（这不一定准确，但情事应当如此）。诰命的具体时间，未必就在三月哉生魄，可能是在稍后的一段期间以内。这些都与《左传》相合，所以《书序》说：“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遗民封康叔，作《康诰》。”对于这一点，从汉到唐，学者并无异说。

宋代学者兴起疑经改经的风气，对《康诰》称叔封为“朕其弟”一点提出质疑，认为是武王时书。这个看法始于胡宏（五峰），受到一些著作的支持。苏轼的《东坡书传》还认为《康诰》篇首“惟三月哉生魄”到“乃洪大诰治”四十八字是《洛诰》的脱简，误错到《康诰》。朱子也是赞成这一类意见的，从而他的学生蔡沈的《书经集传》予以强调，主张将《康诰》移到武王时的《金縢》之前。蔡沈《集传》后来列于科举功令，这种看法（或与之类似的观点）竟成为主流。现代研究《尚书》的学者也有不少人采用，如屈万里先生的《尚书集释》可为代表。

屈万里先生说：“诸家以本篇为武王告康叔之书，良是，惟仍以为康叔封于卫时之诰辞，则非。盖康叔封于卫在武庚之乱平后，其时武王已歿也。今既知康叔初封于康，后徙封于卫，则封于康时自当在武庚之乱以前，亦即当武王之世。”至于康在什么地方，屈书引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之说，以为即《说文》的邠，在今河南颍川。

《系年》的记载，把这些疑难都澄清了。上面已经引到，简文说“乃先建卫叔封于庚丘，以侯殷之余民”，“庚”、“康”古文字通假，庚丘就是康丘，也便是康侯的康。封康是“侯殷之余民”，可见康即在殷的故土境内。大家知道，殷商故土分为邶、鄘、卫，康一定是在卫，所以叔封也称为“卫叔封”。卫国建立以后，卫人才“自庚（康）丘迁于淇卫”，淇卫自然就是淇水之滨的朝歌，又称洹或沫。至于卫国的迁都是在叔封在世之时，还是其子康伯之世，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至于《康诰》“王若曰：孟侯，朕其弟”这句话，孔颖达《正义》已说明是周公称成王命而言，周公称叔封为弟，古人行文不十分严密，是可以理解的。

总之，叔封封为诸侯只有成王时一次，武王时封康一说不符史实的。

在“中华三祖文化与黄帝城遗址公园建设高层论坛”上的发言

尊敬的孙家正主席，

各位领导，各位女士、先生：

今天我有机会参加这次“中华三祖文化与黄帝城遗址公园建设高层论坛”，我感觉非常荣幸。回忆以炎帝、黄帝、蚩尤“三祖文化”为中心议题的学术研讨，已经有十多年的历史了。我是有幸出席过第一届的研讨会的，这里又能与大家见面，向各位请教，真是高兴的事。承蒙会议要我提前发言，我能讲的只是几点个人意见，不妥的地方恳请批评指正。

炎帝、黄帝和蚩尤，都是我国古史传说时期的人物，就文献传说而言，探讨这“三祖”时期的历史文化，理所当然地离不开涿鹿。涿鹿这个地名，历史非常古远，过去常常只追溯到秦汉，这是很不够的。我曾经指出，涿鹿一名已见于《逸周书》的《尝麦篇》，《尝麦》这篇文字，有些地方相当古奥。例如篇中屡次用“箴”这个词，其实应当是“咸”字，意思是“终”，这是现代学者根据西周金文考出来的，汉朝以来大家都不懂得。由此可见《尝麦》应该是从西周流传下来的文献。这便证明，炎黄蚩尤的传说，在西周的时候是相当流行的。

炎黄蚩尤“三祖文化”的提法，可以说是对“炎黄文化”概念的扩大、补充和完善，进一步说明了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多源性。大家了解，自改革开放以来，历史学、考古学界在理论观点上的一项重要进展，就是强调了古代历史的“多元一体”。在考古学上，发展了文化区系的学说，而在历史学上，突出了中国自古以来是多地区、多民族的统一国家，五千年的辉煌文明是各地区、各民族共同缔造的。这既综括了历史事实，又有着现实意义。

前些时候，我应三联书店等方面的约请，曾在一个班上讲读《史记》的《五帝本纪》。当时我对听众说，读《五帝本纪》要认识到司马迁写古代历史，从炎黄蚩尤说起，并不是在他心目中在那以前就没有历史了。其所以断自那一时代，是由于他认为那是中国文明开始形成的时期。正因为如此，我们读《五帝本纪》，不仅要注意阪泉之战、涿鹿之战，更应当关注其间关于中国如何进入文明的种种记述，从这样的角度切入，就能更好地理解炎黄蚩尤传说所蕴藏的历史意义。

根据传世典籍和历代学者的论断，炎黄蚩尤所代表的时代，距今大约正是五千年。因此，我们探索那个时代的文化，也就是追溯中国古代文明形成的根脉。中国的古代文明，约在五千年前的时候形成，这和近年考古工作所揭示的现象是基本吻合。这告诉我们，古史传说并非凭空杜撰，而是一种对远古的神话化的记忆。事实上，世界上各个古代文明都有这种富于神话色彩的传说，而中国的古史传说的神话意味是最少的。

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起，学术界一直在讨论怎样对待和研究中国的古史传说。经过长时期的论争商榷，大多数学者都认识到，在古史传说中确实包含着重要的历史内核，而我们的工作正在于如何剥露这样的内核。近年有不少事情恰指向这一点。比如说帝尧、帝舜也是《五帝本纪》的人物，尧都在平阳更是很晚才见于载籍的传说，然而山西襄汾陶寺龙山文化城址的发掘，在时代和地望上都与之符合。最近我读到李伯谦先生在《古代文明研究通讯》第53期上的文章，他强调以河南登封王城岗大城作为夏代的开始，这不正好同战国以来古书说的禹都在阳城一致吗？由此我们不难想到，涿鹿这个地方在古史传说里这么重要，也非常可能得到进一步的验证。

我这样说，绝对不是主张简单直截地把古史传说与考古发现糅合起来。相反地，我认为这常常是难于做到的。我只是认为，即使是古史传说的时代，成功的探索仍然需要历史学与考古学的互相配合。

长期担任历史研究所和考古研究所领导工作的尹达先生说过，考古的基础是田野工作，田野工作之后要回到室内，还必须做综合研究。我个人体会，“综合研究”意味着提升到理论的高度，没有理论的高度便不会有真正的创新。历

史学上对古史传说时代的探讨也是这样，需要从理论的高度上来思考和分析，才能取得有意义的成果。历史学与考古学在这方面的配合，正应该在这样高度上来实行。

这就是我今天想说的，我们讲的“三祖文化”，指的乃是中国文明形成时期的历史文化，是中国文明的根源。如我以前谈到的，由于中国自古地大人多，在世界古代历史中占有特殊地位，对中国文明形成过程的研究，其价值和意义肯定不是仅限于中国的。我们可以期待，这方面的成果将对人们探索整个人类文明化的进程，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2012年7月25日

（原载《三祖文化》总第1期，2012年）

中国青铜时代与古代文明

说起青铜时代，使我们立即联想到古代文明。确实的，众多曾经辉煌繁盛的古代文明，包括古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古希腊等，就其物质文化的发展阶段来说，都处于青铜时代范围。中国的古代文明，情形也是这样。无怪乎一些位著名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把他们论说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著作冠名为“青铜时代”，例如郭沫若先生的《青铜时代》、张光直先生的《中国青铜时代》。不过关于中国的青铜时代与古代文明还有不少问题，这里只举出几点。

将人类物质文化的发展进程划分为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的所谓“三时代说”，是19世纪初任丹麦国家博物馆馆长的汤姆森奠立的，他当时把馆藏的古代工具、兵器等文物，按照这样三个时代分别整理陈列起来。尽管后来有人指出这一类观念在很早的时候便出现过（如中国汉代的《越绝书》），但汤姆森的学说仍是影响深远的创见，而且成为现代考古学发端时期的一件大事。

“三时代说”随着考古学的不断进展，得到了补充和修正，比如人们都熟悉的，石器时代被细分为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学者们发现，从新石器时代前进到青铜时代绝不是一蹴可几，而是要经过相当长久的期间。在成熟的青铜器工艺出现之前，铜器还不可能较大规模地取代石器。这样的过渡时期，被称作“铜石并用时代”。具体到中国，早在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已有零星的铜器（甚至有个别的青铜器）。到龙山文化及与之年代相当的若干文化，铜器发现已多，材质有红铜、砷铜、黄铜、青铜，工艺有锻造、铸造，一般认为这肯定属于铜石并用时代了。

这里可以提出一个问题：既然铜石并用时代是青铜时代的前行阶段，而古代文明的发展是与青铜时代平行对应，那么文明的起源是不是应该到铜石并用时代去寻找？

在人类历史上是有这样的实例的，那就是古埃及。如有的古埃及史著作所说：“埃及文明是奠基在铜石并用文化的生产力的基础上，在早王朝和古王国时代，手工业生产仍然离不开铜器和石器这些基本的生产资料 and 水平。”埃及的早王朝时代即第一、二王朝，约当公元前3150—前2700年；古王国时代即第三至第六王朝，约公元前2700年—前2200年。

从此又可联系到李伯谦先生最近在《中国青铜文化研究的反思》（《古代文明研究通讯》第53期）一文中提出的一个问题：“青铜器是否为衡量古代中国进入文明的必要标志之一。”

李伯谦先生所说，是指考古学上判断是否进入文明的标志。依照目前有关学者间通行的见解，这种标志一共有四个，即：城市、文字、礼仪性建筑和冶金术，冶金术实际即指青铜器。

我以前介绍过，这种判断文明的标志之说，其来源乃是上世纪中期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召开的一次关于美索不达米亚考古的研讨会，会上有哈佛大学的教授克拉克洪提出了这种标志。随后英国剑桥大学教授丹尼尔在1968年出版的《最初的文明：文明起源的考古学》一书中引述并引申了克拉克洪的观点。

必须说明，克拉克洪和丹尼尔提出的文明标志里面，只有城市、文字和礼仪性建筑三种，并没有青铜器，丹尼尔书里还特别声明，三种标志只要有其两种就够了。虽然文字是标志中最重要的，在个别实例（如秘鲁的古代文明）也可阙如。这也就是说，判断是否文明没有必要的标志，反映着各个古代文明在这些作为标志的文化因素上的多样性。由此推想，即使青铜器算作判断文明的一项标志，也不好说是必要的标志。

上面业已谈到，各个古代文明在其文化因素方面有着多样性，亦即其自己的特点，那么下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古代文明以及与之对应的青铜时代具有怎样的特点？

这是一个需要我们仔细探讨吟味的问题。大家可能记得，张光直先生曾经讲过：“我们古代文明是以青铜器（或是有特殊形制和装饰花纹的青铜器）为特征的。”他说的青铜器，其实指的是青铜的礼器（包含乐器），中国的青铜时代究竟是不是以礼器的制作应用为其主体或者说特征？

我们对古代青铜器所做的研究，传统上确是以礼器作为集中对象的。这一点，早在宋代金石学家关于青铜器的著作里，已经有其充分的表现。礼器在中国古代文明中有特殊重要的意义，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对于社会经济更有直接作用的工具和兵器难道没有多少地位吗？

涉及青铜工具，大家不可忘记陈振中先生的贡献。他以后半生全部精力，走遍全国有关单位，著成《先秦青铜生产工具》这一巨作，以大量证据说明古代青铜工具的发达，其成果超出一般预料之外。

至于青铜兵器，我们只要温习《史记·秦始皇本纪》的一段记事就够了。《本纪》说，秦兼并六国之后，“收天下兵，聚之咸阳，销以为钟鐻金人十二，重各千石”。《三辅黄图》还说这十二个金（青铜）人“坐高三丈”，上面有“李斯篆，蒙恬书”的铭文。这当然只是秦人收缴来的部分兵器，但已足显示那时青铜兵器数量的庞大。

总之，中国的青铜时代和与之相关的古代文明还有许多奥秘，有待我们深入探索。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8月29日；《新华文摘》2012年第21期）

中国早期文明史上的虞舜

对于虞舜和舜文化的研究，我们应当以4000多年前的虞舜时期作为切入点，从中国早期文明的长度、广度、高度三个方面进行探索和研究，把古史传说、经史典籍与考古发掘的地下文物进行鉴析与印证，从中华民族的历史源头、思想源头、道德源头审视虞舜及舜文化的价值，为新时期史学研究与道德建设的学术殿堂提供精良土坯和基石，为我国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作出新贡献，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有益的历史借鉴。

一、关于虞舜在早期文明史时空坐标中的位置

什么叫作文化？什么叫作文明？我认为，人类只要他能够有所作为，能够使用工具，有一些人造东西的时候，这就是一种文化。文明则是人类发展史上的特殊阶段，是人类脱离动物界后，进一步脱离了原始野蛮状态的阶段。

在古代，人类历史上曾先后出现了多个灿烂的文明发祥地。如古中国、古两河流域、古埃及、古印度等四大文明古国，是当时最先进、最早的“文明摇篮”。在这些古文明中，只有中国具有独立起源、持续发展两大特色，从来没有中断而一脉相承，而其他古文明却中断或衰落了。虞舜在五帝之中居末，在尧舜禹之中居中，在中国早期文明史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二、关于虞舜在五帝中的地位

中国文明的起源到底在什么时代？古代人类的文明，在不同的地方有各自

独立的起源和进程，可是它们的发展还是有某种共同性。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远古文明能够绵延不绝传下来的国家，《史记》第一篇是《五帝本纪》，即五帝时期，黄帝就是五帝时期的开始。只要对比一下“夏商周断代工程”年表和古埃及年表，你就会有一个惊人发现，就是我国的几个大朝代跟古埃及几个时期的划分差不多。埃及前王国与古王国时期是公元前3150年到公元前2040年，我国五帝时期大约是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前2070年。夏代与中王国时期、商代与新王国时期的盛期也大体相当。

中国的古史传说，距今八千至四千年前，中华大地出现了伏羲、女娲、炎帝、黄帝、蚩尤、颛顼、帝喾、唐尧、虞舜、大禹等，传统上称之“三皇五帝”。比较通行的五帝之说是指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这五位，五帝之一的虞舜是被大多数人认同的。九嶷山舜帝陵庙考古发掘表明，虞舜是五帝中有秦汉以前陵庙和地下文物相印证的。

三、关于虞舜在中国早期文明史上的时空位置

尧舜禹活动的地区陆续进入了铜石并用时期，母系氏族制正转变为父系氏族家长制。夏朝起始年估计为公元前2070年，虞舜是夏朝以前的古帝王，距今已有4100多年。中国现今的疆域是五千年来以华夏族为主体的政权与周边各族的部落、部族在长期融合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中国上古行政区划，文献传说中九州系大禹治水后划分的。《尚书·舜典》载：“舜肇十有二州。”虞舜活动的疆域，在禹贡所列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等九州，再加并、幽、营三州。舜崩后的葬地在荆州辖内的“江南九疑”，虞舜活动的空间处于中国早期文明的源头地带。

2004年8月13日湖南省文物局、永州市人民政府在长沙联合举行“九嶷山古舜帝陵庙遗址考古新发现发布会”，我在新闻发布会上回答记者提问时说过：“根据历史的传说，这一段历史的解释是清楚的。帝舜即帝位后，四方巡狩，南巡到了南方，死在路上，崩于苍梧之野，苍梧是个很大的地方，但葬于‘江南九疑’，九嶷山只有这个地方，这是没有争论的。”

中国古代历史上的传说，它涉及到的地理范围相当广泛。“舜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作什器于寿丘，就时于负夏。”根据传说，虞舜是东夷之人，这些传说跟后来的传统地名是有关系的。山东也有舜耕历山、舜井和娥皇、女英的传说等。在神话与传说里面常常包含了历史的真实，或者说透过传说我们常常可以看到历史的真实。传说到底反映了多少历史事实，这需要我们做工作。但我要强调一点，不要把古人的能力估计得太低了。

四、关于历史文献和考古发掘对舜葬九疑的佐证

太史公司马迁经过大量史籍考证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实地考察后，在《史记·五帝本纪》中歌颂舜的德化与治功时说：“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并认定舜“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零陵即今湖南永州市，汉时为零陵郡，舜陵就在该市宁远县九疑山。舜葬九疑的记载，先于司马迁的有《礼记·檀弓》“舜葬九疑苍梧之野”和《山海经》“苍梧山，帝舜葬于阳，丹朱葬于阴”的记载。

王国维先生曾说中国书本上之学问，有赖于地底之发现，从而提出了取地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的“二重证据法”。

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地形图》，按现代科学方法测定，对舜帝陵位置、方向的标志与秦汉舜庙遗址一致。马王堆墓主轪侯利苍死于公元前186年，早于司马迁出生年约40年。2002年湖南省考古研究所发掘表明，在玉琯岩前有面积达32万平方米先秦至宋元时期的古舜帝陵庙遗址。古舜帝陵庙遗址的发现是具有很大意义的重要考古成果，它是我国目前发现的始建年代最早的五帝陵庙。

五、关于虞舜在道德文明方面的建树

根据古代文献，虞舜是中华传统道德的始祖，是中华民族历来向往的道德

典范和大公至德的圣德之君，在中国文明史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他先人后己，孝悌忠信，勤政爱民，以和为贵，受到人民的普遍爱戴。虞舜倡导的为人、持家、做官、治国均以道德为本，开创了中华道德文明的先河，因而被后世尊为“百孝之先”、“道德之祖”。在先秦诸子中，儒家特别推崇尧舜，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今天，我们强调以德治国，深入发掘和弘扬舜文化，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六、关于虞舜对中国礼乐、礼制文化的贡献

中国是礼乐之国、礼仪之邦，从中国文明开始萌芽形成开始，就带有这种以礼乐制度作为它特色的这样一种现象。中国礼乐制度的基本精神是讲和，以和为贵，和而不同。孔子说过：“上好礼，则民易使也。”司马迁说：“乐者，所以移风易俗也。”因此，中国讲礼乐之教，用礼乐作为教育的一个重要内容。古书记载，中国古代的礼仪起源于虞舜时代，《礼记》《淮南子》中多次提到“有虞氏之礼”、“有虞氏之路”、“有虞氏之旗”、“有虞氏之库”等有关文明礼制的描述。虞舜以乐教天下，“箫韶九成，凤凰来仪”，“百兽率舞”。《史记·乐书》载：“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歌《南风》之诗而天下治”。据传《南风》歌词是：“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后来孔子闻《韶乐》于齐，“三月不知肉味”。

七、关于清华简对虞舜中道、中和 思想观念提供的佐证

清华大学在2008年7月经校友捐赠，收藏了一批极为珍贵的战国竹简。根据清华简的记载，周文王遗言中有关于舜的内容，文王想用这些史事给太子灌输一个思想观念——“中”，也就是后来说的中道。在《保训》篇中文王说：“昔

舜旧作小人，亲耕于历丘，恐求中，自稽厥志，不违于庶万姓之多欲。厥有施于上下远迩，迺易位迨稽，测阴阳之物，咸顺不扰。舜既得中，言不易实变名，身滋备惟允，翼翼不懈，用作三降之德。帝尧嘉之，用受厥绪。”这段话讲的是舜怎样求取中道。由于舜出身民间，能够自我省察，不与百姓的愿望违背，他在朝廷内外施政，总是设身处地，从正反两面考虑，将事情做好。

中道、中和思想有什么历史渊源和现实意义呢？这使我们想起古代先贤的几段论述。子思所作《中庸》所载孔子的话：“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论语·尧曰》载尧命舜：“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并云“舜亦以命禹”。虞舜处事公平，中道而治天下。他提倡并践行中庸之术，“极高明而道中庸”，这对于我们构建公正公平的和谐社会，也具有现实意义。

八、湘鲁合作开启了舜文化研究优势互补的可行之路

由湖南省舜文化研究会、山东省大舜文化研究会、湖南省舜文化研究基地合作编纂，并由岳麓书社精编出版的《虞舜大典》（近现代文献卷）共八大本，凝聚了湘鲁两省学者的心血。加上已出版发行的《虞舜大典》（古文献卷），共有800多万字，这十大本《虞舜大典》，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与收藏价值。希望湖南山东两省专家学者继续携手合作，发挥各自优势，在继承前人成果的基础上不断取得新的成绩。

九、关于正确对待舜文化研究不同意见的问题

中国早期文明是多线性、多样性发展起来的，具有多元起源、多区域不平衡发展的特点。对舜帝活动范围以及卒地、葬地也有不同的说法，在学术研究与祭祀活动中也常常听到一些不同的声音。争鸣和论辩是学术发展的基础。问题总是在争议中平衡，方法总会在争议中优化。历史是前进的，事物是不断发

展的，虞舜文化研究也是如此。因此，我们应当正确对待研究中的不同意见。舜帝的传说究竟哪些是历史的真实？我们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正在逐步接近。我们所要做的工作就是通过科学的方法尽可能地揭开历史的真实。

（据记录稿整理）

（原载《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12年第11期）

五千年文明史是文化创造源泉

11月15日，刚在党的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在同中外记者见面时做了重要讲话。他在讲话中回顾历史，讲道：“我们的民族是伟大的民族。在五千多年的文明发展历程中，中华民族为人类文明进步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段对我国文明历史高度概括、热情肯定的话，使我们这些历史专业工作者深觉亲切和感动。

中国人常以我们民族文明历史的悠久而自豪。确实，在古代世界里，我们是最早跨入文明时代门槛的民族之一。早在西汉，《史记》的作者司马迁就在其《五帝本纪》篇首，根据当时存世的大量古代文献，结合多年亲身调查的民间口碑，追述了传说中炎帝、黄帝时期文明形成、国家创立的种种史迹。传说的炎、黄时期，推算距今即是五千多年。关于五千年前中国文明起源及其早期发展等问题，近年考古学与历史学界已有一系列发现和论证。

和中国大致同时，先后进入文明时期的，有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印度等古国，稍晚的还有如希腊。这些古代文明都曾经繁荣兴盛，在世界历史上有重要影响，然而后来均归于衰微，甚至断绝。只有中国的文明，在历史的长河中得以传流下来，尽管历经多少风风雨雨，朝代更替，始终没有中断，这在世界上是罕见的。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中华民族之所以能有上下纵贯五千年的文明历史，对人类做出多方面的重大贡献，正是由于我们的先民勤劳勇敢，有坚强的毅力、卓异的智慧，不仅能创造出本身杰出的文化传统，而且善于学习，能够吸取融合其他国家人民的文化、知识和技能。

当然，中国五千多年的文明历史不是没有曲折和停顿的。特别是到了近代，中华民族深陷于长达百年的危机苦难之中，我们文明的命运也可说是“不绝如

线”。中国人被讥为愚昧、无知，中国的文化遭到蔑视、歪曲以至否定，这是极不合理、极不公平的。

挽救中国文明历史走向衰微断绝的悲剧终结的，是中国共产党。如习近平同志在讲话中所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团结带领人民前仆后继，顽强奋斗，把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变成日益走向繁荣富强的新中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民族国家的振兴自然包括文明的振兴，带来文化的空前繁荣和发展。

中国五千多年的文明发展，为我们造成非常深厚的文化积淀，是十分丰富的文化创造源泉。我们历史专业工作者要深入学习党的十八大精神，探索历史发展规律，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的自觉自信，为实现十八大再次明确的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宏伟目标贡献力量。

（原载《中国教育报》2013年3月22日）

解读文明历史 增强文化自信

2012年11月15日，习近平同志在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后，与中外记者见面，做了重要讲话。他在讲话中回顾历史，说道：“我们的民族是伟大的民族。在五千多年的文明发展历程中，中华民族为人类文明进步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是对我国文明历史的高度概括和热情肯定。

我们中国人从来十分重视自己民族的历史。我们有汗牛充栋的历史载籍，有悠久丰富的史学传承。历史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不可或缺的核心，也是我们文化创造取之不竭的源泉。曾经有外国著作讲中国人是“历史的民族”，这在一定意义上确实是恰当的。

五千多年源远流长的文明历史，使每一个有识见的中国人引以自豪，支撑着中华民族的自尊心和凝聚力，使我们得以树立坚定的文化自信。“中国古代文明属于全民族，属于世世代代的人民，是全人类珍贵的遗产。……爱国需要读史。人们说，无论是学社会科学的，还是学自然科学的，都应看一部关于历史的简明而可靠的书。‘历史上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鲁迅《华盖集》）学习和了解历史是人类共同的追求。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文化是由五千年历史进程炼凝荟萃而成。”^①以上这些非常精辟的话并非出自历史学者之口，而是自然科学家、技术科学家宋健先生在1996年说的。我以为所有持“历史无用”观点的人，都应该体味一下上面的话。

五千年的文明历史诞生和发展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让我们考虑五千年的时间意味着怎样的概念。古人说三十年为一世，这对于人间世代间隔的估计可能嫌略长一些。如果以一个世代平均二十五年推算，五千年就相当于约二百代人。这二百代的中国人，怎样从原始蒙昧进步为文明，怎样建立了幅员广阔

的国度，创造了高度发达的文化，体现出何等的智慧、才能和勇气，在世界上起了多大的影响，对人类做出了哪些贡献，给今天的我们留下了什么经验和教训。这里正有着许许多多的重要课题，等待我们思考、探索和解明，下面我试提出几点，与大家商榷。

其一，是揭示中华文明起源形成的机制。

一个文明所具有的文化特点，每每是在该文明开始形成的时期就已经初步存在了，因而对文明的考察必须追溯其起源。具体说来，中华文明起源的问题，便是探讨中华民族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以怎样的形式跨进文明时代的。

大家都熟悉，中国是古代世界中有自己独立起源的文明的国家之一。与我们大略同时进入文明的，在欧亚大陆及北非还有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印度等古国。文明的产生和形成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一定要讲出某个古国在哪一具体年代成为文明，是没有什么意义的。我们只要了解到在大约五千年前，这些古国先后形成了文明，也就足够了。

可是有些人不相信中国有那样长远的文明历史，他们不承认中华文明有自身独立的起源，而主张中国文化的外来说，特别是西来说。这种观点出现颇早，极端的实例如德国学者祈尔歇，他讲中国人都是《圣经》人物闪的一支后裔，漂流转徙到了中国，带来了文化。其中的文字源于埃及，只是中国人未能全部掌握，结果成了汉字。类似的荒诞说法还有不少，有的还遗留到现代。

中华文明的西来说，根源在于以欧洲为中心的文化传播论，以致不相信中国的先民有独立创造文明的能力和智慧。这种观点在学术史上曾有不小影响，大家会记得，在中国发现仰韶文化的瑞典著名考古学家安特生也曾为这种说法所沾染，是中国多位考古学家通过一系列考古工作和研究，才得以驳正。西来说以及其他中华文明的外来说，近年已较少出现了，但中华文明如何起源形成的问题，仍然摆在我们面前。

曾长期在美国哈佛大学任教的张光直先生，在他晚年论述中国文明起源时说：“我觉得，我们需要做一些很重要的工作，就是要把西方社会科学的法则来和中国丰富的历史经验加以对比，看看有多少是适用的，有多少是不适用的。我相信大部分代表人类的法则是可以适用的，但有一部分是不能适用的。这些

不能适用的部分有的就牵涉到文明城市和国家的起源问题。”^②张光直先生这里说的“法则”，用我们更习惯的话讲，就是“规律”。

人类历史有其普遍的规律，有在规律下显示的共同性、一致性，但不同民族、国家的历史又有其本身的特殊性、个别性，而我们对历史普遍规律的认识，是通过各个民族、国家具体历史的综合比较来萃取的。例如现在大家讨论文明起源，涉及判断是否属于文明的标准，一般流行的说法有一定规模的城市、礼仪性建筑物、文字的发明和金属器（青铜器）的使用等。我曾多次说明，这三四条标准是以若干外国古代文明的材料为基准的，并且从开始提出便有争论。

实际上，城市、文字、金属器等都是文明的因素，在各个古代国家、民族间其发展都是不平衡的。正是这种不平衡，使各自走向文明的轨迹不同，构成了文明起源过程的多样性。像中国这样地域广阔、人口众多的国家，其文明的兴起应当有其特有的途径。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出发，深入进行考察探讨，必将使我们对人类文明早期发展的规律有更深刻的认识。

其二，是探讨中华文明绵延持续的原因。

上文说过，中华文明与古代埃及、美索不达米亚等文明一样，是人类最早创立的有独立起源的文明之一，然而和其他大约同时期起源的古代文明不同的是，中华文明不仅兴起甚早，而且传流久远，延续至今。古代埃及、美索不达米亚等地的古文明，很早就绝灭了，直到近现代，才在考古学家的发掘中陆续显现出来。还有稍晚出现的希腊、罗马古典文明，当时繁荣昌盛，留下深远的影响，不过到了中世纪，仍然归于中断。惟有五千年前始源的中华文明，尽管经过世代代，风风雨雨，却能一直传流下来，不曾断绝。其中原因，难道不是特别值得思考探索么？

记得前几年，我应邀在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组织的论坛演讲，提到中华文明绵绵不绝，认为是比所谓“李约瑟问题”更难回答的问题。论坛上有听众要求我一定要给一个解释，我想到的是：中国的文化传统有一个特殊优长之处，就是包容性。

我们文化传统的包容性兼及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内的，一方面是对外的。

对内的，是指国内各地区、各民族在文化上的互相影响交流，融会贯通。史学界同仁都注意到，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趋向，是强调了我们中国从来是多地区、多民族的国家，而光辉灿烂的中华文明是各地区、各民族的人民共同创造的。恰恰是由于有多地区、多民族的文化来源，使我们的文化传统有多彩的面貌、多样的成果。

对外的，是指中国人在历史上一贯善于学习和引进外国先进的、有益的文化。我们有时形象地将这种学习、引进喻为“取经”，实际上中国历史中的“取经”，即吸收印度等地的文化学术，在史籍中有极多的描述记载。至于近代中国人之对待西学，更是众所周知的了。现任俄罗斯远东研究所所长的汉学家季塔连科便说：“中国文化的特征之一就是从不机械地学习外国文化，而是把一切外国的经验‘中国化’。”^③这一点乃是中华文明历久弥新的原因之一。

其三，是论证中华文明演变进步的轨迹。

上面说到中华文明不仅传统久远，而且是历久弥新，这已经谈到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又一特点，即在历史上不断更新和进步。在这个方面，我们不同意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停滞论。

停滞论可以承认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历史，然而否认这五千年历史是一个不断进步的演化过程。持停滞论者主张中华文明是落后的，而且是不变的，中国历史纵然有种种变化，自整体来看，其实质是停滞不前的。所有变化只能限于循环的运动，周而复始，没有真正的进步可言。

这种理论的代表人物，可举出从德国去到美国的魏特夫，他晚年撰写的《东方专制主义》一书，曾在我们这里引起过不少讨论。魏特夫认为中国的社会是以水利为基础的专制主义社会，中国的自然地理环境决定了没有大型的水利工程，就不能维持必要的农业生产，而这样大型的水利工程，必须有专制主义的政权才能建设和控制，从而这样的社会及其文化是停滞不变的。魏特夫主张，中国人自己不可能改变历史，只有西方文化的输入才能打破循环，使之有根本的改变。

停滞论不符合中国的历史实际。尽管史学界对中国历史划分为哪些阶段，以及如何划分，迄今还有不少不同见解，但是中国历史，包括社会史和文化史，

都可以而且必须划分为演变递进的若干阶段，则是显然易见的。只有以发展的眼光看待，才能说明五千年文明历程的真相。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是阐述中华文明对人类做出的贡献。

我们说中国历史不断演进发展，并不等于说我们的文明历史没有曲折和停顿。特别是到近代，中华民族深陷于危机苦难之中，我们文明的命运也面临危殆，遭到怀疑、蔑视、歪曲，以至于否定。

听到过各种各样否定中华文明的声音，比如说：中国历史上没有科学，只有技艺；没有哲学，只有思想；没有宗教，只有迷信；没有医学，只有巫术，等等。其实完全不是这样，只是用西方的概念来套，没有与他们一样的科学、哲学、宗教、医学等等而已。中华民族有自己的文化传统，曾经发展到高度，影响到世界，乃是不争的事实。^④

最近看到一本外国学者写的书，题目是《字母表效应》，著者认为：“字母表为发明之母。与中国象形文字不同的是，字母表和拼音文字培育了西方人分析和逻辑的抽象能力，西方文化中的独有特征——典章化法律、一神教、抽象科学、逻辑和个人主义——也与此息息相关。”^⑤这样说，似乎中国人命定不能有现代的文明了。有意思的是，与这本书中文版问世差不多同时，中国科学院院士汪品先先生提出要“培育一个以汉语为基础的创新平台”，因为“汉语有着不同于拼音语言的优势”，“它的形象传递的不仅是读音，还有画面，包含的信息更丰富”。^⑥

对于中国文明历史产生种种误说的原因之一，是我们还没有更多更深入地说明和介绍我们民族在历史上曾做出的贡献，也没有充分认识我们自己文化传统的优长和不足之处。进一步研究解读五千年的文明历史，将能丰富我们的文化内涵，增强我们的文化自信，从而为今后世界的文明进步做出新的贡献。

注释

① 宋健：《世纪之鹄》，第367页，原子能出版社，2002年。

② 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第483页，三联书店，1999年。

③ 见《社会科学报》2012年12月13日第3版《以中国学研究服务当代中国发展》。

- ④ 参看李学勤:《辉煌的中华早期文明》,收入《通向文明之路》,第5—18页,商务印书馆,2010年。
- ⑤ 《文汇报书周报》2012年11月23日第16版《字母表效应》的广告。
- ⑥ 《文汇报》2012年11月14日第9版“本报讯”。

(原载《社会科学战线》2013年第3期;《红旗文摘》2013年第5期)

清华简的文献特色与学术价值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系于2008年7月15日入藏，经过清理保护和鉴定、拍照、试读等过程，当前的主要工作是进行缀合、编排和分篇，并逐篇进行隶定和释读。到目前为止，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业已发布三辑整理报告。经过学者们的研究，清华简的价值越来越显现出来，受到学界同仁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清华简的价值首先基于它的文献性质。与以往的几批重要简帛文献相比，清华简在内容方面的重要特色是：主要由经、史类文献构成。

大家都知道，过去发现的战国时期的竹简，大都是楚简。楚简中，许多属于遣册之类，不是书籍，有些是墓主人在世时的一些祭祀、占卜材料，也不能算是真正的书籍。现代发现的战国书籍，最早是1956年在河南信阳长台关发现的，即长台关1号墓出土的《墨子》佚篇。作为墓主人生前藏书随葬而被大批发现的简册，近年来主要有三批。第一批是1993年湖北荆门郭店1号墓出土的郭店简，因包含有《老子》等而闻名于世。1994年上海博物馆从香港抢救回的一批战国简，简称为上博简，也包含有大批珍贵的战国书籍，如《孔子诗论》等。这两批竹简主要内容是属于儒家和道家的理论著作，而清华简的特点则正如前面所说，主要是经、史类书籍。

中国古代也曾有过经、史类简册书籍的出土和发现，著名的有汉代的孔壁藏经和西晋时期的汲冢竹书。孔壁藏经主要包括《尚书》、《礼记》、《论语》等，汲冢竹书中最为著名的是《竹书纪年》，也有《易经》类文献。这批书籍中流传到现在的还有《穆天子传》。清华简可以说是历史上第三次这类重大发现。

中国古代自春秋时期起即《诗》、《书》并称，《尚书》和《诗经》在古文献中最显典重。清华简中就包含着丰富的《尚书》类和《诗经》类的文献。其中，

《尚书》类文献分为以下几种情形。

第一种情形，是西汉伏生所传《尚书》里就有的篇目，比如《金縢》。在清华简中叫《周武王有疾周公所自以代王之志》，实际就是《金縢》。因为《周武王有疾周公所自以代王之志》虽然若干文字与传世《尚书·金縢》有所不同，但基本内容是一样的，确定为《金縢》没有问题。

第二种情形是，有一些篇目是伏生所传《尚书》二十八篇所无，而在后来的所谓古文《尚书》中有的，比如《说命》。《说命》孔壁十六篇里没有，《百篇书序》里有，而且说得很清楚，说“《说命》三篇”。清华简的《说命》就是三篇，称为“传说之命”。清华简的《说命》每篇都写着篇名“传说之命”，可见这三篇是一体的。为称呼方便，我们把它称为“上中下”。它们是不是《百篇书序》所言《说命》三篇，当然可以讨论。再比方说《尹诰》，《尹诰》在《礼记·缙衣》里面被引用过。

再有一部分，是伏生所传今文《尚书》，或者孔壁发现的古文《尚书》，或者在《百篇书序》里都没有，而见于《逸周书》。这一点特别重要。

大家知道，《逸周书》里有些篇，在先秦古籍里引用的时候，就叫“周书”，说明它们属于《尚书》类文献。《汉书·艺文志》有“《周书》七十一篇”，《汉书》颜师古注引刘向语，说是“盖孔子所论百篇之余”。《逸周书》里的《祭公》、《皇门》等，在清华简里面都有。在清华简中，《皇门》、《祭公》和《金縢》、《说命》一样，地位是平等的。抄写的情况，比如简的大小等，都完全一致。可见在先秦时候，是拿它们当《尚书》看的。还有一些，是明显只见于《逸周书》的，比如《程寤》篇。《程寤》汉代肯定是在《逸周书》里面。《潜夫论》里面已经引了，东汉以后，一直在引用，到唐代的时候，佚失了，只剩下佚文。清华简中的《程寤》是全篇。

清华简中还有些篇，看起来就像《尚书》，可是今文、古文《尚书》里都没有。清华简一共有六十多篇，接近三分之一是《尚书》一类的文献。

另外一方面，值得特别注意的，就是《诗经》类文献。《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中，有一篇叫《耆夜》，记载“武王八年”戡黎，战胜黎国之后，举行了一个庆功会。庆功会上，周武王、周公都作了诗。特别是在周公作的诗中，

有一篇称为《蟋蟀》。大家知道，今本《诗经》有《唐风·蟋蟀》，《毛诗序》说是刺晋僖公的诗。那怎么在清华简中说是周公作的呢？当然这是战国时代的一个记载。事实究竟如何，很值得研究。

《诗经》类文献中更值得人们重视的，是我们在清华简第三辑发表的《周公之琴舞》和《芮良夫毖》这两篇。《周公之琴舞》是原标题，诗篇的标题上就写着周公的名字。开头像小序似的，有几句话，明确说这些诗是周公和成王所作。这组诗现存的共有十篇，其中一篇就是今本《周颂·闵予小子之什》的《敬之》。其余九篇，人们根本没见过。将清华简的《敬之》和今本对勘，可知虽有异文，但大体一致。从《敬之》篇来看，《周公之琴舞》为《周颂》之体，但其编排形式和篇中的“乱曰”等字样，是与今本《诗经》不一样的地方。孔子在《论语·泰伯》篇中曾说：“师挚之始，《关雎》之乱，洋洋乎盈耳哉！”《国语·鲁语下》中鲁国的大夫闵马父也提到《商颂》的“辑之乱”，这些在今本《诗经》中都没有得以显示。它的意义何在，值得研究《诗经》学史的朋友们认真探究。

至于《芮良夫毖》那就更清楚了，因为它作者是明确的，是芮良夫。芮良夫是西周晚期厉王时候的一个著名的贤臣，很多重要的先秦文献比如《国语》中都记载有他的事迹，现存《诗经·大雅·桑柔》篇就是他作的，被称作长篇。《芮良夫毖》这篇诗分为两个部分。两个部分加在一起，有一百八十多句，比《桑柔》还长。《诗经》所有的诗篇里，没有比这个长的，实在令人称奇。

清华简中还有其他一些重要文献，比如第三辑中的《赤骭之集汤之屋》，情节曲折生动，对于中国早期小说史的研究非常重要。《良臣》的某些内容可以与《春秋》和《左传》对勘。《祝辞》的一些内容可以补充《仪礼·射仪》等。

我们之所以着重提到清华简中的经、史类文献，不但是因为清华简中这类文献所占比例高、数量大，引人注目，更重要的是经、史类文献本身所具有的巨大学术价值和文化意义。从文化制度来说，先秦时期是礼乐社会。经、史类文献反映了礼乐社会的社会制度和主流意识形态，它的精神为先秦诸子所继承，尤其是经过儒家整合与发展之后，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论核心，对于我们今天的文化传统还产生着重大影响。清华简中经学文献的大量发现，无疑对学术史研究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但其意义并不限于此。

我曾有一个谈话，发表在2010年8月4日的《中华读书报》上，题目是《国学的主流是儒学，儒学的核心是经学》。在那篇文章里，我提到一个历史事实，“就是在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里面，儒学是主流，而经学又是儒学的核心。不研究经学，不了解经学，应该说没有把握住我们传统文化的主流和核心的部分。”

清华简中的经、史类文献，实际多数是后世所说的经学文献。《诗经》就不用说了，在今天一般人看来属于历史著作的《尚书》和《春秋》，也是六经的构成部分，这是大家都熟悉的常识。经学文献在楚简中大量出现，是意味深长的。楚国主要是一少数民族群荆楚聚集的地方，郭店楚简和上博简、清华简年代大约在公元前三百年左右，这个时代就是方以智所讲的“三子会宗”的时代，孟子、庄子和屈原都生活在这个时期。由经学文献在楚地的大量发现，人们可以想见战国时期的楚国是怎样的一个文化面貌，楚文化与中原主流文化是怎样的一个关系。这对于整个中华民族发展史的研究都有重要的意义，而不仅仅局限于文献方面的学术研究。

（姚小鸥教授整理）

（原载《文艺研究》2013年第8期）

出土文献与古史重建

中国有五千多年的文明历史，然而和其他古代文明国家一样，我们的古史越向上追溯，就越显得模糊荒昧。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是由于时间相距久远，当时能传留到后世的信息不多，同时受古人思想观念影响，真实的历史信息常与种种神话传说混杂在一起，不易分辨。因此，古史已被遗忘淡化，需要重建，而问题的核心在于重建的方法途径。

上世纪20年代开始，持续到抗战的《古史辨》大讨论，归根结底正是古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以顾颉刚先生为代表的疑古学者，接续康有为、崔适的学说，对传统的古史观做了全盘的检讨清理。在这一讨论期间，王国维先生1925年在清华讲授《古史新证》，提出了著名的“二重证据法”，既批评了“信古之过”，也指摘了“疑古之过”。他认为疑古学者“其于怀疑之态度及批评之精神不无可取，然于古史材料未尝为充分之处理也”。所说“二重证据法”，是以“地下之新材料”补正“纸上之材料”，两者互相印证。作为古史研究的方法论，王国维这一论点对学术界有深刻启发，成为后来中国古史研究和考古学密相结合的先声。

王国维所讲的“二重证据法”，是以他本人多年研究实践的丰硕成果为基础的，自然也难免受到他那个年代历史条件的限制。他在《古史新证》讲义中列举“纸上之材料”，从《尚书》、《诗》、《易》，一直到周秦诸子和《史记》，差不多包括了所有有关的传世典籍，而“地下之材料仅有二种”，即甲骨文字与商周金文。王国维当年只能提到这两者，因为那个时候中国的现代考古学仍处于发轫阶段，到后来李济先生论“古史重建”时，就将田野考古放到突出的位置了。

甲骨文和金文，用现在通行的词语说，都属于出土文献，所以王国维心目中的“二重证据法”，实际上是传世典籍与出土文献的彼此印证。尽管如此，王

国维依据他所能利用的出土文献甲骨金文材料，在古史研究方面做出了辉煌的业绩。他的几篇名文《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殷周制度论》等，都是不朽的论作。特别是他对商朝世系的论证，说明了《史记·殷本纪》的基本真实可信，使“载祀六百”的商代历史存在确立无可怀疑，实在是古史研究中的大事。我们依据出土文献来重建古史，应当以王国维先生的工作作为范例。

今天，在中国考古工作迅猛发展之后，与古史研究密切关联的出土文献，其内涵的丰富、品类的繁多，都远远超出王国维那个时代所能想象。出土文献研究本身已经形成了四个学术界公认的学科分支，即甲骨学、青铜器及金文研究、战国文字研究和简帛学。通过这几个学科分支的进步，学者们正在古史重建的道路上不断前进。

以下就让我们展望一下出土文献研究对古史重建可能取得哪些成果。

先谈甲骨学。近些年来，对于殷墟所出商代晚期甲骨卜辞的分期断代，学者已经建立了新的学说系统，将卜辞分别为王卜辞和非王卜辞，再把王卜辞划分为小屯村北与村中南两系，这大大便利了卜辞的整理释读，使卜辞所反映的史事更清楚准确地显现出来。

现在知道，殷墟甲骨卜辞以两个时期的为最多，一个是武丁时期，一个是商末文丁、帝乙、帝辛时期。

武丁即传世典籍中的殷高宗，据说在位59年，属于他的时期的卜辞，差不多占有殷墟卜辞的一半。特别是小屯YH127坑和花园庄东地出土的卜辞，已经得到初步整理，相当详细地展示出武丁盛时的历史面貌。

商末的甲骨，包括村北系的黄组卜辞和村中南系的无名组晚期卜辞，数量也比较多，内容涉及重要历史事件，如对孟方、夷方等的战争等。同时，这个时期的金文亦多，不少可与甲骨卜辞联系对照，增加我们对当时历史的认识。

由上世纪五十年代起，发现了在商代甲骨文以外还有西周的甲骨文。西周甲骨卜辞迄今已有一系列发现，地点广及山西、陕西、北京、河南以及山东，但是数量较为零碎。其间最重要的是陕西岐山凤雏和周公庙出土的卜甲，其卜辞对于研究周初历史有很大裨益。

青铜器及金文的研究，虽然起源甚早，在宋代已相当发达，然而近年还是有非常大的进步。西周王室世系的证实，是一个显著的例子。上面我们已经说到王国维以来的学者怎样根据甲骨文的研究，证明了《史记》的商王室世系基本可据，但西周世系的论证要晚了许多。1976年陕西扶风庄白出土的史墙盘，列举了文王、武王、成王、康王、昭王、穆王的称号，作器时的“天子”是恭王，这只有世系的前一半。到了2003年，陕西眉县杨家村出土了逯（佐，或释迷）盘，在恭王之下又补上了懿王、孝王、夷王、厉王，作器时“天子”是宣王，这样，除西周末一代幽王外，世系业已完整，列王次第全同于《史记·周本纪》。

西周有三个时期的金文，数量最多，内容也最重要。

首先是周初的武王、成王时期。如利簋记伐纣牧野之战，大保簋记平武庚三监之叛，匱方鼎、禽簋记周公东征，沫司徒送簋记封康叔于卫，何尊记营建洛邑，等等，都可与《尚书》、《史记》等典籍对照。

其次是西周早期之末的昭王时期。古书所载昭王向江汉地区发展，如古本《纪年》说的征伐楚荆及到南方巡狩史事，大都可在金文中得到确证。比较重要的，关于伐楚荆有令簋、京师峻尊、胡应姬鼎等；关于南巡的有静方鼎、中方鼎、中甗、析尊卣等。

再就是西周晚期的厉王、宣王时期。过去关于厉王时历史，能从古书里知道的，差不多只有任用荣夷公专利，激发国人起义一事。由于一批当时金文，如宗周钟、伯戈父簋、蓼生盃、鄂侯驭方鼎、禹鼎等的发现和考释，大家才了解到厉王之世南夷、东夷入侵，造成战乱的情况。至于后来宣王继位，王朝对南方夷人与北方獯豸作战等情节，有不其簋、虢季子白盘、兮甲盘等金文。宣王十八年的驹父盃、二十三年的文盃，更是所谓“宣王中兴”的证据。

既属于战国文字研究，又属于简帛学，兼跨这两个学科分支的出土文献，是战国简帛。大家知道，在过去历史上有过两次战国简书的重大发现，就是西汉前期的“孔壁中经”和西晋初年的“汲冢竹书”。前者之中的古文《尚书》、后者之中的《纪年》，都长时期影响着古史的探究。近年战国简帛有一系列发现，内容为严格意义书籍的，主要有三批，即1993年在湖北荆门郭店出土的郭

店简，1994年上海博物馆入藏的上博简，2008年清华大学入藏的清华简。

郭店简、上博简和清华简都是在公元前300年前后书写的，其文字是当时的楚文字，其性质是秦代焚书以前的书籍，书的类别则互有不同。郭店简是儒家和道家的著作，上博简亦以儒书为主。清华简则主要是经史之类的典籍，其间以《尚书》一类文献为多，也有《诗》、《礼》、《乐》、《易》等内容。值得注意的是在清华简里面已经整理出一部完整的史书《系年》，共有23章，概要地记述了自周朝建立直至战国前期的历史。清华简还有一篇《楚居》，详细记载了楚国的世系和历世都邑所在，如结合上博简多种有关楚史轶事的篇章，可能对楚国历史有所补充修正。

可以预见，出土文献的品类和数量将越来越多，通过“二重证据法”，与传世典籍结合互证，我们一定能够更好地重建古史，阐明我们民族、国家和文明的起源。

（原载《光明日报》2013年9月11日）

具茨山与上古历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如刚才王震中先生所说的，具茨山的岩画和石构建筑等的发现，实际上已经讨论有一段时间了。刚才我们在录像上也看到了，也已经举行了多次的相关学术讨论会。经过这些研讨会，特别是新郑市编著的一些著作和图录，已经使这个发现为世所周知。特别是河南省和新郑市各方面的领导，邀请和组织历史学、考古学、岩画研究以及艺术等各个方面的专家学者，集中力量对具茨山的岩画做了调查研究，已经取得了相当明显的成果。对于这个成果，我们应该给予一个充分的估价。今天这次研讨会一定会更进一步把这一发现和中华文明起源问题结合起来，进行深入的探讨。在更高的层面上深化这方面的研究，这样的话一定会有更大、更好的效果。我自己能有机会参加这个会，应该向主办、承办的各方领导和在座的各位表示特别的感谢。

我今天发言的题目叫《具茨山与上古历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题目也可以这么说：《古史传说是中国古史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个说法我以前在一些会议上也提过了，今天在这里再申述一下。我想大家都知道我们中国的历史，都知道二十四史，最近刚刚有一件学术界的大事，就是《史记》标点本修订版的发行，不但在我们国内举行了首发式，而且在世界上举行了首发式，这对于中国历史研究也是一个重要的贡献。

二十四史头一部就是司马迁的《史记》，《史记》是以《五帝本纪》为首的，《五帝本纪》是以黄帝为首的。我常常说这个不是一个偶然的事情，以黄帝作为我们正史的开始，这一点不是偶然的，而是反映了我们祖先以来传统的文化理念，肯定了中华文明的开端和作为人文初祖的黄帝的历史地位，对这点应该有明确的认识，而黄帝的历史传说，从来就是和具茨山和新郑结合在一起的。

具茨山，什么叫具茨？我很希望在座的各位先生给我讲一讲。这个词本身

非常古老。什么叫具茨？为什么叫具茨？这两个字名称本身就看出来它的历史久远，这是非常古老的词。而具茨山有关的历史可见于先秦文献，正如刚才刘五一副市长在他著作里已经记录的，目前我们能找到的是《庄子》的《徐无鬼》篇。徐无鬼我个人意见应该念徐无畏（wei），无畏这是当时的人名。不管怎么样，庄子的《徐无鬼》篇是战国时期的著作，这篇著作里边曾经记述：“黄帝见大隗于具茨之山。”这是我们今天所能够查到的关于具茨山的最早记录。当然，以前可能还会有，可是我们目前在其他的材料里还没有发现。而“黄帝见大隗于具茨之山”，《水经注》里面有一个明确的解释，说“大隗山即具茨山也”。黄帝见大隗，当时大隗是一个神性的传说人物，可是它也是这个具茨山的名称。因为有这个人物，所以就有这个山名，所以说大隗山就是具茨山。这是《水经注》里从地理角度提到的。可是《水经注》同时也提到了新郑，《水经注》说当时的新郑县故有熊氏之墟，黄帝之所都。《水经注》这句不是他本身说的，而是根据皇甫谧的《帝王世纪》，皇甫谧是晋代的人。皇甫谧的《帝王世纪》明确说了，新郑是有熊氏之墟，是黄帝之所都，就是黄帝的都城。这也就是说，关于具茨山和新郑的传说，自古以来都是结合在一起，不能分开的。这个传说不是后人造的，而是长久存在的古史传说，这点是我们特别明确的。所以我们研究具茨山的岩画和上面的石构遗址等其他各个方面，都要考虑到这个传说的历史背景。

新郑和具茨山和黄帝的历史传说是有非常密切、不可分的关系，这点对我们探讨中国文明起源，和其早期的发展，有很重要的启示意义，对我们理解具茨山岩画以及有关的考古遗址，它的历史背景和历史地位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这是我今天在这里说的一个主要的想法。

可是我们大家也应该充分注意到，像黄帝这样的古史传说，在今天探究上古历史和文明的时候，究竟应该怎么看待这些古史传说？这些传说居怎么样的地位？起什么样的作用？在我们研究里面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位置？这个问题一直到今天还是有待阐明的问题。我也提请在座的各位专家学者，应该进一步探讨和讨论。具体说起来的话，有些学者和著作，这里面包括国内外的，我必须特别说明，今天尤其是一些国外的汉学家，他们认为黄帝和类似的中国古史

传说，可以说基本上，甚至可以说完全没有什么历史价值，好像是禁区，是不能提的。对于这样的古史传说应该怎么看？《五帝本纪》内容是不是完全是后人的虚构？或者说是伪史？这样的话，有必要来考虑我们研究上古历史方法论的问题。我们应该怎么看待这些问题？这个问题我觉得值得我们今后和在这个会议上的各位专家讨论和研究。

根据司马迁本人的叙述，《五帝本纪》的写作不是一个很简单的记述和传说性的东西，而是经过很长期的工作。《五帝本纪》后面司马迁“太史公曰”讲的一段很清楚。他说，“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尚书》里面没有黄帝的内容，百家诸子言黄帝又有很多矛盾、不雅驯的地方，“荐绅先生难言之。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五帝德》和《帝系姓》现在还存在，存在于《大戴礼记》，这两篇文章跟《五帝本纪》对比，可知《五帝本纪》内容正是根据这两篇文章。这两篇是战国时候的著作没有疑问。因此《五帝本纪》讲黄帝是根据历史传留下来的文献做了大量的研究，他不但考虑到儒家的著作《五帝德》、《帝系姓》，还考虑到诸子百家各方面的材料，做了充分的收集，同时很重要的就是他做了旅行和实地的调查研究。大家知道，他说，西至崆峒，北到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就是他本人北边到了河北省的涿鹿，西边到甘肃，东边到了大海，南边到淮河、长江地区，进行了大量调查，这些地方的长老所说的，就是民间的传说，都有关于黄帝的内容。“风教固殊焉”，就是说虽然他们当地的民族传统、文化的性质不一样，总之一是“不离古文”，和传世的文献基本上是符合的。大家明白，这几句话不是简单说的，《五帝本纪》不是随便写的，它不但做了大量的文献研究和校勘，而且做了实地的传说的调查，把这两个结合起来，认为这些方面，基本上是合符的，才写成《五帝本纪》。我觉得这种研究方法对今天来说还很有启示，我们也应该这么做。我们不能偏废一个方面，我们只根据传世文献来解释历史传说，这还是不够的，还要根据各方面的调查和有关的研究来做，司马迁给我们做了榜样。以《五帝本纪》为代表的古史架构是不能够简单否定的。当然大家都会原谅古人的，因为古人没有现代的考古学、文献学等各方面的技术和知识。今天我们的研究条件与古人是不相同的，可是古人

所做的这些工作，我觉得应该还有借鉴之处。

刚才讲的在这里我要特别说一下，对于古史传说之类进行根本否定的疑古的学风，否定中国传统的古史架构，在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前半叶，是有关中国古代研究的一个普遍现象，并不是哪位先生个人说的。我觉得这是学术史上的一个重要的潮流，对于这个潮流里面涉及到的人物，我们应该区别来看。因为大家要知道，疑古学风的开始，像顾颉刚先生自述里面所说的，是从康有为，后来还有北大的崔适，他说受康崔之学。康有为的疑古跟后面的像胡适先生、顾颉刚等先生，他们的疑古性质不同，因为康有为要变法维新，所以要对古代一些正统的观念加以改变，提出孔子改制，是一个变法的维新派。他的学术观点是和他的政治主张是密切结合起来的。

在这之后，现在讨论的话还应注意到有些学者提到的日本人白鸟库吉。白鸟库吉在日本影响很大，今天在这不多做评论，因为他后面的研究是很清楚的。这个白鸟库吉讲“尧舜禹抹杀论”，他的兴起和日本历史所谓的“脱亚”，就是要离开亚洲，摆脱中国学术文化的影响，应该说是相关的。

这里我要特别强调，后来在新文化运动开展后兴起的以胡适先生早期的见解、以顾颉刚先生代表的“古史辨”的学派，我一直认为这是一个进步的思潮，是新文化运动一个组成部分，他们所做的工作有很重要的启蒙和进步意义。从1923年开始，古史界的讨论，疑古学风影响很大，到现在它的影响不只在国内，特别是在海外。在海外你讲讲黄帝试试，他们绝对不会肯定的，主要是受这样学风的影响。

在新文化运动中疑古学风兴起之后，关于疑古学派就有一些不同的批评，有几点意见，对于这方面的批评和纠正，我想至今还有借鉴的必要。首先一点就是王国维先生，他对于疑古学风的批评不是在事后，是当时。大家知道，“古史辨”的开始是在报刊上，是在1923年，他的《古史辨》第一册的出版是1926年，我常常说王国维1925年在清华做《古史新证》，和“古史辨”有关。王国维先生为什么要说这个问题，他自己有一个叙述，后来他的学生戴家祥先生也有追忆。在这个学风兴起之后，大家就问王国维说，王先生，你对这个问题怎么看？他说，怀疑的精神是对的，可是在建设方面不够。王国维先生后来在1925

年秋天在清华讲《古史新证》的课，里面谈了几个问题，都是根据他本人多年以来，对于古史，包括文献以及当时居于最前沿地位的甲骨、金文的研究，所得出来的结论和观点。

首先一点，他指出来，你说古史传说里面有神话因素这是不可否认的。比如说黄帝见大隗于具茨山，如果说大隗是神的话，黄帝后来升天了，这个不也是神话嘛？那么这个是不是就没有研究价值了？这个王国维说得很清楚，他特别说这一点，他说上古之事传说与史实混而不分，这是世界各国之所同。我们现在看，我们看各国的古代文明的历史，开始都是从神话里面出来的。大家如果有兴趣，找一本外国的，比如讲埃及史，或者讲希腊史的书，开头一定讲神话，包括埃及南北怎么统一，怎么戴着红帽子和白帽子，等等，都有一套神话观点。所以说并不是有神话因素的这样的古史传说，就不能够信据和不能够研究，我们是要把它区分开来，找出它的史实的背景，这是王国维先生提出来的。

第二点，王国维先生还指出来，在上古没有文字的时代主要就是依靠口传，这话完全对。因为你说黄帝时代的话，找当时的文字记载一定找不着，所以你要要求它像甲骨文一样，有当时的文字证明做不到，是不可能的。这个要求不合理，因为当时的历史都是口传下来的，古代的传说中间神话的因素就是这么进去的，经过长时期口传，才变成记载。这样一些古史传说就没有研究价值，那样说的话，古代文明早期就不能研究。这个问题，王国维先生虽然不是说得很明确，可是在他文字里已经可以看出来。

再有一点，晚出的文献，甚至于百家的杂说，都应该参考。王国维先生大家知道，在甲骨文研究上做出了重大贡献。当然不是他自己，还有罗振玉先生，一起发现的就是王亥，王亥的发现。大家要知道王亥不是商代的，已经是非常之古老的一个人物，是商汤的七世祖，商汤之前七世，二百来年了。可是王亥这个人，在古书里面基本看不见，经过甲骨文的研究，然后从诸子百家甚至《山海经》等著作里面把这个故事钩稽出来。那么这样的发现，使我们看到即使是很晚的一些诸子百家的书，甚至于像《山海经》这样怪异的作品，它还都有历史价值。我觉得王国维先生对于疑古学风的这点意见也是很重要的。这是王

国维先生的批评。

再有一点也非常有意思的，就是钱穆先生的批评。我想大家知道，钱穆先生与顾颉刚先生的特别关系。钱穆先生本来是江南的中小学教师，那时候对中小学教师跟今天的看法不太一样。他读了康有为的著作，就写了一篇文章来反驳康有为的论点，这篇文章被顾颉刚先生看到了。文章的论点和顾颉刚先生的刚好相反，可是顾先生是极其大度的，不但把他的这篇文章在《燕京学报》上发表了，而且亲自提笔改了篇名，使其篇名更好一些。原来叫《刘向、刘歆、王莽年谱》，这个名不太好，顾颉刚先生就把它改成《刘向、歆父子年谱》，这个今天原稿具在，而且不但是把反对他的文章发表了，而且说你不应该在小学教书，应该到大学当教授，介绍钱穆先生当教授。这样的气象，我想今天我们很难找出一个学者能够比得了。

可是钱穆先生对于疑古的观点，他也有一个批评，他说顾颉刚先生提倡“层累造成的古史说”，觉得古史是越编越长，是不断层累造成的，大家知道这是顾颉刚先生典型的论点。他说你不要忘了，古代的历史还不断在被遗忘，是层累遗忘的古史，很多古史内容经过几千年，不断地遗忘掉。钱穆先生这个论点是王国维先生和其他的不同意疑古学风的人所从来没有提出的。

大家知道还有张荫麟先生的批评，张荫麟先生是学过哲学的，他从逻辑学上来说，古史辨学派用的是默证，这个比较专业，在这里我就不讨论了。不过有一点，特别有意思，大家知道有关这方面的讨论，现在还在进行。就在前几天，在上海大学举行了一个“古史史料学研究的新视野国际学术讨论会”。我自己没有能去参加，他们把材料给我了，上海大学的谢维扬教授写了一篇文章——《古书成书的复杂情况与传说时期史料的品质》。他是那个会议的组织者，他的文章提出一个新的对于疑古学风的批评论点。他说，层累造成的古史说很大的问题是因为是单线发展，层累造成意味着不断地单线发展。古代传说的变化实际上可能是很复杂的。层累造成的古史说，如果是单线的话，你就得把古史传说排队，越排越晚，童书业先生就说黄帝成为中国历史的头一个，最早是战国末，大家想想这个论点就不合理了，如果最早是战国末，离司马迁太近了，他怎么会采用这样一个说法呢？

刚才我们讲到了研究古史传说的方法问题，我觉得是这样。古史传说的时代当然不同于后面的时代，我们不妨把古史分成几个不同的段落，比方说头一段，从春秋战国以下，包括春秋战国，我们有很详细的文献记载，我们有《左传》、《国语》、《战国策》，我们还有其他诸子百家很丰富的记载，完全可以用文献为依据进行详细的研究，去和考古的发现互相对比和印证。可是从这个以前，我们做“夏商周断代工程”，常说公元前841年，公元前841年以前就不行了，因为西周就没有这么多的材料，当然我们有《诗经》、《尚书》，还有《周礼》，还有其他一些材料，然而究竟不能和春秋、战国相比。可是包括商代晚期一直到西周，我们还有甲骨文、金文，还有直接的文字材料。在已发现的甲骨文的前面，比如说武丁以前，或者说盘庚迁殷之前，基本上就没有直接的文字材料了，可是我们还是多少有一些材料是可以做的。至于再往前的古史时代，当然就是靠传说。所以我们对于古史史料的想法，应该有一个阶梯性的不同。越往前，正如考古学老前辈指出的，更依靠考古学的研究。现在的话，我想我们的任务，就是包括我们讨论的具茨山的调查研究，用现代的考古学的科学的工作成果来解释和对照古史传说，就是冯友兰先生说的，从疑古走到释古，对传说里的古史给予正确的科学的解释。不过，这方面已经超出我的知识范围，待会儿由李伯谦先生给我们好好讲一讲。

我要讲的就这些，谢谢大家。

（原载《光明日报》2014年1月7日；《华夏源》总第33期）

陶寺遗址与尧都传说

今天我们在这里开关于陶寺遗址以及尧都问题的学术研讨会，我觉得有相当重要的意义。我们所要探讨的，实际不只是具体的一处遗址与一个传说，而是涉及上古都邑的考古研究能否同传世文献所见古史传说相联系，如果能又怎样结合的问题。这对于古史和考古学的工作，很有方法论的价值。

我们中国有五千多年的文明史，有着丰富的古史传说。如何看待这种传说，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古史辨”大讨论以来，已经在学者间切磋了几十年。现在可以说，在我们这里，全然否定古史传说的主张已经很少听到了，问题是怎样真正认识、怎样正确看待这些传说。

按照《史记》，唐尧虞舜居于“五帝”之末，而典籍中又有以虞（包括唐）夏商周合称为“四代”的，看来尧舜是居于两者之间。过去王国维先生批评疑古之“过”，就不同意其否认尧舜等人物的历史存在。有学者辩论说，殷墟甲骨文里没有尧舜，这没有什么稀奇，因为那些甲骨文是殷商王室的卜辞。古人认为“神不歆非类”，商人是不会占问祭祀非其先祖的尧舜的。其实卜辞里的“先公”等人物，许多属于商朝建立以前，有的已经够上了尧舜的时代（如契）。

说到殷墟，该遗址作为商代晚期都邑的认定，凭的不外乎三点：

遗址规模性质的判定，
甲骨文、金文的发现，
与文献记载的对照。

这第三点，根据主要是战国晚期的《竹书纪年》和西汉的《史记·项羽本纪》，都是传流很晚的传说。

我曾说过，比殷墟更古的都邑遗址，如果一定要求像殷墟那样的论定，恐怕是不大可能的，因为很难设想再有那样的古文字的发现，但是认定殷墟的其他两点的结合，还是很重要的。

事实也是如此。大家知道，徐炳昶先生率领调查“夏墟”，正是依靠古史传说的记述，结果是肯定了二里头遗址，从而认识了二里头文化，迄今公认是与夏代相关的。再如安金槐先生，他相信“禹都阳城”的传说记载，果然找到了王城岗遗址，后来发掘出时代大略相当的大城。总之，传说中的上古都邑，经过调查发掘，已有多次证明不是空穴来风。

再来看陶寺遗址与“尧都平阳”传说的问题。

“尧都平阳”之说，见于西晋皇甫谧的《帝王世纪》佚文，如《史记·五帝本纪》《集解》所引云：

尧都平阳，于《诗》为唐国。

并载《括地志》说：

今晋州所理平阳故城是也。

平阳这个地名，见《左传》昭公二十八年，春秋时已经有了。晋州，就是今山西临汾。

《太平寰宇记》卷四十引《帝王世纪》则说：

帝尧始封于唐，又徙晋阳，及为天子，都平阳。平阳即今晋州，晋阳即今太原也。

这段话“平阳即今晋州”等句，大约是后人的注文。无论如何，这段话把问题弄混了，需要在这里说明一下。

尧为陶唐氏，商周间的唐国是其后裔，被周人所灭，于是周成王把弟弟叔

虞封于唐，称唐叔虞，就是后来晋国的始封。叔虞所封之地，自汉以来有异说，大多认为在晋阳，也即今山西太原，直到清初顾炎武作《日知录》，才加以辨正。近年曲沃、翼城间晋侯基地的发掘，证实了顾氏的洞见。由此上推，唐的位置不会太远，尧也不可能北居晋阳了。“尧都平阳，于《诗》为唐国”，《诗经》里的《唐风》即是晋风，这也可旁证“尧都平阳”之说是比较合理的。

陶寺城址规模宏大，内涵丰富，足称为都邑，而其时代与地望又同尧都传说相当或相近，这是非常值得重视的。希望今后的发掘研究能提供更多的证据。

（原载《光明日报》2013年12月9日）

二、甲骨学研究

论凤雏卜甲中的周王与楚

1977年陕西岐山凤雏建筑基址内H11和H31出土的有字卜甲，是迄今西周甲骨数量最多内容也最重要的一批，当时便引起学术界的广泛重视。1978年在吉林大学举行的“中国古文字学术讨论会”上，这项发现即成为热点之一。^①

凤雏卜甲出现伊始，整理研究的学者就注意到其卜辞里有“楚”。例如徐锡台先生在上述讨论会上提出的论文《周原出土的甲骨文所见人名、官名、方国、地名浅释》^②，已提到H11:83卜甲有“楚子来告”。随之顾铁符先生写了《周原甲骨文“楚子来告”引证》专文^③，其他有关论著还有不少。

凤雏H11卜甲涉及“楚”的，一共有三片，即H11:4、H11:14和H11:83^④，不过由于以往著录的图片或摹本的文字每每不够清楚，以致很难深入探讨。2002年，作为“夏商周断代工程”课题成果的《周原甲骨文》一书出版，提供了比较清晰的彩色照片，为进一步研究准备了条件^⑤。本文就是根据新的照片，参考我过去观察实物的笔记，谈一些个人看法，试与大家商榷。

让我们从H11:83说起。

这片卜甲上刻有一条完整卜辞，共三行十字，依原行款隶写如下：

曰：今萇

楚子来，告

父後，戡。

卜辞开头的“曰”，是前辞，凤雏卜甲中同例的还有如H11:21：“曰：𠄎，𠄎（思、斯）克事。”^⑥

“𦣻”即“秋”字，“今𦣻”就是“今秋”。

辞中的“楚子”恐不是指楚君。《春秋》经传称楚君为“楚子”，是所谓蛮夷虽大称子的“书法”。《史记·楚世家》有“楚子熊绎”，恐怕也是后人的称呼，由封熊绎“子男之田”而来。这里的“楚子”应与甘肃礼县青铜器铭文中的“秦子”同例，“子”的意思是嗣子。

“後”，《国语·周语》注云：“後嗣也。”“告父後”，是报告其父安排後嗣的情况。

“𦣻”，当即正始三体石经的“𦣻”字，读为“捷”。殷墟卜辞和西周青铜器铭文屡见该字，也都可读为“捷”^⑧。《左传》庄公三十一年注：“捷，获也。”《礼记·檀弓》注：“获，系虏之。”

综上，H11:83卜辞是说：今年秋天，楚国嗣子要来，报告其父安排後嗣的情形，要将他囚系起来。

再看H11:14。

这片卜甲也刻有一条完整卜辞，共三行十字，隶写如下：

楚白乞今𦣻

来，即于

王，其则。

文例与H11:83相近。

“楚伯”是楚君^⑨。“乞”，《广雅·释诂三》：“求也。”“楚伯乞今秋来”，即楚君请求今秋朝王。

“即”，《诗·东门之墉》传：“就也。”楚伯今秋来朝，便近就于王。

“则”读为“贼”，“贼”是从“则”声的字。《国语·晋语》注：“贼，杀也。”

据此，H11:14卜辞是说：楚国国君请求今年秋天前来，将就近于周王，要把他杀掉。

以上H11:83、H11:14两条卜辞，可能是同时的事。揣想楚国那时发生君位的争执，原来的嗣子未能继位，与新立的楚君都想到周都朝见，以图确立自己

的地位。卜辞则是周王想做出抉择，支持两者的一方。值得注意的是，对于未得君位的“楚子”，所卜是采取囚禁的手段；对于已有君位而有武力可恃的“楚伯”，便用乘机刺杀的办法。

如果读者觉得凤雏卜甲有这样的内容有些奇怪的话，不妨参看凤雏H31:2卜甲上面的这条卜辞^⑩：“鹄繇（系）子来降，其执，罍（暨）毕（厥）吏（使）。”“鹄系子”应该是一种蛮夷部族的领袖，他来降周，周朝却卜问要把他和他的使人都拘禁起来。这看来不合大家设想的道德规范，但或许在当时情势下有必然的理由。H11:83、H11:14卜辞反映的周王与楚的关系，也是如此。

还有一片卜甲，是H11:4。

这片卜甲刻有两条卜辞，中间有线隔开。左边一条大约与楚事无关，右边一条只有三字，即：

其戮楚。

第二个字，过去都释作“戮”即“微”，以致无法通读。按“戮”的左半含有人形，中有一笔上下相贯，与此字有别。这个字，我以为是“戮”即“微”字，当读为“戮”。

“戮”，是戮罚、戮戒。《诗·閟宫》云：“荆舒是戮。”西周恭王时的士山盘^⑪，有“微（戮）蕝（都）刑方”^⑫，文例尤与卜甲类似。

凤雏卜甲的年代，从多方面考虑，我认为下限约在昭穆之际^⑬。由此，对上述卜辞还可做一些猜想性的推论。

《史记·楚世家》载：“熊绎当周成王之时，举文、武勤劳之后嗣，而封熊绎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而《左传》昭公十二年记楚灵王称“昔我先王熊绎与吕伋、王孙牟、燮父、禽父并事康王”，可知成、康时楚君是熊绎^⑭。《国语·晋语》所说成王盟诸侯于岐阳，与会守燎的楚君也必是熊绎。熊绎之世，楚与周朝关系良好，和凤雏卜甲所说不合。

到周昭王时，形势突变，以致昭王十六至十九年有伐楚之事，是研习古史者所熟知的，当时又有较多青铜器铭文，可资验证^⑮。不过，周王与楚为

何交恶，文献并无记载。凤雏这几条卜辞的记事，很可能就是伐楚战役的导火线。

前几年，在论说土山盘的时候，我曾谈到：“在西周时期，王朝对诸侯的事务拥有干预的能力。在文献中，如《左传》、《国语》所载共王灭密，因纪侯烹齐哀公，及宣王立鲁懿公，被鲁人所杀，又伐鲁而立鲁孝公，等等，也印证了这一点。如果以东迁以后王朝衰弱的情形，认为西周王朝与诸侯的关系也是那样松散，就不符合历史事实了。”^⑩

不久前发表的清华简《楚居》^⑪，详细叙述了楚君的世系及历代居地。其中证实了自成、康时的熊绎，到夷、厉时的熊渠，确实只有六代，所以昭王时的楚君就只能是熊绎之子，而不会是再下一世。这个楚君《楚世家》称“熊艾”，“艾”字《汉书·古今人表》又作“乂”，据《楚居》则系“只”字之误。如果本文的推想不错，凤雏卜甲中的“楚伯”以及昭王征伐的对象就应该是他了。

最后需要提到，可能有人认为H11:83的“楚子”和H11:14的“楚伯”是同人的不同称谓。《左传》僖公九年云：“凡在丧，王曰小童，公侯曰子。”但是卜辞两者都说今秋将来，应当是同时所卜，况且在丧称子之说，只是“书法”。我曾有《公侯在丧曰子说》小文做过讨论^⑫，请读者参看。

注释

- ① 徐锡台：《周原出土的甲骨文所见人名、官名、方国、地名浅释》、《探讨周原甲骨文中有关周初的历法问题》，《古文字研究》第一辑，中华书局，1979年。
- ② 同①前一文。
- ③ 顾铁符：《周原甲骨文“楚子来告”引证》，《考古与文物》1981年第1期，又收入《夕阳刍稿》，紫禁城出版社，1988年。
- ④ 王宇信：《西周甲骨探论》，第36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
- ⑤ 曹玮：《周原甲骨文》，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2年。
- ⑥ 参看李学勤：《周易溯源》，第197页，巴蜀书社，2006年。
- ⑦ 李学勤：《文物中的古文明》，第343页，商务印书馆，2008年。
- ⑧ 李学勤：《再谈甲骨文中的“戡”字》，《湖南省博物馆馆刊》第6辑，2009年。
- ⑨ 周昭王时令簋铭文首句，多读为“惟王于伐楚白（伯），在炎”，但唐兰先生主张在“楚”字下断读，见其《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第275页，中华书局，1986年。

-
- ⑩ 该片因已粉化，曹玮《周原甲骨文》书中没有照片，释文系据1982年陕西岐山周原文管所编《周原甲骨文》所收摹本。
- ⑪ 朱凤瀚：《士山盘铭文初释》，《中国历史文物》2002年第1期。
- ⑫ 同⑦，第196—197页。
- ⑬ 同⑥，第202—203页。
- ⑭ 参看罗运环：《楚国八百年》，第75—76页，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
- ⑮ 李学勤：《通向文明之路》，第107—111页，商务印书馆，2010年。
- ⑯ 同⑦，第198页。
- ⑰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中西书局，2010年。
- ⑱ 同⑦，第206—208页。

（原载《楚文化研究论集》第10集，湖北美术出版社，2011年）

再论周原任家村腹甲卜辞

西周占卜用的龟甲，由于背面钻凿大都较深，又密排成行，易于断裂，因而在出土时多已成碎片，大版的甚少。1979年在周原扶风任家村发现的一版刻有卜辞的腹甲，形制比较完整，文字也颇清晰，久已受到研究者的重视^①。1981年，我曾对这版卜辞做过初步的考释^②，但欠周详。2002年，作为“夏商周断代工程”课题成果之一的曹玮先生《周原甲骨文》一书出版，收有这版腹甲的彩色照片和局部放大照片^③。我反复细察，又有一些新的想法。今乘陕西周原博物馆馆刊《周原》创办之际，试写出来，向大家请正。

这是一版典型的西周腹甲，卜兆的兆枝向内，即朝向腹甲的“千里路”。卜辞刻于相关卜兆兆枝之侧，顺着兆枝走向横向纵行。卜辞一共有五辞，曹书图版标之为①至⑥，⑤和⑥依我的意见应作为一辞。①在右前甲，②③在右后甲，④⑤⑥在左前甲。这些卜辞应分为三组。①与④分别位于左右前甲，卜兆的位置对称，是联卜的，其辞为：

① 𠄎（思、斯）𠄎于永冬（终）。

④ 𠄎（思、斯）𠄎于休令（命）。

两者显然属于一组。②与③是另一组，辞为：

② 用由邈（逋）妾。

③ 此由亦此亡。

⑤和⑥是同一条卜辞，只是分位于卜兆两侧：

⑤⑥ 保贞，宫。吉。

让我们先看第二、三两组卜辞。

第二组，即②和③，是关于逋亡之事的。辞中“由”字，我以为当读为“囚”，“由”是喻母幽部字，“囚”则在邪母幽部，故可通假。银雀山汉简就有将人名“许由”写为“许囚”之例。“用由（囚）逋妾”是说囚禁逃亡的女奴。“此由（囚）亦此亡”是指被囚禁者还会逃亡。

第三组，即⑤⑥，“保贞”是卜辞的前辞。其他西周卜辞，如周公庙01号卜甲有辞云：

□弔（叔）卜

周公贞。

这也是卜辞的前辞^④。与之对比，“保贞”的“保”当与“周公”一样，是该卜辞的卜问者，“保”应当是职官名^⑤。已有学者提到，周原岐山凤雏卜甲中见有“大保”，即周初的召公奭^⑥，但这里讨论的腹甲所出坑位是西周中期的，“保”的时代不能有那样早。

不过即使如此，这版腹甲的卜问者还是有相当高贵的身份，这从第一组卜辞的内容可以得到充分的证明。

第一组卜辞中“永终”、“休命”两词都屡见于西周文献和金文，这是学者已经指出过的^⑦。《尚书·金縢》云：“惟永终是图。”屈万里《尚书集释》说：“永终，犹言永久。”^⑧金文如井人妥钟（《殷周金文集成》109—111）铭文有“永终于吉”，也是同样的意思。“休命”则见于《尚书·多方》：“天惟时求民主，乃大降显休命于成汤。”《集释》说：“显休命，昭显休美之命令也。”^⑨金文如中山王鼎（《集成》2840）：“天降休命于朕邦”，是天之美命；中方鼎（《集成》2785）：“中对王休命”，伯簋（《集成》3864）：“用对扬公休命”，则是王公之美命。

卜辞中的“卬”字需要专门解说。这个字以往大家都释为“御”，近年通过学者们的研究，始知其不然。裘锡圭先生“指出其读音当与孚相同或相近”^⑩，

即与“孚”通假之字。据此，腹甲第一组卜辞读为“斯孚于永终”和“斯孚于休命”，这同《尚书·君奭》的“厥基永孚于休”句意相似。《君奭》该句的“孚”字，杨筠如《尚书覈诂》和屈万里《尚书集释》都读为“符”，训为合^①，腹甲两辞的“卪（孚）”也是一样。合于永终、合于休命，都是吉语。如果仍读“卪”为“御”，便不可通了。卜问者（可能就是“保”）用这样的吉语，表明他有很高的身份。

大家知道，“永终”一词还见于《论语》的《尧曰》篇。该篇首章云：

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舜亦以命禹。

这段话在学术史、思想史上有重大影响，然而学者各家的争论也始终不绝，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对“永终”一词的理解。大概说来，古注把“永终”释为长终，如何晏《论语集解》引包咸说：“困，极也；永，长也。言为政信执其中，则能穷极四海，天禄所以长终。”魏晋以下则有学者释“永终”为永绝，朱子《集注》用其说，云：“四海之人困穷，则君禄亦绝矣。”这一分歧一直继续到现代^②。现在从这里讨论的西周腹甲卜辞知道，“永终”确如清人江声《论语俟质》所说，是“吉祥之辞”，就不能再作“永绝”之类训释了，我们还是应该回到古注的解释上去。

注释

- ① 王宇信：《西周甲骨探论》，第1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
- ② 李学勤：《西周甲骨的几点研究》，《文物》1981年第9期。后收入《周易溯源》，巴蜀书社，2011年。
- ③ 曹玮：《周原甲骨文》，第144—147页，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2年。
- ④ 李学勤：《周公庙卜甲四片试释》，《西北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后收入《文物中的古文明》，商务印书馆，2008年。
- ⑤ 参见张亚初、刘雨：《西周金文官制研究》，第1—2页，中华书局，1986年。
- ⑥ 陕西周原考古队：《扶风县齐家村西周甲骨发掘简报》，《文物》1981年第9期。

- ⑦ 同⑥。
- ⑧ 屈万里:《尚书集释》,第130页,(台)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
- ⑨ 同⑧,第216页。
- ⑩ 董莲池:《新金文编》,第1316页,作家出版社,2011年。
- ⑪ 杨筠如:《尚书覈诂》,第369页,陕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又同⑧,第204页。
- ⑫ 参看程树德:《论语集释》,第1166—1169页,华北编译馆,1943年。

(原载《周原》第1辑,2013年)

释读两片征孟方卜辞

在殷墟甲骨黄组的诸多战争卜辞中，内容最为丰富重要的，众所周知是征夷方卜辞，其次就应数征孟方卜辞。前些时我对征夷方卜辞做了一些讨论，其间作为对比，也涉及征孟方卜辞，特别是释读了《合补》11242腹甲，论证孟方的地理方位与夷方相反，是在殷商王朝的西面^①。我很想对征孟方卜辞再做一梳理，但是后来读到《商代史》第九卷《商代战争与军制》和第十卷《商代地理与方国》，两者就征孟方卜辞均有辑集论述^②，已经把战事的前后轮廓勾画出来。这里只对其中两片的释读，提出一些个人意见。

（一）《合集》36511

此胛骨即《殷虚文字甲编》2416，和前述《合补》11242一样，在征孟方卜辞研究中有重要意义，曾经为许多学者引用。按照我们当前的认识，骨上卜辞是（依原行款）：

丁卯王卜贞，畀巫备（髀）。余其从多甸
于多伯征孟方伯炎，惠卒翼日步，
[亡]左自上下于叔示，余受有祐，不啻戔（捷），
[肩]告于兹大邑商，亡害在畎。
[王曰]：“引吉。”在十月，遯大丁翼。

这是商王选择出征时日的卜辞。所云“余其从多甸于多伯征孟方伯炎”一句里的“从”字应训为率领。《史记·春申君列传》“从而伐齐”，《索隐》引刘氏说：“从，犹率也。”清华简《系年》第二十二章“晋魏文侯斯从晋师，晋师大败齐师”，“从”字的意义也是这样^③。

“惠卒翼日步”，“卒”字形与“衣”淆混，卜辞金文屡见。“卒翼日”意即到周祭的翼日祀季结束。按照常玉芝先生的《商代周祭制度》，《合集》36511是排在她所说“第一祭祀系统”的“王九祀祀谱”里的^④，占卜之时已在十月，而翼日祀季的终了要到十祀的一月之初^⑤。

这样，我们会看出《合补》11241胛骨卜辞很可能是与《合集》36511对贞的：

……[贞]，其征孟方，惠今……
 ……受祐，不啻戔（捷），亡……
 四曰：“吉。”在十月，王九[祀]……

“惠卒翼日步”是远期的选择，而“惠今……”则是近期的选择。确定了这一对贞关系，《合补》11241的明记九祀恰可印证周祭排谱的正确性。

（二）《合集》36518

这片胛骨曾著录于《龟甲兽骨文字》2，25，6、《殷契遗珠》193等，也是非常著名的，其卜辞为：

乙巳王贞，启呼兄曰：“孟方收人
 其出伐，禺（遇）自高，”其令束途于
 高，弗悔，不啻戔（捷），王四曰：“吉。”

过去大家总以为这是征孟方之前所卜，仔细推敲，其实应该是战事进行中间的卜辞。

“启”并非个人名字，而是商军的先锋部队，《周礼·乡师》疏：“谓军在前曰启，在后曰殿。”征夷方卜辞《合集》35345（黄组）有“右牧宰告启”，《屯南》2320（无名组晚期）有“右牧宰启”，“启”都是指先行而言。

“启呼兄曰”的“兄”字作踞坐状，以手伸出，手心向下，此字在甲骨金文中常读为“𠄎”，训为赐予^⑥，但不能移用到这里。裘锡圭先生曾列举一些黄组

田猎卜辞，说明其义当同于“告”^⑦。按“告”与同源于“兄”的“祝”字都在觉部，声母也不甚远，或许这样的“兄”可视为“告”的通假字。无论如何，“启呼兄曰”的意思是先锋部队叫人前来向商王报告。

来报告的内容，是“孟方収人其出伐，遇自高”。句中的“其”字，推求前后文义，当训为“而”^⑧。“収人”是集合人众，“収人其出伐”就是聚众而出战。“遇”原作“禺”，有关考释我以前做过^⑨，“遇自高”是说孟方军队与商军在高地相遇，句例可比较《左传》成公六年晋军“与楚师遇于绕角”，成公十八年晋师“遇楚师遇于靡角之谷”，昭公二十七年楚人“与吴师遇于穷”，等等。这是商的先锋传告的军事情报。

商王的贞卜，是要决定应对这种局势采取怎样的对策，即“其令束迨于高”。“迨”即《说文》“会”字古文“𡗗”，是大家熟悉的。“束”字构形清楚，以往多释为“东”，是不对的。“束”读为“速”，“其令速会于高”，就是命商军各部快速赶往先锋部队与孟方相遇的地点。

征孟方卜辞目前所见远不如征夷方卜辞之多，战争过程不够清楚，还有待进一步搜寻发现。“夏商周断代工程”已将征孟方卜辞所属周祭祭祀系统推定为帝乙时期^⑩，这便与周文王的时代相对应。帝乙西征孟方在当时商周关系中间有什么影响？孟方是不是就是文王所伐的邠（《韩非子·难二》正作孟）？都是今后值得探讨的问题。

注释

- ① 李学勤：《论新出现的一片征夷方卜辞》，《文物中的古文明》，第134—138页，商务印书馆，2008年。
- ② 宋镇豪主编：《商代史》卷九《商代战争与军制》，第327—331页；卷十《商代地理与万国》，第406—40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
- ③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贰），下册，第193页，中西书局，2011年。
- ④ 常玉芝：《商代周祭制度》，第24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
- ⑤ 同④，第254页。
- ⑥ 李学勤：《重写学术史》，第182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
- ⑦ 裘锡圭：《商铜匱铭补释》，《中国历史文物》2005年第6期。

- ⑧ 裴学海:《古书虚字集释》,第382—386页,中华书局,1982年。
- ⑨ 同①,第135页。
- ⑩ 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第58页,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

(原载《甲骨学与殷商史》新3辑,2013年)

三、青铜器研究

再谈青铜器与山西古代史的关系

1982年我到太原参加过一次学术会议，会议期间，山西省考古研究所找我去做了一次演讲，当时我讲了一个题目——“青铜器与山西古代史的关系”。后来山西考古所做了整理，同名文章刊发在《山西文物》1982年第1期，也就是这个杂志最早的一期。^①为什么我在这里重提这个题目，要再讲二十几年前谈过的问题？我觉得把那个时候我讲过的内容，经过1/4个世纪以后，重新做一个回顾，看看这些问题的一些新进展，是个挺有意思的事情。我把现在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在这里谈一谈，意思和上一次一样，也是向山西省的各位老师，包括在座的同行、同学请教。

当时我谈的问题有好几个。首先我谈到这样一个问题，青铜器的研究是考古学研究的重要部分，同时也是我们进行古代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资料来源。大家知道中国的古代研究不仅仅属于历史学的范围，同样也属于考古学的范围。我国著名的考古学家夏鼐先生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什么是考古学》，该文指出以文献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历史学和以物质文化为主要研究对象的考古学，就像车之两轮，鸟之双翼，是相辅相成、关系密切的学科。夏先生的比喻非常好，实际上夏鼐先生这个观点是从王国维那里来的。王国维先生1925年在清华授课，当时他教的课叫“古史新证”，他提出要以地上的材料和地下的材料互相印证，也就是著名的“二重证据法”。所谓地上的材料就是传世文献；所谓地下的材料就是考古文物的发现。因此，我认为夏鼐先生的观点是引申、阐发、丰富了王国维先生的论点，我最近写了一篇文章就讲到这个看法。^②

顺带说一下，大家知道现代考古学在中国建立，一般以中国人自己进行田野考古工作作为标志，我们认为就是1926年清华的李济先生在山西夏县西阴村进行的发掘，上次来山西我也说过这个问题。1926年的这次发掘，虽然王国维

本人没有参加，发掘材料运回清华后，王国维曾亲自看过。虽然是一个规模很小的发掘，可是它标志着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建立。

从汉代到北宋再到中国现代考古学开展以前，中国学者对青铜器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我们可以把这么长的一个历史时期看作一个时段，它的特点就是所用的研究材料不是以科学的方法得到的。在中国现代考古学开始建立之后，还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我们对青铜器和金文的研究，主要依靠的还不是考古学提供的材料，因为考古发现的很少。上次演讲我还特别举了例，大家知道河南的殷墟遗址是从1928年开始发掘的，是中国现代考古史上发掘时间最长的一个遗址。从1928年到1937年抗战爆发，殷墟进行了15次发掘，但所得的大件青铜器，一共只有200多件。所以可以说，直到上个世纪中叶，科学发掘得到的青铜器和铭文材料还是很少的。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以前，科学发掘得到的材料，也还是远远不如传世、流散的器物多。所以在1982年演讲时我就说，我们有没有可能从现在开始进入一个主要以考古材料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新阶段？当时提出我们已经进入一个新阶段，其实心里还是很虚的，今天又过了1/4个世纪，我想真的可以说，我们研究山西的古代历史，可以以考古材料为主了。

改革开放以来，考古工作在全国各地普遍开展起来，并不断有重大的考古发现，包括我们山西省。其中山西青铜器及其铭文就是很重要的发现。在座的都知道，《晋系青铜器研究》已经把山西地区考古发现的青铜器重新整理，做出了很好的研究。

第二点，我们谈谈中国青铜器的起源和发展与山西有什么关系。中国青铜器的起源是一个我们还不太清楚的问题，但非常重要。要弄清中国的青铜时代是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就要先问中国的青铜器是什么时候起源的。

大家知道青铜不是纯铜，青铜是以纯铜为基础，加入了一定量的铅或锡。到目前为止，在中国境内发现的最早的青铜器是在甘肃省东乡县林家遗址。这个遗址属于马家窑文化，出土这件青铜器的地层有一个明确的¹⁴C年代，约当公元前3000年。这件青铜器是个小刀子，有人看过我写的《中国青铜器全集》的导言，现在再版了，当时我在里面说，这件小刀子是单范做的，后来证明是双范制做的，比原来想的还要进步，但零星的发现还不足以说明中国历史进入了青铜时代。

中国历史进入青铜时代，现在我们一般认为还是到公元前2000多年的时候。中国历史进入青铜时代的时间，和古代埃及、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差不多。古埃及和两河流域发现的早期铜器比较多，可是真正进入青铜时代，基本也在公元前2000年或者更早一点的时间。中国在什么时候进入青铜时代，目前最好的一些线索还是在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现在多数学者认为是属于夏代的文化。我们说夏代考古，现在很多人都承认了。河南偃师二里头的时代还早不到公元前2000年，可是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所代表的夏代，肯定属于青铜时代。这个地方发现了相当数量的青铜器，种类很多，有鼎、爵、武器、工具等，而且从它发展的成熟性来看，二里头文化时期还可能存在一些更大、更精美的青铜器。上海博物馆藏了一个很大的钺，上面嵌有绿松石的花纹，这个花纹一看就知道是二里头文化的。大家知道，相当于二里头文化时期，在我们山西也有很多遗址，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夏县东下冯。我在八十年代演讲也提到了东下冯遗址，这个遗址出现了像铜铃等青铜器物，那么能不能再找到比这个更早的青铜器起源？这就是我提出的第二个问题。

从夏县东下冯和偃师二里头来看，如果找这个来源，很可能在山西。现在这个问题我看已经有了一个初步的答案。襄汾陶寺遗址属于龙山文化范畴，它算是龙山文化晚期的陶寺类型，可是在它里面，已有了青铜器出现的线索。不但有了个别小件的器物，而且还发现了一些从铸造技术水平来看非常成熟的器物，例如2003年发现的铜齿轮。它是一个扁的铜环子，周围有非常规整的小齿，就像一个钟表里的齿轮。陶寺遗址的年代是公元前2600至公元前2200年，这件东西是什么年代不用深究，它肯定比夏代早，就是比传说中的尧舜还可能早一点。这个铜齿轮带给我们很多问题：第一，它是砷青铜，从世界冶金发展史来看，最早的青铜器每每是砷青铜。在我国甘肃西部和青海北部也发现过一些砷青铜，但年代要比陶寺遗址晚。陶寺遗址发现这么早的砷青铜饰物是很特殊的，即使是在今天的条件下，我们要做这样一个周围的齿非常匀整的铜环也不容易。我们可以设想它有一个特殊的范，范要刻得非常匀整，砷青铜合金流动性较强，才能在范里面做出精细的齿。这个铜齿轮说明当时青铜铸造已不是一个非常原始的状态了，所以中国青铜器的起源和山西古代有很密切的关系。

如果我们想把陶寺遗址和文献记载的传说相结合的话，它最适合的就是尧舜时代。从时间上来说，如果说夏的开始在公元前二十一世纪，或者更早一点，那就差不多进入公元前2200年了，从古书上说，尧舜加一块也不过就是一个世纪左右的时间，如果把尧舜以前的时间算在里面，那么和陶寺遗址的时代就比较接近。传说尧都于平阳，古代所谓平阳在临汾以南，襄汾陶寺遗址也正好就在这个地带。

陶寺遗址是现在我们已经发现的，北方地区龙山时代面积最大的城址。它有大城，还有小城，设想小城可能是宫城。小城市有宫殿基址，有作坊遗址，还有大型墓葬。在大型墓葬里还出了礼乐器。虽然乐器是小铜铃，可是同时有很大的鼉鼓。还发现了彩绘陶盘，在盘子里面画有一条龙。这个龙和商周青铜器上的完全一样。从各方面来看，陶寺遗址已经是跨入文明社会门槛的一个社会了。最重要的标志就是它有文字。第一次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他们把这件带字的陶扁壶拿给我看时，真是吓了一跳。怎么可能有这样一件东西，上面用毛笔写了一个“文”字。大家知道与古文字有关的一些符号，总是有人怀疑，可到今天为止没有任何一个人怀疑这件陶壶上面的“文”字。这个字一看就是一个毛笔字。

这些方面就说明，陶寺遗址对于我们研究青铜器的起源，中国怎样步入青铜时代，中国早期文明的诞生等问题都十分关键。

下面我们再看第三个问题。刚才我们说到，研究青铜器的起源，青铜礼器对于中国古代文明发展的影响，山西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我相信以后还会有重要的发现。在1982年我还提了一个问题，当时山西虽然有夏县东下冯遗址，可是山西好像没有二里岗时期也就是商代前期的文化，当时考古研究所的先生们也都在场，他们也说只有线索，没有找到很像样的遗址。商代山西究竟是什么文化面貌，在整个商王朝它起着什么作用？这对山西古代史研究我想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当时不光商代前期发现的东西很少，商代后期发现的东西也不多，特别是在青铜器方面。这个问题现在当然不是个问题。像垣曲发现了垣曲商城，是商代前期的，面积和湖北的盘龙城差不多。这说明在商代前期，山西南部地区已经很重要了。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距垣曲不远的平陆出土的大方鼎，

比之郑州发现的大方鼎也不逊色。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发现，古代的社会等级极为严格，大家知道郑州商城是商代前期的都城之一，那么垣曲为什么能有这样的大鼎呢？这就说明，当时垣曲在政治、经济、社会上有相当高的地位。在垣曲发现这样的鼎，反映当时举行过高规格典礼，这种高规格的典礼一定是王室或诸侯等大贵族才能够做到的。这说明，山西在商朝前期已经有重要的地位了，这点我们应该有充分的认识。

至于商代后期，近年来，我们在山西发现了很重要的青铜器群，除了已经出报告的《灵石旌介商墓》之外，最重要的是浮山桥北墓葬群，是商代后期的，规格要比灵石旌介高很多，非常遗憾的是被盗了。2001年春天，我经过香港，到台湾去讲学，在香港的古玩市场看到两个大铜爵，体形很大，上面都有“先”字，就应是桥北墓地出土的。在那个时期前后带“先”字的青铜器，我们见了很多了，最重要的是有一个方彝，后来被北京的保利艺术博物馆收藏了。大家知道这种方彝是极难得到的。还有其他的一些器物，个体也是特别大。所以浮山这个地方，在商代后期一定特别重要。而且浮山的那个“先”与后来晋国的先氏，也可能有联系。在1982年我还讲到，根据古书的记载和对古书的研究，山西很大的一部分，包括太原以南都在商代的王畿之内，商在这儿有很多封国。按文献记载，微子和箕子的封地，传说一个在榆社，一个在孟县。当然也有其他说法，比方有人说微子在山东，但比较可信的说法是在山西。微子是纣王的哥哥，有一种说法是同母所生，而微子出生的时候他的母亲还不是王后，所以传位给了他的弟弟纣王。不管怎么说，这都是商朝最重要的贵族，如果传说可信的话，商代晚期一定在山西留下了非常重要的遗迹。这些遗迹可能我们还没有找到。大家不要以为我们没发现就不存在，那是不对的，我们很可能以后会有重大的发现，像浮山桥北墓地这样的发现就是意想不到的。

下面我们谈第四个问题。在山西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青铜文化区域，这个我在1982年演讲提到了，那时候材料还很有限。当时我在演讲里特别提到了石楼。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起，石楼就不断地出商代青铜器。我说的商代青铜器不是典型的商文化青铜器，是特殊面貌的青铜器，当时集中发现的地点就是石楼。从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一直到现在，发现越来越多，地点也渐渐增多了。

它大概有这样一个范围，黄河在内蒙的托克托转角之后，向南流，这就成为山西和陕西的分界线。在这条分界线两侧陆续发现了许多青铜器。从陕西来说，最北就是府谷，一直往南走，有很多地方，比如说清涧，往南有延川、延安，最近最重要一个发现在甘泉，再往南一直可以到淳化。在山西这边，从石楼到柳林，向南也到了永和一带。这些发现非常多，后来还发现了一些遗址，特别是在陕西清涧发现了李家崖遗址，有人已提出了“李家崖文化”。在李家崖遗址还发现了城址，用石头垒的城址，发现了很多陶器，使我们对这一带的文化有了更深的认识。我们山西这边发现了柳林高红遗址，也有城，也出土了很多陶器。这些其实总的说来是一种北方的戎狄文化。虽然它的很多礼器带有典型商文化的特点，个别还有铭文，可是有些东西是商人所没有的，比如说带有兽头的小刀子、铜铎、蛇首匕等。这些都属于北方草原文化，也就是当时戎狄的文化，这一点是大家容易理解的。山西从来就是华夏和戎狄交错的一个地区。

在去年的时候，北京首都博物馆开始搬家，现在已经搬完了，在座的老师可能已经去看过了，也欢迎同学们到北京来看看新的首都博物馆。他们收购了一件青铜器，估计就是在山西或陕西出的，是勺子形的，我们叫匕。这件匕上有一个老虎，还有一个人。老虎是立体的，在后边趴着，人在前边坐着。人的上身下身都有衣服，头发向四面披下来，基本一样长。他穿的衣服看起来好像是一身铠甲，这是我们第一次看到这种文化中的人的状态，而且它是跽坐的，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大家有兴趣，可以关注这些地区的发现，最新的一个例子，是陕西甘泉的阎家沟，见于《考古与文物》今年的第3期，大家有兴趣可以找来看看。这些东西都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它代表的是北方草原文化受到中原华夏文化强烈影响之下的产物，越往南的越接近华夏地区，华夏的成分就越多，像甘泉就是这样，淳化也是这样，山西的石楼、永和也都是这样。越往北的，特别是陕西、山西北部的一些地区，看起来地方性就更强了。

在上述这些地方，也包括山西内地的一些地方，还发现有一种很特殊的文物，就是铜钺。它像半个西瓜，下边有个圈足，上头两个小耳。这类器物是草原骑马民族的。从内蒙古到西伯利亚，一直到乌拉尔山，一些地方的岩石画上刻有这种器物。这一类器物的分布横跨欧亚草原，它的东端可以到中国的东北，

西端可以到罗马尼亚、匈牙利这些地区。它延续的时代也特别长，最早的可以到公元前几世纪，最晚的可以相当中国的魏晋、十六国时期。

今天我们知道的这种铜镞最早的例子是在我们中国出的，就在山西和陕西，早期秦国的地方——甘肃礼县也出，可见在西周的时候，我们叫作戎狄的这种民族，对于整个欧亚大陆的文化发展很有影响和贡献。可能这类草原文化很重要的一个根源，应该在山西和陕西，也包括内蒙古的一部分。这个特别值得研究。

最后谈第五个问题。到山西来，当然不得不谈晋国。1982年的时候，我们做梦也没有想到天马一曲村遗址和晋侯墓地能够发现。这样的重大发现，不但对于山西的古代，对于整个中国古代史都有重要影响。不管是天马一曲村墓地，还是北赵晋侯墓地，它们在青铜器研究上，都有极其重要的作用。这个作用是什么呢？它给了我们一个连续的年代标尺。现在我们知道天马一曲村遗址可以上推到西周初。从西周初一直排到西周结束，甚至更晚一点，这个序列基本上把整个西周包括在内，而且我们知道晋侯墓地有第二代晋侯的墓葬，就是M113、M114，应是晋侯燮父及其夫人的墓葬。这是我们现已发现的西周诸侯国墓地里最完整的一处。

西周的诸侯国墓地我们找到了很多，这么多西周时期的诸侯国墓地，没有一个能比得上晋侯墓地。晋侯墓地这么连续，而且我们有《史记·晋世家》、《世本》相对照，出土了许许多多的青铜器，当然对于古代史研究，特别是晋国史研究都是非常重要的。这些发现使我们对于晋国的兴起和历史地位，会看得非常清楚。有些学者认为晋国一开始不太重要，一直到春秋时期才兴盛起来，我个人不同意这个看法。大家读《左传》就明白，定公四年讲到周初的封国最主要的就是鲁国、卫国和晋国，每个都有特殊的诰命。鲁国的诰命叫《伯禽》，卫国的诰命叫《康诰》，晋国的诰命叫《唐诰》。今天只有《康诰》存在，可是这些诰命的名字还保存在《左传》中，说明春秋时期的人还知道这些事情，反映出周初建立这三个诸侯国是最重要的事。晋国之封在夏墟，也就是大夏之墟，这一点特别清楚。在晋侯墓地中出土的青铜器铭文，也反映出晋国和王朝之间的密切关系，这一点也特别重要。

最近出现的一件流散青铜器：二十八祀铜簋，发表在今年《考古》第3期上。

这件簋的口部有点压扁了，它的铭文特别有意思。第一个字不认识，我们姑且把这个字读作“觉”吧，不一定对。铭文内容是：“觉公作妻姚簋，遭于王命唐伯侯于晋，唯王廿又八祀。”显然是一个小君长叫作“觉”，为他的妻子“姚”做了一件铜簋，正好与周王命唐伯侯于晋这件大事是同一年。大家知道，唐国是唐尧之后，在成王时期，唐国被周公消灭了。成王的弟弟叔虞被封在了唐国，当时还称作唐。到了唐叔虞的儿子燮父，迁徙到了靠近晋水的地方，国号遂改为晋。晋也还在唐的范围之内，古书上就说唐和晋是很近的。很明显，铭文中说“王命唐伯侯于晋”，是指唐叔虞的儿子燮父迁都的事情。最后说“唯王廿又八祀”，有的学者认为成王二十八年，有的认为康王二十八年。我个人比较倾向于康王二十八年。

过去我们研究先秦的历史，有一个观点是很不正确的，我们老是拿看《春秋》、《左传》这个思想来看西周。你看《春秋》、《左传》时，王没有什么用处，总以为这个周王朝是一个很松散的政权，各诸侯有很强的独立性，其实西周时期不是这样。西周时很多的诸侯国，直接就在王的指挥之下。齐国也是一样，王封太公时就说：“五侯九伯，汝实征之”，天下的五等诸侯，九州的君长，他们犯什么事，你出兵去打他们。齐国管这事干什么？因为它可以代表周王。所以齐国非常感谢，齐国前五代国君，死了之后都返葬宗周，说明它们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

晋国也是一样。M113中出土一件韦甗，这件甗的铭文提到周昭王南征，晋国一个叫“韦”的人参加了，周王派他到繁这个地方去做大使。这是周昭王到南国的一件事，在昭王十九年的正月。韦甗埋在晋国墓葬里边，说明韦是晋国一个大臣。“繁”，我觉得就在三星堆一带，汉代这里就称为繁县，现在还有新繁这个地方。^③繁和蜀是相连的，不管怎么说，他是受王的派遣去的。还有叔虞方鼎，可能是唐叔虞本人的，这件铜器的铭文内容也是说叔虞受到了周王的赏赐。

当时的西周王朝是一个相当统一的、有凝聚力的王朝，它的力量很大，非常强。晋国是西周王朝在北方的重要支柱和屏障。我个人一直认为，晋国疆域是很大的，并不是只有曲沃这么一块，它本身之封，可能只有几百里，可是它

控制的范围很大。晋国的北面，有个姬姓的杨国，再北方呢，则是很多戎人，这些也是交给晋国管理的。所以晋国的建立，古书上讲得很清楚，说“启以夏政，疆以戎索”。“启以夏政”，是指统治的结构是按华夏的结构来办的，“疆以戎索”，它的疆界、土地、制度等是按戎人的法则来做。所以晋本身封国很小，但影响很大，是一个非常重视各民族之间融合交流的国家。

晋国的军力也非常强。大家可能觉得晋侯墓的墓地也不怎么大，有的晋侯才随葬五个鼎，看起来很小家子气，怎么这么少呢？你看它的车马坑就知道了。M8是晋献侯，就是晋侯苏，晋侯苏的编钟里记载，他跟着周厉王南征北战，我个人认为是他那时还年轻，带兵去打仗，身先士卒。你看看他那个车马坑，整个都是战车和马。古代一个国家的军力就是用战车来衡量的，所以说有千乘之国，百乘之国。M8的车马坑现在已经挖出来40多辆车了，60辆应该没问题。一个国君殉葬，把一个军队带走了多少人啊，他的国家还要不要防守了？当时有法律规定，一定面积的土地出一辆车，随葬的车多得很，反映出晋国是一个武力非常强盛的国家。到了西周灭亡时，晋国起的作用更大。大家知道晋穆侯之后是殇叔，殇叔是篡位的。殇叔之后是晋文侯，古书中说：“晋文侯定天子”，决定了周平王的地位。褒姒那个儿子伯盘跟周幽王一起死于戎祸，褒姒被俘虏走了。这时周朝的大臣拥立两个王，一个是太子周平王，一个是携王。当时两个政权并立，就是晋文侯出的兵，把携王杀了，使局面稳定下来。

所以我个人不赞成晋侯墓地最后那个墓是晋文侯之墓，我更倾向羊舌村大墓是晋文侯或者是晋昭侯的观点。对于这个问题，我想就谈到这里。

再一次谈“青铜器与山西古代史的关系”这个题目，我想并不是我个人有什么长进，而是我们考古学和历史学的研究有很大的进步，因此，今天我们能涉及的内容比上一次充实多了。希望再过五年或十年，我们还有机会谈青铜器和山西古代史的关系。

（2007年6月22日在山西大学的演讲，由山大整理）

注释

① 该文后收入李学勤《中国古代文明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14—224页。

- ② 李学勤《“二重证据法”与古史研究》，载《清华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后收入李学勤《通向文明之路》，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261—263页。
- ③ 关于“繁”地，参看李学勤《论繁蜀巢与西周早期的南方经营》，《三星堆与南方丝绸之路青铜文化研讨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2007年。后收入李学勤《通向文明之路》，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122—125页。

[原载《山西大学学报》(哲社版)2013年第4期]

谈枣庄徐楼村宋公鼎

2010年秋，蒙山东枣庄市博物馆石敬东先生赐示枣庄徐楼村墓葬新出青铜器照片，盛情极值感谢。由这批器物形制纹饰等方面看，时代在春秋中期、晚期之间。其中有钟、鼎、盘等多件有铭文，属于同一器主。现取最清晰的一件鼎铭为例，计有文字五行二十八字：

有殷天乙唐（汤）
孙宋公囙乍（作）
洵弔（叔）子饴鼎，
其躋（眉）寿莖（万）年，
子子孙孙永保用之。

简要讨论如下。

鼎铭开首作器者自称“有殷天乙唐孙”，与1978年河南固始侯古堆一号墓所出宋公囙簠相同。后者铭文是：

有殷天乙唐（汤）孙宋公囙乍（作）
其妹句毖（吴）夫人季子媵匡（簠）。

见《殷周金文集成》4589、4590，鼎铭的年代不会距之过远。我过去谈到，春秋战国间已有四代宋公有青铜器发现^①，即：

宋公戌钟
宋公差戈

宋平公戌（或误作成）
宋元公佐

宋公廬、鼎、簠、戈	宋景公櫟（或作兜櫟、头曼）
宋公得戈	宋昭公得（或作德、特）

徐楼村鼎铭的宋公圀，以通假求之，无疑是宋平公的上一代共公，《左传》记他名固，《史记·宋世家》则说名瑕。

“圀”字在金文中多见，前人有种种读释，有兴趣的读者可参看周法高《金文诂林补》第七册所收该字条下，但意见虽多，大都扞格不通。1942年杨树达先生作《毛公鼎跋》，分析“圀”字从“𧐄”声，而“𧐄”通“貉”，故“圀”当读为“憲”即“恪”字^②。这一见解尽管有学者反对^③，已被有关学界多数人接受，如《殷周金文集成》便予采用。现在徐楼村鼎铭宋公名“圀”，与“固”、“瑕”相通，“固”古音见母鱼部，“瑕”匣母鱼部，“𧐄”匣母铎部，证明杨树达先生的释读是正确的。鼎铭宋公圀即宋共公，在位于公元前588至前576年，刚好在春秋中期之末，与从器物形制纹饰所作估计一致。

附带说一下，“圀”字在一些金文中，最好也读为“固”，例如：

猷簠：𧐄（中）圀皇帝大鲁命
 猷钟：用𧐄圀先王受天大鲁命
 毛公鼎：用仰绍皇天，𧐄圀大命
 番生簠：用𧐄圀大命，𧐄（屏）王位

所说的都是皇天上帝授周的大命，“圀”应读“固”，训为安定，可参看《诗·皇矣》“天立厥配，受命既固”及《书·君奭》“今汝永念，则有固命”。

宋乃子姓国，鼎铭“洵叔子”是宋共公嫁予洵国的女儿。“洵”系国名，与这件鼎同出的一件小鼎做器者为“洵公”，可能便是叔子的丈夫。

补记：本文原题《枣庄徐楼村宋公鼎与费国》，当时误解鼎铭第三行首字为从“比”，后见更多同出器铭，知道错了。赵平安教授有《宋公圀作洵叔子鼎与濫国》文，刊于《中华文史论丛》2013年第3期，做了很好的考订。因此将本文修改，并删去后半部分。

注释

- ① 李学勤:《论几件宋国青铜器》,《商丘师专学报》1985年第1期。
- ② 杨树达:《积微居金文说》(增订本),第13—14页,中华书局,1997年。
- ③ 于省吾:《墙盘铭文十二解》,《古文字研究》第5辑。

(原载《史学月刊》2012年第1期,收入时做了删正)

纣子武庚禄父与大保簋

清华大学在2008年7月经校友捐赠入藏的一批战国竹简，通称“清华简”，已为学术界所熟知。清华简的整理报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的第一辑，已于2010年末由上海的中西书局出版，第二辑的编纂工作也已启动。预计收入第二辑的，是一篇史书，拟题为《系年》。该《系年》简共138支，体裁接近古本《竹书纪年》，叙事上起西周初年，下至战国前期，共有23章。关于《系年》的内容，我已有小文《清华简〈系年〉及有关古史问题》，刊于《文物》2011年第3期。

小文曾引用《系年》这样一段：

周武王既克殷，乃设三监于殷。武王陟，商邑兴反，杀三监而立紂子耿。

由史事情节看，这里的“紂字耿”显然就是商纣之子武庚禄父，也即大家熟悉的青铜器大保簋铭文中的“录子耿”，小文已经说明。周武王卒后，商邑造反，拥立王子武庚禄父，是周初历史上的重大事件，《系年》所记，又与传世文献有所不同。但由于篇幅限制，那篇小文对大保簋未能多做讨论，这里想加以补充，供读者参取。

大保簋是传于清道光咸丰年间发现的所谓“梁山七器”之一，出土于山东寿张梁山下，即今山东梁山县境^①，是最著名的周初青铜器，今在美国华盛顿弗利尔美术馆。此簋首先著录于《攷古录金文》，因铭文关系重要，多有学者研究，见解不一。本文想依据新的有关发现，对大保簋做进一步讨论。至于“梁山七器”总体的一些问题，将在另文叙述。

这件簋的图像，读者易于查阅的是《商周彝器通考》281。簋无盖，有四耳。

耳上饰具大卷角的兽首，下加长方形垂珥。腹两面作大勾形角的饕餮纹。圈足较高，饰夔纹，勾喙，顶部有向后延伸的冠，长身，尾端上卷，体下有细长横羽。簋上这种特殊的饕餮纹与夔纹的组合，同于陕西宝鸡纸坊头M1:8方座簋^②，而其同出的M1:9四耳簋，器形正和大保簋相类^③。纸坊头这座墓的时代，报告定为“两周成王前期”^④，这与大保簋刚好相当。

大保簋铭文（《殷周金文集成》4140）共四行三十四字：

王伐录子聃，𡗗𡗗（厥）反，王
降征令（命）于大保，大保克
𠂔（敬），亡𡗗（讎），王𡗗（侃），大保易（锡）休
余（集）土，用兹彝对令（命）。

这涉及周初最重要的一段史事。

簋的器主大保就是召公奭，学者并无异词，但对于铭文“王伐录子聃”即大保受命征伐的对象，则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影响最大的一种意见，是将录子聃与西周中期录伯戣簋（《集成》4302）的录联系起来，但录伯戣一家世代服事周朝，如录伯戣簋铭中王云：“繇自乃祖考有毖于周邦，右辟四方，董（助）弘大命”，说曾叛周，实在没有依据。

杨树达先生《积微居金文说》也用与录伯戣簋联系之说，而于“王伐录子”下断句，他说：“聃字从口从耳，乃聽字之初文，……此文王伐录子为句，聃一字为句，谓王伐录子，录子聽命也。……说者多谓伐者伐其反，今知不然者，如彼说，文当先记反而言伐，今文先伐而后反，知反在伐后也。下云征令，征令谓征讨之令，则征此反耳。”如果这样，录子为王所伐，降服听命，随后再次反叛，为大保征伐，就更与录伯戣家族的情况难合了。

能别辟蹊径，从文献中找出周初伐录子聃一事的根据的，是日本学者白川静先生。他虽然仍认为录子聃是录伯戣的先世，但指出录子聃就是纣子禄父。这一见解见于他的《金文通释》卷一上：“‘录子聃’又称‘天子聃’，所作器有觚，铭‘天子聃乍（作）父丁彝’[《憲斋（集古录）》二一·九]。其敢称天子者，

意指为殷宗既灭后的后嗣。以之与录子耶并考，录子耶无疑是封以殷余民的‘王子禄父’。”^⑥

禄父是商纣之子，《逸周书·作雒》载：“武王克殷，乃立王子禄父，俾守商祀”，同书《克殷》称之为“王子武庚”，《史记·殷本纪》等称之为“纣子武庚禄父”，“禄父”为其名，武庚系其庙号。“录子耶”可能是名、字联称，即名禄字子耶。武庚禄父叛周一事，乃习周初历史者所共知，也正与从形制、纹饰推定的大保簋年代相吻合。因此，白川静此说得到一些学者的支持^⑦。

不过需要说明的是，白川静先生所举的“天子耶”觚，其释读还是有问题的。该觚见《集成》7296，原为晚清陈介祺所藏，《簠斋金文题识》云：“道光乙未（十五年，公元1835年）得之历（济南）市。”其铭文首字上作两横笔，与常见“天”字有些不同。《题识》释之为“天”，但说“上盖而有蚀”^⑧，看来是否“天”字值得考虑。另外，纣的庙号是“帝辛”，有没有一个弟兄称“丁”，也不可。知。^⑨尽管如此，白川静关于大保簋“录子耶”的见解是有道理的，可谓洞察。

让我们再回来看大保簋铭文。

“𡗗厥反”，杨树达先生读“𡗗”为“嗟”^⑩，然而句前并无“王曰”、“王若曰”等语，这里怎么会用“嗟”这样表示语气的感叹词呢？实际西周金文连用“𡗗厥”还有其例，如：

师旂鼎 义（宜）播，𡗗厥不从厥右征，今毋播。

九年卫鼎 迺舍裘卫林霫里（狐狸），𡗗厥唯颜林。

“𡗗”都不能读作“嗟”。按“𡗗”当读为“徂”，“厥”可训为“兹”。《书·费誓》：“公曰：嗟，人无诟，听命。徂兹淮夷、徐戎并兴。”于省吾先生《尚书新证》已说明：“按徂即廬，亦作𡗗，语词。”^⑪“徂兹”和“𡗗厥”意义是一样的。由《费誓》前已有“嗟”，足证读“𡗗”为“嗟”是不当的。

“王降征命于大保”，“降命”系当时习语，在《尚书》的《周书》诸篇，或言天降命，如《金縢》“无坠天之降宝命”，《酒诰》“惟天降命”，《多方》“乃大降显休命于成汤”；或言王降命，如《多士》“予大降尔四国民命”，《多方》“我

惟大降尔命”、“我惟大降尔四国民命”、“乃有不用我降尔命”，均可与簋铭对看。

“大保克敬，亡𡇗”，西周金文使命征战，常云“敬”，例如师旅簋说“敬乃事”，引簋说“敬乃御”^②，簋铭“克敬”也是讲敬于王命。“𡇗”，《说文》：“滴问也。”“亡𡇗”意与常见的“亡尤（或作述、眈）”相同。

“王𡇗”，“𡇗”应依裘锡圭先生读为“侃”或“衍”，训作乐^③，是喜悦的意思。“王侃”当作一句，殷墟卜辞屡见。

“大保锡休集土，用兹彝对命”，是记大保受王锡休，其例金文多有。当时赏赐土地常称某土，如召卣“毕土”，中方鼎“褒土”，都同此处的“集土”一样是采邑。大保作这件青铜器“对命”，是答谢王赏赐采邑，不是指征伐之命。

与清华简《系年》对照，知道大保簋所记确是救平王子禄父叛乱之事，其重要性也就更为突出了。

注释

- ① 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第45页，中华书局，2004年。
- ② 卢连成、胡智生：《宝鸡强国墓地》，图二二、二三，文物出版社，1988年。
- ③ 同②，图二四。
- ④ 同②，第42页。
- ⑤ 杨树达：《积微居金文说》，第69页，中华书局，1997年。
- ⑥ 白川静：《金文通释》（日文）卷一上，第59—60页，（日）白鹤美术馆，1964年。
- ⑦ 殷玮璋、曹淑琴：《周初太保器综合研究》，《考古学报》1991年第3期。
- ⑧ 陈介祺：《簠斋金文题识》，第41页，文物出版社，2005年。
- ⑨ 《殷周金文集成》3975耶簋是商末器，用祀“大子丁”，又有特殊族氏，应与这里讨论的觚无关。
- ⑩ 同⑤。
- ⑪ 于省吾：《双剑谿尚书新证》，第301页，中华书局，2009年。
- ⑫ 李学勤：《高青陈庄引簋及其历史背景》，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第十八次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2010年。
- ⑬ 裘锡圭：《释衍、侃》，《鲁实先先生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系所、中国文字学会，1992年。

（原载《甲骨文与殷商史》新二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

山东高青县陈庄西周遗址笔谈

我没有参加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举行的会议（指“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学论坛”），看报道，李伯谦先生有个评论，他提了几点，我个人是非常赞成的。当时他主要根据17、18号墓做的论断，我后来在网上、报纸上看到青铜器的照片，现在又看了实物。我认为以18号墓所出青铜器为代表的器群，时代应该在康、昭，最晚到穆王早年。如果是康王，一定是康王的后期。这里有几件器物是比较有代表性的，比如觥，还有底下有三个足的簋，等等，也都是康昭时期流行的形制，时代比较确定。

35号墓所出的簋属西周中期后段，窃曲纹和大鸟纹都具有该阶段的特征。铭文开头是“王格于恭太室”，“恭太室”是恭王的宗庙，它一定晚于恭王。铭文中的“引”是器主人名。“齐师”以往至少见过三次，都是西周中期偏晚。“齐师”虽跟齐国有密切的关系，但属于王朝管理。“赐汝彤弓一、彤矢百”，“彤弓”、“彤矢”是合文，这个赏赐层次很高，相当于诸侯一级，文献中王赐晋文公也不过如此。

从簋的铭文内容看，没有记出打仗的对象。我个人有个想法，就是西周王朝和齐国发生矛盾，只有一个事情，即周夷王把齐哀公用鼎给烹了，然后强立齐胡公。铭文中的战事，可能和此事有关。

“齐师”是由王朝管辖，不是由齐国管理，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事。与此相类似，周昭王时的静方鼎铭文有“在曾鄂师”，也是由王朝管理的当地军队。由此可见，当时的诸侯国与王朝的关系并不像东周时那样。

我想，这件事情和周夷王废齐哀公有一定关系。如果是和东夷开战，获胜是很光彩的事，为什么不明说呢？

如果这样一个想法能够成立，那么对陈庄遗址的认识就有参考价值了。周

王杀齐哀公立胡公之后，胡公就迁到薄姑，这是齐国唯一一段时间都于薄姑，再往后，胡公被杀，献公便搬到临淄了。营丘不可能在这个地方，更可能的是薄姑。当时王朝指令管辖“齐师”的人员死后，埋葬在薄姑，是很自然的。

（原载《考古》2011年第2期，收入时略有修改）

清华简《祭公》与师询簋铭

这是我第三次写小文论述《祭公》了。

大家了解,《祭公》是传世《逸周书》的一篇。对于该篇的时代和性质,历代学者多有不同意见。为此,我曾在1988年写有《祭公谋父及其德论》一文^①,说明《祭公》实系西周文献,篇内专论“懿德”,继承着周公的思想传统,当视为儒学的渊源之一,“我们研究西周思想流变,不可不给祭公谋父以适当的位置”。到2000年,我又写了《师询簋与〈祭公〉》^②,指出《祭公》作于周穆王晚年,文句风格多同作于周共王元年的青铜器师询簋铭文相似。我一共列举了八点,从而对《祭公》的可信做了进一步论证。

2008年入藏清华大学的一批战国竹简(通称清华简),经过编排考释,发现其中有《祭公》^③。《祭公》简共有21支,保存良好,篇题原作《祭公之顾命》,正与《礼记·缙衣》及郭店简、上博简《缙衣》所引一致,应是流传于楚地的该篇祖本。以简本和《逸周书》本对照,能校正许多讹误之处,这对于《祭公》的深入研究,无疑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需要说的是,简本《祭公》与传世本的文句差异还是不少的。那么,我在2000年拙文里举出的《祭公》同师询簋铭相似的八点,在简本《祭公》能否成立?或者有怎样不同的情形?本文想就这方面问题试做讨论。

(一)我在2000年文中提到,《祭公》传世本有“朕皇祖文王、烈祖武王……用应受天命”,师询簋铭也说“丕显文武应受天命”,两者“应”都读为“膺”。简本《祭公》则作“用纒(膺)受天之命”,只多了一个“之”字。西周青铜器铭文罕见“天命”,多见的是“大命”,师询簋铭却是“天命”、“大命”并见,《祭公》简本、传世本也是一样。

(二) 簋铭“亦则惟汝乃圣祖考”，“汝”、“乃”同义。传世本《祭公》有“我亦惟有若文祖周公暨列祖召公”，“我亦惟有若祖祭公……”，句型相类。简本作“我亦惟有若祖周公暨祖召公”，“我亦惟有若祖祭公……”，虽有个别差异，句型还是如此。

这里附带说一下，《史记·燕世家》云：“召公奭与周同姓，姓姬氏”，其同周王室的关系似乎很远，但《穀梁传》庄公三十年说：“燕，周之分子也。”《白虎通义》、《论衡》及谯周、皇甫谧等也有类似说法，不少学者不予采信，实际从《祭公》穆王称召公为“祖”看，《穀梁》等说是接近事实的。

(三) 簋铭“用夹绍厥辟，奠大命”，可对照传世本《祭公》“用克龠绍成康之业，以将大命^⑤，用夷居之大商之众”。简本此处作“克夹绍成康，用毕成大商^⑥”，差别较大，但“夹绍”更与簋铭一致。

(四)《祭公》传世本“执和周国”，“执和”一词，我在2000年文中说明即簋铭“鼈龠孚政”的“鼈龠”之讹。也属共王时的史墙盘则作“敷稣于政”。简本《祭公》此处为“塹（修）和周邦”，“修和”见于《尚书·君奭》。“鼈”字《说文》云“从弦省，从鼈”，传统上认为是来母质部字，不过看《祭公》和师询簋等，铭文里的“鼈”恐怕就应该读为“鼈”，是端母幽部字，而“修和”的“修”或通作“脩”，是透母幽部，古音可谓相同。这个词其应理解为“调和”，“调”也可读在端母幽部。

(五) 簋铭“肆皇帝亡斃”，“皇帝”也见于《尚书》中穆王时的《吕刑》。简本《祭公》“惟时皇上帝宅其心”，作“皇上帝”。传世本为“维皇上帝度其心”，则是误衍一“皇”字。

(六) 簋铭“今日天疾威，降丧”，杨树达先生《积微居金文说》引《诗·召旻》：“旻天疾威，天笃降丧”，指出：“铭文日字当读为旻，旻字从日文声，此省声存其形也。”省声存形，在西周铭文中前所未见，难于举出其例，如果簋铭原确如此，只好说是误字。简本《祭公》有“诂天疾畏（威）”，“诂”即读为“旻”。至于传世本《祭公》，此处作“昊天疾威”，“昊”疑即“旻”，形近而误。

(七) 传世本《祭公》“俾百僚乃心，率辅弼余一人”，文句欠通。2000年小

文曾据师询簋“敬明乃心，率以乃友扞御王身”，试于“百僚”下补一“明”字。北京琉璃河1193号墓出土的克罍、克盃铭文云：“王曰：大保，惟乃明乃心，享于乃辟”，也有“明乃心”字样。今看简本《祭公》，该句作“逊措乃心，尽付界余一人”，与传世本差别较大，但可知后者“辅弼”系“付界”音近而误。按简本讲臣下以心“付界”于君，意义正和克罍、克盃大保以心“享于乃辟”相合。《尔雅·释诂》：“享，献也。”“献”与“付界”正是相近的词。

（八）簋铭“欲汝弗以乃辟函于艰”，句亦见毛公鼎。《祭公》传世本有“我亦维丕以我辟险于难”，我曾说“丕”字当读为“不”。简本作“我亦不以我辟窾于懋”，正为“不”字。至于“窾（坎）”、“懋”都是通假字，是显而易见的。

由以上讨论，足见清华简本《祭公》比传世本更在文句上近似师询簋，证实该篇的可信，今后可以作为西周文献深入研究。

还应提到，简本有一些地方，足能祛除因传世本讹误造成的重大误解。最好的例子，就是《祭公》中屡见的“三公”。篇文的“三公”，注释家多认为是后世指为“天子之相”的“三公”。《公羊传》隐公五年：“天子三公者何？天子之相也。天子之相则何以三？自陕而东者周公主之，自陕而西者召公主之，一相处乎内。”潘振《周书解义》便把《祭公》的“三公”说成这个涵义的“三公”，看简本可知，《祭公》的“三公”恐怕只是对三位大臣的合称，简文说：祭公“召毕舛、井利、毛班，曰：三公，……”三人都受祭公召唤，接受他的教训。我们不能因为《祭公》有“三公”之称，就推论当时有作为“天子之相”的三公制度。

注释

- ① 李学勤：《祭公谋父及其德论》，《齐鲁学刊》1988年第3期。
- ② 李学勤：《师询簋与〈祭公〉》，《古文字研究》第22辑，中华书局，2000年。
- ③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中西书局，2010年。
- ④ 参看泂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第90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 ⑤ “大命”，从朱右曾《逸周书集训校释》本。
- ⑥ “毕”字释读尚待研究。
- ⑦ 杨树达：《积微居金文说》，第59页，中华书局，1997年。
- ⑧ 黄怀信等：《逸周书汇校集注》，第93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

- * 本文得到教育部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出土简帛典古史重建(09JZD0042)”、科技部科技支撑计划“中华文明探源及其相关文物保护研究”项目课题“古代简牍保护与整理研究(2010BAK67B14)”和清华大学自主科研项目“清华简的文献学、古文字学研究”的资助。

后记：本文写就后，读到《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1年第2期所载麻爱民《迷盘补释》一文，其中引述安徽大学何琳仪教授2003年所作《迷盘古辞探微》关于“𡔷”字从“𡔷”得声的意见，并加反驳。何文我没有读过，现知他正是将“𡔷和”读为“调和”的，不过，“𡔷”、“𡔷”两字有关的文字学问题较多，尚有难于通解之处，有待今后研究。

(原载《孔子学刊》第2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

试释翼城大河口鸟形盃铭文

2007年发现并开始发掘的山西翼城大河口墓地，已出土大量珍贵遗物，其间青铜器数量众多，且有不少重要铭文，见于报道^①。对这些铭文的考释解读，将对墓地的隶属、性质及历史背景，提供论证的线索和证据。最近，该墓地一件奇异的鸟形盃的图片业已发表^②，清晰的铭文引起大家的注意，这里试提一些看法，供大家讨论。

鸟形盃出自大河口2002号墓，全器作立鸟形，首颈昂起，敛翅伸尾，背上有盖系环，且有一扁环形钮。胸下加流，朝前斜出，尾下设一卷身小夔，与鸟爪构成盃的三足。通身纹饰像鸟的毛羽，只在后部小夔体表有所谓重环纹（鳞纹）。从纹饰特点看，似可估计为西周中期。

盃铭铸于盖的内面，保存完好，共为8行51字，现依原行款隶写如下：

乞誓曰：“余某
弗豐公命，余自
無，則金。”身第传
出，报毕誓，曰：“余既曰
余豐公命，戮余亦
改朕鬲，出弃，鞏公
命。”用作宝般盃，
孙子其万年用。

铭文格式前所罕见，文句也有不少地方需要仔细解释。

第一行开头的“乞”，是器主名。“乞”字古作“气”，殷墟卜辞作三横画

形，中间一笔稍短，也有三笔等长，以至与“三”字混淆的，后来为了与“三”字区别，上下两画改为曲笔，于省吾先生曾有精到论述^③。盃铭这个字，则是中下两画作曲笔，用意还是一样的。先秦人名“乞”的甚多，如石乞、陈乞等，不须详述。

第一行之末的“某”字，下部的“木”上面两斜笔变成一横，可参看第三行“無”字的右下部分，知道仍是“某”无疑。“某”在此读为“谋”，《广雅·释诂》与“议”、“计”等互训。

第二行“弗戛公命”，“公命”一词见《左传》隐公元年等。“戛”即“称”，《汉书·景帝纪》注：“副也。”“弗称公命”意指与君主的命令不合。这里应该说明，《诗·臣工》传云：“公，君也。”不要由于此处说“公”，就推想乞的君主有公爵的身份。

“余自無”，“無”字从“爽”声，即“模”字，所以“無”应读为“谟”，《说文》：“议谋也”，同第一行“谋”同义。

“𠂔”，《说文》“鞭”字古文。

以上自第一行“余谋”到第三行“则鞭”，是乞的誓辞，大意是说：如果我所做谋画与君命不合，只是我私自的策划，就接受鞭刑。按《尚书·舜典》云：“鞭作官刑”，孔传：“以作为治官事之刑”，《周礼·条狼氏》有详细记述。有关问题，以前我在研究陕西岐山董家村所出训匭时，已经探讨过了^④。

“身第传出”，“身”，《尔雅·释言》：“亲也。”“第”通“茆”字，《诗·载驰》传：“车之蔽曰茆。”“茆传”是一种有遮蔽的传车。这句话意思是说器主乞在立誓之后，亲自搭乘传车出行各地。从商代起，已经设立了驿传制度^⑤，是卜辞金文研究者都了解的。

乞乘驿传出行，是为了“报𠂔（厥）誓”。“报”意为反复，这里是说到各地反复说明自己已立的誓言。立誓是在都邑中宗庙一类所在，恐怕地方不能知晓，因而乞有必要亲往进行说明。

由第四行“余既曰”到第六七行“公命”，是乞到各地陈说本人誓言的话。誓辞说“余谋弗称公命”，就甘受鞭刑，所以这里讲“余既曰余称公命”意即我已经立誓说一定要遵从君命了。

第五行“𠄎”字乃“襄”字所从，此处应读为“尚”，即后来写的“倘”字。第六行“𠄎”即“辞”字，指誓辞，训诂称为“辞誓”。“倘余亦改朕辞”，“亦”是加强语气的助词^⑥，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如果我违反了誓言。按当时讲违背誓言时用“改”，如在侯马盟书中说“变改”^⑦。

“出弃”，“弃”字下从“𠄎”形，省去“収”旁。散氏盘誓言有“传弃之”，意云通过驿传流弃于边远之地，这里“出弃”与之相近。

“𠄎公命”，“𠄎”字读为“践”^⑧，《广雅·释诂》：“履也”，在这里就是履行。

根据以上所论，盂铭大意可用白话译说如次：乞立誓说：“我所做谋议如果不合君命，而是我自己私行策划，就受鞭刑。”乞亲自乘有车蔽的传车前往各地，重复所立誓言，说：“我已立誓要上合君命，假如我违反誓辞，便应该遭到流弃，使君命仍得执行。”乞因此铸造盘盂，传于子孙使用。

这篇铭文奇特高古，很不容易释读。我再三推敲，曾想在第三行“身”字下面断句，把第一行“余谋”到第三四行“弗传出”整个作为乞的誓言，即“余谋弗称公命，余自谟，则鞭身，弗传出”，这样“弗传出”似与下文“出弃”相呼应。不过，作如此读的结果，乞为什么要“报厥誓”，向什么人“报厥誓”，又何以将所立的誓重复，便很难交代了。现在的读法，前面是乞的誓辞，后头是他向各地说明的话，看来是比较顺理成章的，希望能得读者指教。

注释

- ① 卫康叔：《大河口西周墓地：小国的霸气》，《中华遗产》2011年第3期。
- ② 同①，第112—113页。又见《2010年山西重要考古发现》，《中国文物报》2011年1月7日；《山西翼城大河口墓地惊现西周“霸”国》，《光明日报》2011年4月28日09版。
- ③ 于省吾：《甲骨文字释林》，第79—83页，中华书局，1979年。
- ④ 李学勤：《新出青铜器研究》，第114页，文物出版社，1990年。
- ⑤ 同③，第277—280页。
- ⑥ 杨树达：《词诠》，第364—365页，中华书局，1979年。
- ⑦ 参看汤余惠：《战国铭文选》，第197页注4，吉林大学出版社，1993年。
- ⑧ 参看刘钊：《古文字考释丛稿》，第140—148页，岳麓书社，2005年。

（原载《文博》2011年第4期）



附图 乞盃铭文照片

翼城大河口尚孟铭文试释

2009年5月起，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对翼城大河口西周墓地进行发掘，收获甚丰，最近已屡见报道。其间《2010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所收《山西翼城大河口西周霸国墓地》一文^①，叙述简要，附带发表了不少图片，包括若干青铜器的器形和铭文。这些铭文对研究该基地的性质及历史背景，具有非常关键的意义。现选取已见铭文最长的尚孟^②，尝试做一释读，与大家讨论商榷。

尚孟出自随葬青铜器众多的M1017椁室内，位于墓主头前右方。孟的形制为侈口附耳，口沿下饰窃曲纹，直腹平底，有三象首形足。从窃曲纹有较原始的“臣”字形目看，时代应在西周中期前段，可估计属穆王前后。

孟的内壁有铸铭10行，共116字，是近年发现较长又特别重要的铭文之一。以下依原行款写出释文，并尽量用通行字体：

惟三月，王史（使）白（伯）考蔑尚麻，归
柔斡（鬻），旁（芳）鬯、臧（浆），尚拜稽首。既稽
首，延宾，鬻（赞），宾用虎皮冉（称）毁（饋），用
章（璋）奉。翌日，命宾曰：“拜稽首天子
蔑，其亡麻，敢敏。”用章（璋）。遣宾，鬻（赞），用
鱼皮两侧毁（饋），用章（璋）先马。遽（原）毁（饋），
用玉。宾出，以胆（俎）或（又）延，白（伯）或（又）遽（原）毁（饋），
用玉
先车。宾出，白（伯）遣宾于萆（郊），或（又）舍
宾马。霸白（伯）拜稽首，对扬王休，
用作宝孟，孙子子其万年永宝。

这篇孟铭记述的是周王派遣使臣聘问霸伯尚，嘉奖尚的功绩，举行典礼的过程，应当属于当时的聘礼^③，但由于时期的差异，所行之礼和《仪礼·聘礼》等反映东周状况的传世文献有所不同。同时还要考虑到，霸伯一族，如墓地发掘者所说，很可能“是被中原商周文化同化的狄人人群”^④，其礼制也会同中原传统多少存在差别。我们根据文献来讲这篇铭文，只能说是不中不远。

“惟三月，王使伯考蔑尚厯”，伯考是周王所派使臣的名字。“蔑厯”后一字即常见的“厯”，前一字张光裕先生指出意同于“嘉”^⑤，对照《左传》僖公十二年“余嘉乃勋”，可知“厯”确为功勋之义。王使伯考前来，是为了嘉勉尚的功绩。至于功绩究何所指，铭文没有说明。

“归柔鬻、芳鬯、浆”，是王命伯考带来的赏赐。“归”，《广雅·释詁三》：“遗也”。意思是馈赠。“鬻”是香草鬻金，“鬯”是以之酿成的香酒。“浆”，《说文》：“酢浆也”，为《周礼·酒正》“四饮”之一。这些大概都是尚所处地区缺少的，而为遵行传统礼制所必备。

由“王使伯考”到“尚拜稽首”，是记“蔑厯”赏赐之礼，以下则是伯考对尚的聘问礼节。

尚“既稽首，延宾，鬻”，“延”意为迎请，如《尚书·顾命》：“逆子钊于南门外，延入翼室。”“鬻”小孟鼎作“鬻”，读为“赞”^⑥，意为引导，如《国语·周语上》：“右史赞王。”此处应在“鬻”字下断句，看下文自明。“宾”，就是来聘的王使伯考。

“宾用虎皮称毁，用璋奉”，是说伯考对作为主人的尚奉赠礼物。“毁”字为动词，古音晓母微部，在铭文中读作群母微部的“馈”，《周礼·膳夫》注：“进物于尊者曰馈。”^⑦“称”，《仪礼·士相见礼》注：“举也。”“奉”，《尔雅·释言》：“献也。”

《周礼·小行人》云“圭以马，璋以皮”，铭文馈璋配以虎皮，与经文相合。皮是虎豹之皮，见《仪礼·聘礼》注，疏引《礼记·郊特牲》：“虎豹之皮，示服猛也。”“称毁（馈）”是举皮而献，可参看《聘礼》“有司二人举皮”。

以上从“蔑厯”到奉璋，当日行礼已完，下面记“翌日”即次日的活动。

“翌日，命宾曰”云云，为尚告伯考，要他代向周王禀告的话。“拜稽首天

子蔑”，是感谢王的嘉美奖赠。“其亡曆，敢敏”，“敏”字《礼记·中庸》注：“犹勉也。”这乃是尚自谦的话，说实际没有什么功勋，只有以之自勉而已。

尚“命宾”之后，便“用璋”，即将伯考上日奉献的璋还回，在《聘礼》称做“还玉”^⑧。

此后便是“遣宾”，送伯考回返王处，尚有几次隆重的馈赠。

首先，“遣宾，赞，用鱼皮两侧毁（馈），用璋先马”。“侧馈”的“侧”，《仪礼·士冠礼》注：“犹特也。”《聘礼》注：“犹独也。”“鱼皮”一对作为一项专赠，所以说“侧馈”。^⑨其后又“用璋先马”，即先奉璋，后献马，体现先轻后重的原则^⑩，可参看《老子》第六十二章：“虽有拱璧，以先驷马。”

其次，“遽毁，用玉”，“遽”通“原”字，《尔雅·释言》：“再也。”“原毁”便是再馈、再献。

铭文上述“蔑曆”以至“遣宾”的初献、再献，虽未明说，按传统礼制都应在室内，究竟哪些仪节在宗庙，还是朝堂，或在宾所居馆舍，不能详考。铭文只说“遣宾”再馈之后，“宾出”，主人尚“以胆或延”。“胆”就是“俎”，《仪礼·乡射礼》注：“俎者，肴之贵者也。”可见尚送宾举行飨宴，尽管宾已经离席辞出，又接引回来，“或（又）原毁（馈）”，进行第三次馈赠，“用玉先车”，所馈不仅玉瑞，还有车，可与第二次所馈的马相配。

经过三次馈献，伯考最后辞出，“伯遣宾于郊”^⑪，又赠马于宾，作为这次盛礼的结束。

附记：孟铭“拜稽首天子蔑，其亡曆”句，“亡”字有学者疑为“臣”字，连读作“拜稽首天子蔑其臣曆”，但字的结构不似，此说当暂存待证。

注释

- ① 国家文物局主编：《2010中国重要考古发现》，第65—73页，文物出版社，2011年。
- ② 同①，第69页，铜孟（M1017：6）、铜孟内壁铭文两图。
- ③ 王派使臣到诸侯国可称聘，参看钱玄：《三礼通论》，第634—635页，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
- ④ 同①，第73页。

-
- ⑤ 张光裕:《雪斋学术论文二集》,第180—181页,(台)艺文印书馆,2004年。
- ⑥ 李学勤:《青铜器与古代史》,第239页,(台)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
- ⑦ 归、愧、馈音义相近,但非同字。
- ⑧ 同③,第641页。
- ⑨ 以鱼皮馈赠比较奇怪,又不合翼城一带自然状况。怀疑“鱼”读为《说文》训“牡鹿”的“麋”,“麋皮”即礼书“麋鹿之皮”。
- ⑩ 同③,第259页。
- ⑪ “遣”字写法略有讹变。

(原载《文物》2011年第9期)

膳夫山鼎与周厉王在位年数

1981年2月，河南南阳北郊砖瓦场发现一座古墓，由于已遭破坏，墓葬的形制大小已不能知道。经过收集，该墓所出青铜器有鼎、簋、盘及车马器等多件^①，以其器形和纹饰考察，属于西周晚期。1984年，我曾有小文，对这批器物做过讨论^②。

南阳砖瓦场这批青铜器，鼎、簋均有铭文。鼎一件（《殷周金文集成》2529），其文字为：

[仲] 冉父作宝
鼎，其万年子子
孙永用享孝。

簋两件，其一（《集成》4189）盖铭是：

南鹵（申）伯大宰仲冉父
厥辟作其皇祖考
遲（夷）王、监伯罍簋，用
享用孝，用锡眉寿，
纯佑康勗，万年无
疆，子子孙孙永宝用享。

同簋器身及另一件（《集成》4188）的文字略有差异，开首器主名作“仲冉父大宰南鹵（申）厥辟”。我已说明，器主名“厥辟”，字“仲冉（称）父”，职任南

申伯的大宰。南申伯就是《诗·崧高》中的申伯。最近即将发表的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系年》证明，当时还有“西申”^③，今南阳的申称作“南申”，无疑是为了与“西申”区别。

南申和周王朝有特别亲密的关系。《诗序》：“《崧高》，尹吉甫美宣王也。天下复平，能建国亲诸侯，褒赏申伯焉。”毛传：“尹吉甫、申伯，皆周之卿士也。”《左传》隐公元年《正义》：“申之始封亦在周兴之初，其后中绝，至宣王之时，申伯以王舅改封于谢。”可知申伯是宣王的内亲^④。任申伯大宰即执政大臣的仲禹父，乃是夷王之孙、监伯之子，也足见申与王朝关系的密切。

仲禹父簋还有一点非常重要，是我在写1984年那篇小文时不曾考虑到的，就是簋铭告诉我们，夷王有一个称为“监伯”的儿子，他与继夷王而立的厉王为兄弟行，从而和其他几件青铜器铭文有关。提出这一点的，是刘启益先生。

2002年，刘启益先生的《西周纪年》一书出版。在这部著作中，他同意我的意见，定砖瓦场仲禹父诸器的时代为宣王，他说：“仲禹父鼎的形制与虢文公鼎十分相似，簋铭说仲禹父是夷王之孙、监伯之子，他与宣王是叔伯兄弟行，定为宣王是正确的。”^⑤由之他联系到叔硕父鼎（《集成》2596）：

新宫叔硕父、
监姬作宝鼎，
其万年子子
孙孙永宝用。

以及叔硕父方甗（《集成》928）：

叔硕父作旅
献（甗），子子孙孙永宝用。

都是西周晚期器^⑥。刘先生说：“鼎铭记载：‘新宫叔硕父、监姬作宝鼎’，说明监姬是叔硕父之妻、姬姓监国的女儿；从仲禹父簋铭中已获知厉王的兄弟被封为

监伯。既然叔硕父器的时代属于西周晚期，那么，叔硕父鼎铭中之监姬非监伯之女莫属。监伯生活的时代与厉王相当，他女儿、女婿生活的时代应在厉王后期至宣王前期。”^⑦

这一点有很关键的意义，因为西周晚期王朝青铜器中，叔硕父又见于膳夫山鼎^⑧。刘启益先生说：“叔硕父何许人也？善夫山鼎记载：‘山敢对扬天子休令，用作朕皇考叔硕父尊鼎’，原来，他是善夫山死去的父亲。叔硕父生活的时代为厉宣，那么，卅七年善夫山鼎……的时代定为宣王，就是合乎情理的事了。”^⑨因此，他将膳夫山鼎定为宣王时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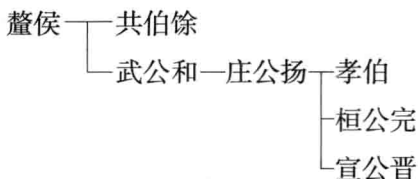
膳夫山鼎传系新中国成立前陕西永寿好时河出土^⑩，铭文（《集成》3164）首言“惟卅又七年正月初吉庚戌”，末言：“用作朕皇考叔硕父尊鼎，用祈丕眉寿綽綽，永命灵终，子子孙孙永宝用。”由于所记时王在位年数达到三十七年，自出现后一直受到研究西周年代学的学者关注。

这是因为在西周年代学上，厉王的在位年数从来是悬而未决的问题。《史记·周本纪》明确记载厉王三十七年被国人放逐于彘，但这与同书中如《卫世家》所叙有关年数不能吻合，引起学者质难。梁玉绳《史记志疑》卷三云：“厉王在位之年，汉初已无考，故史公作表，断自共和。”卷八又说：《卫世家》“言顷侯赂夷王，则书顷侯于夷王之世宜也，但顷侯十二年卒，子釐侯嗣位之十四年便及共和之元何欤？将递推其世，而釐侯立于厉王二十五年，顷侯立于厉王十三年，安得逮事夷王？将顺数其世，而夷、厉两王凡四十五年，安得釐侯十四年当共和行政之岁？”^⑪梁玉绳是主张“《世家》于顷侯之年有讹脱”的，而更多的学者认为厉王实际没有三十七年，错误是在《本纪》。现在有了膳夫山鼎，假使该鼎属厉王时，就应依照梁玉绳说，反之鼎属宣王时，厉王有没有三十七年便仍有问题。刘启益先生《西周纪年》的论断之所以重要，理由即在于此。

刘先生的讨论给我们很大的启发，但有一件事是刘书没有考虑到的，就是监伯不会是厉王的弟弟，而只能是他的长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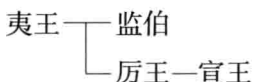
在周王朝及其诸侯的世系中，凡称“伯”都系长子。文王长子为伯邑考，被纣杀死，次子是武王发，再下周公以及管、蔡等均称“叔”，直到最小的聃季

载，是大家都熟悉的。诸侯如《卫世家》，西周晚期有釐侯，太子共伯名余，早死，次子武公和继位。武公传子庄公扬，太子孝伯又早死，由弟桓公完、宣公晋先后继位。这一部分卫国世系可表列如下：



釐侯太子余称“共伯”，是因为他曾受封于共，庄公之子“孝伯”的“孝”，则是谥法，他大概没有过自己的封邑。

对照像《卫世家》这样的例子，本文所论夷王以下一部分世系也可如此表列：



监伯之所以称“伯”是由于他为长子，称“监”是因为他受封于监，这恰和上述共伯之例相同。

监伯身为长子，却不得继父位为王，这恐怕不是由于犯罪被黜一类的原因，因为那样他的后人就不能继续成为监氏了。最大的可能，便是和卫国的共伯一样，是早死，在夷王去世之前已经不存在了。

如果监伯在夷王去世、厉王继位前已死，他当时年龄必不很年轻，因为他已经有第二个儿子仲弭父，又有女儿监姬。我们姑且假设监姬在厉王元年年龄是十岁，那么到厉王三十七年她已四十七岁，堪称半老，有一个二十岁上下的儿子受封为替王司理饮食的膳夫小官，如膳夫山鼎所述，是合情入理的。

相反，若把膳夫山鼎排在宣王三十七年，即使将厉王在位年数缩到约二十年，二十年加共和十四年、宣王三十七年，便有七十一年，监姬即使仍在世，也是八旬上下，她的儿子膳夫山年纪也太大了。也许有人会说，膳夫山是监姬所嫁叔硕父的儿子，却可能不是监姬所生，不过叔硕父的年纪总得和监姬差不多，情形还是一样的，膳夫山的年纪将嫌太大。

再从仲弭父方面来看，作为监伯的次子，设想厉王元年他也只有十岁上下，

厉王如有三十七年，加共和十四年，宣王之初他刚过六十岁，到宣王封申时正是年高德劭，任申国大宰之职是适当的。

因此，膳夫山鼎还是以定在厉王时为好，也就是说厉王在位实有三十七年。

1999年，在“夏商周断代工程”实施过程中，我写了一篇《膳夫山鼎年代的确定》^⑫，根据膳夫山鼎的形制和文字，指出这样五点：

- 一、膳夫山鼎形制、纹饰近于宣王初的毛公鼎。
- 二、铭文字体、格式类似宣王三年的颂鼎。
- 三、铭中所见图室见于宣王早年的无惠鼎。
- 四、铭中所见南宫乎作有编钟，钟的形制、纹饰均似厉王末年的虢叔旅钟。
- 五、虢旅其人又见厉王三十一年之酹攸从鼎。

结合本文所论，膳夫山鼎还应是厉王三十七年所作，这也即论证了厉王确有三十七年。

依照“夏商周断代工程”西周金文历谱研究，厉王三十七年和共和元年为同一年，即公元前841年。该年正月壬子朔，膳夫山鼎“正月初吉庚戌”在其前二日^⑬，这应当是可以允许的误差。至于宣王三十七年，则在历法上不合。

最后，还有两个小问题要说一下。

一个是叔硕父鼎作者称“新宫叔硕父”是什么意思。按“新宫”指新建宗庙，叔硕父当系管理新建宗庙的官员。厉王时实有新建宗庙，即厉王十三年望簋（《集成》4272）的“周康宫新宫”。

再一个是仲禹父簋作者父称“监伯”，他本人也应为监氏。传世有邓孟壶（《集成》9622），铭为：

邓孟作监

嫫罍壶，子子

孙永宝用。

邓国在今湖北襄阳北，与申较近，监嫚是邓国嫁给申国监氏的女子，其夫可能即仲再父的子辈。

注释

- ① 崔庆明：《南阳市北郊出土一批申国青铜器》，《中原文物》1984年第4期。
- ② 李学勤：《论仲再父簋与申国》，《中原文物》1984年第4期。
- ③ 李学勤：《清华简〈系年〉及有关古史问题》，《文物》2011年第3期。
- ④ 《列女传》云宣后为“齐侯之女”，但该书所载古事多不可信据。
- ⑤ 刘启益：《西周纪年》，第396页，广东教育出版社，2002年。
- ⑥ 叔硕父方甗传出土于山西吉县安平村，见刘雨等：《商周金文总著录表》，第152页，中华书局，2008年，有可能与叔硕父鼎非一人所作。
- ⑦ 同⑤，第398页。
- ⑧ 白川静：《金文通释》卷三上，一五四，论膳夫山鼎时已引及叔硕父鼎、甗。
- ⑨ 同⑦。
- ⑩ 吴镇烽：《陕西金文汇编》下，第881页，三秦出版社，1989年。《文物》1965年第7期《陕西省博物馆新近征集的几件西周铜器》则云出自麟游、扶风、永寿交界处某沟。
- ⑪ 梁玉绳：《史记志疑》，第100、291页，中华书局，1981年。
- ⑫ 李学勤：《夏商周年代学札记》，第214—219页，辽宁大学出版社，1999年。
- ⑬ 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第84页，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

（原载《中华文史论丛》2011年第4期）

随州叶家山西周墓笔谈

自上世纪七十年代湖北随州（当时称随县）擂鼓墩一号大墓发掘以来，学术界就所谓“曾国之谜”有很多探索和讨论。我个人主张青铜器铭文中的姬姓曾国就是传世文献里的随国，但随国为何时所封，有过怎样的历史，并不清楚，最早的记载，如《国语·郑语》所说，只能证明西周晚期南方已有随国。铭文中的曾国也是如此，过去只能上溯到西周晚期。更早的曾是不是诸侯国，一直没有证明，因而大家猜想曾国即随的始源可能不早。2007年随州羊子山西周早期鄂国墓地的发现，更加强了这种推测。

随州叶家山西周墓葬群出土了大量青铜器，多件有铭文，包括曾国国君所作，“年代约为西周早期”，这确如简报所说是“一个重大突破”，足以纠正我们过去的误解，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当前要做的，是对叶家山墓葬群几座主要墓葬的年代进行研究。

我认为，就所出青铜器而言，对于叶家山M1、M2，最好的对比单位是北京房山琉璃河M251和M253，其报告定之为周初成康之际；还有陕西宝鸡竹园沟M13与M7，其报告称前者在成康间，后者在康昭间。

叶家山M1器主名“𠄎（师）”的几件青铜器，两件圆鼎类似琉璃河M251的父乙鼎或竹园沟M13的父辛鼎、M7的丰公鼎。叶家山M1：09鼎，则类似琉璃河M253的亚癸鼎。至于四件方鼎，形制纹饰都酷似《殷周金文集成》2661德方鼎，德方鼎系成王时器。同出的M1：019饗饗纹尊，很像河南浚县辛村的沫伯逯尊，沫伯逯尊也属于成王时。其他各器也没有明显更晚的例子。所以叶家山M1的时代应为成王至康王早年。

在叶家山M2器物中，铭文有曾侯諫名号的各件，圆鼎也类似琉璃河M251父乙鼎等。分裆鼎类似有“成王”名号的猷侯鼎。曾侯諫为媿姓妇女作的簋，花

纹结构近于成王时的沫司徒遯簋。同出叶家山M2的雷纹鬲，近似琉璃河M251和宝鸡纸坊头M1的鬲。M2:2斗子鼎是分裆鼎，铭文记周王大桼（侑）赏赐众邦伯之事，与1948年洛阳所出保尊、卣同时，也是成王时作。看来叶家山M2的时代也是成康，与M1相近。

叶家山M27显然较晚。墓中也出有早的器物，如方座簋似成王时的叔德簋，盘似琉璃河M251的伯矩盘，伯生盃的花纹同于浚县辛村M60的睦尊，鱼伯彭尊、卣（《据古录金文》2，1，51卣器主为鱼伯彭长子罙）似琉璃河M251的父戊尊、竹园沟M7的伯各尊、卣等。最重要的曾侯方鼎，口沿下饰“肥遗”形纹加涡纹，腹面有U字形的乳丁纹边框，这种类型的方鼎固然有很早的，例如商末的觚方鼎（《文物》2005年第9期），但也有晚的，见宝鸡茹家庄M1乙。再考虑到叶家山M27“象目纹”鬲和贯耳壶，也有同型器例出于茹家庄M1乙，类似的贯耳壶还见于陕西长安普渡村长思墓、河南洛阳北窑M410等，都在西周中期前段，叶家山M27墓葬的年代恐不会早于昭穆之世。

由上面的考察，我们知道周初成康时，曾国已经存在于随州一带，与鄂国相近。因此，昭王南征到此，中甗铭云“在曾”、“在鄂师次”，静方鼎铭云“在曾、鄂师”，都反映了当时情况。“在曾、鄂师”仍是在曾、鄂两国的王师，不宜另作解释。

叶家山青铜器的风格，一般说来与王朝传统并无二致，体现了曾国与王室间的密切关系。羊子山鄂国青铜器中和保利艺术博物馆藏卣相似的那种特殊的艺术风格，在这里也没有出现。只有M27的两件大盂，有特异而且繁复的装饰，基本形制与四川彭县竹瓦街所出大盂相同。竹瓦街盂也是周初的，我曾有《彭县竹瓦街青铜器的再考察》（《四川考古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96年）论及。昭王南征，也派人前往“繁”即今新繁、彭县一带地区，事见山西曲沃北赵晋侯墓地M114所出钲甗铭文。这里面蕴含的历史背景，很值得仔细吟味。

（原载《文物》2011年第11期）

谈单氏人名

——金文释例之二

二十年前，我写过一篇小文，题为《先秦人名的几个问题》^①，着重讨论了传世文献所见秦代以前的人名的体例，并以之与金文人名进行比较，希望借以解释考释工作间遇到的有关疑难。在那篇小文里，我曾特别说到：先秦男子“名、字经常单举，单举氏则十分少见。在古书如《左传》里，单举氏来指人，一般要加上一个‘氏’字，如尹氏、武氏、苏氏、子旅氏。这正像现代口语讲‘姓张的’、‘姓王的’，虽可指个人，却不是正规的人名。”

然而例外还是有的，那篇小文举出过“齐仲孙”和陈“颀孙”，实际不止于此。如《左传》庄公九年：“鲍叔帅师来言曰：‘子纠亲也，请君讨之；管、召讎也，请受而甘心焉。’”“管”即管夷吾、管仲，召即召忽。又僖公十二年：“管仲辞曰：‘臣贱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国、高在。’”“国”即国子，“高”即高子。再有文公八年：“先克曰：‘狐、赵之勋，不可废也。’”“狐”即狐偃，“赵”即赵衰^②。这些都是由于当时具体情况，只说其人之氏，便可明白究何所指。

类似的现象，在金文中偶然也出现过。

突出的实例是西周早期金文中的“荣”。如《殷周金文集成》4121荣簋，系清宫旧藏，现在北京故宫博物院。这是一件四耳簋，腹饰涡纹间夔纹，与江苏镇江烟墩山出土的宣侯矢簋相似，属《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所列I型2式^③，当为康王时物。其铭文为（依原行款，尽量用今字）：

惟正月甲申，荣
格，王休，赐厥臣
父荣瓚王裸、

贝百朋，对扬天子
休，用作宝罍彝。

同系康王时器的邢侯簋（《集成》4241）云“王命荣暨内史曰：舍邢侯服”，也有荣。再有著名的大孟鼎，作于康王二十三年，铭中说：“今余惟命汝孟绍荣，敬雍德经敏，朝夕入谏，享孝友，畏天威。”作于康王二十五年的小孟鼎也有命荣讯问所俘敌酋的记事。由两孟鼎看，荣的职司很可能相当于大司马^④，荣簋所云更说明他在王朝中地位的尊贵。

大家知道，荣氏是周王朝最显赫的世族之一。《国语·晋语四》载，文王时有“周、邵、毕、荣”，注云“周，周文公；邵，邵康公；毕，毕公；荣，荣公”，已可见荣氏的重要。看西周金文，足知荣氏一直贵显，如“荣伯”，“荣仲”、“荣季”等名，屡见不鲜。再检文献，西周厉王时有大臣荣夷公，到春秋时期，王臣还有“荣叔”、“荣錡氏”等。因此，认为前引几件康王时器铭中的“荣”是荣氏，其身份是非常合适的。

荣氏贵族省称为“荣”，不仅前引康王时几例，还可举出《集成》4342师询簋，“夏商周断代工程”的西周金文历谱推定其时代为恭王元年，铭云：“王格于大室，荣内右询。”还有《集成》4192、4193絺簋，时代比师询簋略晚，铭云：“王使荣蔑曆”，两者的“荣”都可能就是见于恭王十二年师永孟（《集成》10322）等多器的荣伯^⑤。如果不这样理解，把“荣”看作个人私名，在好几件铭文里都不合体例。

与“荣”的例子类似，还可举出“趟”。穆王时最有名的青铜器班簋（《集成》4341），铭文称王命毛公伐东国猾戎，并命吴伯、吕伯左右辅助，然后“趟命曰：‘以乃族从父征。’”于是毛公之子班作为父亲的保卫随从出战。这里的“趟”，前人有种种解说，都不确切。其实对照《集成》4162孟簋“孟曰：‘朕文考暨毛公、趟仲征’”，“趟”就是趟仲，当时任毛公的副手。《集成》2731虠鼎“王令趟捷东反夷”，也指同时之事。

恭王或稍晚的柞伯鼎^⑥，记伐南国昏邑之役，有“既围城，命蔡侯告报虠仲、趟氏”，“趟氏”是虠仲的副手，和“趟”一样也单称氏，只是附加了“氏”

字而已。趙氏也是西周王朝一支重要的世族，金文中多见“趙伯”、“趙仲”、“趙叔”等^⑦，是众所习知的。

还可以找到一个最新的例子。

山西翼城大河口西周墓葬群所出青铜器中有一件霸簋^⑧，有盖，顶设捉手，双耳垂珥，圈足下有三长足，系康昭时器^⑨，铭文云：“芮公舍霸马两、玉、金，用铸簋。”按这一墓葬群所出金文，许多属于“霸伯”，还有“霸仲”、“霸姑”等^⑩，互相对照，霸簋之“霸”当也是单称氏的一例。如以为霸氏得于霸簋器主之名（或字），是不妥当的，因为明为霸氏的器物有的也同样早。

尽管有上面讨论，我还要说，金文以及其他出土文字中男子单举氏是一种非常特殊罕见的现象，正如同前述《左传》的情况一样，我们不可由此做过多的推论。

注释

- ① 李学勤：《先秦人名的几个问题》，《历史研究》1991年第5期。
- ② 参看方炫琛：《左传人物名号研究》，第80页，（台）政治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博士论文，1983年。
- ③ 王世民等：《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第57—58页，文物出版社，1999年。
- ④ 李学勤：《青铜器与古代史》，第232页，（台）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
- ⑤ 参看吴镇烽：《金文人名汇编》，第274页，中华书局，2006年。
- ⑥ 参看李学勤：《通向文明之路》，第126—129页，商务印书馆，2010年。
- ⑦ 同⑤，第403页。
- ⑧ 谢尧亨等：《山西翼城大河口西周墓地》，《文物天地》2008年第10期。
- ⑨ 张懋镕：《古文字与青铜器论集》第三辑，第38—43页，科学出版社，2010年。
- ⑩ 卫康叔：《大河口西周墓地：小国的“霸”气》，《中华遗产》2011年第3期。

（原载《传统文化研究》第19辑，2012年）

西周早期颂方彝考释

本文想着重讨论的，是一件非常重要的西周早期方彝，即《殷周金文集成》9892。该方彝藏于美国波士顿艺术博物馆，铭文最早著录于1957年出版的于省吾先生《商周金文录遗》510，盖器俱全，随后问世的陈梦家先生《美帝国主义劫掠的我国殷周青铜器集录》A645、R284则只有器身的照片、拓本。这是一件隅有扉棱的饕餮纹方彝，形制、纹饰同析方彝、令方彝等接近，但体边较直，不那么“倾垂”，时代应略早一些，约估为康王时是妥当的。

《集成》9892方彝的铭文古奥费解，以致引起有的学者质疑^①。我在过去曾试做释文^②，对其间疑难未能正确分析。以下想依据后来出现的一些有关材料，再行推考。

方彝盖器文字行款相同，为4行31字，现先以通行字体写定，然后就需要说明的问题做出解释：

颂夔（肇）卿（会）酉（贾）百生（姓），夙（扬），用
乍（作）高文考父癸宝尊
彝，用鬯（申）文考剌（烈），余其
万年彜（将）孙子宝。父。

颂，器主名，右侧人形上部不作“目”，是“页”而不是“见”旁。“颂”当即《说文》“𩇑”字。

肇，语首助词，无义^③。

酉，原作“𠂔”形，旧多释为“宁”，实应释“酉”，读为“贾”，我以前曾谈起过^④，下文还会讲到。

百姓，《诗·天保》毛传：“百官族姓也。”

颺，通“扬”。“扬”有炽盛之义，见《周礼·卜师》郑注及《诗·正月》朱子《集传》。

高文考，“高”训“大”，见《战国策·秦策》高诱注。《集成》3621簋铭“陆妇作高姑罍彝”，“高姑”与“高文考”一样，是用“高”形容上一世尊长。

申，《书·尧典》孔传：“重也。”

𡗗，字从“𠂔”得声，读为“将”，《说文》“帅也”，在此即率领的“率”^⑤。“余其万年将孙子宝”，句例近于《集成》2420“其万年孙子宝”、3751“迈年孙子宝”、3974和3978“孙子其万年永宝”等。

爻，器主族氏，参看《商周图形文字编》1203^⑥。

根据以上读释，这件颺方彝的铭文是记述器主对百官族众进行商贾活动，交易成功，从而为先父制作祭器。

颺方彝的铭文虽较特异，还是有可以对比的实例，这首先是1986年在河南信阳浉河港出土的一批青铜器中的几件^⑦，时代和颺方彝差不多，也是西周早期。

先举出其中一件簋（简报图二，2、图一一，1^⑧），铭文为：

𠄎册。𡗗（晨）启𠂔（贾），用
乍（作）父乙宝罍彝。

另有一尊、一觚、二角，铭文基本与簋相同，只是族氏标识“𠄎册”放在最后面。

同出的一件方彝盖（简报图七、八），铭文则是：

𠄎册。夙启贾，用作（作）
父乙宝罍彝。

器主称“夙”，字义为早，与“𡗗”可读为“晨”彼此相应，很可能是同一个人的一名一字。值得注意的，是夙方彝盖上以“贾”字取代“𠂔”的位置，确证

了后者就应读为“贾”。

再可以提到1981年陕西岐山流龙咀发现的鲁方彝盖^⑨。其时代要晚不少，“夏商周断代工程”的“西周金文历谱”推定属于西周中期共王之世。该方彝盖的铭文见《集成》9896，可写定为：

惟八年十又二月初
吉丁亥，齐生鲁肇贾，
休，多赢，惟朕文考乙
公永启余。鲁用作朕
文考乙公宝尊彝，鲁
其万年子孙永宝用。

铭中同样说器主“肇贾”，同于颂方彝等器，而且也是为父作祭器，说“惟朕文考乙公永启余”，意思是受了其父在天之灵的教导。重要的是铭文中讲其商贾活动“休，多赢”，可以对照《左传》昭公元年所说“贾而欲赢，而恶器乎？”杜注“赢”即“赢利”，这我已经在论鲁方彝的小文中说明了^⑩。由此可知，颂方彝铭内“扬”字训为炽盛，是比较合理的。

西周青铜器铭文中有关商贾的记载并不稀见，近年已逐渐得到释读，这里谈的颂方彝不过是又一例证。

注释

- ① 叶正渤：《颂方彝铭文献疑》，《考古与文物》2011年第4期。
- ② 李学勤：《殷代地理简论》，第ii页，科学出版社，1959年。
- ③ 杨树达：《积微居小学述林》，第242页，中华书局，1983年。
- ④ 李学勤：《新出青铜器研究》，第144—145页，文物出版社，1990年。
- ⑤ 慧琳《一切经音义》引《说文》作“率也”。
- ⑥ 王心怡：《商周图形文字编》1203，文物出版社，2007年。
- ⑦ 信阳地区文管会、信阳县文管会：《河南信阳县浉河港出土西周早期铜器群》，《考古》1989年第1期。

- ⑧ “简报”指同⑦。
- ⑨ 祁建业：《岐山县博物馆近几年来征集的商周青铜器》，《考古与文物》1984年第5期。
- ⑩ 李学勤：《青铜器与古代史》，第364—365页，（台）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

（原载《中国文字博物馆》2011年第2期）

试说叶家山 M65 青铜器

前些时候，承蒙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许可和帮助，我看到了随州叶家山M1、M2和M27的有关资料，并就其所出青铜器性质、年代等问题写了一些意见，将与该三座墓的发掘简报一道在《文物》今年第11期发表。最近，又在《江汉考古》今年第3期上读到叶家山M65的发掘简报^①，再有几点想法，在这里向大家请教。

叶家山M65如简报所说，确可能是西周早期曾侯谏的墓。墓中青铜器铭文记为曾侯谏作的有M65:44鼎、M65:47方鼎和M65:49簋，文字都是“曾侯谏作宝彝”，字体风格相同，当系同时铸造。簋的形制、纹饰，均类似著名的禽簋、献簋，禽簋有“周公”，献簋有“毕公”，所以曾侯谏这件簋应属成康时。

曾侯谏方鼎口沿下的鸟纹很有特色，为陈公柔、张长寿先生所分小鸟纹I7式，据云“这种小鸟纹在西周早期很流行，在许多铜器上都有发现”^②。M65:44圆鼎则与叶家山M2的曾侯谏鼎成对，尺寸也相仿佛，我前文已说明M2那件鼎很像北京琉璃河M251的父乙鼎、宝鸡竹园沟M13的父辛鼎及M7的丰公鼎。

我的前文提出过，最适宜同叶家山M1、M2青铜器对比的青铜器群，有琉璃河M251、M253，还有宝鸡竹园沟M3、M7。琉璃河M251和M253，报告定为定康之际；竹园沟M3报告云在成康间，M7在康昭间，总之均为西周早期。

叶家山M65的青铜器中还有M65:34盃，铭云“侯用彝”。这件盃盖上饰有细密立羽的饕餮纹，与曾侯谏簋相似，其款足上有人字弦纹。形制同于琉璃河M253父辛盃及竹园沟M13的盃，共同点是躯体显得稍长。

M65:31壶有提梁，腹饰十字绶带，这样类型的酒器过去多名之为“卣”，

而此器铭文云：“曾侯作田壶。”与之相似的，有传浚县辛村出土的濬伯遂卣（《殷周金文集成》5364）^③，系成王时器。

以上盃、壶两件，尽管没有记出曾侯的名字，但其时代和曾侯谏是相同的，极可能也是曾侯谏所作。

这样，我们应该重新考虑M27出土的两件曾侯方鼎，其盖铭为“曾侯作宝鼎”，器铭为“曾侯作宝尊彝鼎”，也不记曾侯名字。我在前文说过，该种类型的方鼎的时代跨度很长，可自商末以至西周中期前段。M27方鼎结合形制、纹饰、字体来看，只能说不能太晚，器主是曾侯谏还是他的下一代很难断言。

不过，M27墓的下葬年代还是较晚的。该墓青铜器中的“象目纹鬲”，以往学者以为应晚，但叶家山M1有一件（非发掘品），现在知道M65也有一件，即M65:52，看来这种类型的鬲可能在西周早期已经出现了。尽管如此，M27的贯耳壶仍是时代较晚的证据，如想提早，还须找到有说服力的对比材料。

M65还有些器物是特别早的。比如M65:30尊和29卣，铭云“作尊彝”，花纹是和曾侯谏方鼎相似的鸟纹。尊、卣的造型都像成王时的卿尊、卿卣。卣的轮廓还很像保卣，保卣出于洛阳，系成王时物。再如M65:51分裆鼎，类似献侯鼎，献侯鼎铭记成王时事而有“成王”谥号，当系康王初年所制。

根据以上讨论，见于叶家山M65和M2的曾侯谏为成康时人，他似即周初第一代曾侯。曾国姬姓，我以为就是文献里的随国，如今知道这个诸侯国这样早便建立了。假设曾之始封在成康之际或康王世，昭王南征时曾国之君有可能就是曾侯谏的下一代，因为曾侯谏墓M65不会迟到那个时候（昭王末年）。

到春秋时期，今随州市境有随（即曾）、唐、厉三个诸侯国的都邑。厉的建封也在周初，见于太保玉戈铭文^④。唐在昭王南征时青铜器铭文中也有（字作“庚”，系通假）。近期随州羊子山又发现西周早期鄂国墓葬，使当时这一地区的形势更为复杂。看来有关历史仍有不少疑难有待我们抉发探索。

注释

①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州市博物馆：《湖北随州叶家山M65发掘简报》、《江汉考古》2011年第3期。

- ② 王世民等:《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第199页,文物出版社,1999年。
- ③ 同②第121页,卣2。
- ④ 李学勤:《太保玉戈与江汉的开发》,《楚文化研究论集》第2集,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

(原载《先秦史研究动态》总56期,2013年2月;《楚简楚文化与先秦历史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湖北教育出版社,2013年)

斗子鼎与成王岐阳之盟

2011年春，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随州市博物馆发掘随州叶家山西周墓地，其中M1、M2与M27的发掘简报已在《文物》2011年第11期发表^①，同时刊出了有关学者的笔谈。我在笔谈里曾提到叶家山M2所出的斗子鼎铭文有特殊的历史意义，现在这里试做进一步讨论，请大家指正。

斗子鼎编号为M2:2，系分裆的柱足鼎，可归于王世民等先生《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鼎的Ⅲ型1式^②。以下据该鼎铭文照片，依原行款隶写，然后做必要解释：

丁巳，王大祓。戊午，
斗子蔑曆，敝白牡一。
己未，王商（赏）多邦
伯，斗子丽，商（赏）奭
卣、贝二朋，用作文
母乙尊彝。

“丁巳，王大祓”，“祓”为祭祀名，应即商代卜辞常见的“出”或“又”。后者前人多读为“侑”，引《尔雅·释诂》训为“报”，认为就是文献中的报祭^③。

“戊午”为丁巳次日，两字因在行末，合占一字位置。

“斗子”，器主名。“斗”字写法见随州擂鼓墩曾侯乙墓漆箱盖文^④，清华简《尹诰》“料”字所从也与之相似^⑤。《左传》襄公三十年有地名“斗城”，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云在今河南通许东北^⑥，不知是否斗子封地。

“敝”，读为“尝”，《广雅·释诂二》：“食也。”

“白牡一”，后两字也是因在行末而合占一字位置。白色牡牛当为周王祭祀所用牺牲，祭后分颁于臣下。

“多邦伯”，“邦伯”意即诸侯，见《尚书·盘庚》、《酒诰》、《召诰》，讲的都是殷商的诸侯，周初还沿用这一称呼。

“丽”，意思是“侍”，杨树达先生在论述尹光鼎时有很好的考证^⑦。这里是说斗子在周王赏赐诸侯时在旁随侍，从而获得鬯酒和贝的嘉奖。

不难看出，斗子鼎铭文记述的是一次非常盛大的典礼，不仅有周王，而且有众多诸侯在场参加。

我在前面说到的笔谈中已经指出，斗子鼎铭所记应该和《殷周金文集成》5415保卣、6547保尊铭文是同一史事。保卣、保尊传出土于河南洛阳，依卣铭行款隶写如下：

乙卯，王令保及
殷东国五侯，诞
觐六品，蔑曆，于
保锡宾，用作文
父癸宗宝尊彝，遘
于四方迨（会），王大祀祓
于周，在二月既望。

对于这一铭文的意义，我过去有小文论说^⑧，其中谈到其器主名保，受王命参与“殷见”即朝见东方的五等诸侯，给予赏赐，得到诸侯们的回赠。

大家肯定已经注意到，保卣所记是周王“大祀祓”时的情形，而当时王殷见东方诸侯，日在乙卯，这正是斗子鼎丁巳的前两天。看来周王在“大祓”之前分别朝见各方诸侯，到丁巳日举行“大祓”，再过两天对来朝诸侯进行赏赐，整个典礼才告完成。保卣所记是祭祀之前，斗子鼎所说是祭祀以后，两者合观，典礼的始末便大体清楚了。

保卣、保尊从形制、纹饰看，在西周同类器中最为古朴，《西周青铜器分期

断代研究》定之为成王时物^⑨，是完全正确的。斗子鼎的形制、花纹也颇有特色，与之最接近的是燕侯旨分裆鼎，其铭文云“燕侯旨初见事于宗周”，是第二代燕侯即位不久时所作，估计在成康之际，而器上的饕餮纹是分解的，两侧有横出的羽毛形，也见于成王时较早的康侯封方鼎，所以把斗子鼎排在保卣、保尊同时，是没有问题的。

保卣、保尊与斗子鼎记载的，是成王时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卣、尊铭说“四方会”，可参照《尚书·康诰》所说“四方民大和会”，是指已属周王统治的四方诸侯的大聚会，对成王朝见，这件事实际见于传世文献。

《左传》昭公四年：“六月丙午，楚子（楚灵王）合诸侯于申，椒举言于楚子曰：‘……霸之济否，在此会也。夏启有钧台之享，商汤有景亳之命，周武有孟津之誓，成有岐阳之蒐，康有酆宫之朝，穆有塗山之会，齐桓有召陵之师，晋文有践土之盟……’”杜预注云：“周成王归自奄，大蒐于岐山之阳。岐山在扶风美阳县西北。”传文所说成王岐阳之蒐，实际是诸侯的会盟。杜注凿定其时在自伐奄回归之时，是根据《尚书·多方》的序推想的，不一定可信，但对岐阳地理位置的说明是准确的。

《国语·晋语八》：“昔成王盟诸侯于岐阳，楚为荆蛮，置茅菴，设望表，与鲜牟守燎，故不与盟。”前人认为也是讲“岐山之阳”的这次会盟。

《诗·閟宫》说太王“居岐之阳”，《皇矣》也讲文王“居岐之阳”，“岐阳”就是我们熟悉的周原遗址所在，周初封周公为采邑的“周”。保卣、保尊云“四方会，王大祀祓于周”，这个“周”不是宗周（镐京），也不是成周（洛邑），而是岐阳的周。周原遗址出土的西周卜甲^⑩和西周陶文^⑪，常标记为“周”。因此，保卣、保尊和斗子鼎所载，正是成王岐阳会盟诸侯的史迹。

《左传》称岐阳此次会盟为“蒐”，“蒐”是春季的田猎活动，详见《周礼·大司马》等书，据称当以仲春举行。保卣等铭文虽未明说到有“蒐”，但所记“二月”恰好是仲春之月，这恐怕也不是偶合。

总之，斗子鼎的发现，印证了对保卣、保尊的理解，使我们认识到成王时确有岐阳会盟诸侯之事，是非常重要的。至于斗子鼎何以在叶家山曾（随）国墓地中存在，斗子与曾侯有否特定关系，这就有待进一步探索了。

补记：有学者拟释鼎铭“斗”字为“荆”，但细察字形不似。

注释

- ①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随州市博物馆：《湖北随州叶家山西周墓发掘简报》，《文物》2011年第11期。
- ② 王世民、陈公柔、张长寿：《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第21—23页，文物出版社，1999年。
- ③ 孟世凯：《甲骨学辞典》，第16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
- ④ 湖北省博物馆：《曾侯乙墓》，图二一六，文物出版社，1989年。
- ⑤ 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清华简〈尹至〉、〈尹诰〉、〈程寤〉研读札记》，《中国经学》第8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按在《尹诰》简整理过程中也曾提出“料”字的释读。
- ⑥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1177页，中华书局，1990年。
- ⑦ 杨树达：《积微居金文说》，第145页，中华书局，1997年。
- ⑧ 李学勤：《邲其三卣与有关问题》，《殷都学刊》增刊《全国商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1985年。
- ⑨ 同②，第114、124—125页。
- ⑩ 曹玮：《周原甲骨文》，H11:31、H11:104，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2年。
- ⑪ 王恩田：《陶文图录》1.66.1—6，1.72.1—73.5，齐鲁书社，2006年。

（原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2年第1期）

释金文“亡尤”等词

——金文释例之三

西周金文屡见“亡尤”一词。“尤”字，《诗·载驰》传云：“过也”，《左传》襄公十五年注云：“责过也。”“亡尤”意即没有过责。这样训释，在原文中都是畅达的。

例如武王时的退簋（《殷周金文集成》4261，过去习称天亡簋）铭有“王祀于天室，降，天亡尤”^①，是说武王祭天，礼成身退，没有过咎受天谴责。

约为康王时的麦尊（《集成》6015）铭有“侯见于宗周，亡述（尤）”，是讲邢侯到镐京朝王，一切顺利，没有过责。同铭又说“唯归，将天子休，告亡尤，用龚（鸿）义（仪）宁侯颺考”，意即邢侯返国，向其先父周公祭告此行平安，并献上用在镐京所射鸿鹄的羽毛制作的表饰^②。

穆王时的班簋（《集成》4341）云，班受命随从毛公出征，“三年静东国，亡不成眚（尤）”，“亡不成尤”是说没有不成功的过失。

以上武王到康王属西周早期，穆王时已至中期前段。同在中期前段的还有鬲方尊（《集成》6005）和繁卣（《集成》5430）。前者说“鬲既告于公，休，亡眚（尤）”，指未由其君长获有谴责。后者说“公禘醢辛公祀，卒事亡眚（尤）”，则是讲直到完成所记祭祀仪式没有过失。

西周中期前段还有两例，都用“无眚（尤）”取代“亡尤”。其一是钱簋（《集成》4322）：“卒搏（搏）无眚（尤）于钱身”，即在搏战过程中没有过责，文例可与上举繁卣参看。再一是静簋（《集成》4273）：“王命静司射学宫，……静学（教）无眚（尤）”，是讲静的教射成功，未有过愆。

在中期前段以后，就不见“亡尤”或“无尤”了。

上面已将“亡尤”、“无尤”的意思解为未有谴责，实际同时铭文里就有“亡

遣”或“无遣”。成王时的大保簋（《集成》4140）载纣子武庚叛周，王命大保即召公前往征伐，“大保克彳（敬），亡遣（遣）。”同属西周早期的小臣夔鼎（《集成》2775）云王将赴楚麓弋猎，“命小臣夔先，省楚应，王至于迄（弋）应，无遣（遣）。”这里的“遣”，《说文》：“谪问也。”《广雅·释诂一》：“责也。”和“尤”是同义字。

西周中期前段的鼂鼎（《集成》2731）铭云王命趟（人名）征伐东方叛夷，“鼂肇从趟征，攻龠，无商（谪）”，“谪”或作“谿”，《小尔雅·广诂》：“责也。”《方言》：“过也。”与“遣”又是同义字。

也在中期前段恭王时的史墙盘（《集成》10175）有一句话是“鼂屯无谏”，我过去曾说：“谏，疑读为谪。西周金文多作鼂屯亡败，二语意同。”“谏”也可读为“责”，总之也与上述各字同义。

“鼂屯亡败”习见于西周中期后段到晚期金文，如中期后段的师望鼎（《集成》2812），晚期的虢叔旅钟（《集成》238—244）、大克鼎（《集成》2836）、梁其钟（《集成》187、188、192）等，由于“鼂”字不识，一直没有较好解读。除了史墙盘该句提供了线索外，西周晚期宣王时的兮甲盘（《集成》10174）有“休，亡败”，句例很像鬲方尊的“休，亡尤”，也表明“败”应为与“尤”、“谪”等可相通用的字。

“败”从“民”声，古音当在明母文部，我认为应读为“衅”，《左传》宣十二年注“罪也”，昭元年注“过也”，正好与“尤”、“谪”等字义近。

注释

- ① 读释参看李学勤：《“天亡”簋试释及有关推测》，《中国史研究》2009年第4期。
- ② 铭文前部有邢侯从王射鸿的记事。《易》渐卦上九：“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吉。”
- ③ 李学勤：《论史墙盘及其意义》，《考古学报》1978年第2期。

（原载《初识清华简》，中西书局，2013年）

新见楚王鼎与“曾国之谜”

不久以前，我曾有机会看到新出现的楚王鼎的器形和铭文照片，随后在《江汉考古》2011年第4期读到曹锦炎、张昌平两位教授关于该鼎的论文^①，颇多获益。《江汉考古》主编和编辑部对此非常重视，指出“对长期以来学术界争论的曾国之谜或许有所裨益”，令人感动，因此在这里陈述一些个人意见，聊供大家商榷。

新出现的楚王鼎，曹、张两文已从其形制、纹饰论断其年代当在春秋中晚期之际。曹文对其铭文作了准确的释读，下面尽量用今字写出：

唯王正月初
吉丁亥，楚王媵
隆（随）仲嬭（半）加夔繁，
其眉寿无期，
子孙永宝用之。

其中第三行首字“随”的写法在包山简里已出现过，我以前做过分析^②。

楚王鼎的出现与所谓曾国之谜有什么关系，这就需要从曾国之谜的提出说起。

曾国之谜是针对一系列曾国遗存，特别是曾国青铜器的发现而提出的研究课题。1978年夏，随州（当时称随县）擂鼓墩一号大墓即曾侯乙墓发现，我当时有幸前往发掘现场参观，还出席了有关讨论。为了应对这次重大发现带来的历史问题，我写了一篇小文，刊登在《光明日报》上，题目就叫作《曾国之谜》^③，得到考古、历史学界不少先生赐教。1990年，根据若干新的发现，我又写了《续

论曾国之谜》^④，申述自己的想法。后来我把这两篇小文综合起来，收入拙著《青铜器与古代史》一书^⑤。

我主张青铜器铭文中所见的姬姓曾国就是传世文献里的随国。提出这种一国二名之说的理由，主要有以下三点：

首先是从文献的角度看。在传世各种古书里面，查找不到一个姬姓的曾国。比如《国语·郑语》，记载周幽王时史伯对郑桓公论说当时周朝形势，他说：“当成周者，南有荆蛮（楚）、申、吕、应、邓、陈、蔡、随、唐”，没有“曾”这个国名。按两周之际，从出土青铜器来说，正是曾国兴盛的时代，史伯身为王朝大史，连小小的唐国都没忽略，怎么会遗漏偌大的一个曾国？

《左传》一书，详细地记录了楚国向北发展，吞并众诸侯国的经过。清人高士奇作《左传纪事本末》，专设“楚伐灭小国”一题。他在其后评论道：“夫先世带砺之国，棋布星罗，南捍荆蛮而北为中原之蔽者，最大陈、蔡，其次申、息，其次江、黄，其次唐、邓，而唐、邓尤偏处方城之外，为楚门户。自邓亡而楚之兵申、息受之，申、息亡而楚之兵江、黄受之，江、黄亡而楚之兵陈、蔡受之，陈、蔡不支而楚兵且交于上国矣。”他还特别提到：“夫随之为国，限在方城内，于楚尤偏，而能屡抗楚锋，独为后亡。”在这整个过程之间，也未见曾国的名号。

其次是从地理角度看。我在前述小文中，曾列表说明曾国青铜器，尤其是其国君及大臣的器物，集中出于随州境内，而且多数可以确定是出于墓葬。由此足见，曾国的政治中心即在随州。近年新发表的材料，包括最近随州叶家山西周早期墓葬群的发现，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点。

随国姬姓，在汉阳诸国中最大，《左传》有明文记述。其桓公六年传杜预注云：“随国，今义阳随县。”该随县即今随州市。这个地理位置，核以各种古书所载有关历史事件，都相符合，从而历代学者没有异说。青铜器铭文所显示的曾国既然以随州为中心，与文献里的随国便重合了。

再有是从历史角度看。由曾侯乙墓，包括墓内随葬的遣策知道，战国早期楚惠王时存在曾侯，与楚关系紧密而为楚人所尊重；又从曾姬壶知道，直至楚声王还娶曾女为夫人，这已经迟到公元前五世纪之末了。

早在《左传》僖公二十八年（公元前632年），晋国的栾枝已说：“汉阳诸姬，楚实尽之。”同书定公四年（公元前506年），吴人又对随国说：“周之子孙在汉川者，楚实尽之。”这充分表明，汉东一带除“独为后亡”的随国外，不可能再有姬姓的诸侯留存。

至于随国得以幸存到战国的原因，我在前述小文已经详细说明过，这是由于吴国伐楚入郢，楚昭王逃亡到随国时，随人抗拒吴人的威胁利诱，保护了楚昭王的缘故。正是出于这一段恩情，楚昭王的儿子惠王才会如曾侯乙墓的现象所反映的那样，对曾国优礼有加，尽管这时的曾侯实际是在楚的卵翼之下。

以前大家讨论曾国之谜，说曾与随是一国二名，只意味青铜器铭文的曾即是传世文献的随，在古代当时该国是不是实有二名，还没有确凿的证据。如今新出现了这件楚王鼎，其铭文标明了随，是楚王嫁女儿（或姊妹）于随的腰器，证实随这一国名无疑存在。结合上文说的三点理由，一国二名之说还是成立的。

一国二名，在古代并不罕见。远一点的例子，如商又称作殷，经学者研究，商人自称时一般只说商，周人则称之为殷或殷商，有时也说商。近一些的例子，楚又称作荆，有时又称荆楚或者楚荆。关于这一点，罗运环教授有过精辟的论述，他说：“纵观先秦古籍，楚国名荆、楚二称互见，但战国以前多称楚，春秋以后多称荆。细审先秦古文字资料，战国以前楚人皆自称楚，战国以后仍自称楚，但也偶见称荆。”^⑥就西周至春秋的青铜器铭文而言，周人称之为楚、荆或楚荆，楚人自己只称楚，罕见有称荆的。与之对比，曾与随为一国二名，也没有什么奇怪。

根据已见青铜器铭文，曾人自作器时大都称曾。曾姬壶的器主是嫁到楚国的曾女，称曾；曾孟卣的器主是楚女嫁到曾国，也称曾^⑦。只有这件楚王鼎腰女子出嫁，称夫家为随。看来曾人一般自称曾，楚人则多称之为曾，有时称随。这种情形，与上举两例相似。

曾、随一国二名，只是为了解答曾国之谜设立的一种假说，希望大家继续讨论批评。

注释

- ① 曹锦炎:《“曾”、“随”二国的证据——论新发现的随仲嫫加鼎》,《江汉考古》2011年第4期;张昌平:《随仲嫫加鼎的时代特征及其他》,《江汉考古》2011年第4期。
- ② 李学勤:《中国古代文明研究》,第129—130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
- ③ 李学勤:《曾国之谜》,《光明日报》1978年10月4日,后收入《新出青铜器研究》,文物出版社,1990年。
- ④ 李学勤:《续论曾国之谜》,《江汉论坛》专刊《楚学论丛》,1990年。
- ⑤ 李学勤:《青铜器与古代史》,第423—434页,(台)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
- ⑥ 罗运环:《楚国八百年》,第64页,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
- ⑦ 刘彬徽、刘长武:《楚系金文汇编》,一二,湖北教育出版社,2009年。

(原载《青铜器入门》,商务印书馆,2013年)

谈新出现的妇姁爵

几年以前曾有学者告诉我，有一件铭文为“妇姁”的商代青铜爵出现，使我发生很大兴趣，但这件爵是什么样的，我一直没有机会目睹。最近翻阅刚刚问世的《贾文忠金石传拓集》，忽然发现书里面有这件爵的全形与铭文拓本^①。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有研究价值的器物，试做简要讨论如下。

关心殷墟甲骨文研究的都知道，殷高宗武丁时期的诸妇中间，以妇好的身份最为显贵。她的事迹见于当时好多宾组卜辞和历组卜辞，表明她经常参预祭祀、兵戎等“国之大事”，她也为王诞育了孩子。近年发现的花园庄东地非王卜辞，也有好多关于妇好的记载。

有关妇好，还有重要的考古发现。1977年发掘的殷墟5号墓^②，由于墓中出土了大量而且成组成套的有“妇好”二字铭文的青铜器，已被学术界公认是妇好本人的墓葬。该墓青铜器还有“后粤母”、“后母辛”等铭文，我有小文提出，妇好名好，字粤（巧）母，死后日名为辛，其称“后”是因为她是王后^③。读者如果了解妇好的详细情况，可以参看新近出版的韩江苏、江林昌著《〈殷本纪〉订补与商史人物征》一书^④，这里不能多引。

武丁时期的诸妇为数众多，可是死后能够在王室的“周祭”系统中受祀为武丁配偶的，只有三个人，称妣戊、妣辛、妣癸。由上述殷墟5号墓即妇好墓的发现，知道妇好就是妣辛，那么其余两人是谁呢？

这一点还牵涉到一件最著名的青铜器——后母戊大方鼎。妇好墓发掘之后，大家看到墓内出土的后母辛方鼎，自然而然地联想到后母戊方鼎。后母戊方鼎的铭文“后母戊”和后母辛方鼎的“后母辛”非常相似，只差日名不同，这指明“后母戊”应该是武丁日名为戊的又一配偶，而她是诸妇中的哪一位，正是许多人关心的。

对这个问题做出富于洞察力的回答的，是唐兰先生。他在关于妇好墓的座谈会上提出，后母戊大方鼎的“后母戊”应该就是殷墟卜辞里的妇姁^⑤。

唐兰先生的推测是非常有道理的。从卜辞看来，妇姁在武丁诸妇间的地位，可谓仅次于妇好。她的名字也见于宾组和历组卜辞，她的行事同样是文武兼备，并且在农事方面比妇好还要更多一些^⑥。果然，在妇好墓发掘几年以后，殷墟小屯南地甲骨面世，在《屯南》4023无名组卜辞中，见到了“妣戊姁”的称号。妇姁名姁（《说文》：“姁，静也。”），死后日名为戊，称“妣戊姁”，证明了唐兰先生的预见。

出后母辛方鼎的是妇好墓，那么出后母戊方鼎的应该是妇姁墓了。出后母戊方鼎的墓，也已经发现。很多人知道，后母戊方鼎是在抗战时的1939年在殷墟武官村吴家柏树坟园掘获的，出鼎的墓于1959年找到，并在1984年进行发掘清理，这便是殷墟260号墓。可惜这座墓“已被盗一空，只在盗坑扰土中捡到一些小铜器，如铜泡、铜牛形饰及铜铍等，还有骨铍、刻花骨匕柄、白陶片及玉饰等”^⑦。尽管我们对妇好墓，猜想墓中原有标出妇姁名号的器物，遗憾的是一件也未能发现。

《贾文忠金石传拓集》著录的妇姁爵，虽然不知在哪里出土，却是我们第一次见到的有“妇姁”铭文的青铜器。

这是一件卵形底的爵，其流部较长，尾部相对说则较短。两柱位置在流折上，表明其时代较早，柱帽呈圆锥形。爵的颈部饰内填雷纹的蕉叶纹，盃上饰有牛首，腹面饰饕餮纹，卵形圈底，下有断面呈三角形的长足。整个爵的形制轮廓，最近似妇好墓编号676的Ⅵ式爵^⑧。爵腹的饕餮纹，有“乙”字形的角，属于《殷周青铜容器上兽面纹的断代研究》所分I6式，曾见于妇好墓编号867的尊^⑨。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爵铭“妇姁”的“帚（妇）”字下半不分叉，与妇好墓多数“妇好”铭文的“帚（妇）”字相同，这可说是两者同时代的明显证据，证明爵的主人正是与妇好一样为武丁配偶的那个妇姁。

顺便说一下，《贾文忠金石传拓集》中还有不少值得专门研究的器物，例如其第29页的应公簋，铭为“应公作宝彝”，时代属于周初，是应国第一代国君之物，又如第54页的迺（即会字）甗，铭为“迺作毕公宝尊彝”，时代也在西

周早期，毕公就是文王之子毕公高。因此这部书的价值不只在于高超的墨拓技艺而已。

注释

- ① 贾树：《贾文忠金石传拓集》，第49页，文物出版社，2012年。
-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妇好墓》，文物出版社，1980年。
- ③ 李学勤：《论妇好墓的年代及有关问题》，《文物》1977年第11期。
- ④ 韩江苏、江林昌：《〈殷本纪〉订补与商史人物征》，第312—33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
- ⑤ 《安阳殷墟五号墓座谈会纪要》，《考古》1977年第5期。
- ⑥ 同④，第330—338页。
- ⑦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的发现与研究》，第109页，科学出版社，1994年。
- ⑧ 同②，图版五八，4。
- ⑨ 王世民等：《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第224页，《殷周青铜容器上兽面纹的断代研究》图二，7，文物出版社，1999年。

（原载《文博》2012年第3期）

论芮姑簋与疏公簋

芮姑簋是迄今所见芮国青铜器中最早的一件，1992年入藏于在台北的故宫博物院^①。这是一件素朴无华的方座簋，通高18厘米，无盖，耳上饰兽首，下有钩状小珥，腹下部略显膨出，低圈足，下附方座。其口沿下饰两道细弦纹，中加小兽首，腹面光素，座壁则有方框形的弦纹。看其形制，应作于西周早期后段，张懋镕教授说相当康王、昭王时^②。

簋铭两行共六字，依原行款隶写如下：

内（芮）姑乍（作）

旅𠂔（簋）。𠂔。

需要注意的是“旅”字右侧下方的两个“人”形，头部身躯都作凸显的肥笔，很有特色。这种现象只在少数西周早期铭文里出现过，比如叔卣（《殷周金文集成》4132、4133）铭中“大保”“保”字左半所从的“人”就是这样的。叔卣的大保即召公奭，不会晚过康王，所以芮姑簋属于康王世的可能性要更大一些。

《尚书》的《顾命》篇记成王崩、康王嗣位时事，当时大臣正好有芮伯，是入仕王朝的芮君，排次刚好居大保之后。芮姑有可能是这位芮伯的配偶，最多不会晚于其下一世。

铭文最末的“𠂔”字，其实便是“五”。晚商到西周的筮数（或称数字卦）里的“五”，不少便是这样写的^③。大约是为了不要被误解为纪数，特别采用了这种横置的写法。

簋铭之末有这个“五”字，是标明器主的族氏（或称之为族徽）^④。芮姑簋的器主是嫁与芮国公室的姑姓女子，而如所周知，芮国公室男子芮公、芮伯、

芮公叔、芮太子等，从来没有在铭末记“五”这一族氏的^⑤。因此，芮姑的芮是她的夫氏，而“五”是她的母氏。我过去曾讨论过，青铜器铭文中女子有兼称其母氏和夫氏的，例如“苏卫己”，该女己姓，苏是母氏，卫是夫氏^⑥。芮姑正是如此，只不过其母氏依晚商以来习惯记于铭末而已。

芮姑是姑姓、“五”氏，这表明“五”这个族氏属于姑姓。指出这一点，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解读近几年备受学者注意的疏公簋^⑦。

疏公簋的铭文是：

覲（疏）公乍（作）匏（妻）姚
殷（簋），遘于王令（命）
易（唐）白（伯）侯于晋，
唯王廿又八祀。𠄎（五）。

“疏”字的释读，我有小文说明^⑧，这里就不再详述了。

这件簋乃疏公为其妻姚姓女子所作，作器的纪年“廿又八祀”，我认为是康王二十八年^⑨，也有学者主张当属成王的，无论如何，其时代与芮姑簋相去不远。

我还知道有一件西周早期的浅腹扁足鼎，铭文云系“公白（伯）”为“覲（疏）𠄎（姒）”所作，铭尾也标有族氏“𠄎（五）”。疏姒应该是嫁于疏的姒姓女子。如果我们猜想公伯与疏公簋的疏公为同一人，疏姒很可能是他的母亲。

“疏公”并不能认为是一位公爵的国君。查检传世文献，周代很有一些大夫甚或身份更低的人称作“公”的。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左传》哀公二十五年的“棠公”，杜预注云：“棠公，齐棠邑大夫。”同书里类似的，还有齐国的邢公，晋国的成公般，卫国的庾公差、尹公佗、许公为，郑国的商成公等，都非公爵，疏公应该也是如此。

疏公簋特记作器“遘于王命唐伯侯于晋”即唐叔虞之子燮父迁都于晋之事，这表明疏公实际是从属于唐，也就是后来的晋国的。其所以在铭末标记族氏“五”而又自称“疏公”者，是由于他按照晚商以来传统方式，原来的族氏为

“五”，而后受封于“疏”，故亦可称疏氏。这正像陕西扶风庄白一号窖藏史墙一家，族氏本为“木羊”，因曾居微，后来又称作微氏。

“五”氏存在于晋国，还有一个证据，即是山西天马曲村晋国墓地M6195西周早期墓所出的一件鼎^⑩，其铭文为：

白（伯）雍乍（作）^⑪

宿（宝）小羹（鬯）

贞（鼎）。𠄎（五）。

足证当时晋国确有“五”这一族氏，作器者伯雍也应为姑姓。

疏公应该是食邑于疏的晋国贵族。我的想法是疏就是胥，两字均为心母鱼部。晋有胥氏，具体说有见于《左传》僖公二十三年的司空季子，杨伯峻先生注云：“司空是其官，季子是其字；胥，其氏；臣，其名，食邑于白，故亦谓之胥臣，亦谓之白季。”^⑬这个胥氏到春秋晚期已亡，以致《左传》昭公三年叔向叹息说：“栾、郤、胥、原、狐、续、庆、伯，降在皂隶。”当然，西周早期的胥氏能否与春秋时的胥氏是一家，其间有无绝封更封之事，还是需要考虑的。

可是我们不能考定胥在晋国什么地方^⑭。假如大家允许我在这里做一点没有多少根据的推想，是否可以从司空季子食邑于白，试猜胥的方位也距之不远。据学者研究，白可能在今山西临猗南，中条山北^⑮，而西周早期的芮很可能在今山西芮城西。如果胥真是距白不远，恰好同芮相近，那么“五”氏的姑姓女子嫁到芮国便更觉自然了。

注释

① 钟柏生等：《新收殷周青铜器铭文暨器影汇编》，1665，（台）艺文印书馆，2006年。

② 张懋镕：《古文字与青铜器论集》第三辑，第72页，科学出版社，2010年。

③ 参看《张政烺文史论集》，第562—566页，中华书局，2004年。

④ 春秋时楚伍子胥，《汉书·古今人表》即作五子胥。楚伍氏本作五，亦见清华简《系年》、《良臣》。

⑤ 同②，第74页。

- ⑥ 李学勤:《先秦人名的几个问题》,《历史研究》1991年第5期。
- ⑦ 朱凤瀚:《观公簋与唐伯侯于晋》,《考古》2007年第3期。
- ⑧ 李学勤:《释“疏”》,《考古》2009年第9期。
- ⑨ 李学勤:《论觉公簋年代及有关问题》,《庆祝何炳棣先生九十华诞论文集》,三秦出版社,2008年。
- ⑩ 同①,937。
- ⑪ 吴镇烽先生曾指出“公”有时只是尊称,见《金文人名汇编》,第459—460页,中华书局,2006年。
- ⑫ “乍”字倒书且较潦草,参《殷周金文集成》5327卣铭。
- ⑬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404—405页,中华书局,1993年。
- ⑭ 参看马保春:《晋国历史地理研究》,第232页,文物出版社,2007年;又:《晋国地名考》,第183页,学苑出版社,2010年。
- ⑮ 同⑭《晋国地名考》,第45页。

[原载《陕西韩城出土芮国文物暨周代封国考古学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文稿》
(一),2012年8月]

试谈楚季编钟

湖北宜昌万福埡遗址是最近一项非常重要的考古发现，见于《中国文物报》8月22日报道，已引起有关学术界的重视。遗址H1灰坑的青铜器，有编钟11件、鼎1件，出土于6月18日，随后有学者和媒体给我看了有关材料，使我深感惊异，认为对楚史和楚文化的探究有重要意义。我当时的想法，已发表于《三峡晚报》6月23日的通讯。这段时间，我就万福埡编钟的一些问题试做进一步思考，写在这里向大家请正。

首先要确定的，是编钟本身的制作时代。这组编钟从形制、纹饰看，属于王世民等先生《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所钟的IV型，其显著特点之一是正鼓部饰有工字形的云纹。该书列举的这一型钟，如应侯视工钟，鬲钟、师丞（或释夷）钟等，现在看来都在周厉王之世，还有五祀鞮钟，更是厉王自己的器物。因此，万福埡编钟也应属于这样的时代范围，即周厉王前后。

过去著录的楚公豪（家）钟，器形见于《商周彝器通考》945、946，也是王书所分的IV型钟。楚公家已有学者论证就是楚君熊渠，他正是周夷王到厉王时期的人。由此可见，对西周楚器在这方面仍可适用中原的标尺。

万福埡编钟的铭文是：

楚季宝钟（钟），𠄎（厥）孙迺献于公，
公其迈（万）年受𠄎（厥）福。

铭文表明，作钟的器主是楚季，后来由楚季之孙献于其君，即铭文所称的“公”，从而编钟转归那位楚公所有。献钟的人是作钟的楚季的孙辈，所以刻铭

献钟一事肯定与楚季作钟不在同一时代。

细察钟上铭文，不难看出文字确实是后刻的，有明显的刻画痕迹可见。应该说明，在钟上加刻铭文的实例已经发现过，如上海博物馆收藏的成钟，字刻于厉王时；更著名的是晋侯墓地所出晋侯苏钟，字刻于宣王中期。两者都是在已铸就的钟上后加铭文。这一点说明，铭文中的“楚季宝钟”，只能是楚季所作的钟，而不会是楚季的孙辈所作用以祭祀楚季的钟。如果是那样，便不会后刻铭文了，而且把私家祭祖之物刻铭献君，也是不合情理的事。

编钟既为楚季所作，依例应名为楚季编钟，这就需要考证楚季是什么人。

像大家熟悉的虢国有虢仲、虢叔、虢季一样，楚季这类的称谓，只能用于楚国的公室或公族。在传世文献里面，确曾载有楚季，东汉时王符的《潜夫论·志氏姓》还说楚国“公族有楚季氏”，不过这个族氏源出何人，也即是说楚季的时代、身份，却是说法不一。

《潜夫论·志氏姓》另有一条说：“楚季者，王子敖之曾孙。”王子敖不知其详，由称“王子”可知必在楚武王之后，不会早到西周，与编钟的楚季自无关系。

唐代《元和姓纂》引战国末成书的《世本》云：“楚若敖生楚季，因氏焉。陈大夫有楚季融。”若敖熊仪于周宣王三十八年（公元前790年）至周平王七年（公元前764年）在位，《世本》楚季当系其最小的儿子，算是两周之际的人，和编钟的时代不能相合。

这里我想提出，编钟铭文的楚季为谁，不妨从同见于青铜器铭文的楚叔去推论。

读者不会忘记，楚叔一名多次见于淅川下寺M1所出器铭，举例如：

鼎：楚叔之孙𡗗之𡗗𡗗。

缶：楚叔之孙𡗗子𡗗浴缶。

据研究，𡗗就是楚国著名世族蒧（或作邾、芑）氏，𡗗子𡗗也就是《左传》书里的蒧子冯。

《左传》蘧（芴）氏最早一人是芴章，其后芴吕臣、芴贾、芴艾猎，以至芴子冯各代都很清楚，可参看清人常茂徠的《增订春秋世族源流图考》。《志氏姓》云：“蚡冒生芴章者，王子无钩也。”蚡冒熊眇据《史记·楚世家》是于周平王十四年（公元前757年）至三十年（公元前741年）在位，这即是说要到东周初才有蘧氏，同时，蘧氏为何称楚叔之孙也难解释。

只要读一下《国语》的《郑语》，容易看出王符的说法是不对的。

《郑语》记述周幽王时的史伯说：

夫荆子熊严生子四人：伯霜、仲雪、叔熊、季隳。叔熊逃难于濮而蛮，季隳是立，蘧氏将起之，祸又不克，是天启（季隳）之心也，又甚聪明和协，盖其先王。

这段话的韦昭注说：

荆，楚也。熊严，楚子鬻熊之后十世也。伯霜，楚子熊霜；季隳，楚子熊隳也。仲不立，叔在濮。濮，蛮邑。蘧氏，楚大夫。熊霜之世，叔熊逃奔濮而从蛮俗。熊霜死，国人立季隳，蘧氏将起叔熊立之，又有祸难而不能立也。

季隳《楚世家》作季徇，他继长兄伯霜即位，在周宣王七年（公元前821年），那时已经有了蘧氏，怎么能讲蘧氏出自远在其后的蚡冒呢？

伯霜去世，仲雪不立，国人立季隳，当时蘧氏策划迎立逃奔在濮地的叔熊而未成功。从这里不难看出，蘧氏正是叔熊的族众。参照下寺器铭，蘧氏自称楚叔之孙，可知楚叔不是别人，即是叔熊。这一点是李零先生指出的，详细论证见其《楚国族源、世系的文字学证明》（《文物》1991年第2期）一文。

楚叔是叔熊，那么楚季很可能就是季隳，其在位年为周宣王七年（公元前821年）到二十八年（公元前800年）。季隳应生于周厉王晚期，活动年代与楚季编钟的时代是合拍的。

至于楚季之孙，即公族楚季氏，其献钟刻铭的时代也不会太晚，这由两点可以看出来：首先，铭内称楚君为“公”，这肯定不会迟到东周初楚武王称王。其次，钟铭的字体风格近似楚公冢钟及楚公逆（熊罥，继季紃在位于周宣王二十九年至三十七年）钟，具有西周的特点。

（原载《中国文物报》2012年12月7日）

由沂水新出孟铭释金文“總”字

2012年初，山东沂水天上王城景区施工，发现一批春秋青铜器，内有带铭文的两件，已经任相宏等先生在《中国文物报》上撰文介绍^①。两件器物，据铭文一件是宋国华氏媵女的鼎，一件是江国公族自作的孟，都很重要。其确切时代，要等器物修复后，结合形制纹饰的特征，才能推定。不过孟的铭文里有一个字，特别引人注目，有可能为解决金文研究中的疑谜提供线索，我想在这里试做讨论。

孟上面的铭文共有七行三十八字，兹依原行款隶写如下：

惟王正月初吉

丁亥，邛（江）伯歆之孙

肇君季黹自

作濫（鑑）孟，用祀用

飨，其眉寿无

疆，子子孙孙永宝

是尚。

这里想谈的，是铭文第三行器主名“季黹”的“黹”字。

先看这个字的左半，即“隹”。大家一定会联想到，它常见于金文的“歎”字。“歎”字多见于西周金文，但一直没有得到公认的释读，最近新出版的《新见金文字编》仍列于“附录”，并说：

此字旧说至为纷纭。近年何琳仪、胡长春释为“攀”字初文，而读作

“班”；陈剑认为字以“𠂔”字表意初文之简体为声符，从而肯定高鸿缙等读“兼”之说；刘桓谓字之主体像人于井旁持水欲饮之形，其声符则为“𠂔”字表意初文之简体，从而肯定郭沫若等读“掇”之说。

孟铭“𠂔”字的出现，表明“𠂔”字的左半是可以从右半的“欠”分开的。孟铭的“𠂔”下部作“𠂔”形，应视为“井”的讹变，任相宏等先生已认识到这一点，所以在其文章中将之直接写作“井”形。

再看“𠂔”字的右半，即“𠂔”。这个字《金文编》曾释作“忤”^③，《四版〈金文编〉校补》已经根据近年研究纠正，改释为“恩”^④，是正确的。

经由上面的分析和比较，我想大家都会看出，“𠂔”字是从“𠂔”得声的，“𠂔”是该字的声符。至于“𠂔”即“𠂔”字，则是一个所谓双声符字，加上“恩”旁，是为了指明字的读音。也就是说，“𠂔”及从“𠂔”声的“𠂔”字都应该与“恩”音同或相近的字。

那么，金文中的“𠂔”究竟该读作什么字呢？我以为是“總”字。

“總”字，《周礼·天官》序官注“领也”，《大戴礼记·哀公问五义》注“统也”，“總”的意思便是统领。金文有时用一个“𠂔”即“總”字，更多时候是用“𠂔司”即“總司”，都是讲统领管理。

最多见的金文实例是宰官之属，以下试直接以“總”代替“𠂔”字，看释读是否畅通。

明显标出职官为宰的，如宰兽簋云：

昔先王既命汝，今余惟申就乃命，更乃祖考事，總司康宫、王家臣妾、鬲（附）庸，外内毋敢无闻知。

与之近似的有伊簋：

王呼命尹册命伊，總官司康宫、王臣妾、百工。

以及諫簋：

先王既命汝總司王宥（家字之誤），汝某不有聞^⑤，毋敢不善。

還有蔡簋：

昔先王既命汝作宰，司王家，今余惟申就乃命，命汝暨習總正對格，死（尸）司王家，外內毋敢有不聞。

幾件器銘里的“總司”、“總官司”都是指對宗廟（康宮）、王家各類人員的統領管理，這正是宰官的職責。至於蔡簋是命蔡和習兩人任宰，“總正對格”，即統領下屬官員（正）來應答王室的使令，這說得比其他銘文更細緻些。

又有兩件器銘，都是公卿的家宰所作，語句也與上引相似。一件是逆鐘：

叔氏曰：逆，乃祖考許（？）政于公室……用總于公室仆庸、臣妾、小子室家，毋有不聞知。

再一件是師獸簋：

余命汝死（尸）我家，總司我西偏、東偏仆馭、百工、牧、臣妾，董裁內外，毋敢否（不）善。

家宰的作用和王家的宰官完全一致。

吟味這些銘文的內容，不難體會“總”帶有統合下屬的意思。事實上，金文用“歟（總）司”等詞之處，所管理的每每是需要統合的散在的職官人員，舉例如微繼鼎的“九陂”，鄧簋的“五邑祝”，三年師兌簋的“走馬”，師克盃的“左右虎臣”，盩方尊、方彝的“六師暨八師藝”，四十三年佐鼎的“四方虞林”，等等，大多是散在的，所以要去“總”起來管理。這樣看來，把“歟”釋為“總”

也是妥当的。

使用“𡥉（總）”字的金文多数在西周中晚期。更晚的例子只能举出春秋时齐国的叔尸钟，其铭文有：

余命汝职佐正卿，为大事，總命于外内之事，中敷明刑。

字释为“總”还是很顺当的。

沂水孟铭“季𡥉”是人名，西周金文也有以“𡥉”为人名的，如《殷周金文集成》4123的𡥉簋，附记于此。

注释

- ① 任相宏、邱波：《山东沂水天上王城出土𡥉孟子鼎、𡥉君季𡥉孟铭考略》，《中国文物报》2012年8月17日。
- ② 陈斯鹏、石小力、苏清芳：《新见金文字编》，附录下，第466页，福建人民出版社，2012年。
- ③ 容庚：《金文编》，第722页，中华书局，1985年。
- ④ 严志斌：《四版〈金文编〉校补》，第123页，吉林大学出版社，2001年。有关这样写的“恩”字，参看何琳仪：《战国古文字典》，第429页，中华书局，1998年。
- ⑤ 古“谋”、“谟”二字通用，此处“某”疑即“莫”。

（原载《出土文献》第3辑，2012年）

日光镜铭新释

日光镜是西汉铜镜中最多见的品类之一，如《长安汉镜》一书统计，在汉长安地带发掘的1100余座汉墓中，共出土铜镜300多面，日光镜竟占92面^①，其年代自西汉早期下至新莽。按该书所说日光镜，是特指一种形制偏小，圆钮，钮座环以连弧纹或索状纹的铜镜，同书所列“日光草叶文镜”、“日光四乳铭文镜”等尚不在内。本文讨论的日光镜铭，泛指铭文以“见日之光”或类似文句起首的铜镜铭文，其形制不限于《长安汉镜》的日光镜，这是首先要说明的。

其次还须说明，有日光镜铭的铜镜广泛见于许多著录。本文为了方便，借用日本“中国古镜研究”班《前汉镜铭集释》所辑铭文的编号^②，在引用时以括弧注在镜铭后面。

日光镜铭非常富于变化，以“见日之光”作为首句的居其多数，最习见的乃是：

见日之光，天下大明。(242)

类似的有：

见日之光，长乐未央。(238)

见日之光，所言必当。(239)

见日之光，美人在旁。(240)

见日之光，时来何伤。(241)

见日之光，长毋相忘。(243)

等等，都是在“见日之光”后面加上另一四字句，末字与“光”字叶押阳部韵。

铭文较此更长的，是在“见日之光，天下大明”之后再增多文句，仍押阳部韵，如：

见日之光，天下大明，乐未央。(303)

见日之光，天下大明，用者君卿。(235)

见日之光，天下大明，千秋万岁，长乐未央。(234)

见日之光，天下大明，服者君卿，镜辟不羊(祥)，富于侯王，钱金满堂。(302)

又有把“天下大明”改成同义的“天下大阳”的，如：

见日之光，天下大阳，所言必当。(236)

见日之光，天下大阳，服者君王，千秋万岁，长乐未央。(233)

见日光，天下大阳，服者君卿，延年益寿，敬毋相忘，幸至未央。
(232)

最后一例首句少一“之”字。

个别还有将“见日之光，天下大阳”的“光”、“阳”二字互易的：

见日之阳，天下大光，长毋相忘。(237)

现在的问题是，在镜铭中如此多见的“见日之光”一句，究竟是什么意思？学者一般的意见，是把“见”读为“现”，训作显现，《前汉镜铭集释》便是这么解释的^③。不过这样讲来，“见日之光”即铜镜显现出日光，似乎仍有问题。试对照下列铭文：

如日之光，所居君王。(212)

相当“见日之光”的“见”字乃是“如”字，说铜镜明亮“如日之光”，显然要

贴切得多了。

最近看到一面连弧草叶纹镜，其铭文前部是：

见日之光，若月之明……

两句相对，不难看出“见”也相当“如”字，才能称得起工稳。与之相似的有：

见日之光，有月之明。（246）

“有”字也和“如”、“若”通训^④。总而言之，这里的“见”不该读为显现的“现”，而是一个与“如”、“若”等义近的字。

说到这里，熟悉古文字的读者一定会想到，这个所谓“见”字其实应该释为“视”。

将从“目”从“儿”作立姿的所谓“见”与从“目”从“卩”作坐姿的“见”区别开来，是近年根据郭店楚简得出的重要推论，可以上溯到殷周甲骨金文，裘锡圭先生有详细论析^⑤。镜铭的“见”正是下部从“儿”作立姿的，表明“视”字这种起源甚早的写法到西汉仍有存在。

“视”，《小尔雅·广言》及《广雅·释言》均云：“比也。”《礼记·王制》郑注也说：“犹比也。”“视日之光”意即“比日之光”，刚好同“若月之明”对仗，都是形容镜光洁明亮如同日月。

描写铜镜明如日月，在西汉镜铭内十分普遍，例如：

……与天无极如日光……（401）

……如日月光兮……（402）

……如日月光……（417）

……如日月之光……（441）

又有讲“光象日月”的，“象”训类、比，见《左传》昭公六年杜注、《文选·七

启》刘注，如：

……光辉（辉）象夫日月……（204）

……光象日月……（403）

……光象日月智（知）人请（情）……（405）

……法象天地日月光……（440）

涵意都是一样。

附带说一下，“明如日月”一类文句，在很晚的东汉镜铭里尚有存留，还有作“明而日月”的，其中“而”字可与“如”字通用，这一点早在罗振玉的《镜话》中就已经指出了^⑥。

本文只是一种想法，尚祈大家指正。

注释

- ① 程林泉、韩国河：《长安汉镜》，第89页，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
- ② “中国古镜研究”班：《前汉镜铭集释》，（日本）《东方学报》第84册，2009年。
- ③ 同②232镜铭下。
- ④ 裴学海：《古书虚字集释》，第153页，中华书局，1982年。
- ⑤ 裘锡圭：《甲骨文中的见与视》，收入《裘锡圭学术文集》1甲骨文卷，第444—448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
- ⑥ 罗振玉：《镜话》，收入《雪堂类稿》甲《笔记汇刊》，第520页，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

（原载《文博》2013年第1期）

石鼓山三号墓器铭选释

陕西宝鸡石鼓山三号墓青铜器群，是近年关于商周之际青铜器的一项重大发现，其概况已见于发掘简报^①。这群器物中出现了一系列铭文，对认识器群及墓葬的时代、性质有非常关键的意义，已有学者做出论释^②。2002年9月，蒙当地学者帮助，我曾有机会观察了这群青铜器，现就其间几件重要铭文提出一些补充意见，以供商榷。

（一）户方彝、户卣

编号M3:24的方彝和M3:23、M3:20大小两卣，与禁结合成为一组，正与1901年宝鸡斗鸡台青铜器群以鼎尊、大小两件鼎卣与禁结合成为一组互相类似。方彝和卣都有“户”字铭文，有的只作“日”字形，有的如大卣作“日”，突出表现了门枢，证明释读不误。

“户”是器主的族氏。作为族氏的“户”字铭文，过去曾几次发现著录。例如兵器有户戈，见《殷周金文集成》10771、10772。其中10772一戈原载《双剑谿吉金图录》^③，云“出于西安”，这是一件商代的素戈，直援无胡，有上下阑，铭文于省吾先生已正确释出。

值得提起的是，过去著录过两件铭文为“户”的卣，只是个别铭文写法略有变异，见《集成》4858、4859，都是于晚清出现的。如《集成》4858一件，图像见林已奈夫《殷周青铜器综览》卣100，与石鼓山卣相似，有繁缛的装饰花纹，腹面为有突起大角的牛首，时代应同于石鼓山器群。

标有“户”这一族氏的器物出自西安、宝鸡，使我们联想到在今陕西户县的扈。据《史记·夏本纪》，夏禹之后姒姓有“有扈氏”，《正义》引“《括地志》云：‘雍州南鄠县，本夏之扈国也。’《地理志》云：‘鄠是古扈国，有户亭。’《训纂》云：‘户、扈、鄠三字一也，古今字不同耳。’”^④“扈”字本从“户”得声，

铭文的“户”应该就是“扈”。

石鼓山三号墓简报等根据户方彝等一组青铜器在墓内的地位，判断其器主便是墓主，是很合理的。以上对于“户”族氏的讨论，使我们对三号墓墓主有进一步的了解。

（二）中臣鼎

在三号墓二层台上发现，估计系由该墓四号龕掉落的中臣鼎，编号M3：81，是一件饰饕餮纹的分裆鼎，属于《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所分鼎的Ⅲ型1式^⑤。细看其纹饰结构，最近似著名的献侯鼎（《商周彝器通考》38），后者记成王时事，中臣鼎的年代也可定在成王时，不晚于康王初年。

特别需要指出，中臣鼎的铭文并非铸款，而是刻成的。细心观察，很容易看出字的笔画是用锋刃器契刻的特殊迹象，如各笔之间叠压打破，还不难从运刃的走向深浅，证明契刻者使用的是右手。过去我写过小文，说到殷墟青铜器已有刻铭的实例^⑥，但其笔道粗糙，远远没有中臣鼎这样流利，这肯定是契刻工具有所改进所致。

鼎铭共两行六字：

中臣𠄎（尊）

鼎，帝𠄎（后）。

铭文开头“中臣”两字都反书。“中”字作多旂之形，商至西周铭文屡见^⑦，也见于殷墟和周原甲骨文^⑧。

“尊”字下部的“𠄎”形稍有省减。此字上有“八”形，肯定应释为“尊”，可参看《金文编》“尊”字^⑨。

“帝”字上部三角形填实，下部省去两斜笔，较为罕见。

“𠄎”字从“后”声，在此即读为“后”。

“帝后”一词曾见于1976年陕西扶风庄白出土的庚姬尊、卣（《集成》5997、5404），其铭中有“帝后赏庚姬贝卅朋，……用作文辟日丁宝鬲彝”等语。按商周礼制，已亡故的王称“帝”，如《礼记·曲礼下》云：“君天下曰天子，……

措之庙，立之主曰帝”，《大戴礼记·诰志》也有类似记载。“帝后”即已故王的配偶，是女性，因而庚姬受其赏赐而为其亡夫作器。

辨明“帝后”是什么意思，“中臣”的涵义也就不难了解了。

《说文》说“中，内也”，“中臣”当即《周礼》书里的“内小臣”。查《内小臣》职文云：“掌王后之命，正其服位。后出入，则前驱。若有祭祀、宾客、丧纪，则摈。……”说明内小臣有管理王后祭祀等活动的职责。鼎铭“中臣尊鼎，帝后”，是讲这件鼎系内小臣所司，供帝后祭事之用。

前面已说过，这件中臣鼎的年代约在成王时，不晚于康王初年。如参考石鼓山三号墓同出的其他器物，属成王之世似更为可能，那么鼎铭内的“帝后”就应当是武王之后邑姜了。无论如何，这件中臣鼎来自王室，其于墓中存在，表明墓主与王朝有相当密切的关系。

（三）罍尊

编号M3:14的尊，出于三号墓三号龕，是一件带有扉棱的饕餮纹尊，腹部微凸不显，属于《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所分尊的I型I式^⑩，年代应为周初。尊的纹饰有一些特点，简报已有描述。

尊的铭文不像绝大多数同类器铭那样位于尊的内底，而是出现在圈足的内壁上，同于觚的铭文，这是相当特别的。尊铭的笔画非常纤细，在同时铭文中也不常见，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铭文共三行八字：

罍易（锡）商（赏），
用乍（作）父癸
彝。

“罍”字象双手张网，下有虎首，在此为器主的名字。这个字不识，多见于西周中期以下铭文，常云“康罍纯佑”或“康罍纯鲁”^⑪，白川静《金文通释》云与“康勳纯佑”为同义语。

“易”字左边三斜笔连在右方竖笔上，从而有些不易辨识。“易商”可以读

为“锡赏”，与龚姒鼎（《集成》2433）“龚姒（姒）商（赏）易（锡）于后”的“赏锡”类似。另一种读法是将“商”读为“璋”，如同宜侯矢簋（《集成》4320）铭文的“商瓚”即是“璋瓚”。我个人是倾向于前一种释读的。

注释

- ① 石鼓山考古队：《陕西宝鸡石鼓山西周墓葬发掘简报》，《文物》2003年第2期。
- ② 辛怡华、王颢、刘栋：《石鼓山西周墓葬青铜器铭文初探》，《文物》2003年。
- ③ 于省吾：《双剑谿吉金图录》，第157页，中华书局，2009年。
- ④ 参看钱穆：《史记地名考》，第243—244页，商务印书馆，2001年。
- ⑤ 王世民等：《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第22—23页，文物出版社，1999年。
- ⑥ 李学勤：《中国青铜器刻铭的起源》，香港大学《中国文化》第36卷第1、2期，1998年。
- ⑦ 王心怡：《商周图形文字编》，第463—464页，文物出版社，2007年。
- ⑧ 李宗焜：《甲骨文字编》，第1164页，中华书局，2012年。
- 曹玮：《周原甲骨文》，第78页，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2年。
- ⑨ 容庚：《金文编》，第1005—1006页，中华书局，1985年。
- ⑩ 同⑤第110—112页。
- ⑪ 张亚初：《殷周金文集成引得》，第458页，中华书局，2001年；董莲池：《新金文编》附录二，第41页，作家出版社，2009年。
- ⑫ 白川静：《金文通释》卷三上，第164页，（日）白鹤美术馆，1969年。

（原载《文物》2013年第4期；《石鼓山西周墓葬与青铜器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13年9月）

“九终”与“九律”

——兼释商末“己酉方彝”

收入《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第三辑的《周公之琴舞》是一组乐诗^①，其开首部分有两句，分别是：

周公作多士敬毖，琴舞九终。

成王作敬毖，琴舞九终。

注释读“九终”之“终”为“卒”，云：“《尔雅·释诂》：‘卒，终也。’九终义同九终、九奏等，指行礼奏乐九曲。《逸周书·世俘》：‘箫人九终’，朱右曾《逸周书集训校释》：‘九终，九成也。’”

按“九成”语见《尚书·益稷》“箫韶九成”，《孔传》释“九成”为“备乐九奏”，《正义》称：“成，谓乐曲成也。郑（玄）云：‘成，犹终也。’每曲一终，必变更奏，故经言九成，传言九奏。”“九成”、“九奏”和“九终”、“九卒”，意思确实都是一样的。

《益稷》所说“箫韶”即《周礼·大司乐》“以乐舞教国子”的“大磬”，郑玄注：“大磬，舜乐也。”“韶”字又通作“招”，由于该乐舞有“九成”，所以又称“九招”，见于《墨子·三辩》、《庄子·至乐》、《吕氏春秋·古乐》、《淮南子·齐俗》、《史记·五帝本纪》、《山海经·大荒西经》等典籍^②。按照这样的传说，具有“九成”结构的乐舞起源甚早，周公与成王之作《周公之琴舞》乃传统的延续，是顺理成章的。当然，仅有文献传说是不够的，最好还要有考古文物方面的材料来证明，这就使我们想到宋代著录的商代晚期青铜器“己酉方彝”。

“己酉方彝”最早著录于《宣和博古图》8、15^③，是一件直壁下部微收的方

彝，失盖，器口沿下饰夔纹，腹饰饕餮纹，侧加倒夔纹，低圈足，足上饰夔纹，通体有八道扉棱。其铭文（《殷周金文集成》9894）共五行，三十八字，今参据裘锡圭先生释文^④，依原行款隶写于下：

己酉，戌矧𩇛宜，于
 罍卣（置）庸（镛），簫九律。
 簫商（赏）贝十朋，万（萬）祀，用寧
 丁宗彝。才（在）九月，隹（惟）王
 十祀翌日五，隹（惟）来东。

铭文有些地方需要作一解说。

该铭文的历日，依照商代晚期的习惯，应该是十五祀九月翌日己酉。曾有学者将之列于十祀，并与帝辛十祀九月征夷方卜辞排在一起^⑤，但其内容难于调谐。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徐凤先博士已经成功地将之确定在帝辛的十五祀^⑥。

“戌矧”的“矧”是人名。“戌”系职司戍守的武官，商代卜辞铭文多见，如《合补》8982+《屯南》4200无名组卜辞有戌夆、戌觚、戌肩、戌逐、戌何^⑦，都受王命率其族人戍守。青铜器铭文中的戌𩇛等^⑧，性质也是如此。

“𩇛宜”，“𩇛”意为进献，“宜”训为膳肴，《尔雅·释言》：“宜，肴也。”“𩇛宜”是一种奉献膳肴的礼仪，可行于祀典，如四祀邲其卣（或称壶）的“𩇛文武帝乙宜”，也可行于生人，如令簋的“作册矢令𩇛宜于王姜”。后一铭文中的令“戌冀（翼）司气（飨）”，身份尤与戌矧近似。

戌矧𩇛宜的对象是什么人呢？参看铭末所记“惟王十祀翌日五，惟来东”，“来东”乃是王来东，不难理解戌矧是𩇛宜于王。要知道商末所说的“东”，是指商都今安阳以东，而罍据卜辞并不在这样的方向^⑨，因而“𩇛宜”与“于罍”是不应连读的。

“卣庸”即“置镛”，裘锡圭先生有专门的论述^⑩。“于罍置镛”的“罍”当读为“韶”，句意是在演奏韶乐时置镛。由此知道，器主是一位乐官。

这位乐官的名字很难辨识，上部从“兮”是清楚的，下部似“𦘒”而中间略有差别，现暂依从“𦘒”写定。

“九律”就是“九卒”。“律”、“卒”都在物部，声母也甚接近。裘锡圭先生曾论及卜辞的“卒”字可写作“𦘒”^①。前文已说过，韶乐有“九招”之称，这里的“九卒”正与之相合。

“于𦘒（韶）置𦘒”的读法，还有卜辞的旁证，即《合集》3012。这是一片无名组卜辞，原曾著录为《殷契萃编》518，其上面的一辞是：

𦘒（韶）庸（𦘒）才（在）𠂔又（有）夕，其𦘒（袁）。

“韶𦘒”是韶乐所用大钟。“𠂔”我疑为“分”字初文，读为同音的“本”，指𦘒的甬部。“夕”，《广雅·释詁二》：“𦘒（斜）也。”“袁”则读为同音的县（悬）。全辞大意是韶乐所用的𦘒甬部歪斜，是否仍可悬挂演奏。

方彝的器主鬲由于演奏韶乐，得到十朋贝的赐予，参加乐舞的“万（萬）”即舞者们^②，也获有一头牝猪的酬赏。

最后还需要说一下，铭末“东”字没有中央一横笔，卜辞的“东”或与之同形的字每每这样写^③，或释为“束”，恐怕是不对的^④。

注释

- ①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叁），中西书局，2012年。
- ② 孙诒让：《周礼正义》，第1729页，中华书局，1987年。参看顾颉刚、刘启钊：《尚书校释译论》，第490—491页，中华书局，2005年。
- ③ 刘昭瑞：《宋代著录商周青铜器铭文笺证》，九八，中山大学出版社，2000年。参看毕秀洁：《戍铃方彝的摹本问题及补释》，《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3年第1期。
- ④ 裘锡圭：《甲骨文中的几种乐器名称》，《中华文史论丛》1980年第二辑；又收入《裘锡圭学术文集》第一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
- ⑤ 常玉芝：《商代周祭制度》，第275—27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
- ⑥ 徐凤先：《𦘒方鼎与商末周祭系统》，《文物》2005年第9期。
- ⑦ 刘义峰：《无名组卜辞的整理与研究》，第264—265页，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

- ⑧ 吴镇烽:《金文人名汇编》(修订本),第114页,中华书局,2006年。
- ⑨ 参看《李学勤早期文集》,第194—197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8年。
- ⑩ 同④。
- ⑪ 裘锡圭:《释殷墟卜辞中的“卒”和“裀”》,《中原文物》1990年第3期;又收入《裘锡圭学术文集》第一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
- ⑫ 同④附:《释万》。
- ⑬ 沈建华、曹锦炎:《甲骨文字形表》,第136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年。
- ⑭ 毕秀洁:《戍铃方彝的摹本问题及补释》,《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3年第1期。

(原载《初识清华简》,中西书局,2013年)

疑尊、卣别解

法国希拉克总统博物馆在2011年6月出版一部展览图录，题为《青铜与黄金的中国·东波斋藏品》^①。书中著录有疑尊、疑卣，异常精美，且同有较长铭文，是非常重要的西周青铜器，特别是其铭文有关鄂侯事迹，与近几年学术界热议的鄂国等问题联系，值得大家重视。图录流传未广，幸有北京大学董珊先生于去年撰文《疑尊、疑卣考释》^②，对两器做了详细的介绍和深入的论析。这里我只据个人所见，试提几点想法，未必有当。

疑尊高24.2厘米，侈口，长颈，突腹，低圈足，通体花纹均线条化，口沿下为由夔纹组成的蕉叶纹，下加横S形顾首夔纹带。腹饰尾部上卷的饕餮纹，足饰横S形顾首夔纹。铭文在内底。

疑卣高29厘米，盖设捉手，盖面为饕餮纹，无盖角，立缘饰横S形顾首夔纹。器提梁上为夔纹，梁端有大披角的兽首。器颈饰横S形顾首夔纹带，腹最大径偏下，饰尾部上卷的饕餮纹。低圈足，上有弦纹。所有花纹，和尊一样，都以精细的雷纹衬地。对铭，在盖内及器内底。

尊、卣的铭文相同，行款也一样，均系5行45字，隶写如下：

隹（惟）中（仲）彝父于卜噩（鄂）侯于
盞（城），诒（诞）兄（貺）耳（珥）于宋白（伯）。公
𠄎（姁）乎（呼）遯（疑）逆中（仲）氏于侃。丁
卯，遯（疑）至，告，𠄎（姁）商（赏）贝，𠄎（扬）
皇君休，用乍（作）父乙。

第一行“于卜”，“于”义为往，见《诗·桃夭》毛传。“卜”字象兆枝的斜

笔朝下，与宜侯矢簋铭同。

“鄂侯于鼈城”应连读，“城”乃动词，按《淮南子·时则》高注：“都曰城，邑曰筑。”“于鼈城”意为在鼈地建造都城。

“仲孳父于卜鄂侯于鼈城”是仲孳父去为鄂侯占卜建都之事。这一行为与《书·召诰》、《洛诰》所记卜建东都洛邑相似，这有可能就是周代鄂侯的始封。

“惟仲孳父于卜鄂侯于鼈城，𠄎𠄎珥于宋伯”，句间“𠄎”字依常用方式隶定，系语词。杨树达先生说：“按𠄎字不知为何字，审铭文词义，用于两事之间，与经传遂字相近。”^③按保尊、保卣铭云：“王命保及殷东国五侯，征𠄎六品。”“𠄎”实即“延”字，故“𠄎”字可释为从“延”从“口”，应该就是“诞”字。董珊先生读疑尊、卣此字为“诞”，是很对的。在传世之献中，“诞”字正有这样的用法，“相当于今语的‘于是’、‘然后’，用以说明上下句举事的次序”，吴世昌先生在1930年便讨论过^④。

铭文两事，“𠄎珥于宋伯”的性质是明白的。如学者指出，商周铭文里的“𠄎”意思是受命送交赏赐的物品，而命赐者一定是王（令簋王姜是王后）^⑤。由此我们可以推想，仲孳父是王朝之臣，他“卜鄂侯于鼈城”，然后“𠄎珥于宋伯”，都是奉王之命。

“公妣呼疑逆仲氏于侃”一句，上承仲孳父“𠄎珥于宋伯”而言。由于仲孳父来“𠄎珥于宋伯”，公妣待之以礼，于是命疑专程到侃地迎接，可见公妣当是宋人。由铭文后面疑称她为“皇君”看，“公妣”乃是宋公的夫人，而疑即尊、卣的器主应为宋臣。疑受命“逆仲氏于侃”之后，以完成使命回报，从而得到公妣的赏赐。

观察尊、卣的形制、纹饰，两器的时代确在西周早期。近期著录的同时期器物，还有一件疑鼎^⑥，高28厘米，立耳深腹，口沿下饰有立羽的饕餮纹带，其铭文为：

𠄎（疑）为𠄎

彝，父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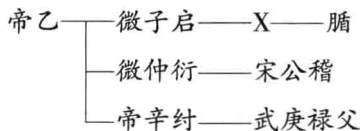
很可能同尊、卣是一人所制。如果是这样，那么这鼎、尊、卣三器和《澂秋馆

吉金图》所收器主为卿的一组器物颇多相似。卿尊、卣上面的横S形夔纹，正接近疑尊、卣的同类花纹，卿鼎的器形、纹饰更与疑鼎大致相同。卿鼎铭文提到“新邑”，公认为成王亲政后时所作，疑的器物也应属于这一时代。

“宋伯”即当时的宋君。按《史记·宋世家》，宋国始封君是微子启。启本为商王帝乙的首子，帝辛即纣的庶兄。《吕氏春秋·当务》云：“纣之同母三人，其长曰微子启，其次曰中（仲）衍，其次曰受德。受德乃纣也，甚少矣。纣母之生微子启与中衍也，尚为妾，已而为妻而生纣。纣之父、纣之母欲置微子启以为太子，太史据法而争之曰：‘有妻之子而不可置妾之子。’纣故为後。”纣在位年数很长，据已发现的其时甲骨金文，至少在二十五年以上^⑦，因此封宋时微子启年龄一定相当大。

《礼记·檀弓》说：“微子舍其孙腓而立衍也。”郑注：“微子适子死，立其弟衍，殷礼也。”《宋世家》亦云：“微子开（启）卒，立其弟衍，是为微仲。”《孔子家语·本姓》：“其弟曰仲思，名衍，或名泄，嗣微子後，故号微仲，生宋公稽。胄子虽迁爵易位，而班级不及其故者，得以故官为称，故二微虽为宋公，而犹以微之号自终，至子稽乃称宋公焉。”^⑧微子启卒后，微仲衍自然也较老，与其兄一样，在位不能很久，他的儿子稽继位很可能是在成王较晚的时候。

以上讲到的商末王室到宋国公室的世系，可列表如次：



看表容易知道，宋公稽的登位不会太迟，应该就是疑尊、卣铭中的“宋伯”。

至于“宋伯”何以称“伯”，我有一个大胆的揣想，即这是相对“仲孥父”之“仲”而言。铭云“公妣呼疑逆仲氏于侃”，以君夫人命逆斋送周王赏物的使臣，如果其间没有特殊的血缘关系，是悖乎常理的。“仲氏”一词见于《诗·燕燕》和《何人斯》，与“伯氏”对称。若以仲孥父为“宋伯”之弟，而“公妣”是微仲夫人，他们的母亲，行事便顺理成章了。当然，这只能是推测。

最后还想谈一下尊、卣铭的地理背景。仲孳父受命出行，先卜鄂侯于盩建都城一事，盩地何在，难于确指，但考虑到2007年湖北随州羊子山发现的西周早期墓出有鄂侯青铜器，鄂都的方位应距之不远。

公妣命疑迎接仲孳父的地点侃，是有可能推定的。“侃”字与“衍”字相通^⑩，衍地见《战国策·魏策》、《史记·魏世家》等文献，程恩泽《国策地名考》卷十一考定在今河南郑州北三十里^⑪。宋国在今河南商丘，设想仲孳父从湖北随州一带北上，疑到郑州附近迎接，一起东行至商丘，应该说是合理的安排。

注释

- ① Chine de Bronze et D'or, Collection Dong Bo Zhai, Musée du président Jacques Chirac, 2011.
- ② 董珊：《疑尊、疑卣考释》，《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2年第9期。
- ③ 杨树达：《积微居金文说》（增订本），第90页，中华书局，1997年。
- ④ 吴世昌：《释〈书〉〈诗〉之“诞”》，收入《罗音室学术论著》第一卷《文史杂著》，中国文艺联合出版公司，1984年。
- ⑤ 沈培：《说古文字里的“祝”及相关之字》，引彭裕商、董珊说，《简帛》第2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
- ⑥ 张懋镕：《新见西周金文丛考》，收入朱凤瀚主编《新出金文与西周历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
- ⑦ 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第58页，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
- ⑧ 杨朝明等：《孔子家语通解》，第455页，齐鲁书社，2009年。文字据《史记·宋世家》索隐略改。
- ⑨ 随州市博物馆：《随州出土文物精粹》，文物出版社，2009年。
- ⑩ 裘锡圭：《释“衍”、“侃”》，收入《裘锡圭学术文集》1 甲骨文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
- ⑪ 参看诸祖耿：《战国策集注汇考》，第1154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

（原载香港浸会大学《饶宗颐国学院院刊》，创刊号，2014年4月）

由清华简《系年》释读沫司徒疑簋

清华大学所藏战国楚简《系年》，已发表于整理报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第二辑^①。《系年》是一部久已佚失的史书，以二十三章的文字篇幅，概述了周朝建立以至战国前期的历史大事，有非常珍贵的学术价值。

《系年》书中记述西周史事的，是最前面的四章。其第四章讲到卫国的初封，说：

周成王、周公既迁殷民于洛邑，乃追念夏商之亡由，方设出宗子，以作周厚屏，乃先建卫叔封于庚（康）丘，以侯殷之余民。卫人自庚（康）丘迁于淇卫。

这段话叙述的周成王、周公分封康叔的经过，同《左传》定公四年卫人祝佗追述的卫国初封的情况，基本上是相一致的。有关的一些问题，我曾写有《清华简〈系年〉解答封卫疑谜》小文^②，详细讨论过了。但该文限于字数，没有能够联系到与卫国分封有关的青铜器沫司徒疑（疑）簋，从而对卫国初封问题的探讨还不充分，这便是我要再写本文的原因。

沫司徒疑簋过去常被称为“康侯簋”，是最著名的周初青铜器之一。该器传系1931年出土于河南浚县辛村的卫国墓地，后流散到英国，1977年入藏于在伦敦的不列颠博物院^③。簋高21厘米^④，无盖，侈唇深腹，口沿下饰涡纹与四瓣花纹，腹饰直棱纹，双耳上有带扁角的兽首，下有垂珥，圈足纹饰与口沿下相同。器的图形见《商周彝器通考》259，铭文见《殷周金文集成》4059。

簋铭共4行24字，现依原行款写定（尽可能用今字）：

王来伐商邑，诞（诞）
 命康侯鬲（鄙）于卫，
 濬（洙）司土（徒）逯（疑）累鬲（鄙），
 作厥考墉彝。𠄎。

对于这篇铭文，中外学者意见有很多很大的分歧，读者如有兴趣，可参看日本白川静的《金文通释》^⑤，这里不一一引述。

以下让我们结合新发现的《系年》简文，对这件簋铭重加解释。

铭文第一行“来伐”的“来”字，从杨树达先生释^⑥。

“商邑”见《诗·殷武》“商邑翼翼，四方之极”，指商王朝直接统治的区域而言，殷墟卜辞称之为“大邑商”，因而也作为商王朝的代词。《系年》第一章讲周武王“克反商邑”，即颠覆商王朝的政权。第三章说“武王陟，商邑兴反”，即武王卒后武庚在商的故地反周。此处铭文称“王来伐商邑”，对照简文第三章“成王屎（敕）伐商邑”，“王”确是成王。有学者以为是“摄政称王”的周公，是不对的^⑧。

“诞命康侯鄙于卫”，承上句“王来伐商邑”，“诞”是虚词，义同于今语的“于是”^⑨。正由于成王来伐商邑，才有“命康侯鄙于卫”之事，这是因为卫乃是商邑的一部分。

大家知道，武王克商之后，将商王朝故地分划为邶、鄘、卫三地，设立三监。《毛诗正义》引郑玄《诗谱》云：“乃三分其地，置三监。……自纣地而北谓之北，南谓之鄘，东谓之卫。”康侯之所以称“康”，是由于都于康丘。这个康丘便于“侯殷余民”，自系在商朝故地，推想当在邶、鄘、卫三地中的卫地境内，因此康叔在简文里又称作“卫叔封”。“卫”是大名，“康丘”是其中作为都邑的地点。

以往各家考释簋铭，最感困难的是怎样解读“鬲”字。特别是各家多以铭文为记封卫一事，又都主张康在其他地方，那么“卫”必须是康侯所都的地点，这样就陷入了困境，因为“鬲”如果读为“鄙”，便不能作都邑解了。殷墟卜辞屡见“鬲”字，都读为“鄙”，如有名的宾组大骨云：“土方𠄎于我东鄙，𠄎（捷）

二邑，舌方亦侵我西鄙田”，“鄙”均为都邑以外的边境之义。

这里应该提到，杨树达先生曾引《广雅·释诂》“鄙，国也”来解释簋铭^①，这是不妥当的。《广雅》原文是：“州、郡、县、道、都、鄙、邦、域、邑，国也。”只是讲州、郡等字与广义的“国”有关，《广雅疏证》已以详细举例表明了这一点。

铭中的“𡩗”读为“鄙”，应该解释为划定国土的边境地区。王在征伐商邑、平定叛乱之后，分封康侯，确定其边鄙自然是必要的步骤。

簋的器主是“濬司徒疑”。“濬”字右上原似从“木”，陈梦家先生鉴于卜辞“未”字有时如此，指出实系从“未”，“濬”即古书记载中的妹或沫，也就是纣所居的朝歌，在今河南淇县东北^②。这个地点虽曾为商王所居，但不是康侯初封的都邑，可能是因为战争破坏一时难于修复的缘故。

沫司徒疑在同出器物铭文里或称“沫伯疑”，其人以“沫”为氏，职官为司徒。按西周青铜器铭文，凡涉及土地权限之事，每每都要有三有司即司徒、司马、司空参加。此次康侯封建，划定边境，沫地也包括在内，这便是簋铭所说“累鄙”。“累”字古书作“逮”，训为“及”，意思是参预。

沫，也即是朝歌这个地方，既然曾为纣所居，自然有其形胜之处，不是康侯初都的康丘所能比，所以如《系年》所载，卫人后来还是“迁于淇卫”，“淇卫”就是滨于淇水的朝歌，不过简文并没有说明迁都是在什么时候。考虑到据《史记·卫世家》，康侯的下一世为康伯，仍沿用“康”为名号，卫人的迁都或许还要晚一些。

上面的推测，并不意味着浚县辛村的墓地不会早至周初。如果像我们所说，康丘即在邶、鄘、卫的卫地以内，迁都前后的卫国君主和贵族很可能不更换墓地。这一类问题，当然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注释

- ①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貳），中西书局，2011年。
- ② 李学勤：《清华简〈系年〉解答封卫疑谜》，《文史知识》2012年第3期；又收入《初识清华简》，中西书局，2013年。

- ③ 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上册,第11页,中华书局,2004年。
- ④ 罗森(Jessica Rawson):《古代中国:艺术与考古学》(*Ancient China: Art and Archaeology*),第100页注Ⅲ,不列颠博物院,1980年。
- ⑤ 白川静:《金文通释》卷一上,第141—161页,白鹤美术馆,1964年。
- ⑥ 杨树达:《积微居金文说》,第222—223页,中华书局,1997年。
- ⑦ 参看《李学勤早期文集》,第174—176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8年。
- ⑧ 同⑥,第222页。
- ⑨ 吴世昌:《罗音室学术论著》第一卷《文史杂著》,第13页,中国文艺联合出版公司,1984年。
- ⑩ 同⑥。
- ⑪ 同③,第12页。

(原载《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3年第3期)

研究晚期青铜器的必要

——重读《商周彝器通考》的《仿造》章

湖南省博物馆将举办“复兴的铜器艺术——湖南晚期铜器展”，我认为这是青铜器研究领域里一件盛事。“晚期铜器”主要是指宋代以来的仿造青铜器，出土与传世的为数不少，但从来很难得到有关学术界、艺术界的注意，大多不见著录，更缺乏深入的考察。以我所能知见，惟一就此做综合论述的，乃是容庚先生在其名著《商周彝器通考》内专设的《仿造》一章^①。

《商周彝器通考》一书，问世于1941年，我早年曾多次绎读，然而对《仿造》这章每每掠过。现在应湖南省博物馆盛意，想为这次专题展览写几句话，重温《通考》该章，才体会到容先生的学识实有不可及之处，在短短的十页篇幅里，将当时所能涉及的仿造青铜器方面的问题都做了极好的论述，迄今看来，对进一步探讨仍有重要的指引意义。

《仿造》章蕴含的成果，特别值得我们吸取的，至少有这样几点：

首先，是在概念上把“仿造”和“伪造”区别开来。

“仿造”青铜器与“伪造”青铜器是不同的，《通考》书中第十一章为《仿造》，第十二章为《伪造》，即将两者明确区别。容庚先生后来在《通考》基础上修改出版的《殷周青铜器通论》^②，虽然以《通考》这两章合并作其第九章《青铜器的仿造和伪造》，但是章内分节还是把两者分开。

当然，“仿造”与“伪造”有其共同之处，就是对三代秦汉青铜器进行模仿，惟其模仿的目的互不相同。“仿造”在不同程度上效法古器，为的是追仿古制，并不是要冒充古物，因而有时还以铭文标出本身的制作年代；“伪造”的目的则在于牟利，从而一定会尽可能伪装成出土古器，所运用的技巧不少是“仿造”所不需要的，例如做假铭文等等。

其次，是推定了仿造青铜器的起源。

容庚先生在《通考》的《仿造》一章里，开头便说明唐代天宝年间虽有铸器之事，不过还不是仿造青铜器的真正始源。真正称得起仿造青铜器起源的，乃是在北宋仁宗年间。

《仿造》章据《宋史·乐志》和欧阳修《集古录跋尾》云：宋仁宗景祐年间（公元1034年）“修大乐，冶工给铜更铸编钟，得古钟有铭于腹，因存而不毁，即走钟也^③。……初王朴作编钟皆不圆，至李照等奉诏修乐，皆以朴钟为非，及得走钟，其状正与朴钟同，乃知朴为有法也。”此后宋朝所制编钟，如《通考》附图八的黄钟清钟，都是仿造古制。

上述仿造编钟的例子并不是孤立的。《仿造》章引翟耆年《籀史》云：宋徽宗“政和癸巳（公元1113年），帝获周鬯于镐京；秋获商卣，获咒敦于长安；又获黄目尊于浚都。后复幽燕，获耶律德光所盗上古宝玉尊，形制与黄目尊等。……明年获周罍，越三月甲子获宝簋。帝承天休，宪三代，稽古象物，昭德于彝器，凡祀圜丘，祭方泽，享太庙及祫宫诸器，……肇新宋器，匹休商周，……于是一洗汉唐诸儒臆说之陋，万世而下，始识三代尊彝之制，使六经所载不为空言。”宋朝仿造青铜器的风气，到这时达到高峰。

再有，是说明了仿造青铜器盛行的历史背景。

上面已经讲到，北宋开始仿造古器，实际并不是偶然的。考察当时的学术史，可知学风正在丕变，学者士人对汉唐时期的学术传统群起怀疑，甚至大胆否定，其中也包括有关礼乐制度的学说观点。如《通考》的《仿造》章所说：“宋皇祐（仁宗，公元1049—1053年）以后，商周彝器出土者多，士夫深悟《三礼图》所图之失，故徽宗铸器一依古制。”

宋徽宗爱好古器，自然也有他崇尚艺术的个人因素。他在位的时候，还敕撰了宋代规模最大的青铜器著录《博古图录》三十卷。经徽宗提倡，朝野盛行搜集收藏青铜器，也有许多仿造器物的实例，一直延续到南宋前期。甚至一些权臣，如童贯、秦桧之流，亦有仿造的青铜器存世。这些，我们在读《仿造》章时都会获有深刻的印象。

容庚先生《通考》《仿造》章的工作，为后人研究仿造青铜器开拓了道路。

当前我们研究仿造青铜器，似可在这样几方面注意：

第一，辑集更多的实物标本，作为研究的基本依据。容先生作《通考》的时代，所能触及的仿造器实物比今天少得多，书内所附图版只有绍兴洗、黄钟清钟和潞国觚（明末）数件^④，铭文拓本也只有寥寥两幅^⑤。

第二，过去收藏和著录青铜器，总是偏重有铭文的器物，对于仿造青铜器也是如此。实际上没有铭文的器物数量要超过有铭文的很多。我们考察青铜器，应兼顾其形制、纹饰、功能、组合以及工艺等方面。

第三，分域和分期，是研究青铜器之类文物的基本要求。对于宋代以来的仿造青铜器，这方面工作还处于初步阶段，有必要将其作为工作的重点。

第四，现代的青铜器研究，已开始引进若干新的科技方法和手段，这些也完全适用于仿造青铜器。

总之，仿造青铜器的研究大有可为，相信湖南省博物馆这次专题展览一定会对此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注释

① 容庚：《商周彝器通考》，燕京大学燕京学社，1941年。

② 容庚、张维持：《殷周青铜器通论》，文物出版社，1984年。

③ 走钟属西周晚期，宋代著录共五件，见刘昭瑞：《宋代著录商周青铜器铭文笺证》，三九〇—三九四，中山大学出版社，2000年。

④ 同①上编附图七一九。

⑤ 同①图二八四、二八五。

（原载湖南省博物馆：《复兴的铜器艺术——湖南晚期铜器展》，中华书局，2013年）

四、战国文字研究

关于清华简中的“丁”字

在《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第三辑的整理考释过程中，几处遇到𠄎字，形如倒“山”，殊不易识。李守奎教授最早提出释为“丁”，大家多以为疑。经反复考虑，我觉得其说可信，现从形音义略作分说，供列位讨论。

先谈字形。“丁”字形体的演变，何琳仪教授《战国古文字典》说：甲骨文作，或填实作。西周至春秋金文作，方形渐变作三角形。战国文字“或延长三角形作、、、，遂演变为小篆之个。”^①书中所举战国“丁”字有《古玺汇编》3850“公孙丁”，其形作，是在形基础上横笔两端下延而成。查《古玺汇编》，除3850该钮外，还有0418“王丁”，“丁”字作，罗福颐先生释文及《古玺文编》皆释作“丁”字。汤馥惠《战国文字编》、陈光田《战国玺印分域研究》均曾征引^②。

陈书已说明，《古玺汇编》两玺均属于三晋系。清华简上这个字，则依楚文字常规，在其中央竖笔上面加饰笔小横，于是成为我们看到的形状，应视为“丁”字的一种变体。

次论字音。清华简《高宗问三寿》通篇有韵，有句云：“仄非（必）平，恶非（必）𠄎”，末一字从“聖”从𠄎，系双音符字。按“丁”古音端母耕部，从“聖”的“𧇧”和与“聖”密切相关的“聽”等字都在透母耕部^③，故正好与同属耕部的“平”押韵。这由字的本身和字的韵脚来说，都可印证𠄎乃是“丁”字^④。

清华简《芮良夫毖》是可列为大雅的诗篇，篇中有一段是：“所（意为职）而弗敬，卑（比）之若重载以行嵒险，莫之扶导，其由（意为尚）不遁（躡）𠄎？”“丁”在此与“敬”字押韵，而应读为端母真部的“颠”，系通转（-en→eng）^⑤。

再讲字义。“丁”，《尔雅·释诂》及《诗·云汉》传：“当也。”^⑥作𠂔的“丁”字在简文里也训当。清华简《赤鹄之集汤之屋》：“是始为埤，𠂔诸屋”，“丁诸屋”即当之于屋，指筑小墙挡在居室之前，是抵御简文所说“白兔”的方法。

“丁”字训当，在清华简中还有别的例子，如《四祝》（暂名）周公语云：“先告受命天丁闢（辟）子司慎咎繇”，“受命天丁辟子”即受命于天当为君主的嗣子，简文或称“辟王孺子”，就是成王，不过这个例子的“丁”字不写作𠂔而已。

总之，𠂔字释“丁”，由形音义看都是说得通的。

2012年5月9日

注释

- ① 何琳仪：《战国古文字典》，第791页，中华书局，1998年。
- ② 汤馥惠：《战国文字编》，第961页，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年。
陈光田《战国玺印分域研究》，第207页，岳麓书社，2009年。
- ③ 陈复华、何九盈：《古韵通晓》，第28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
- ④ “厌必平，恶必圣”：厌，《诗·湛露》传：“安也。”平，《左传》僖公十二年注：“和也。”圣，读为逞，《左传》襄公二十五年注：“尽也。”句意是说，安心治政的必能取得和谐，作恶多端的则必归于灭亡。
- ⑤ “丁”与“颠”通转，参看王力论“顶”、“颠”二字关系，见《同源字典》，第325页，商务印书馆，1982年。
- ⑥ “丁”与“当”耕阳旁转，为同源字，见王力《同源字典》，第324页。

（原载《初识清华简》，中西书局，2013年）

记《古镜写影》有字秦镜

天津王襄先生（1876—1965）是最早辨识和收藏殷墟甲骨的学者之一^①，蜚声于学术界。他一生著述弘富，曾有唐石父先生及王先生之子王巨儒先生加以纂辑，题为《王襄著作选集》，在2005年出版^②。《选集》共三巨册，长达两千六百多页，但还有一些王襄先生的遗作未能收入，他关于铜镜的专著《古镜写影》即其一例。

《古镜写影》是王襄先生研究古代铜镜的主要著作。查《王襄著作选集》所附王巨儒《王襄年谱》，1950年，王襄先生七十五岁，“《古镜写影》成。本书概述了我国自周代至明代出土古镜形制，序言里论证了周代已有镜的见解”，这标明了《古镜写影》成稿的年代。《年谱》又说，1957年，中国科学院陶孟和先生到津访问王襄，询问近年有什么撰述，王先生提出书稿四种，第一种便是《古镜写影》。当年8月，王襄先生将这四种书稿送交中国科学院审查，中科院于9月24日复函，“因《古镜写影》未能进行综合论述，不拟出版”^③。这部书稿一直没有付印，《王襄著作选集》只在所录《纶阁文稿》第三册中收有《古镜写影叙》^④。

我很早就读过王襄先生《簠室殷契征文》、《簠室殷契类纂》等书，但一直无缘谒见。1981年，我在天津得见王先生另一位哲嗣王翁儒先生，谈及王襄先生遗稿《古镜写影》等，深觉有重大学术价值。次年6月，蒙王翁儒先生赐函，告知《古镜写影》“书凡五卷（五册），计：

第一卷 镜型篇、周秦镜篇

第二卷 汉魏三国南北朝镜篇（上）

第三卷 汉三国南北朝镜篇（中）

第四卷 汉三国南北朝篇（下）

第五卷 唐宋元明镜篇、后记

共约一百五十页，每页五百字，计共七万五千字，附图七纸。”^⑤对照《选集》，知道后者只收录各篇的“叙”以及1951年写的“后记”。再看《古镜写影》的“后记”，其中说：“此编镜影始周终明，收镜七百五十九面”，足见原书的规模，而以王襄先生的博识多见，所载铜镜一定富有珍品，解说考释也必有胜迈前人之处。

王翁儒先生给我看了一部分铜镜材料，有拓本也有摹本，我当时做了札记。现择取其中一件，略加讨论，以副王翁儒先生雅意。

《古镜写影叙》的《镜型篇》提到：“镜铭之字，周时仅见敕口镜，乃周末之古文。”^⑥研究古镜的读者对这段话肯定会极感兴趣，所谓“敕口镜”是怎样的？镜上有什么铭文？何以知其为“周末之古文”？

附图是我根据《古镜写影》原图模制的。原图是王襄先生依照拓本作的摹本，有“杨鲁鑫藏拓抚之”题字，及“王襄”、“纶阁述古”二白文印。

这是一面无边缘的素镜，径约9.8厘米，中央设桥形钮，有径2厘米的小圆钮座。镜背有五个字，笔道细劲，应系刻成。字的方向互不相同，如将镜钮横置如图，这些字都偏在上方。文字的风格，显然带有王国维先生所说“周秦间西土之文字”，即秦文字的特点，读者不妨以之与《秦铜器铭文编年集释》、《秦文字集证》等著录中的秦文字对照^⑦。有些字的写法，与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也颇相似^⑧。

试依位置上下的次序，释读这五个字：

在镜钮正上方的，两直笔交叉，横笔稍短些，应释为“十”。

“十”字右下方的字，乍看不易分析，实际其右侧是从“殳”的，只是“殳”的上部小竖笔误与左侧偏右的一点连在一起了。请对照睡虎地简的“殺”字^⑨，即不难明白。这个字没有写出“殺”字左上的“×”形，但是如果我们认为上面的“十”便是“殺”字这两笔，字形就完全了，这可能是一个特殊的借笔例子。

“十”字左下方横写的，是“丁”字。商、西周以至春秋的“丁”字，大都是这样写，战国中晚期才在下部延伸出一笔，如睡虎地简^⑩。

与“丁”字大致相对，在钮座右侧的，是“亥”字。

在“丁”字下面，朝着钮座横置的，是“赦”字，“赦”是《说文》“赦”字异体，曾见于西周金文^①。

把五个字连起来读，是：

十殺丁亥赦。

古代以丁亥为吉日，见于《大戴礼记》的《夏小正》^②。这句话的意思可能是说各种应处死刑的罪名可在丁亥之日得到赦免。大家知道，镜的使用有时与巫术有关，上写这句话的铜镜或许正是这样。

这面铜镜的时代不会太晚。战国晚期的素镜一般是三弦钮，不是桥形钮，“丁”字的写法也表明这一点。战国中期大概是最迟的估计，因此可说这是最早的文字镜之一。不过这面镜上文字的性质全然不同于后世的镜铭，不必把镜铭的起源上推到这样的时代。

这面镜的名称，我建议叫作“丁亥镜”，可惜其出土情况和收藏过程全无消息，原件也不知下落。杨鲁安（即鲁鑫）先生于前些年谢世，他的那张拓本是否存在，亦难究诘。王襄先生的《古镜写影》或许是仅存的有关材料了。

《王襄年谱》记载，1965年夏，王先生家属将其遗留的手稿、墨迹及收藏文物等“全部捐献天津市革命委员会。后分类拨交天津市人民图书馆、天津市艺术博物馆、天津市历史博物馆及天津市文史研究馆收藏”^③，《古镜写影》书稿当在其中。希望该书将来能够出版，使我们更多地看到王襄先生的业绩。

注释

① 孟世凯：《甲骨学辞典》，第115—11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

② 唐石父、王巨儒整理：《王襄著作选集》，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

③ 同②第2636、2648页。

④ 同②第2370—2391页。

⑤ 函中第二卷标题当有衍文。

⑥ 同②第2380页。

-
- ⑦ 王辉:《秦铜器铭文编年集释》,三秦出版社,1990年;王辉、程学华:《秦文字集证》,(台)艺文印书馆,1999年。
- ⑧ 张守中:《睡虎地秦简文字编》,文物出版社,1994年。
- ⑨ 同⑧,第45页。
- ⑩ 同⑧,第217页。
- ⑪ 儋瓠,见吴镇烽:《西周金文撷英》,第48—50页,三秦出版社,1987年。
- ⑫ 参看李学勤:《古文献丛论》,第168—169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
- ⑬ 同②第2655页。机构名称原文如此。

(原载《汉镜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



附图 丁亥镜

五、简帛学研究

清华简《楚居》与楚徙郢郢

清华大学所藏战国竹简中的《楚居》一篇，已在整理报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中发表^①。该篇为楚人所作，历叙楚国起源传说、历代世系及居处都邑，对楚国历史文化研究有极重要的价值，已经得到许多学者的重视。

《楚居》最末一段说：

至悼哲王犹居郢郢，中谿（谢？）起祸，
焉徙袞肥遗；邦大瘠（棘），焉徙居郢郢。

这里的“悼哲王”即楚悼王，公元前401至前381年在位。据简文，悼王在其父声王尚在、自为太子的时候，就居于郢郢，继位后仍在该地，所以说是“犹居郢郢”。郢郢当即《说文》之郢，云“沛城父有郢乡”，在今安徽亳州东南。

悼王时，朝内发生动乱，祸首“中谢”是职官名，于是迁居到肥遗。“肥遗”是一种神话动物，见于《山海经》，或说是黄身赤喙的鸟，或说是一头二身的蛇，在简文中则是地名。据《楚居》前面部分，其地原名“湫郢”，我以为就是《左传》庄公十九年所见地名“湫”。《左传》载：楚文王御巴而败，遂伐黄，“还，及湫”，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云：“湫音剿。《清一统志》谓湫在湖北省鍾祥县北，《春秋大事表》谓在湖北省宜城东南，其实一也。”^②《楚居》说楚文王、成王、惠王都曾居于该地，惠王加以改建，于是易名为“肥遗”。按照简文体例，楚王曾经居处的地方，后世再次去居处，称作“徙袞”，所以此处悼王是“徙袞肥遗”。最后，因肥遗遭受自然灾害，悼王再次迁都到郢郢。

楚悼王徙居郢郢，是《楚居》简记录的最末一次迁徙，这显然关系到《楚居》的写作年代。由于简文中最晚的楚王谥号是“悼哲王”，不再提及下面的王，可以

推断《楚居》即作于悼王之下的肃王之世，肃王的在位年是公元前380至前370年。

楚自肥遗徙至郢郢这件事，又见于新蔡葛陵简的一条纪年：“王自肥遗郢徙于郢郢之岁”，或省称“王徙于郢郢之岁”。“肥遗郢”就是“肥遗”，以为楚都，故称为“肥遗郢”。（楚武王所徙的郢，本名为免，后因人口众多，免不能容纳，将附近的“疆涅”陂堤掘开，使水泄出干涸，成为适合居住之地。“涅”本义是泥、淀，此处指泽地而言。当地原来是“涅”，故而称“郢”，后来楚都皆叫作“郢”，这也是《楚居》告诉我们的。）

葛陵简发表之后，安徽大学刘信芳教授和我都对楚王徙于郢郢的年代做过推算^③，结果相同。简中属于该年的历日较多，能够作为推算的依据。这些历日集中于楚历享月、夏禘、八月这相连续的三个月，所见纪日干支有：

享月 己巳

夏禘 己丑、乙巳、癸丑、乙卯

八月 丁巳、己未、辛酉、己巳、甲戌、庚辰

在试推时，我说：“如上所排，该年夏禘未有乙卯，八月初有丁巳，其间只隔丙辰一日，所以八月朔只能是丙辰或者丁巳。”查张培瑜先生《中国先秦史历表》，当时适合这样条件的，要到楚肃王四年，即公元前377年，才有八月丙辰朔，因此把徙于郢郢推到那一年。

近期武汉大学宋华强博士的《新蔡葛陵楚简初探》一书出版^④，该书第三章对上述说法提出了一些问题，如：

葛陵简零200、323有“夏夕（与禘通）之月，丙辰之日”，应该也属于徙郢的那一年，所以其八月是丁巳朔，不是丙辰朔。

简文里没有对悼王的祭祷，而有“自文王以就圣赧（声桓）王”，以悼王前的声王为殿，可见其时在位的是悼王。

宋华强书还从葛陵墓主平夜君成的世系、年龄等方面，推论简的下限在悼王元年至七年之间。这些都是有道理的。

关于历日，宋书说：“根据楚历建寅的看法^⑤，查张培瑜《中国先秦史历

表·史日朔闰表·战国朔闰表》，楚声王之后，公元前398年楚历八月（夏历五月）丁巳朔；楚历夏夕（夏历四月）丁亥朔，到丙辰三十天，为一大月，当年历日正好能容得下‘王徙于郢郢之岁’享月、夏夕、八月三个月的所有干支。”公元前398年是楚悼王四年。

宋华强博士还提到：“刘彬徽《葛陵楚墓的年代及相关问题的讨论》一文根据楚历建丑说，把葛陵简的年代下限推定在公元前398年。其推论依据虽然与我们不同，但推论结果却是相合的。只是我们尚未读到该文，不知其具体论证如何。”按刘彬徽先生此文已发表^⑥，所举支持公元前398年说的理由，还包括葛陵墓所出器物从类型学看较早等，也很有意义。

现在有《楚居》简的出现，问题很清楚了，楚王徙居郢郢确应在楚悼王四年，公元前398年。

回顾我过去为什么没有采用这一年，是由于用精密的方法推算，该年楚历八月，即周正七月、夏正五月的朔日是戊午^⑦，而没有考虑到如果按一些古历法就会是丁巳^⑧。

这一年也是葛陵墓主病卒年份，所以葛陵墓的年代亦可由之推定了。

注释

- ①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中西书局，2010年。
- ②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211页，中华书局，1993年。
- ③ 刘信芳：《新蔡葛陵楚墓的年代以及相关问题的讨论》，《长江大学学报》（哲社版）2004年第1期；李学勤：《论葛陵楚简的年代》，《文物》2004第7期。
- ④ 宋华强：《新蔡葛陵楚简初探》，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
- ⑤ 楚历以亥月为岁首。
- ⑥ 刘彬徽：《葛陵楚墓的年代及相关问题的讨论》，《楚文化研究论集》第七集，岳麓书社，2007年。
- ⑦ 张培瑜：《中国先秦史历表》，第93页，齐鲁书社，1987年。
- ⑧ 同⑦，第186页。

（原载《江汉考古》2011年第2期）

清华简与《尚书》、《逸周书》的研究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对于古史研究有重要意义。现在我们初步估计全部清华简有64篇或更多一些书，内容和《诗》、《书》、《礼》、《乐》、《易》、《春秋》都有一些关系，但与《书》的关系更重要。按照后世的分类，一种是真正的《尚书》，见于在今天传世的《尚书》，或者由其标题或内容可以推定是《尚书》的；第二种是不在《尚书》，可是见于传世的《逸周书》的；还有一些，是我们从来不知道的，可是从其体裁来看是和《尚书》、《逸周书》是一类的。这三部分总共有20多篇，是清华简的主要内容。此外还有关于历史方面的材料，如清华简第二辑整理报告的内容，是《系年》。原无标题，但其体例比较接近于西晋时发现的《竹书纪年》，有些文句和传世的《竹书纪年》非常相近甚至相同，故定其名为《系年》，将于2011年出版。

1942年长沙子弹库出土了战国帛书。1951年至1954年陆续在长沙发现了五里牌、仰天湖、杨家湾的战国竹简，但这些竹简还都不是严格意义的书。真正发现战国时代的竹书，那是1956年在河南信阳长台关一号墓。可惜竹简残断过甚，现在没有办法拼起来。当时我认为是儒家的作品，现在还有人这么看，不过现在比较有明确的证据证明这些竹简是墨家的作品。此后湖南慈利石板村也出土了竹书，但是多数残碎。真正重要的是郭店、上海博物馆、清华这三批竹简。与前两批竹简偏重于儒家、道家著作等思想性、哲学性的内容不同，清华简的内容主要是经史类的，而且主要是和历史有关的。我们可以看到，一批随葬的竹简，反映了墓主的思想和学术倾向。银雀山一号墓就都是兵书，我们可以想见墓主人一定是军事家。郭店墓的主人按我的意见是“东宫之师”，是教太子的老师，多有思想性内容，摘录的《语丛》也是思想性的内容。清华简的墓主人，可能是史官一类的人。

下面我们谈一谈和《尚书》、《逸周书》有关的几个值得讨论的问题。

清华简里面真正能和伏生所传今文《尚书》直接联系的，最主要的就是《金縢》。刘国忠教授整理的《金縢》这一篇，竹简相当完整。虽然有一些地方要补字，也有个别很重要的地方和今本文字不一致，可是很明显这一篇就是《金縢》的内容。过去因为竹简整理尚处于初步阶段，而媒体很关心，我们曾以为竹简里有《康诰》，后来证明不是《康诰》。这是因为有一支尾简有几字和《康诰》最后几字“……世享”相同，其下留白，遂以为有《康诰》，结果不是《康诰》。我们也曾以为有《立政》，因为我们在简上看见的话，跟《立政》差不多完全一样，可是进一步研究发现不是《立政》，而是跟《立政》有关的另外一篇东西。《金縢》则没有这些问题，虽然它并没有写“金縢”这样的标题。这样我们能有一个估计：济南伏生传的今文《尚书》，或说28篇，或说29篇，所以《尚书》的篇数并不多，数量很有限。孔壁出的《尚书》，据说比伏生本增多16篇。相对于这个来说，我们现在发现《尚书》类文献20多篇，数量上同它们差不多。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大家一定会问，先秦的时候，到底有没有一部《尚书》？——当时可以不一定称《尚书》，因为有不少人认为“尚书”这个名字是汉代才有的——特别是有没有一百篇《书》，是孔子选的？这一点实际上不能从清华简中发现，或者据伏生的、孔壁的《尚书》证明，至少我们这个墓里面没有百篇《尚书》，可是这也不能说当时就一定没有百篇《尚书》。这就涉及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尚书序》。《尚书》确实有一百篇的序，而且汉代的人都相信它，郑玄还专门作了注。《尚书序》说明有过一百篇的这种设想，或者有这种东西。清华简能不能证明《尚书序》的存在呢？至少有一点可说，就是《金縢》，《书序》很明确讲它名为《金縢》，《史记》也称《金縢》，可见当时有“金縢”这一名称。如果《尚书序》普遍流行，在楚地，竹简的主人看到过《尚书序》的话，他为什么不把这一篇东西称为《金縢》呢？这一篇用了一个很长的题目：“周武王有疾周公所自以代王之志”，这个题目不是随便取的，几乎完全相同的话见于《史记》。因此这个标题还是有一定道理的，至少在楚地，墓主人是承认这个标题的，而且特别用了“志”。《逸周书》在《国语》等古书中常常被称为《周

志》，“志”应该是对前人言论、事迹的记述，此处用了“志”，和《周志》接近。这一篇在百篇里面，是很重要的一篇，伏生所传，但是墓主人是不承认《书序》的。如果他看见《书序》或承认《书序》，为什么不写“金縢”而用这样一个名字？所以很可能他没有看见过《书序》。当然，说他没有看见《书序》，并不一定等于在公元前三百年没有《书序》或与之类似的文字。其他各篇，也都没有用《书序》的篇名，但是有的比较接近。比如《说命》，是古文《尚书》，可是在孔壁增多的16篇里面并没有《说命》，今天的古文《尚书》有《说命》。清华简有，标题是“传说之命”。“传说之命”就是“说命”，可是名称还是有差别。《说命》见于《礼记·缁衣》，如果我们承认《缁衣》是子思作的话，那么子思是用“说命”这个标题的。而在楚国的人不用“说命”而是用“传说之命”，虽然“传说之命”就是“说命”，可是还是不一样。有一点要注意，东晋的伪古文《尚书》中的《说命》是三篇。作伪者怎么知道它是三篇的呢？那就是《书序》，因为《书序》告诉我们《说命》是三篇。今天清华简的《传说之命》真是三篇，因此《尚书序》还是有根据的，否则它怎么知道是三篇？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当然，《传说之命》很难读，里面的问题还比较多，有不少有关商朝历史的话，还有一些神话性的内容，里面的若干文句和《国语》比较接近，我们希望能尽快地发表。所以，从我们清华简的发现来说，现在不能证明，也不能反对孔子编百篇《尚书》之说，不过墓里面没有孔子所编百篇本的《尚书》。

第三个问题，清华简的消息公布之后，大家特别关心东晋本《尚书》的真假问题。从宋代以来，特别到阎若璩之后，东晋《孔传》本《尚书》是一部伪书差不多已经成为定案，虽然很多人曾经想翻案。晚清的代表者是洪良品，写了好多部书，来为古文《尚书》翻案。今天我们应该比较公平地说，洪良品的翻案，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他里面有些地方批评阎若璩、惠栋，是有道理的；可是总的说起来，还是站不住脚。后来清华大学的前辈学者张荫麟先生写了一篇《伪古文尚书案之反控与再鞠》，把洪良品所代表的思潮里面提出的证据统统都驳倒了。最近这些年，又有一些学者来翻案，而且写了整本的书，应该说这些书有一些地方也是有道理的，可是总的说起来，不能推翻从宋代开始到阎若璩、惠栋的工作，所以大家特别关心清华简里面的《尚书》能不能证明伪古文

《尚书》的问题。这个问题，清华简本身不能做充分的说明，因为清华简和古文《尚书》有关系的篇章很少，可是还是能够举出明显的例子。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尹诰》。《尹诰》这一篇又称为《咸有一德》，《史记》以下，都用的是《咸有一德》。因为西汉时期孔壁发现的《尚书》，里面就有这一篇，题目就是《咸有一德》，司马迁用的名字也是《咸有一德》。司马迁受学于孔安国，亲见古文《尚书》，所以他用《咸有一德》没有错。“尹诰”这个名字比较早，见于《缁衣》。《缁衣》传说是子思所作，《缁衣》里面所引《尹诰》，见于东晋《孔传》本《咸有一德》。所以大家觉得《咸有一德》所引有见于《缁衣》的《尹诰》，这不是没有问题吗？其实不是这样的，现在我们清华简里面有整篇的《尹诰》，原简没有标题。那么我们怎么证明我们所见的简就是《尹诰》呢？因为这简的第一句，“惟尹既及汤咸有一德”，《礼记·缁衣》所引作“惟尹躬及汤咸有壹德”，所以《尹诰》又称为《咸有一德》，就是从这个句子来的。郭店《缁衣》简和上博《缁衣》简都是一样的，作“惟尹允及汤咸有一德”，与《礼记·缁衣》有一点文字差异，这是允许的。郭店简和上博简《缁衣》基本相同，分章也一样，《礼记·缁衣》则有不同，且多引了一段《尹诰》：“惟尹躬天见于西邑夏，自周有终，相亦惟终。”后两句或以为不是《尹诰》原文。自郑玄以后，历代的注疏家对于这一段话有种种解释，但都无法讲通，而且都承认不好懂。这段话很古奥，“西邑”见于甲骨文，现在看来就是夏。不仅如此，而且《礼记·缁衣》也有不同的本子。郑玄说：“见或为败，邑或为予。”邑和予古文字形接近，当是抄错为予字。现在清华简作“尹念天之败西邑夏”，这句话就好懂了，而且这里确有“败”字，说明郑玄所见本是有道理的。这句话紧接着“惟尹既及汤咸有一德”，可见清华简这一篇就是《尹诰》。如果以上的论证无误，那么东晋本的《咸有一德》完全不对，因为除了这几句引语，二者的内容几乎没有有什么关系，所以这个例子非常清楚地推翻了东晋本。

其实不止这一个例子，还有别的例子。清华简《传说之命》与今本《说命》，也除了《国语》所引之外，毫不相关，完全不是一回事。清华简里面还有很长的一篇，有可能是《罔命》。如果这个推想不错的话，那也和今本毫无关系。以上虽然是个别的例子，但是足以说明东晋以后的传世本没有历史根据。

所谓作伪，我一再地说并不一定是古人是个骗子在骗我们，而只是整理了一些材料。陈寅恪先生说古文《尚书》可能就是古人把一些过去剩下的材料整理了，这个就跟我们今天的设想不一样，这个看法对不对，还可以讨论。

附带地我想在这里谈一个问题。很多人谈到考证方法论的一些问题，比如一部书，里面有一部分证明是真的，其余部分并没有得到证明，也就是说其余部分完全可能是伪的，这当然是对的；可是如果说一部分，比如有十篇，里面有一篇证明是真的，其余九篇不知道真不真，那至少证明一篇是真的，就使其其他几篇是真的可能性提高；相反也是如此。如果证明十篇里面有一篇是假的那么其他各篇是假的可能性也会加大，这一点应该承认。最近有学者讨论这个问题，提出所谓“顾颉刚难题”，我个人不太赞成这个说法。现在表明古文《尚书》里面有几篇是假的，那么其他各篇是假的可能性也加大。

第四个问题我想在这里特别说一下，《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第一辑九篇中，有八篇是《尚书》类的文献。其中除了我们讲的《尹诰》，还有命名为《尹至》的，谈的都是夏和商的关系，是有关商汤伐夏的材料。这两篇字迹、简制相同，为同一抄手所抄。《尹至》这一篇所讲的故事，见于《吕氏春秋·慎大》。看来《慎大》是本于《尹至》或类似的材料，二者对读可以解决不少问题，包括《慎大》篇的错字都可以指出为什么写错了。《尹至》、《尹诰》讲商汤灭夏，按照《尚书》的体例，可以称作《商书》，称作《夏书》也不是不可以。起初读起来会感觉有些句子很浅显，可是仔细读就会发现并不是这样，有一些句子很特别。它的特点是很多的用词和语法与今文《尚书》中的《夏书》和《商书》是一样的。且不管《夏书》和《商书》到底是什么时候作的，清华简这两篇和它们的体裁是一样的。比如《尹至》开头，汤见到伊尹，“汤曰：格”，现在今文《尚书·汤誓》有：“王曰：格”，王就是汤，就等于说“汤曰：格”。《商书·盘庚》有“王若曰：格”。这种句子，其他地方没有，所以它们应该是同出一源，同时而作。还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比如这里面有夏人说的话“余及汝皆亡”，《孟子》作“余及汝偕亡”。这句话见于《汤誓》，作“时日曷丧，余及汝皆亡”。《尹至》还有一句话作“其如台”，前人指出意思就是“奈何”，又见于《汤誓》、《盘庚》、《西伯戡黎》，还有很多例子。所以我们看《尹至》、《尹诰》，开始看很浅显，会怀

疑是不是战国人瞎编的。可是如果你一对照的话，就会发现其来源是一样的，和《夏书》、《商书》一致。这一点特别值得注意，如果我们进行综合研究，可能会提供一些新的东西。这些《尚书》类文献，在用词遣句和文法上还有很多和西周金文一致，以后我们还会有更多的介绍。

第五个问题很重要，在这个简里没有《尚书》和《逸周书》的差别。有明确知道是《尚书》的，比如刚才讲的《金縢》、《传说之命》，还有《罔命》（如果是对的话），不管其内容如何荒唐，也一定是《尚书》。还有一些一定是《逸周书》，比如沈建华老师整理的《祭公》、李均明老师整理的《皇门》，今本《逸周书》就有。还有一篇《逸周书》里面非常重要的《程寤》，从唐朝以后就不存在了，但是尚有一些佚文。这三篇如果按照我们现在的分类，就是《逸周书》。可是在清华简里面，它们和《金縢》、《传说之命》没有差别，都是《书》。这一点并不稀奇，在秦以前就是这样的，今天我们所称的“逸周书”之名，最早为许慎所用。“逸周书”就是失传了的《周书》，“逸”不是不存在，而是没有师说，“绝无师说”。所以它还是《周书》。《左传》、《战国策》曾引《逸周书》若干篇，像荀息，狼臆引用的。如果我们相信《左传》、《战国策》记载的话，那就是在春秋时代就已经在引这些东西了，引的时候就称《周书》。而在《左传》、《战国策》里面引用今本《尚书》某些内容的，有时也称《周书》，或《商书》等。所以当时人的思想里面，这些东西没有差别。如果有差别，可能就如同某些学者说的，是因为孔子编了百篇《尚书》，而《逸周书》是“孔子删《书》之余”。如果真是这么理解，那么《逸周书》本来就是在《尚书》这一类东西之中。特别应该指出的，比如《祭公》这一篇，在《缁衣》里面就引用了，称作《叶公之顾命》，“祭”与“叶”可以通假，而我们清华简就称作《祭公之顾命》，这个标题和《缁衣》篇是一致的，而《缁衣》引用它时是和其他的《书》完全同等的。所以后来被称作《逸周书》的东西，在当时至少有很大一部分被承认就是《书》。这对于我们认识清华简也有意义，由此我们可以发现清华简的这些内容都是可以称作《书》。

传统上认为汉朝发现《尚书》古文有两次，一次是汉景帝末年的孔壁，比伏生所传多16篇，另一次是杜林于西州所得“漆书”古文一卷。现在看来不是

这样，要不然《逸周书》这些材料是怎么来的呢？沈建华、刘国忠、李均明等先生经过研究，指出《逸周书》中的一些字为什么是错的，或者是脱漏，或者是衍字，或者是改错的。怎么改错的，为什么改错了，这将竹简本与之一对照，就可以明白。比如《皇门》这一篇，最后的句子根本就无法懂，清朝人说可能有缺句，现在看起来大概就是丢了一支简。还有一些字，多年以来大家就不认识，有些字虽然不认识但是意思可以明白。我和黄天树教授都曾释过“𠂔”字，指出它的意思是“助”，在清华简里面它对应的字就是助，至于它究竟是一个和助同义的字，还是就是助字，还可以讨论。这样我们就认识到，西汉的时候，先秦古书的发现，比我们想象的要多。这一点是我们近年竹简帛书发现的一个概括性的推论，比如我们已经多次发现《诗》的文句，如果拿齐、鲁、韩、毛四家诗来套，根本套不了。阜阳简《诗经》就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它不是四家诗中的任何一家。因为汉朝以后的家法，字只要写法不同，就是另外一家诗了。现在看来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当时流行的还有很多异文，所以当时决不仅仅只有四家诗，《尚书》恐怕也是一样。除了伏生一系和古文《尚书》之外，《逸周书》就说明当时还有很多流传的《书》。71篇的《逸周书》，一定是汉朝人编起来的，因为71加29就是一百，就是为了凑这个数。他们怎么能收集到呢？就是因为当时有古文的材料在流传，而这一点不见于任何的记载，可是我们可以从现在的发现做这个推论。当时人读古文的水平，可能在某些方面比我们更好，可是有些地方他也不够，出现了种种错误。

所以《逸周书》的本子一定是汉代的。有些人认为是西晋汲冢出土的，唐朝人就称之为《汲冢周书》。汲冢到底出没出《周书》，这个问题不能从我们的材料推出，现在还有争论。汲令卢无忌《齐太公吕望碑》提到有《周志》，《周志》好像就是《周书》了，可是那个文王梦天帝的内容在现在《逸周书》里根本没有，所以汲冢当时所出《周志》（或称《周书》）究竟是什么，今天还无法证明。可是现在《逸周书》里面有些材料，一定是汉代人见过的。比如《程寤》里面有一大段，在王符的《潜夫论》里面就有，而且他加了些讨论。那一段是很清楚的，而且和竹简本非常一致，这就证明他当时一定是看见了，否则怎么能一致呢？所以今天流传的《逸周书》，在汉代一定有它的起源，是不是就是

这个样子，我们不知道。这一点，由于我们还有一些有关材料，将来可以进一步研究。

在此我还想特别说明一点，就是我们对《逸周书》里面若干篇的估价，还应该提高。比如这次我们发现的《程寤》、《皇门》、《祭公》，特别是后两篇，就是西周的东西。我们举些明确的例子，比如《穆天子传》里面经常提到井利、毛班。以前于省吾、杨树达先生写文章证明班簋的“班”就是毛班，今天看这是完全正确的，一定不会错。后来我们研究青铜器，指出当时还有个利，虽然没说是井利，可是身份和《穆天子传》中的井利一样。大家要知道，《穆天子传》并不是历史实录，它是战国时代的小说，虽然反映了一定的历史，但不可能是真的。战国时代的人怎么知道井利、毛班？后来今本《竹书纪年》才有——这个问题我们以后再讨论。现在我们看到战国时代竹简本的《祭公》，井利、毛班还有一个毕𪔐，就是穆王时候的“三公”（当然这个“三公”不一定是“三公九卿”之“三公”），于是我们才恍然大悟，《穆天子传》里的这三个人，是从类似《祭公》这样的文献里来的，从西周以来就传有这样的材料。《穆天子传》里面还有一个毕矩，可能就是毕𪔐之讹。这些材料，可以告诉我们《逸周书》的真实性，但不是《逸周书》的所有材料都有这样的真实性。

最后说说《皇门》的重要性。《皇门》这一篇在《逸周书》里本身就是很重要的材料。这一篇一开头就有“周公若曰”，我们简里面没有“周公”，是“公若曰”，里面谈了很多事情，过去读不懂的，这里都能读懂。清代虽然有研究《逸周书》的学者，像陈逢衡，指出这一篇是周公摄政时代的东西，可是其他人对于这一篇究竟是什么时候的，争论还是很大。现在我们读清华简，可知它非常可能是周公摄政时代的东西。可是这里只有“公”字，有人会怀疑是不是一个普通诸侯国的公呢？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它里面自称为“寡邑小邦”，西周一直是自称小邦，而且文中还把自己和夏朝、商朝相比，一般诸侯国不可能有这种口气。因此《逸周书》传世本说是“周公若曰”，应该还是事实。如果真是事实，它反映的应该是周公刚刚摄政时的心理状态，所以是一篇非常有意思的文献。这些问题都是值得进一步讨论的。

类似这一类的问题，还能举出很多。

（本文是根据2010年12月10日李学勤先生在芝加哥大学北京中心的“顾立雅学术讲座”录音整理而成，经李学勤先生审阅，略有删节。原载《史学史研究》2011年第2期）

论清华简《耆夜》的《蟋蟀》诗

前年秋天，我曾在《光明日报》写过一篇小文，简要介绍了清华大学所藏战国竹简的《耆夜》^①，幸能引起读者的兴趣。现在该篇竹简的图版和考释，已在2010年底出版的《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书内发表^②。这里想就有关这篇简文的一些问题，特别是篇中的《蟋蟀》诗，做进一步的讨论。

大家可以看到，《耆夜》简共为14支，其间有4支断折，文字残缺。简文记述周武王八年伐耆，即《尚书·西伯戡黎》的黎国，得胜凯旋，于文王宗庙举行庆功的“饮至”典礼。参加这次礼仪的，除武王外，有毕公、召公、周公、辛甲、作册逸（史佚）、吕上（尚）父（太公）等。饮酒间武王作诗，致毕公的名《乐乐旨酒》，致周公的名《辂乘》；随之周公作诗，致毕公的名《英英》，致武王的名《明明上帝》。这四篇，都是我们前所未见的佚诗。

最后，周公持爵未饮，有感于蟋蟀骤降于堂，作诗一篇三章，名为《蟋蟀》。这篇诗与传世《诗经》的《唐风》首篇《蟋蟀》，不仅标题相同，内容也显然彼此有着关系。在出土的古文字材料里，发现这样与《诗经》相关的实例，是非常特殊罕见的。

现收于《诗经·唐风》的《蟋蟀》，也是三章，依阮刻《十三经注疏》的《毛诗正义》本，全篇是这样的：

蟋蟀在堂，岁聿其莫，今我不乐，日月其除。无已大康，职思其居。
好乐无荒，良士瞿瞿。

蟋蟀在堂，岁聿其逝，今我不乐，日月其迈。无已大康，职思其外。
好乐无荒，良士蹶蹶。

蟋蟀在堂，役车其休，今我不乐，日月其慆。无已大康，职思其忧。
好乐无荒，良士休休。

《耆夜》简文的《蟋蟀》则是（尽量用通行文字）：

蟋蟀在堂，役车其行，今夫君子不喜不乐，夫日□□，□□□忘。毋
已大乐，则终以康。康乐而毋荒，是惟良士之迄迄。

蟋蟀在席，岁聿云落，今夫君子不喜不乐，日月其迈，从朝及夕。毋
已大康，则终以祚。康乐而毋[荒]，是惟良士之思思。

蟋蟀在序，岁聿□□，[今夫君子不喜不乐]，□□□□，□□□□。
毋已大康，则终以思。康乐而毋荒，是惟良士之思思。

粗看起来，两篇《蟋蟀》似乎相近，仔细分析，两者实有较显著的差异。

首先，一念就会知道，两篇用韵很不一样。简文《蟋蟀》，第一章押阳部韵，第二、三章押鱼、铎部韵（鱼、铎平入对转）。《唐风·蟋蟀》第一章押鱼、铎部韵，第二章押月部韵，第三章押幽部韵。单就这一点说，差别已经很大了。

两篇虽有许多共通文句，但各章并非一一互相对应。实际上与简文第一章相接近的，是《唐风》的第三章。可以看到，两者均以“蟋蟀在堂”起句，随后说到“役车”。《唐风》的二、三章起句仍是“蟋蟀在堂”，简文则二章为“蟋蟀在席”，三章为“蟋蟀在序”，且用以押韵。

两篇的句式也有不同。简文《蟋蟀》不像《唐风》那样作清一色的四字句，整齐划一。尤其特别的是其中“今夫君子不喜不乐”没有韵脚，八字只好作一句读。如其第二章：“今夫君子不喜不乐，日月其迈，从朝及夕”，韵脚落于“夕”字，按照王力先生的说法，乃是“疏韵”^③，《唐风·蟋蟀》没有这种现象。

《唐风》三章，末句分别是“良士瞿瞿”、“良士蹶蹶”、“良士休休”，句末都是叠字。依毛传，“瞿瞿”意为“瞿瞿然顾礼义也”、“蹶蹶”意为“动而敏于事”，

“休休”则指“乐道之心”，总之皆为“良士”的品德。简文《蟋蟀》三章，第一章末句作“是惟良士之遘遘”，第二、三章作“是惟良士之思思”。“思思”或即《唐风》的“瞿瞿”，“遘遘”可能是指正大而言，因为“方”字有大和正的涵义。简文同样是说“良士”的德性，却仍有明显的差异。

简文与《唐风》两篇《蟋蟀》既然有这样的不同，其成篇的时期和地域应该有一定的距离。从《唐风》一篇显然比简文规整看，简文很可能较早，经过一定的演变历程才演变成《唐风》的样子。

二

关于《唐风·蟋蟀》的成篇时期和内容性质，《诗序》有很明确的说法：“《蟋蟀》，刺晋僖公也。俭不中礼，故作是诗以闵之，欲其及时以礼自虞乐也。此晋也而谓之唐，本其风俗，忧深思远^④，俭而用礼，乃有尧之遗风焉。”所说的晋僖公，《左传》桓公六年作僖侯，《史记·晋世家》作釐侯，其在位年为西周共和二年至宣王五年，即公元前840至前823年。

汉代学者论及《蟋蟀》，大都本于上述《诗序》的看法。例如《汉书·地理志》说：“参为晋星，其民有先王遗教，君子深思，小人俭陋，故唐诗《蟋蟀》、《山枢》、《葛生》之篇曰：‘今我不乐，日月其迈’，‘宛其死矣，它人是媼’，‘百岁之后，归于其居’，皆思奢俭之中，念死生之虑。”还有《后汉书·马融传》等，也有类似的话。晚出的《孔丛子·记义》甚至假托孔子读《诗》，说：“于《蟋蟀》见陶唐俭德之大也。”这些都是由《诗序》之说而来^⑤。

按照《诗序》一系的传统说法，《唐风·蟋蟀》“今我不乐”的“我”，指的便是诗篇所刺的晋僖公。但是，通读诗篇，会感到意旨的前后矛盾，正如前人已指出的：“每章前四句似为荒乐者代述其言，后四句又似戒其耽于逸乐”^⑥。尽管有些学者努力调和^⑦，矛盾还是显著的^⑧。作诗的人何以这样来“刺”晋僖公，确实有些费解。

这里特别要说的是，历史上的晋僖公实际不是生活过俭，以致不合礼制，激起人们作诗以“刺”的君主，事实刚好相反。这一点，有他所制青铜器足能

证明。

近年在山西曲沃北赵发掘的晋侯基地中，发现了器主为“晋侯对”的一批青铜礼器，经多方面研究，“晋侯对”肯定就是《晋世家》的釐侯，也即《诗序》讲的晋僖公^⑨。墓地M1是他的墓，M2为其夫人。

晋侯对器物里引人注目的有一组盃^⑩，上面的铭文是（依原行款）：

惟正月初吉
庚寅，晋侯对
作宝罍吸盃，
其用田狩湛
乐于原隰，其
万年永宝用。

还有一件铺^⑪，铭文是：

惟九月初吉
庚寅，晋侯对作铸
罍铺，用旨食
大饗，其永宝用。

这两篇铭文都有独特的地方，不见于其他青铜器。

盃铭说“田狩湛乐于原隰”，“湛乐”可参照《诗·常棣》“和乐且湛”。其实“湛”可以通作“沈”，有不好的意思，如《诗·抑》“荒湛于酒”，《墨子·非命下》“内湛于酒乐”。

铺铭“旨食大饗”，“旨食”意是美食，“饗”我想应读为“燔”，即烤肉。铺是豆类器，可用以陈肉食。

将两篇特异的铭文结合起来，不难看出晋僖公绝不是俭啬的人，而是耽于逸乐，爱好田游和美味的豪奢贵族。《诗序》所讲恐怕不是史实。

《耆夜》所提供的简文《蟋蟀》的历史背景，则完全没有上面说的矛盾和问题。

简文周公作《蟋蟀》一诗，是在战胜庆功的“饮至”典礼上，大家尽情欢乐正是理所当然，周公只是在诗句中提醒应该“康乐而毋荒”才符合“良士”的准则。要求周朝廷上下在得胜时保持戒惧，是这篇诗的中心思想。

三

有些人可能没有注意到，《耆夜》不但明记周的伐耆在武王八年，实际通过周公作《蟋蟀》一诗，指出了伐耆的具体时节。

《唐风·蟋蟀》第一章的毛传说：“蟋蟀，蛭也，九月在堂。”孔颖达《正义》：“九月之时，蟋蟀之虫在于室堂之上矣。”按《豳风·七月》有：“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正义》：“蟋蟀之虫，……八月在堂宇之下，九月则在室户之内。至于十月，则蟋蟀之虫入于我之床下。”正与毛传“九月在堂”相符。以此对照《耆夜》的《蟋蟀》，不管《七月》历法的建正如何，蟋蟀“在堂”、“在席”、“在序”肯定是接近岁末的事，以至诗中说“岁聿云落”。由此证明，周的伐耆是在武王八年的深秋以后。

按《史记·周本纪》云：“武王即位，太公望为师，周公旦为辅，召公、毕公之徒左右王师，修文王绪业。九年，武王上祭于毕，东观兵，至于盟津。……是时诸侯不期而会盟津者八百诸侯。诸侯皆曰‘纣可伐矣’，武王曰‘女未知天命，未可也’，乃还师归。”这是十一年克商的前奏，前人多认为本于汉初流传的《泰誓》。这种本子的《泰誓》，曾为《尚书大传》所引，应该有很早的来源，与后来的《孔传》本《泰誓》不能同日而语^①。按《尚书序》：“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师渡孟津，作《泰誓》三篇。”因此清梁玉绳《史记志疑》说《周本纪》“其曰‘九年’，乃武王即位为西伯之九年；下文曰‘十有一年’，乃武王之十一年，与《书序》合，甚为明划，其言亦必有所据，与文王不相涉。”^②

梁玉绳这段话，是针对《孔传》本《泰誓》把克商从十一年改作十三年说的。

《孔传》说：“周自虞芮质厥成，诸侯并附，以为受命之年，至九年而文王卒。武王三年服毕，观兵孟津”，这样讲来，“十一年”乃是文王受命的纪年，武王不用自己即位年数，而是沿用文王受命之年。此说影响甚大，一直到王国维的《周开国年表》还继续着这样的看法。

孔颖达《正义》为了支持《孔传》，还专门引用了《逸周书》的《文传》篇。《文传》云：“文王受命之九年，时维暮春，在鄙，[召]太子发曰：‘吾语汝所保所守，守之哉。’”有遗命的性质，似与《孔传》相合，然而细绎《逸周书》有关各篇，有文王、武王的纪年，例如：

《程寤》“惟王元祀正月既生魄”（文王纪年）^⑬

《柔武》“维王元祀一月既生魄”（武王纪年）

《大开武》“维王一祀二月”（武王纪年）

《小开武》“维王二祀一月既生魄”（武王纪年）

武王并不沿用文王受命之年。

无论如何，《耆夜》的“武王八年”一定是武王即位的八年，不可能是文王受命的八年。这也就支持了上述梁玉绳的意见，《周本纪》本于《泰誓》讲的“九年”是武王自己纪元的九年。

这样，简文所记武王伐耆，同孟津观兵在时间上便前后邻接了。伐耆在八年之末，随后就是在孟津观兵，与诸侯相会。

《西伯戡黎》的本事，历来以为“西伯”是文王，宋代才有学者主张是武王^⑭。《耆夜》的记载，从各方面考虑，要比传统的说法近乎情理，值得今后深入探究。

注释

⑬ 李学勤：《简介清华简〈耆夜〉》，《光明日报》2009年8月3日。

⑭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中西书局，2010年。

⑮ 王力：《诗经韵读》，第69—71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

- ④ “忧深思远”，语本《左传》襄公二十九年。
- ⑤ 详见胡承珙：《毛诗后笺》，第507—508页，黄山书社，1999年。按胡氏说：“《盐铁论·通有篇》引孔子曰：不可大俭极下，此《蟋蟀》所为作，此尤足见《序》说之古”，查《通有篇》原文，“此《蟋蟀》所为作也”应系桓宽所说，不是孔子的话。
- ⑥ 同⑤，第508页。
- ⑦ 参看吴宏一：《〈诗经·唐风〉新绎》，（香港）《国学新视野》2011年春季号。
- ⑧ 李学勤：《〈史记·晋世家〉与新出金文》，《学术集林》卷四，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
- ⑨ 钟柏生等：《新收殷周青铜器铭文暨器影汇编》，852—854、856，（台）艺文印书馆，2006年。
- ⑩ 同⑨，857。
- ⑪ 蒋善国：《尚书综述》，第222—22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
- ⑫ 梁玉绳：《史记志疑》，第82页，中华书局，1981年。
- ⑬ 同②。
- ⑭ 参看顾颉刚、刘起钎：《尚书校释译论》，第1066—1067页，中华书局，2005年。今本《竹书纪年》云帝辛“四十四年，西伯发伐黎”，即受宋儒影响。

（原载《中国文化》第33期，2011年5月）

清华简对学术史研究的贡献

清华简是在2008年夏天入藏的，其整理报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第一辑于2010年底出版，第二辑目前尚在编写中。这两辑报告共收简10篇，而整批简初步估计有60多篇，因此现在想准确评说这批简对古代学术史研究有怎样的价值，实在是为时尚早。但即使只就这头两辑来说，已经可以看到清华简在这方面的的重要性，这里试谈几个问题。

首先是《尚书》的传流问题。大家知道，汉初伏生传《尚书》28篇，为今文《尚书》；后来景帝末曲阜孔壁发现《尚书》，增多16篇，为古文《尚书》，其后又有杜林得于西州的“漆书”古文。古文《尚书》久已散佚，东晋以后流传的《孔传》本，宋代以来屡经学者质疑，也一直有论作为之翻案。清华简中有《尚书》一类书籍20余篇，有的是今文《尚书》有的，如《金縢》，有的是见于孔壁古文或百篇《书序》的，如《尹诰》（即《咸有一德》）、《说命》，还有一些是今古文都没有的。以清华简《尹诰》与《孔传》本《咸有一德》比较，很容易看出后者是晚出的依托之作，种种辩解是徒劳的。

清华简还有几篇，如《皇门》、《祭公》，汉代以来收录于《逸周书》，而在竹简中居于与《尹诰》、《金縢》等同样的地位。这证明在汉代还曾有不少这一类文献传流，只是由于不见于百篇《书序》或类似原因，被屏于《尚书》之外，现今我们对之就应该刮目相看了。不管是《皇门》还是《祭公》，其所体现的思想特点都和《尚书》中的《周书》各篇一致，足以证明后来的儒学确实是继承和发展了西周占统治地位的观念传统。

传统的看法是，孔子删《书》，选定百篇，篇名见于《书序》，清华简虽有《尚书》，却不能证实这一点。特别是简里虽然有《金縢》篇文，原来用的篇题乃是《周武王有疾周公所自以代王之志》，并不像《书序》那样标为《金縢》。

这至少表明，把篇文抄写到简上的人没有见过《书序》。

其次是《左传》的可信性问题。《左传》一书，传为西汉张苍所献，出现之后即在学者间引发争论。争论的焦点，本来是传文是否与《春秋》经文互为表里，到了近代，竟有著作怀疑《左传》记事的真实性，如日本津田左右吉的《左传的思想史研究》可为代表。清华简中固然没有《左传》，但有一种我们试题为《系年》的史书，在许多方面能够与《左传》彼此印证。

即将在《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第二辑中发表的《系年》，共有138支简，分为23章，叙事起自周初武王、成王，下至战国前期，其间属于春秋时期的章数最多，许多地方可与《左传》对照，相为补充，也证明《左传》所记真实，足资依据。值得注意的是，两者甚至一些人物的话语都是相似的，例如《系年》载，晋襄公死，其子灵公年幼，大臣想召请襄公之弟当时在秦国的公子雍为君，“襄夫人闻之，乃抱灵公以号于廷，曰：‘死人何罪？生人何辜？舍其君之子弗立，而召人于外，而焉将置此子也？’”《左传》文公七年记此事，襄夫人说：“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适（嫡）嗣不立，而外求君，将焉置此？”与《系年》所记基本相同。

《系年》还有一点值得重视，就是在好多方面接近于古本《竹书纪年》。《纪年》是西晋之初在今河南汲县境内的一座战国魏墓中发现的竹简书籍，内容记夏商周史事，直到魏襄王二十年（公元前299年），而《系年》作成于楚肃王时（公元前380—前370年），彼此相去不远。《纪年》、《系年》若干记载一致，如西周晚年有共伯和执政，不同于《史记》周、召二公“共和”之说。

过去研究《纪年》的学者，大都以为《纪年》是类似《春秋》的编年体。晚出的所谓今本《竹书纪年》，就是这个样子。不过现在还能在传世载籍里找出的《纪年》佚文，有些是很难按编年体编排的，比如《史记·越世家》索隐所引关于越国史事的《纪年》原文，就是如此。猜想《纪年》本来的体裁是和《系年》类似的，以史事为中心分为一章一章，有点像所谓“纪事本末”体。是否这样，需要深入研究，这在史学史上是一个很有意义的问题。

最后说一下楚国在学术史上的地位问题。迄今为止，以书籍为主要内容的随葬竹简，已经发现了好几批，最早的如信阳长台关简，后来的慈利石板村简、

荆门郭店简、上海博物馆简，加上这里讨论的清华简，内涵之丰富，已经远远超过我们过去所能想象。这些简都出于战国楚墓，当然是由于当地埋葬制度和地下条件特殊的原因，然而也充分说明了楚国的学术文化所达到的高度。以往历代学者常视楚国为蛮夷之地，似乎没有多少文教可言，其实不过是一种偏见。重新考虑古代学术的地理分布，有关材料条件已经逐步趋于成熟了。把现有的这几批简综合起来，结合传世文献研究的成果，写一部战国时期楚国学术史，一定是别开生面。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1月9日，刊出时标题稍有改动）

《系年》出版的重要意义

各位已经看到了刚刚出版的《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整理报告的第二辑，现在请容许我简要介绍一下这一辑的内容，也就是介绍我们在清华简中的一项重要发现。大家知道清华简是一批战国中期偏晚的竹简，2008年秋天入藏到清华大学。现在收入第二辑报告的是一部前所未见的史书，是战国时期，应该是楚国人写的一部史书，原无标题，整理时题为《系年》。

大家可以看到，《系年》竹简一共有138支，原有简序编号，基本上保存完好，没有大的缺损。这是一部周代的断代史，全书讲述了从武王伐纣一直到战国前期的全国的历史大事，是一部十分珍贵的史书，也是近现代秦以前史书绝无仅有的重要发现。

以上我说了“近现代绝无仅有”，并不是在我们历史上绝无仅有，因为在历史上有过一次类似的发现，那是在中国历史上的西晋武帝咸宁五年，即公元三世纪的279年，在汲郡即今河南汲县的一座战国时魏国墓中出土了一批竹简，其中有一部史书，也原无标题，当时整理者定名为《纪年》，也叫《竹书纪年》（现早散佚，只有辑本）。《纪年》是魏国人作的一部通史，写作年代大约是战国晚期的魏襄王时，前人估计在公元前298—前297年左右，清华简《系年》要更早，从内容看，作于楚肃王时（公元前380—前370年），我们的清华简的抄成年代，据¹⁴C测定是前305±30年左右，这是离《竹书纪年》发现1700年左右再次发现秦以前的完整史书。

刚才我讲的“公元前”年数，指的是2300多年以前，有的朋友可能印象不深，这如果以当时一些著名人物的年代对比，就会更清楚了，我在这里举三位人人皆知的人物：

孟子 约公元前390—前305（86）

庄子 约公元前365—前290（76）

屈原 约公元前343—前299（45）

这三位人物的卒年都在公元前300年左右。我们的清华简，就是他们那个时代的书籍，是他们有可能读到的。而楚国人作的《系年》（如果是），应该说是比屈原《楚辞》更早的楚国完整的著作，当然性质并不一样。

《系年》全书是分章的，一共分为23章，从讲述的时代看，可以大致分为三大部分：

第1—4章 西周开始到平王东迁、两周之际

第5—19章 春秋时期

第20—30章 战国时期

关于1—4章，讲了周朝如何建立，分封诸侯，又怎样走向衰亡。重点叙说了晋、郑、楚、秦、卫等国的兴起，有许多地方是我们不知道的，有些地方或者可以补充传世文献，纠正古书记载，解决经学、古史上的一系列疑难问题，例如前一段在一些学术会议上我们介绍过的秦人如何起源的问题，《系年》的记载可以得到文献的考古学的印证，又如共和执政和平王东迁的过程，也有详细重要的记载，多与传世文献不同。

春秋时代的《系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即印证和补充《春秋》经传，特别是《左传》、《国语》的记载，如果今天还有人怀疑《左传》是后人伪作的话（像日本津田左右吉），《系年》简有些话语都与《左传》相同或相似。当然，也有不少地方可补正《左传》以及《史记》。例如吴国伐楚入郢的经过等，就和传世之说明显不同。

《系年》的战国早期部分，由于传世文献缺乏，《纪年》也没有留存，尤其珍贵重要，所记的好多大事，是古书里没有或语焉不详的。这之间包括很大很重要的事件，如列国间的战争，如第21章楚人（楚简王时）与晋师战于长城，

第22章楚声王时，韩、赵、魏与越王联合伐齐，越王翳与齐、鲁在鲁国会盟，鲁侯为越王驾车，齐侯参乘。后来晋国魏文侯大败齐师，韩、赵、魏与齐盟誓，以及第23章楚悼王时晋（魏）师大败楚师等情节，都是古史大事，而过去是不够了解的。由于时间有限（只给我二十多分钟），只能介绍到这里。不管怎样，我们说《系年》的发现和今后的研究将在一定程度上改写古史，并不是过分的。

必须说明，由于我们的学识能力有限，我们对《系年》这样重要的简书的整理考释工作，只能说是有关研究的第一步，必然有许多不足之处，特别是与传世文献结合研究，与金文等考古成果结合研究，我们只能提供工作的起点。我们在这里再次感谢大家的光临，更期待今后（包括下午的座谈会）大家不吝指教。

附带要报告的是，清华简整理报告的第三辑，工作已经起步，仍会有不负大家关心的发现，在工作比较成熟的适当时候，我们会及时向大家报告。

（原载《邯郸学院学报》2011年第4期，系2011年12月19日在“《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第二辑成果发布暨学术座谈会”上的介绍辞）

新整理清华简六种概述

截至2011年为止，清华大学2008年入藏的战国竹简（简称“清华简”）已整理注释两批，分别于整理报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第一、二辑中发表^①，幸能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本文要向大家介绍的，是我们正在进行整理的竹简第三批，共计有六种八篇。

六种竹简，有两种是西周时期的佚诗：作于周初的，是类似《周颂》的《周公之琴舞》；作于西周晚期的，是类似《大雅》的《芮良夫毖》。有一种是真正的古文《尚书》——《说命》三篇。有一种记汤与伊尹之事的佚书《赤鹄之集汤之屋》，还有一种托名武丁与彭祖的佚书《殷高宗问于三寿》。最后一种记载古代贤臣，拟题为《良臣》。

以下逐次作简要说明。

一、《周公之琴舞》

《周公之琴舞》简长45厘米，共17支，第15支上半残失。在第1支背面写有标题《周公之琴舞》。

细读简文，可以看出这是一组十分珍贵重要的乐诗，由十篇颂诗构成。简文开首云：

周公作多士敬（傲）毖（毖）寔（琴）壘（舞）九绪（遂）。

其下有诗一篇。接着，简文说：

成王作敬（傲）愆（愆）簋（琴）壘（舞）九绪（遂）。

其下有诗九篇。按周初《诗》《书》所言“多士”，是指朝臣官吏而言^②。“愆”的意思是戒慎，所谓“多士傲愆”，是周公率领的朝臣傲戒成王，而成王自作的“傲愆”，则是嗣位后对自己的傲戒之词。传世《诗经》的《周颂》里有一篇题为《小愆》，就是这种傲戒的诗。

简文在周公“多士傲愆”下面，列诗一篇，冠以“元内（人）启曰”，似乎与“琴舞九遂”不合。大家知道，当时诗歌一个单位常称为一终或一成，而“遂”字《国语·晋语四》注“终也”，《礼记·月令》注“犹成也”，“九遂”应该是和九终或九成同义。简文在成王作的“傲愆”下面，正好是有诗九篇，分别冠以“元（意思是第一）内（人）启曰”、“重（再字之误）启曰”、“三启曰”以至“九启曰”。

我以为这种情形并不意味简文周公所作缺失了八篇，因为仔细分析成王作下面的九篇诗句，有的是王的口气，有的却是朝臣的口气。这里试举出在成王作下冠有“元内（人）启曰”的一篇：

敬之敬之，天惟显帀（师），文非易帀（师）^③。毋曰高高在上，劓（陟）降其事，卑（俾）蓝（监）在兹。乱曰：讵（遁）我宿夜，不逸敬之，日烹（就）月廼（将），享（学）其光明。弼寺（时）其有肩，覬（示）告舍（余）显德之行。

不难发现，这篇诗即是传世《周颂》里的《敬之》。试对照今传本的文字：

敬之敬之，天维显思，命不易哉。无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监在兹。维予小子，不聪敬止，日就月将，学有緝熙于光明。佛时仔肩，示我显德行。

《诗序》说《敬之》是“群臣进戒嗣王也”，但看诗中“示告余显德之行”等语，“余”肯定为成王自称。

与《敬之》相反，冠以“四启曰”的一篇开端说：

文文其有家，岳（保）监其有逵（後），孺子王矣。……

“孺子王矣”这句话见于《尚书·立政》，恰好是成王嗣位时周公所说。由此足知这篇诗实际原在周公所作之中。

《周公之琴舞》的性质是一种乐章，堪与备受学者重视的《大武》乐章相比。关注《诗》、《乐》的都知道，《大武》（或称《武》）为武王、周公所作，见于《左传》宣公十二年、《庄子·天下》和《吕氏春秋·古乐》。《礼记·乐记》曾描写其乐舞是“始而北出，再成而灭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国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复缀，以崇天子。”王国维先生推断该乐章即《昊天有成命》、《武》、《酌》、《桓》、《赉》、《般》六篇，后来高亨等学者又有不同说法^④。《周公之琴舞》乃是与之结构相仿的乐诗，以周公还政、成王嗣位为其内容，这不仅是佚诗的发现，也是佚乐的发现。

乐本为六经之一，随着春秋以降“礼坏乐崩”，古乐归于衰微。《汉书·艺文志》说：“周衰俱坏，乐尤微眇，以音律为节，又为郑、卫所乱，故无遗法。”到了汉代，就只存留《乐记》，而没有所谓“乐经”了。《周公之琴舞》对于研讨古乐应该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

这一乐诗除《敬之》在《诗经》中被编入《闵予小子之什》外，绝大部分久已佚失，没有任何文献引述。其所以传流到楚地，是很值得思考的。我猜想，这可能与周王朝发生的王子朝之乱有关。据《左传》昭公二十六年载，公元前516年，周朝发生变乱，召伯盈逆敬王而逐王子朝，“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宫嚭奉周之典籍以奔楚”。像《周公之琴舞》这种专供嗣王即位一类典礼时演奏的乐章，如果说来自王子朝等所携往楚国的典籍之中，是合乎情理的。

二、《芮良夫毖》

《芮良夫毖》简长44.7厘米，有小部分残断，特别是后半较甚，初步拼缀，

暂定为28支简。第1支简背原写有标题“周公之颂诗”，可能是因为与简文内容不合，后又加以刮削，以致字迹模糊，我们也不采用这一标题。

与上述《周公之琴舞》相似，《芮良夫毖》也是儆戒性质的“毖”诗，不过它和乐舞无关，乃是刺讥时政的政治诗。简文开首，已经把这一点讲得很清楚：

周邦聚（驟）有禍（禍），寇戎方晉（臻），厥辟、戠（御）事，各營（營）其身，恒靜（爭）于稟（富），莫綢（治）庶難，莫卹邦之不寧，內（芮）良夫乃作毖（毖）再久（終）。

“再终”意即两篇，简文确分作两篇，冠以“曰”和“二启曰”。不过仔细读来，两篇还是互相联系的。如果以之作为一体来看，全诗便至少有180余句，这要比传世《诗经》任何《雅》、《颂》都更长些。

芮良夫是厉王时的大臣，以芮国（在今陕西大荔）诸侯在朝中任职，《国语·周语上》注：“芮良夫，周大夫芮伯也。”他以谏刺厉王的虐政名垂史册，除《周语上》记述他劝阻厉王任用佞臣荣夷公外，《逸周书·芮良夫》是他劝诫执政朝臣的言辞，《诗·大雅·桑柔》据传也是他讽谏厉王的作品。《桑柔》也是长诗，可和《芮良夫毖》对照。

《周语上》载，芮良夫反对厉王倚任荣夷公的理由是：

夫荣夷公好专利而不知大难。夫利，百物之所生也，而或专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将取焉，胡可专也？所怒甚多而不备大难，以是教王，王能久乎？

《逸周书·芮良夫》也说当时的“执政小子”“道（导）王不若，专利作威，佐乱进祸”，“惟以贪谀为事，不勲（勤）德以备难”。这正是简文所讲“厥辟（指厉王）、御事（指执政朝臣），各营其身，恒争于富，莫治庶难，莫卹邦之不宁”，其间词语是很相似的。

《周语上》还记载：

厉王虐，国人谤王，邵公（召穆公虎）告王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

《芮良夫》也提到：

贤智箝口，小人鼓舌，逃害要利，并得厥求，唯曰哀哉。

《芮良夫毖》则说：

呜呼畏哉，言深于渊，莫之能测。

所指都是同样的政治形势。简文还说：

敬之𢇛（哉）君子，天犹畏（威）矣。敬𢇛（哉）君子，塋（寤）败改
繇（由），龚（恭）天之畏（威），载圣（听）民之繇（谣）。

则是芮良夫对厉王和执政朝臣的期望。

简文开首所云厉王时“寇戎方晋（臻）”，也见于诗篇本身。当时的寇患，见于传世文献的只有《后汉书·东夷列传》的“厉王无道，淮夷入寇，王命虢仲征之，不克”，寥寥数语，不足以显示灾难的严重程度。好在近年青铜器铭文的发现和研究，已经将厉王时夷人入侵的过程大致揭露出来。

据厉王所作的宗周钟（即鞶钟）及有关的其他铭文，厉王因南方蛮夷作乱，曾自成周出发征讨，所伐有南淮夷英、桐、濡、角、津等国，取得胜利，归途路径在今湖北北部的鄂国，鄂侯还曾“纳醴于王”。谁想不久鄂侯竟然反叛，率夷人入侵，深入周朝腹地。厉王命六师攻伐鄂国，经过一段曲折才得成功^⑤。尽管铭文使用不少可能是溢美之词，厉王国事的艰难还是显然易见的，芮良夫对此极度忧虑，是必然的事。

三、《说命》三篇

《说命》简文长约45厘米，有三篇，每篇最后一支简背均有篇题《尊（傅）敝（说）之命》，现分别题为《说命上》、《说命中》和《说命下》。《说命上》共7支，《说命中》共7支，《说命下》则共10支。

《说命》是《尚书》的一部分，《书序》云：“高宗梦得说，使百工营求诸野，得诸傅岩，作《说命》三篇。”现在清华简中的《说命》确系三篇，可见《书序》是有依据的。《说命》不在汉初伏生所传的《尚书》之中，孔颖达《尚书正义》所述郑玄讲的孔壁古文《尚书》多于伏生的十六种二十四篇中也没有《说命》，而东晋时梅赜所献孔传本《尚书》里则有三篇《说命》，前人已考定为伪书。与清华简《说命》对照，梅氏献出的《说命》除自先秦文献中摘辑的语句外全然不同。

先秦文献曾多次引用《说命》佚文，最重要的是《国语·楚语上》楚灵王时大夫白公子张所说，但没有明引《说命》篇名。不过其间有“若药不瞑眩，厥疾不瘳”，《孟子·滕文公上》引而标出“《书》曰”，足以证明《楚语》这些话的来源。看简文，知道白公子张是将《说命》做了概述，没有完全依照原文的次第，试以有关语句对比如下：

《楚语上》：“若金，用汝作砺；若津水，用汝作舟；若天旱，用汝作霖雨。启乃心，沃朕心。若药不瞑眩，厥疾不瘳。若跣不视地，厥足用伤。”

简文《说命中》则分别作（依简上先后）：

若金，用惟汝作砺。

启乃心，日沃朕心。若药，如不瞑眩，越疾罔瘳。

若天旱，汝作淫雨。若圉（圉即津字之讹）水，汝作舟。

若詆（抵）不视，用伤。

《楚语上》只是把这几句串在一起了。

《礼记·缁衣》引《兑（说）命》：

惟口起羞，惟甲冑起兵，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

简文《说命中》则作：

𠄎（且）惟口起戎出好，惟干戈作疾，惟衣𦐇（载）病，惟干戈生（𦐇）厥身。

《墨子·尚同中》：“是以先王之书《术令》之道曰：‘唯口出好兴戎。’”孙诒让《墨子间诂》已指出《术令》就是《说命》。简文此处与《墨子》所引更为接近。“好”应读为“羞”，均为幽部字，而且“好”字可写作从“丑”的“𦐇”，见《说文》，或“𦐇”，见《古文四声韵》，“羞”正是从“丑”声的字。

不过，《礼记·缁衣》引用的另一段《说命》佚文，以及同书《文王世子》、《学记》引用的几条《说命》语句，则不见于简文，这大概是传本不同的缘故。

《墨子》称《说命》为“先王之书”，《楚语》也说是武丁“作书”，都认为《说命》传自商代。看简文，《说命》确实记载了武丁对傅说讲说的大量内容，称之为“命”是非常恰当的。

简文《说命上》与中、下两篇体裁有些差异。《说命上》主要是记事，讲述武丁命百工画像，“旬（徇）求𦐇（说）于邑人”，在傅岩找到正在筑城的傅说。武丁命傅说率军征伐𦐇（失）仲，获胜而不行杀戮，称为“赤（赦）𦐇（俘）之戎”，于是任傅说为公。

《说命上》载有失仲的一次关于杀子的卜辞：

避(失)仲卜曰:“我其杀之”,“我其已,勿杀”,勿杀是吉。

“我其杀之”和“我其已,勿杀”是对卜的,结果以“勿杀”为吉,这种卜辞格式与殷墟甲骨卜辞全然相同。特别时用“其已”一词,在殷墟卜辞多见^⑥,值得注意。

《说命中》记传说由傅岩来到商朝的首都殷,“武丁朝于门,内(入)在宗”,以下为武丁对傅说的命辞。

《说命下》第一支简缺失,该篇是否与《说命中》连接,不能完全判定,但看其内容包括武丁的言辞七段,每段都冠以“王曰”,这是《说命中》所没有的,还是应该认为篇文自成起讫。

《说命下》有一段是武丁追述太戊的功绩:

昔在太戊,克渐(训进)五祀,天章之用九德,弗易(训轻)百彗(姓)。惟时太戊盍(谦)曰:“余不克辟万民,余罔桀(坠)天休,弋(式)惟参(三)德赐我,虐(吾)乃尊(敷)之百彗(姓),余惟弗进(雍,意为闭塞)天之段(赍)命。”

按《史记·殷本纪》,商朝太甲之后,国势渐衰,到太戊时复兴,“诸侯归之”,简文武丁的话可与之互相印证。至于“九德”、“三德”,都见于《尚书·皋陶谟》,“三德”又见《洪范》、《吕刑》,也可看出《尚书》各篇间的联系。

这里附带说一下,清华简《说命》的出现,和在《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第一辑中刊出的《尹诰》即《咸有一德》一样,确证了传世《孔传》本为伪书。但要说明的是,这并不表明伪书是毫无价值的。清代程晋芳曾指出:“梅(賾)书虽后起伪作,自是晋人之书,今人于唐宋人文集且宝贵之,况六朝以上乎?其中嘉言正论颇有来历,当与伏书分别观之,未可悉弃也。”他还特别提到孔传本“《说命》三篇有儒家气象”^⑦。对于伪书的形成和传流过程,我们还有深入探讨的必要。

四、《赤鹄之集汤之屋》

《赤鹄之集汤之屋》简长45厘米，共15支，第15支简背写有标题“赤鹄之集汤之屋”。“鹄”字从“咎”声，在见母幽部，读为觉部的“鹄”，韵部对转。

简文说：

曰故（古）有赤鹄（鹄）集于汤之屋，汤殳（射？）之，获（获）之，乃命小臣曰：“脂（旨）殳之，我其享之。”

这是说有一只赤鹄栖落在汤的居处之上，汤将它射获，命小臣即伊尹烹煮作羹。“殳”字就是徐王罍鼎和庚儿鼎的“𩇛”字，应释为“羹”^⑧。

伊尹曾为小臣，汤举之于庖厨之中，是古时流行的传说^⑨。《楚辞·天问》云：“缘鹄饰玉，后帝是飧。”王逸注：“后帝谓殷汤也，言伊尹始仕，因缘烹鹄鸟之羹，修饰玉鼎，以事于汤，汤贤之，遂以为相也。”这种说法与《赤鹄之集汤之屋》有密切的关系^⑩。

自先秦至汉代，有许多涉及伊尹的故事流行，不少见于子书。在《汉书·艺文志》的《诸子略》里，还著录有《伊尹说》27篇，云：“其语浅薄，似依托也。”清代严可均、梁玉绳以为《吕氏春秋》的《本味》即其中的一篇^⑪。《赤鹄之集汤之屋》的性质可说与《伊尹说》类似，但成篇年代要早一些。

简文引人注目的特点，是有浓厚的巫术色彩。如说汤诅咒伊尹，使他“寝于路，视而不能言”，随后伊尹被称作“巫乌”的鸟拯救，并由之知道“夏后”（桀）身患重病，原因是天帝命“二黄蛇与二白兔居后之寝室之栋”，又“命后土为二陵（陵）屯^⑫，共居后之床下”，从而解救了“夏后”的危难。这些可能与楚人好信巫鬼的习俗有关，是在楚地传流的伊尹传说。

五、《殷高宗问于三寿》

《殷高宗问于三寿》简长45厘米，原简共28支，现缺失一支半，标题写于第末支简背。

简文开首说：

高宗观于匭水之上，参（三）寿与从。

“匭”字从“邕”字省，在此读为“洹”。《史记·项羽本纪》有“洹水南殷虚上”，简文高宗武丁在“洹水之上”，所处正是商朝晚期的都邑殷。

寿，《尚书·召诰》疏“谓长命”，这里“三寿”指三位长命的老人，简文称之为“少寿”、“中寿”和最老寿的“彭祖”。通读全篇，主要是武丁和彭祖的问答，其间论说都依托于彭祖，事实上是后人假名于彭祖的一篇论议性质的作品。

“彭祖”之名，最早见于《国语·郑语》，据称上古祝融之后有八姓，即己、董、彭、秃、妘、曹、斟、牟，其中“彭姓：彭祖、豕韦、诸稽，则商灭之矣”，可知彭祖是彭姓的一族。《大戴礼记·帝系》载有颛顼之后重黎、吴回，据《史记·楚世家》都有“祝融”之号。吴回生陆终，娶鬼方氏之妹：

产六子，孕而不粥（育），三年，启其左胁，六人出焉。……其三曰钱，是为彭祖；……其六曰季连，是为牟姓。

由此足见彭祖和楚人的祖先季连有一定的关系。楚简《殷高宗问于三寿》托名彭祖，可能不是偶然的。

在汉代的《列仙传》里，彭祖是长命的神仙，这种形象在简文中已有雏形，彭祖自称“共（降）在九宅”，目见“夏之归商”，他至少从商初活到了武丁的

时代，无怪乎武丁称他为“高文成祖”了。

《殷高宗问于三寿》实质上是一篇表述政治理想与道德范畴的文字。简文假彭祖之口，论说了恙（祥）、义、德、音、諝（仁）、圣、智、利和叡信之行，所说和战国时各家学说对比，很有自己的特色。例如：

衣备（服）悦（美）而好信，巧（巧）志（才）而哀（哀）罪（矜），
血（卹）远而慈（谋）新（亲），惠神而顺（柔）人，寺（是）名曰諝（仁）。

这与儒家强调的“仁”涵义显有不同。

六、《良臣》

《良臣》简长约32.8厘米，共11支，经缀合后并无残缺。简上没有标题，因其内容记述黄帝以至春秋著名君主的良臣，试拟今题。简文通篇连贯书写，中间以粗黑横线分隔成20小段。这20段所记依次是：

黄帝，尧、舜、禹，汤，武丁，文王，武王、成王，晋文公，楚成王，
楚昭王，齐桓公，吴王光，越王句践，秦穆公，宋（襄公），鲁哀公，郑桓
公，郑定公，子产之师，子产之辅，楚共王。

“子产之师”、“子产之辅”两段是“郑定公”段的补充，“楚共王”一段似系后加。总之，黄帝到西周是依时代顺序，春秋时期则系分国编排。

值得注意的是，简文所载唐虞到西周时的良臣，不少与《尚书》有关，但一部分人物的活动时代和传统说法显然不同。

例如简文说：

康（唐即汤）有伊尹（尹），有伊陟，有臣扈（扈）。

按《书序》云：“汤既胜夏，欲迁夏社，不可，作《夏社》、《疑至》、《臣扈》。”孔颖达《正义》以疑至、臣扈为二臣名，据此臣扈为汤臣，合于简文。至于伊陟，系伊尹之子，与臣扈同朝也是可能的。《汉书·古今人表》正以伊陟、臣扈并列，说臣扈“亦汤臣”。然而《尚书·君奭》则云“在太戊，时则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以二人为太戊时臣。太戊是汤的四世孙，伊陟、臣扈如在汤朝中已任重臣，是不可能活到辅佐太戊的。清代梁玉绳作《古今人表考》，提出商代有两个臣扈，用以调停上述矛盾^⑬，但《书序》又讲“伊陟相太戊”，难道那时又有两个伊陟么？

《良臣》简文与《君奭》不合，还不止于此。《君奭》云“在太甲，时则有若保衡”，以保衡为汤孙太甲时臣。《诗·商颂·长发》“实维阿衡，实左右商王”，毛传“阿衡，伊尹也”，《史记·殷本纪》说同，因此前人多以为保衡便是阿衡伊尹^⑭，简文却说：

武丁有攸（傅）貌（说），有保奭（衡）。

认为保衡和傅说一样，是高宗武丁时人，和传统说法全然不同。

更令人惊异的，是简文说：

武王有君奭，有君仲（陈），有君𩇑（牙），有周公旦，有邵（召）公，遂佐成王。

君奭在《君奭》篇中又称保奭，应即任太保的召公奭，历代学者没有异说。简文前举君奭，后面又说召公，可能是为了表明周公、召公并佐成王的缘故。

《尚书》本有《君陈》、《君牙》两篇，《君陈》佚文见《礼记·坊记》、《缙衣》，《君牙》佚文也见于《缙衣》。郭店简、上博简的《缙衣》便有这样的佚文。《书序》：“周公既没，命君陈分正东郊成周，作《君陈》。”《坊记》郑玄注和《檀弓》疏引郑玄《诗谱》说君陈为周公子、伯禽弟，同成王是一样辈分。至于君牙，《书序》“穆王命君牙为周大司徒，作《君牙》”，距离武王时更远。《良臣》把他们列于武王之世，当另有所本。

至于春秋时期的人物，简文所举就与传世文献没有多少差异，只是如上所说，为了突出子产，特别列举了“子产之师”和“子产之辅”，猜想简文的作者有可能源出郑国，甚至和子产有某种特殊的关系。

补记：《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叁）出版时，内容略有调整。

注释

- ①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中西书局，2010年；（贰），中西书局，2011年。
- ② 参看屈万里：《尚书集释》，第190页，（台）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
- ③ “师”在此为虚词，与传世本《敬之》对照，即读为“思”。
- ④ 姚小鸥：《诗经三颂与先秦礼乐文化》，第47页，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
- ⑤ 李学勤：《中国古代文明研究》，第120—122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又：《文物中的古文明》，第199—202、299—302页，商务印书馆，2008年。
- ⑥ 同⑤前书，第16—20页。
- ⑦ 程晋芳：《勉行堂诗文集》，第738页，黄山书社，2012年。
- ⑧ 杨树达：《积微居金文说》，第126页，中华书局，1997年。
- ⑨ 参看韩江苏、江林昌：《〈殷本纪〉订补与商史人物征》，第182—18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
- ⑩ 这一点是刘国忠教授发现的。
- ⑪ 《二十五史艺文经籍志考补萃编》第三卷，姚振宗《汉书艺文志条理》，第298页，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年。
- ⑫ 陵屯，词见《庄子·至乐》，《释文》训“屯”为“阜也”，陵屯意即陵阜。《列子·天瑞》张湛注云“陵屯，高洁处也”，则未必是。这一点是邢文教授指出的。
- ⑬ 《史记汉书诸表订补十种》下，梁玉绳《人表考》，第574页，中华书局，1982年。
- ⑭ 同②，第205页。

（原载《文物》2012年第8期）

由清华简《系年》论《文侯之命》

《文侯之命》在汉初伏生所传《尚书》二十八篇之中，其撰作时代从来有两说：一说始于《书序》，云“（周）平王锡晋文侯秬鬯圭瓚，作《文侯之命》”；另一说本自《史记·晋世家》，将该篇置于晋文公时。历代学者各持一说，有不少争论。现代注释《尚书》的著作，通行的如杨筠如《尚书覈诂》^①、屈万里《尚书集释》^②，以及近期间世的顾颉刚、刘起钎《尚书校释译论》^③，就这个问题都有较详细的讨论，一致认为应从《书序》之说。定《文侯之命》在晋文侯时，可以视为学术界的共识。

在《尚书》的《周书》各篇之间，《文侯之命》内容单纯，也较为简短。其所以与那些典重的篇章一起被选入《尚书》，应该是由篇文记述了平王东迁，和《春秋》托始于鲁隐公时一样，标识了王朝衰微、诸侯力政局势的肇端^④。因此我们研究《文侯之命》，不能只限于认定其系平王、文侯时书，还有必要进一步推求其确切年代，才能深入了解其历史背景和本身意义。

对于《文侯之命》年代做出具体判断的现代学者，有上面已经提到的屈万里先生。他曾有《尚书文侯之命著成的时代》一文，收入其《书儒论学集》。文章的要点点见于《尚书集释》，他说：

齐召南《尚书注疏考证》谓本篇作于平王元年。今按：昭公二十六年《左传》“携王奸命，诸侯替之而建王嗣”句下，《正义》引汲冢书《纪年》云：“平王奔西申，而立伯盘以为天子，与幽王俱死于戏。先是，申侯、鲁侯及许文公立平王于申，以本天子，故称天王。幽王既死，而虢公翰又立王子余臣于携，周二王并立。二十一年，携王为晋文公所杀，以本非適，故称携王。”伯盘即伯服，《日知录》卷二有说。“晋文公”之“公”当作

“侯”。二十一年为晋文侯二十一年，即周平王十一年，然则本篇盖作于携王被杀，平王既定于东都之时，其时当为平王十一年也。^⑤

其所说周平王十一年，为公元前760年。

把《纪年》所言“二十一年”当作晋文侯二十一年的说法，估计是来自王国维的《古本竹书纪年辑校》，也是《纪年》研究者很普遍的意见，然而在清华简《系年》发现以后，却被证明是不对的。

现已收于《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第二辑的《系年》^⑥，是战国中期楚人著作的一部史书，内容包括自周初到战国早年的事迹。其第二章云（尽量用通行字体）：

周幽王娶妻于西申，生平王。王或娶褒人之女，是褒姒，生伯盘。褒姒嬖于王。王与伯盘逐平王，平王走西申。幽王起师，围平王于西申，申人弗畀，缁人乃降西戎，以攻幽王，幽王及伯盘乃灭，周乃亡。邦君诸正乃立幽王之弟余臣于虢，是瞀（携）惠王。立廿又一年，晋文侯仇乃杀惠王于虢。

《系年》这段关于两周之际历史的记述十分重要，许多地方可以与前面提到的古本《纪年》合观，补充和订正一些问题的看法。

首先是明确了幽王之后、平王之母来自西申，不是在今河南南阳的申国。南阳的申封于宣王时，其公室可能与西申有一定关系，为与西申区别，其青铜器铭文有时自称为南申^⑦。西申在今陕西北部，位于防御西戎的前沿，缁人也应该是受王朝派遣，在这一带设防的。

平王即当时本为太子的宜臼，遭到迫害被废以后，便逃往母家西申。幽王出兵，围攻西申，申人抵抗，不肯交出宜臼，于是与之联合的缁人为西戎打开大门，导致王朝的覆亡。

《纪年》说幽王、伯盘“俱死于戏。先是，申侯、鲁侯及许文公立平王于申”，这里“先是”一词特别需要注意。看来在幽王仍在的时候，申侯已经联络

鲁侯（据《史记》年表应为鲁孝公）和许文公，把逃来的宜臼推立为王了，这或许正是幽王、伯盘出兵伐申的原因。这次宜臼之立并未得到各方面的承认，以致楚人所撰《系年》不言此事。

《纪年》讲虢公翰立王子余臣于携，《系年》则说“邦君诸正立余臣于虢”，措辞不同，指的应系一事。幽王时执政大臣是虢石父，《吕氏春秋·当染》称他作“虢公鼓”，虢公翰当为其下一代的虢君，仍为朝臣的领袖。由此不难推想，拥立余臣的是原来幽王朝中的一班人。携这个地名难于考定，清雷学淇《竹书纪年义证》引《新唐书》、《大衍历议》说“丰、岐、骊、携皆鹑首之分、雍州之地”，也不能进一步查考。从《系年》称立于虢看，携当系虢国境内的邑名。

在此还要指出，当时的虢肯定已经不是在今陕西宝鸡的西虢。而是迁到了今河南三门峡（旧陕县），否则晋文侯就不可能到虢国把余臣杀掉了。

读《系年》简文，于立携王后说“立廿又一年，晋文侯仇乃杀惠王于虢”。这个二十一年无疑是携王的二十一年，相当晋文侯三十一年，公元前750年。

晋文侯并不在申侯等推戴宜臼的诸侯之中，他拥立平王的过程，《系年》的记载是这样的：

周亡王九年，邦君诸侯焉始不朝于周，晋文侯乃逆平王于少鄂，立之于京师。三年，乃东徙，止于成周。

所谓“周亡王九年”，当然不能由携王被杀算起，因为那样就超过了晋文侯在位的下限。“九年”是从幽王之死计算，相当晋文侯十九年，公元前762年。文侯逆平王于少鄂，少鄂不知所在，或疑即晋地鄂，在今山西乡宁，地近黄河，是有可能的。平王自西北方来，路途必多险阻，我很怀疑《史记·秦本纪》所说秦“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平王封襄公为诸侯，赐之岐以西之地”，就发生在此时。

平王在晋文侯支持下立于京师，京师是指宗周，但是宗周近戎，同时经过戎人洗劫又已废坏，平王不得不向东迁徙到成周，这时为晋文侯二十二年，公元前759年。再过九年，文侯杀了携王，平王的王位终于得到巩固。这就是《国语·郑语》所云晋文侯定天子。

晋文侯这一事迹，也见于宋代著录的晋姜鼎（《殷周金文集成》2826）。晋姜鼎是文侯夫人晋姜在文侯去世后所作，铭文说到文侯“虔不坠，谿覃京师，臂（义）我万民”，于省吾先生解释说：“谿即鲁，通旅，谓休美也。《尔雅》：‘覃，延也。’言休美延及京师。”^⑧这里“京师”一词暗指周王，休美及于京师，使万民得以义安，说的正是定天子之事。

这样，我们便可以回到《文侯之命》的年代问题上来。

篇文说：“呜呼，闵予小子嗣，造天丕愆，殄资泽于下民，侵戎我国家纯。”又云：“曰惟祖惟父，其伊恤朕躬。呜呼，有绩，予一人永绥在位”，是王位已定的口气，足知其时必在携王已死，二王并立的局面结束以后，平王才有可能重赐晋文侯，命他归还晋国。换句话说，这一定晚于文侯三十一年。那时文侯已到晚年，他卒于其三十五年即公元前746年。也许正是由于年岁的缘故，平王遣送他出朝返国。

还要提到，与晋文侯一起迎立平王的，还有郑武公。《毛诗正义》引郑玄《诗谱》的《王城谱》云：“晋文侯、郑武公迎宜咎于申而立之，是为平王。以乱故，徙居东都上（王字之误）城。”也就是《左传》隐公六年周桓公对平王之孙桓王所讲“我周之东迁，晋、郑焉依。”《系年》虽然没有详说这一点，然而述及事件的结果是“晋人焉始启于京师，郑武公亦政（通正，训为长）东方之诸侯”，这便把当时的大势讲明白了。

附记：《系年》简发表后，已有不少学者就其第二章所见“廿又一年”进行了深入讨论，提出了种种见解，非常值得感谢。我以为该处简文云：“……邦君诸正乃立幽王之弟余臣于虢，是携惠王。立廿又一年，晋文侯仇乃杀惠王于虢。”以全篇纪年文例比勘，“立廿又一年”只能是携王的二十一年。如第六章云：“（晋）惠公既入，乃倍秦公弗予。立六年，秦公率师与惠公战于韩。”“立六年”也只能是晋惠公的六年。

至于简文于携王死后另说“周亡王九年，邦君诸侯焉始不朝于周”，或提出在“亡”字下断读，这恐难成立，因为上面于幽王、伯

盘死后已说了“周乃亡”，与此处呼应，不会再讲“周亡”了。“周亡王九年”还应是“周无王九年”，这是由于宜臼在申，余臣在虢，都不在王都，也都未能得到普遍承认。周之无王，还是只可由幽王之灭算起。

注释

- ① 杨筠如：《尚书覈诂》，第467页，陕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
- ② 屈万里：《尚书集释》，第262—263页，（台）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3年。
- ③ 顾颉刚、刘起钎：《尚书校释译论》，第2128—2136页，中华书局，2005年。
- ④ 参看同③，第2134—2136页。
- ⑤ 同②，第263页，标点略予调整。
- ⑥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贰），中西书局，2011年。
- ⑦ 李学勤：《论仲禹父簋与申国》，《中原文物》1984年第4期。又：《膳夫山鼎与厉王在位年数》，《中华文史论丛》2011年第4期。
- ⑧ 于省吾：《双剑谿吉金文选》，第149—150页，中华书局，2009年。

[原载《扬州大学学报》（人社版）2013年第2期；《新华文摘》2013年第11期]

论清华简《说命》中的卜辞

清华大学2008年秋季入藏的约2500枚战国竹简的整理研究工作，正在继续顺利进行。其整理报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的第三辑即将出版，内容有竹简六种八篇，我已有《新整理清华简六种概述》一文，做了简要的介绍^①。在这里我只想就六种里的《说命》，谈一个大家可能有兴趣的问题。

《说命》属于《尚书》，清华简的《说命》，和《书序》所描写的一样，共有三篇，原简都题作《傅说之命》，我们整理时分别题之为《说命上》、《说命中》、《说命下》。篇文与传世的孔传本《说命》根本不同，乃是古文《尚书》真本，这些我在那篇《概述》中已说明了。

《说命上》简文是纪事的，篇内讲到商王武丁命傅说领军征伐豷（失）仲的经过。据载失仲曾占卜是不是要杀掉他自己的两个儿子，原文是：

失仲卜曰：“我其杀之”，“我其已，勿杀”，勿杀是吉。^②

在《概述》里我已经指出，这一占卜的格式与殷墟卜辞是一致的，但限于篇幅，没有详细分说，因此在下面再做一些讨论。

首先大家容易看到，简文叙述的失仲的卜辞实际是一正一反两条命辞。正的命辞是“我其杀之”，即失仲将杀死儿子；反的命辞是“我其已，勿杀”，即失仲不去杀死儿子，这样正反相对贞问的卜辞格式，是了解殷墟甲骨的人都非常熟悉的，如东北师范大学的马如森先生说：

在殷墟卜辞中，尤其是一期卜辞，常常会看到，在一块骨版上刻有两条卜辞，以正反贞问，左右成对，故又称“左右对贞”的方式，来卜问一件事情。^③

此处所说“一期卜辞”，用现在更通行的说法，便是“宾组卜辞”，主要是武丁时期的，正反命辞对贞的规律，确实在这组卜辞表现得最为突出和明显。

我们要强调说明，正反对贞这种格式或规律，是在殷墟甲骨出土以后，经过学者反复研究才能得出的。从其他材料了解的古代占卜，并没有告诉我们这一点。由此看来，清华简《说命上》记录的失仲卜辞应该有所本。

事情还不止如此，失仲卜辞反的命辞开头说“我其已”，这也是和殷墟卜辞相像的。过去我写过一篇小文《释“改”》^④，涉及殷墟卜辞以及西周甲骨的这种文例。文中我曾举出宾组卜辞有“已”或“勿已”、“毋已”等语，例如：

贞，已，亦不以艰。（《合集》12898）

贞，勿已，臣旱……（《合集》4091）

癸酉卜王贞，余勿已，我畲亩……用。（《合集》15496）

……𪔐，毋已，于𪔐。一月。（《合集》7002）

及至历组、无名组和何组卜辞，则规范化作“勿已”、“弼已”，其例甚多，如《合集》30757何组卜辞有：

癸卯卜狄贞，其祝。

癸卯卜狄贞，弼已，祝。

同版还有：

甲子卜狄贞，王异其田，亡灾。

甲子卜狄贞，王勿已田。

到了商末的黄组卜辞，则写作“弼改”，如《合集》36418：

弼改，其惟小臣临命，王弗悔。

“改”字从“己”声，所以“弼改”也就是“弼己”。西周甲骨卜辞更是多见“己”或“弼己”，我在《释“改”》文中列举了不少实例。

回想我那篇小文，当时是倾向于把卜辞中的“己”都读为“改”^⑤，而“改”训为变更。现在看清华简“我其己，勿杀”一句，“己”字还是应该如字读，训为止，而“改”反应读为“己”，我以往的想法应予纠正。

失仲占卜的结果，据简文讲是“勿杀是吉”，这也是同殷墟卜辞符合的。比如在宾组卜辞，每贞问一条命辞，例应做出判断——吉还是不吉，常见在命辞后面标出“王占曰吉”，也是众所周知的。简文说“勿杀是吉”，可知失仲所占是杀不吉，勿杀则吉。

由以上论证可以看出，被列为《商书》的《说命》真正是包含着商代以下很难拟作的内涵。它和传世的《盘庚》等篇的价值，应该可以相提并论。

注释

- ① 李学勤：《新整理清华简六种概述》、《文物》2012年第8期，该文述及的《殷高宗问于三寿》一种将改由《祝辞》代替。
- ② 同①引文。
- ③ 马如森：《殷墟甲骨学》，第139页，上海大学出版社，2007年。
- ④ 李学勤：《释“改”》，《石璋如院士百岁祝寿论文集》，（台）南天书局，2002年。后收入《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
- ⑤ 同④。该文曾论及河北邢台南小汪出土的一片西周卜骨，近见《文物》2012年第1期《河北邢台南小汪周代遗址发掘简报》图二八有该骨更好摹本，可知其“𠄎曰：己”一辞是与右方一辞分开的，我过去连读是不对的，附志于此。

（原载《华夏文化论坛》第8辑，2012年12月）

论清华简《周公之琴舞》“寔天之不易”

即将在《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第三辑中发表的《周公之琴舞》，是一组非常珍贵的周初乐诗，最近我已于小文《新整理清华简六种概述》里简要介绍过了^①。《周公之琴舞》性质类同《诗经》的《周颂》，结构则近似《礼记·乐记》描述的《大武》乐章。全诗现有十篇，其开首云“周公作多士傲毖琴舞九卒”，其下系诗一篇；接着说“成王作傲毖琴舞九卒”，其下有诗九篇。粗看起来，似乎前者缺失了八篇，但如仔细析读，不难看出后者九篇不都是成王所作，有些是王的口气，有些则是周公和多士即众臣的口气。猜想这组乐诗在传流中间曾经调整改编，才成为现在所见的面貌。

要详细论证《周公之琴舞》各篇哪些是周公众臣口气，哪些是成王口气，是相当复杂的事情，本文只想以全诗第七篇，也就是所云“成王作”的第六篇为例，说明该篇文句具有君王口气的特点，且与若干金文相同。有关文字考释大都以《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第三辑的注释为基础，不再逐一说明。

《周公之琴舞》每篇诗的前部称“启”，各冠以“元入启”、“再启”以至“九启”，后部则皆称为“乱”^②。我们想讨论的一篇是这样的：

六启曰：其余冲人，服在清庙。惟克小心，命不夷筭（歇），寔天之不易。乱曰：弼（弗）敢荒在位，龚（恭）畏在上，敬显在下。……

比较容易解说的，是诗开头“其余冲人，服在清庙”两句。“余冲人”见于《尚书》的《盘庚》、《金縢》、《大诰》，是君王自己的谦称，只是写作“予冲人”而已。《金縢》和《大诰》的“予冲人”，正是成王所说。在《大诰》里成王还自称“我幼冲人”，在《洛诰》又称“予冲子”，与《召诰》、《洛诰》、《君奭》中

周公口中的“冲子”、“我冲子”一样，也均指成王而言。

“服在清庙”意思是在清庙主祀。“清庙”一词见《周颂·清庙》及序，郑玄笺以为文王之庙。主持祭祀文王，正是成王的身份。

费解的是“命不夷歇，寔天之不易”等句，其关键在于“寔”字的解释。这个字常见于西周及春秋金文，我认为四版《金文编》关于它已经有恰当的意见。该书引楚簠“寔”字，读之为“对”^③。按楚簠1978年出土于陕西武功任北村，铭文见《殷周金文集成》4247、4248，其后半云：

……楚敢拜手稽首，寔扬天子丕显休，用作罍簠，其子子孙孙万年永宝用。

显然“寔扬”应读为“对扬”。这是因为“寔”是端母质部字，“对”是端母物部，声同韵亦相近，故可通假。我在此处补充的是，不仅楚簠，许多金文中的“寔”字，以及《周公之琴舞》的“寔”字，也都应读作“对”。

这里说的“对”是什么意思呢？《诗·皇矣》云：“帝作邦作对，自大伯王季。”“对”字毛传训为“配也”，郑笺：“作，为也。天为邦，谓兴周国也。作配，谓为生明君也。”孔疏：“生明君，谓生文王也。国当以君治之，故言作配。”原来当时的观念，王朝的成立由于天命，这是“作邦”；这样的天命必须有君王当之，这是“作对”，亦即作配。

《周公之琴舞》诗句中的“命不夷歇，寔天之不易”，正包含着这样的内容。所谓“天之不易”，对照《尚书·大诰》“尔亦不知天命不易”和《君奭》“不知天命不易”，正是与上句的“命”即“天命”相应，所“寔”即“对”的就是天命，同《皇矣》的思想是相一致的。

据此也便可以理解，诗下面说的“弗敢荒在位，恭畏在上，敬显在下”，是讲在位的君王必须“恭畏”在上的天帝之命，而在下加以“敬显”。强调这种统治者观念的诗句，恰符合成王的口气。

读懂了《周公之琴舞》这篇诗句，我们就能对金文中出现的类似文字有更深入的理解。

首先可以提到五祀𡵓钟和𡵓簋。五祀𡵓钟1982年出土于周原扶风白家村，铭文见《集成》358；𡵓簋1978年出土于扶风齐村，铭文见《集成》4317。两器器主为一人，名𡵓，学者都依据唐兰先生对旧出𡵓钟（宗周钟）的研究^④，认为即厉王胡^⑤。它们是迄今罕见的周王自作器物。

五祀𡵓钟铭文云：

……余小子肇嗣先王，配上下，作厥王大宝，用喜侃前文人，前文人融厚多福，用申𡵓（固）先王受皇天大鲁命^⑥。……𡵓其万年永骏尹四方，保大命，作寔在下。……

和《周公之琴舞》一样，厉王所“寔”即“对”的乃是天命，而“在下”是相对在上的天与前文人而言。

𡵓簋铭文：

……𡵓作蕤彝宝簋，用康惠朕皇文烈祖考。其格前文人，其灋在帝廷陟降。申𡵓皇[天]大鲁命，用𡵓（令）保我家、朕位、𡵓身，……用𡵓寿𡵓永命，骏在位，作寔在下。……

词语也是相类似的。所体现的观念和《周公之琴舞》可谓一脉相承，都是君王的口气。

只是到周室东迁以后，少数势力强盛的诸侯的金文竟也出现了这一类语句。例如东周初的晋姜鼎（《集成》3165）系晋文侯夫人所作，铭文有“作寔为极”之句。到春秋中期的秦公簋（《集成》4315）铭文说：

……严恭寅天命，保业厥秦，𡵓事蛮夏，……骏寔在（训为于）天^⑦，高引有庆，寔圉（肇域）四方。

就同西周君王的口吻没有什么区别了。

这里可以附带提到，西周晚期井人妥钟（《集成》109—112）铭中有“寔处宗室”，“寔”也读为“对”，但为“对”宗室所祭祀的器主的“文祖皇考”，与上述各例上“对”天命有别，不必详论。

注释

- ① 李学勤：《新整理清华简六种概述》，《文物》2002年第8期。
- ② 参看顾颉刚：《“师挚之始，关雎之乱”》，《史林杂识初编》，中华书局，1963年。
- ③ 容庚：《金文编》，第272页，中华书局，1985年。
- ④ 唐兰：《周王猷钟考》，《唐兰先生金文论集》，紫禁城出版社，1995年。
- ⑤ 不同意见有李朝远：《“猷簋为厉王之器”说献疑》，《五祀猷钟新读》，《青铜器学步集》，文物出版社，2007年。
- ⑥ “圉”读为“固”，参看李学勤：《枣庄徐楼村宋公鼎与费国》，《史学月刊》2012年第1期。
- ⑦ 秦公钟、铸作“骏寔在立（位）”，或以“天”为“立”字之误。

（原载《出土文献研究》第11辑，2012年12月）

论清华简《周公之琴舞》的结构

清华简《周公之琴舞》共简17支，只有个别缺损，图版及释文已在整理报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第三辑发表^①，《周公之琴舞》是由十篇诗组成的乐诗，性质同于传世《诗经》的《周颂》，有非常重要的研究价值，我在小文《新整理清华简六种概述》中已经做了简括的介绍^②。本文想就这一组诗的构成问题，提出推想性的意见。

在《周公之琴舞》前部，有两段类似于《诗序》的话。开头的一段是：

周公作多士傲毖琴舞九终。

随后又有一段是：

成王作傲毖琴舞九终。

这说明了乐诗的作者和篇数。“终”读为“遂”或“卒”，“九终”也就是九成、九终，意即九篇。值得注意的是简文并没有两个九篇，在“成王作”之下确有诗九篇，分别冠以“元内（入）启曰”、“再启曰”、“三启曰”以至“九启曰”，然而在“周公作”之下只有冠以“元内（入）启曰”的诗一篇。

在上面提到的小文里，我已经指出，这种现象不能简单地解释为“周公作”的诗缺失了八篇，而“成王作”的诗完好无损。通过仔细绎读，可知现有的十篇诗前后呼应，“周公作”之下的一篇固然是周公傲毖多士的口吻，并且适于作为全诗的领首，但在“成王作”之下的九篇，却有一些不可能出自成王。

让我们来看，“周公作”之下的一篇很短，只有四句：

无悔享君，罔坠其孝，享惟悃币（虚词，读为思），孝惟型币。

“享”字训为献。西周初年金文克罍、克盃（《近出殷周金文集录》987、942）云：“惟乃明乃心，享于乃辟”，是说以全心献于君王，可知这里讲的“享”涵义类于晚出的“忠”。诗句说的是忠于君，孝于亲，正是对朝臣多士而言，可信为周公所作。

“成王作”之下的第一篇“元内（入）启曰”，是这组诗中惟一留存于传世《诗经·周颂》的，今名《敬之》，但与今本文句有若干差异。《诗序》说《敬之》是“群臣进戒嗣王也”，不过该诗今本有“维予小子，不聪敬止”和“示我显德行”，简文相当文句作“通我夙夜，不逸敬之”、“示告余显德之行”，容易看出是成王自称，不是臣下进戒的话。

“成王作”之下的“再启”则与“元入启”不同。诗一开始便说：“假（训为嘉）哉古之人，夫（意为人人）明思慎，用仇其有辟，允丕承丕显。”这是举前代良臣为例，说他们都能善于“仇其有辟”即辅助君主，这自然是针对朝臣多士的，不会是成王敬愍自己。

“三启”前面有：“德元惟何，曰渊亦抑，严余不懈，业业畏忌。”“余”和“元入启”一样，是王的自称代词。“三启”后面还说“欲其文人，不逸监余”，“余”也是成王自称，“文人”即西周金文常见的“前文人”，指的是先公先王。

“四启”诗中说：“文文（亶亶）其有家^③，保监其有后，孺子王矣。”按《尚书·立政》有：

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

又有：

呜呼，孺子王矣。继自今，我其立政立事。

孺子王矣。继自今，文子文孙，其勿误于庶狱庶慎，惟正是义之。

“嗣天子王矣”、“孺子王矣”都是周公说成王嗣位之辞。简文“四启”的情形完

全相同，无疑是“周公作”的一篇。再看“四启”下面讲到“显于上下”，“上下”即指天地，又说“昼之在视日，夜之在视辰，日入罪举不宁”，也只有天子身份足以当之。

以上“成王作”以下的“元入启”到“四启”，“元入启”、“三启”为成王口吻，“再启”、“四启”是周公口吻，乃是君臣相间。至于“五启”以后则不一样，可以辨出，“五启”、“六启”和“七启”三篇诗都是成王的口气。

“五启”诗中有“诸（训为凡）尔多子”之句。“多子”词见殷墟卜辞，也见于《尚书·洛诰》和《逸周书·商誓》，意指朝臣及诸侯^④，在这里是成王对他们的称呼，他要求“多子”“恒称其有若，曰享答余一人”，“余一人”乃成王自称，表明了天子的地位。

与“五启”的“余一人”相似，“六启”的“余冲人”也只能是成王自称。诗云：“其余冲人，服在清庙”，“清庙”见《周颂·清庙》，郑玄笺言为祭文王之庙。“服在清庙”者当然是嗣位的成王。

与“五启”的“诸尔多子”相类，“七启”有“咨尔多子”之句。诗内“余遂思念，畏天之载”等句，也符合成王的自我儆戒。

“八启”的语气又有改换。其诗开端便说：“佐事王聪明，其有心不易”，辅佐事奉君王，矢志不渝，是对臣下的要求，显系戒毖多士之辞。

最后的“九启”以“呜呼，弼（弗）敢荒德”起始，最后归结到：“迺我敬之，弗其坠哉。思丰其复，惟福思庸，黄耆惟盈。”是说大家要始终儆戒，持满保盈，直到终老，应该是周公戒毖多士之辞的终了。

综上所述，《周公之琴舞》全诗十篇，如以内容实际来说，以君臣口吻划分，是这样的结构：

所谓“周公作”	元入启	臣
所谓“成王作”	元入启	君
	再启	臣
	三启	君
	四启	臣
	五启	君

六启 君

七启 君

八启 臣

九启 臣

其分布很有规律，显然是有意编排的结果。

在此不妨试做一大胆的推想。《周公之乐舞》原诗实有十八篇，由于长期流传有所缺失，同时出于实际演奏吟诵的需要，经过组织编排，成了现在我们见到的结构。虽然我们只能读到诗文部分，《周公之乐舞》本来一定是在固定的场合，例如新王嗣位的典礼上演出的。如我在《新整理清华简六种概述》中所说，其性质可与《大武》乐章相比，对探索古代诗、乐极有意义。

注释

- ①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叁），中西书局，2012年。
- ② 李学勤：《新整理清华简六种概述》，《文物》2012年第8期。
- ③ 香港浸会大学陈致教授释“文文”为《诗·大雅·文王》的“亶亶”。
- ④ 参看李学勤：《释多君、多子》，《甲骨文与殷商史》第一辑，1983年。

（原载《深圳大学学报》2013年第1期）

清华简《筮法》与数字卦问题

1978年冬，张政烺先生在吉林大学古文字学术讨论会上发表了题为《古代筮法与文王演周易》的讲话^①，其中论及的所谓数字卦问题，在学术界热烈讨论已有三十多年。近期有一些论作，对数字卦问题的若干基本概念做了比较深入的检讨，就如何认识数字卦从方法论角度进行反思^②。这无疑是非常有益的，但是由于所依据的材料限制，仍不能对数字卦做出正面的系统破解。

目前正在整理的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中，有一篇占筮方面的专书，我们试题之为《筮法》。简文详细记述了占筮的理论和方法，并且列举了许多数字卦作为占例。这些数字卦的结构，与天星观简、包山简、葛陵简等楚简所载实占的数字卦，形式基本一致。因此，《筮法》的出现，可能为数字卦的研究打开新的局面，也将给易学的进展带来新的契机。

《筮法》简保存良好，没有明显缺损。入藏时，简册的前半部分已经分离散乱，后面部分仍保留原来成卷的状态。简长35厘米，共63支，每支简尾正面有次序编号，所以在简的编排上没有疑难。简上的文字是分栏书写的，还插有图形，整篇看来很像是一幅帛书。整理时按照文字的内容、位置和行款，暂分之为30节。

简文有一段韵语说：

各当其卦，乃力（扌）占之，占之必力（扌），卦乃不忒（忒）。

“扌”是用蓍草占筮过程中的一种程序。《周易·系辞上》云：“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为二以象两，挂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时，归奇于扌

以象闰。五岁再闰，故再扚而后挂”，是学易占的人都熟悉的。《说文》即释“扚”字为“易筮再扚而后卦（挂）”。《筮法》的具体占筮程序容或与《系辞》不同，但其间有“扚”，可知一定是用蓍草的占法。

《筮法》将所占问的事项分为十七类，称作“十七命”：

凡十七命：曰果，曰至，曰享，曰死生，曰得，曰见，曰瘳，曰咎，
曰男女，曰雨，曰取妻，曰战，曰成，曰行，曰饑（售），曰旱，曰祟。

这可与《周礼·大卜》对比。《大卜》云：“以邦事作龟之八命：一曰征，二曰象，三曰与，四曰谋，五曰果，六曰至，七曰雨，八曰瘳。以八命者赞三兆、三易、三梦之占。”“八命”用于龟卜，也通用于占筮，《筮法》的“十七命”不少与“八命”同名，可能即自其扩充发展而来。

“十七命”在简文中都有对应的专节，只是次第和上引有异，同时把“雨”、“旱”合作一节，另加“夔（弁）”一节，合起来仍为“十七命”。

简文“十七命”各节都列出数字卦作为占例，所有的数字卦，都是并行的两组六画卦，也可看做四个三画卦。例如“死生”一节，有两个数字卦的占例，一个是：



又一个：



然而完全不出现六画卦即别卦的卦名，也不用任何卦爻辞，正与天星观等楚简

所见一样。

三画卦即经卦的卦名，在《筮法》简文中多见。艮、巽、兑与震（一部分）是楚文字相应写法，没有特异之处。乾，《说文》从乙乾声，简文只作“𦰩”，是假借字。离，简文作“罗”，同于马王堆帛书《周易》，也系通假。坤，简文作“𡙇”，是《归藏》特有的写法^③，也见于碧落碑及《汗简》，推测都是来自《归藏》。坎，作“𡙇”，即“劳”字，同于王家台秦简《归藏》，辑本《归藏》作“𡙇”^④，《周易·说卦》第五章称坎“劳卦也”。从这些，已可看出《筮法》经卦卦名近于《归藏》。

《筮法》卦名近于《归藏》，还表现在其震卦有时作“𡙇（来）”。按辑本《归藏》震卦作“𡙇”，与“来”均为来母之部字。简文以震为来，和坤、坎的异作同样，是与《归藏》有关的明证。

在《筮法》简里，还发现了一幅把八经卦分配于八方的卦位图，乃是迄今所见最早的卦位图。读《周易》的读者都熟悉，《说卦》第五章叙说卦位，如依汉以前图例，以南方为上，就可绘出这样的卦位图：

	离	
巽		坤
震		兑
艮	坎	乾

用宋以下易学的话讲，这便是后天卦位。《筮法》的卦位图，方向是明确的，在其最外周中间标有：

东方也，木也，青色。
 南方也，火也，赤色。
 西方也，金也，白色。
 北方也，水也，黑色。

最外周角隅上则记出四正卦：

奚故谓之震？司雷，是故谓之震。

奚故谓之劳？司树，是故谓之劳。

奚故谓之兑？司收，是故谓之兑。

奚故谓之罗？司藏，是故谓之罗。

这有着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意味。再看该图次外圈的八卦，对比依《说卦》画的卦位，劳（坎）罗（离）两卦的位置背反。

我最初看到这幅卦位图，猜测是把数字卦这两者画错了。后来细绎简文全篇，才知道许多地方都同卦位图息息相关，图上的卦位并无误绘之处。例如论四季八卦所应吉凶的一节，现用表的方式表示是：

	大吉	小吉	大凶	小凶
春	来 巽	劳	艮 罗	兑
夏	劳	来 巽	兑	艮 罗
秋	兑	艮 罗	劳	来 巽
冬	艮 罗	兑	来 巽	劳

很明显，劳（坎）对应南方的夏，罗（离）对应北方的冬。

在卦位图的中央，又套绘了一幅人形的图象，人体的不同部位标示有经卦，这是所谓“近取诸身”，现试称为人身图。查《说卦》第九章说：“乾为首，坤为腹，震为足，巽为股，坎为耳，离为目，艮为手，兑为口。”和人身图比较，七卦都彼此相合，惟有离卦不在目而在腹下，差异又出在离卦，不知与卦位图的特点间有没有联系？

让我们再回到数字卦这个概念本身上来。

前些年，我曾一度猜想楚简所谓数字卦其实都只是卦画^⑤，如今见到《筮法》，知道想法是错误的。简文中有“爻象”一节，附十二支与数字爻的对应表：

子	午	九
丑	未	八
寅	申	一
卯	酉	六
辰	戌	五
巳	亥	四

表中“九”、“八”等都是爻，写法也同于数字卦（如“六”作 $\wedge$ ，“五”作 $\times$ ），由此确证数字卦是以数字构成的卦。

从简文卦的结构看，一是阳爻，六是阴爻，都是多见的常态；而同样相当阳爻的五、九，相当阴爻的四、八，则比较少见。简文专述了后者的爻象：

八为风，为水，为言，为飞鸟，为肿胀，为鱼……

五象为天，为日，为贵人，为兵，为血，为车，为方，为忧、惧，为饥。

九象为大兽，为木，为备戒，为首，为足，为蛇，为曲，为玦，为弓、琥、璜。

四之象为地，为圆，为鼓，为珥，为环，为踵，为雪，为露，为霰。

这在文例上很像《说卦》的第十一章，不过《说卦》讲的是卦象，这里却是爻象。

上引简文以八、五、九、四为序，或许还有深意。看现已发现的楚简实占的数字卦，除常见的一、六外，八较多，五次之，九更少，四则尚未见到，这或者不是偶然的。

关于五、九是阳爻，四、八是阴爻，《筮法》简文有一系列实例。这里试从“得”节中择引一例：



其解说云：

叁男同女，乃得。

按《说卦》第十章称：“乾，天也，故称乎父；坤，地也，故称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谓之长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谓之长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谓之中男；离再索而得女，故谓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谓之少男；兑三索而得女，故谓之少女。”这被称作乾坤六子之说。上引数字卦用简文卦名转写。即是：

震劳

巽震

劳（坎）是中男，两震是长男，巽是长女，故云“三男同女”。乾坤六子说在简文中的运用，此外还有不少例子。

由“得”节“三男同女”这个占例，又可知道，其左下巽卦的第三爻九确是作为阳爻的，这只是类似情形的一例。五、九和一同样是阳爻，四、八和六同样是阴爻，在若干占例中得到证实。

从这一类占例还可说明，这种数字卦与《左传》、《国语》所记占筮的“卦变”现象其实并不相干。这里没有本卦、之卦的区别，反而是将两组四个三画卦即经卦综合起来考察。简文把这四个经卦称为“四位”，是过去我们完全不了解的。

在以上的讨论中，大家肯定会发现，《筮法》写传世的《说卦》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熟悉有关学术史的人们应该记得，终身精研易学的金景芳先生，在他晚年的专著《〈周易·系辞传〉新编详解》一书里，指出《说卦》中有《连山》、《归藏》的遗说^⑥。现在我们看到《筮法》同《归藏》也存在相当密切的关系，应该叹服金景芳先生的卓见。

注释

① 《吉林大学古文字学术讨论会纪要》，《古文字研究》第一辑，中华书局，1979年。

② 例如邢文：《数字卦与〈周易〉形成若干问题》，《台大中文学报》第27期，2007年；王化平：《〈左传〉和〈国语〉之筮例与战国楚简数字卦画的比较》，《考古》2011年第

10期。

- ③ 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经编易类《归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 ④ 同③，引李过说：“辇者，劳也。”
- ⑤ 李学勤:《周易溯源》，第280—284页，又“重印附记”，巴蜀书社，2011年重印本。
- ⑥ 金景芳:《〈周易·系辞传〉新编详解》，第184—191页，辽海出版社，1998年。

(原载《文物》2013年第8期)

试论《系年》第一章的思想内涵

清华简《系年》共有23章，简138支，其第一章只占简4支，文字相当简短，但所记述的历史跨度却非常大。章文由周武王克商、建立周朝讲起，一下子就跳到西周晚期厉王被国人放逐，共和行政，以至宣王三十九年王师败于千亩，可说是纵括了西周的一代兴衰。

这里的问题是，西周有近三百年的历史，事迹十分丰富。在《系年》作者，即战国前期的时候，人们所能追溯的西周史事，肯定要比秦汉以下要多得多。然而《系年》作者在这部史书的开卷第一章，竟如此简括地概述西周，其写作的用意究竟何在？

粗看起来，这一章的构成好像是明显的。章文一起始便说：

昔周武王监观商王之不恭上帝，禋祀不寅，乃作帝籍，以登祀上帝天神，名之曰千亩，以克反商邑，敷政天下。^①

章文末后则讲道：

宣王是始弃帝籍弗田，立三十又九年，戎乃大败周师于千亩。

恰好与开头武王作千亩联系对照。武王敬奉上帝，作籍田千亩，以其产物祀神，于是战胜不敬上帝的商王，建成了周朝的统治；而宣王则废弃千亩的籍田大礼，无以祀神，结果王朝势衰，竟被戎人打败，成为西周衰落的契机。王朝的兴亡，似乎全出于“上帝天神”的神力。

仔细通读章文，我以为作者的思想观点，实际并不是这样。一个很明白的

理由，就是章文还专门强调了厉王流放一事。章文说：

至于厉王，厉王虐于周，卿士、诸正、万民弗忍于厥心，乃归厉王于徧（彘），共伯和立。十又四年，厉王生宣王，宣王即位，共伯和归于宋（宗，指卫国）。

这一史事与千亩似若无关，为什么要特别记述呢？

大家知道，周宣王废籍田礼一事，也见于《国语》一书的《周语上》，该篇称：“宣王即位，不籍千亩”，并且载有当时贤臣虢文公很长的劝谏之辞。结果“王不听。三十九年，战于千亩，王师败绩于姜氏之戎”，纪年与事迹都和简文一致。韦昭注说：

籍，借也，借民力以为之。……自厉王之流，籍田礼废，宣王即位，不复遵古也^②。

原来厉王被放逐，籍田之礼已不再举行，宣王即位后只不过是不再恢复罢了。

《周语上》的虢文公，就是著名青铜器虢季子白盘的器主子白。他在谏辞里说：

夫民之大事在农，上帝之粢盛于是乎出，民之蕃庶于是乎生，事之供给于是乎在，和协辑睦于是乎兴，财用蕃殖于是乎始，孰庞纯固于是乎成。

西周时的中国，本来是以农业经济为其基础的。由周王亲率朝臣举行的籍田大礼，实质上是对全国农业生产的一种动员仪式，废除这一仪式，乃是忽视农业这一基础的具体表现，伤害了“王事”的根本。虢文公说，行籍田礼，效果是：

民用莫不震动，恪恭于农，修其疆畔，日服其耨，不解于时，财用不乏，民用和同。……三时务农而一时讲武，故征则有威，守则有财。若是

乃能媚于神而和于民矣。

而废籍田礼，结果必然是“匮神之祀而困民之财，将何以求福用民？”

这就和厉王的虐政是相似的。两者都是违背了治民的原则。《系年》这一章并列厉、宣的行事，正是暗示了这个道理，只是没有《周语上》那样显豁明白而已。

注释

① 用《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贰)释文，下同。

② 《周语上》据徐元诰：《国语集解》，中华书局，2002年点校本，下同。

读《系年》第三章及相关铭文札记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第二辑刊布的战国时史书《系年》^①，其前四章追述西周历史，第三章云：

周武王既克殷，乃设三监于殷。武王陟，商邑兴反，杀三监而立寀子耿。成王戠伐商邑，杀寀子耿。……

所说是武王卒后三监之乱等大事。这段简文虽然不长，但在许多地方可与周初青铜器铭文对照，解答铭文中长时期悬而未决的问题。

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是大保簋（《殷周金文集成》4140），簋铭开头为：

王伐录子耿，戠厥反。王降征命于大保。大保克戠，亡譴。……

我曾有小文论及^②，铭文里的“录子耿”即《系年》简中的“寀子耿”，也就是商纣之子武庚禄父，所以“王伐录子耿”和“成王戠伐商邑，杀寀子耿”指的是一件事。

其次，可以举出小臣单觶（《集成》6512）^③，觶铭是：

王後坂克商，在成师，周公锡小臣单贝十朋，用作宝尊彝。

此铭怎样读释，学者意见纷纭。最近李守奎教授撰文^④，根据《系年》第一章讲武王“克反商邑”，“克反”联为一词，有战胜覆灭之意，说明觶铭“坂克”读为“反克”，为与“克反”同义的动词。

《系年》第三章说“成王尸伐商邑”，注释已解说“尸”即“休”字，并引容庚先生之说，其义为继。简文先提到武王克殷，则成王之伐商邑，实系继续父业，两句前后呼应。周的伐商，有武王、成王两次，所以宜侯矢簋（《集成》4320）铭云“王（康王）省武王、成王伐商图”。武王伐商于前，成王伐商在后，从而解铭云“王（成王）後坂克商”，与简文“成王尸伐商邑”涵义相同。这一点，其实前人如方濬益、陈梦家都已推想到了^⑥。

我们还可以提到沫司徒疑簋（《集成》4059）簋铭说：

王来伐商邑，诞命康侯鄙于卫。……

首句“王来伐商邑”，对看简文“成王尸伐商邑”，其主词“王”肯定是成王，而不是一些学者主张的是称王的周公。当然，所谓成王伐商，成王本人不一定必得亲临前线，实地指挥作战的应该是周公。

伐商的实际主事者是周公，这由小臣单解铭文也能够看出来。解铭讲的“在成师”颁赏给单的，乃是周公。这个地名成，在传世古书中或作郕、盛，位置在今山东宁阳东北^⑦，也便是商邑以东，足见当时商邑已被攻克，周公正在率军东进，成王本人在成是不可能的。

既然成王伐商之役实质是周公伐商，这一点在青铜器铭文中也有具体反映，见于最近出现的卿盘^⑧。这件盘新见著录，读者可能不很了解，需要作一些介绍。

卿盘是一件无耳高圈足的盘，口径33厘米，高12.7厘米。腹饰有立羽的夔纹，中间有小兽首。足饰同样夔纹，中间有小扉稜。铭文铸在内底中部，共3行14字，依原行款隶写如下：

周公来伐商，
戡（滅）室卿，易（锡）𤛹（金），
用乍（作）宝彝。

“周”字作“田”中四点之形，同于殷墟卜辞及德方鼎（《集成》2661）等。

“来”字中间作两横笔，同于沫司徒疑簋。后者或释“束”，是不对的。当时的“束”字见束觶^⑧，与此结构有别。

“减”字见于清华简《说命中》，云“古我先王减夏”，系商王武丁追述汤的事迹，其字应读为“减”，殊无疑义。“减”字在此，我认为当读为励或励，义为勉励。“宐”字，裘锡圭先生说：“从金文用例看，此词大概有奖励的意思”^⑨。“减宐”一词，曾见于伯姜鼎和禹簋^⑩，其涵义相同。

在周初青铜器铭文中，名卿者不止一人^⑪，盘铭的卿，随周公伐商有功，未必就是士卿尊或臣卿鼎的器主。

综上所述，合观《系年》及有关铭文，与《史记·周本纪》所说“周公奉成王命”伐诛武庚等，平三监之乱，基本是符合的，应该说反映了当时的史实。

注释

- ①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貳），中西书局，2011年。
- ② 李学勤：《绌子武庚禄父与大保簋》，《甲骨文与殷商史》新二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又收入《初战清华简》，中西书局，2013年。
- ③ 器形见马承源：《中国古代青铜器》，图版三十九，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
- ④ 李守奎：《小臣单觶“𠂔”字补说》，达慕思—清华清华简国际研讨会论文，2013年。
- ⑤ 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上册，第10页，中华书局，2004年。
- ⑥ 陈槃：《春秋大事表列国爵姓及存灭表撰异》，第371页，历史语言研究所，1966年。
- ⑦ 吴镇烽：《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14432，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又见《吉金御赏》（貳）《王公礼乐》，第12—24页，（香港）御雅居，2013年。
- ⑧ 李学勤、艾兰：《欧洲所藏中国青铜器遗珠》，90，文物出版社，1995年。
- ⑨ 裘锡圭：《史墙盘铭解释》，《文物》1978年第3期；又收入《裘锡圭学术文集》第三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
- ⑩ 同⑦，《吉金御赏》（貳），第14页。
- ⑪ 同⑤，第66页。

（原载《出土文献》第4辑，中西书局，2013年12月）

重说《保训》

2008年夏入藏清华大学的战国竹简，通称清华简，经过清理观察，总数约2500枚，估计有佚书60多篇。其间最早得到公布的是《保训》，这是由于在对简进行保护时首先注意到《保训》简第一支的重要文句，同时该简的长度和字体都自有特点，很容易拣选出来。2009年4月，我们在《光明日报》上通报了发现《保训》的讯息^①，随后于《文物》该年第6期发表了该简的图片和初步释文^②。《保训》一为学术界所知，就引发了热烈的讨论，学者意见纷纭，其集中的焦点在于如何理解简文内“中”这个概念，有关争议至今尚在进行。有兴趣了解详情的读者不妨参看梁涛、曹峰两先生这方面的论作^③。

《保训》简文的内容，是叙述周文王临终时对太子发即武王的遗言。篇中说“王念日之多历，恐坠保（宝）训”，文王还提到“昔前人传保（宝）”云云，可知所谓宝训不是文王自己的创造，而是从前世传流下来的。事实上在《保训》里，文王是通过两个历史故事来阐述宝训，一个是舜的故事，另一个是微（商汤的先祖上甲）的故事。这两位历史人物时代相隔，身份各异，然而都体现了宝训。

关于舜，简文说：“昔舜旧作小人，亲耕于历丘，恐求中，自稽厥志，不违于庶万姓之多欲。厥有施于上下远迩，迺易位迺稽，测阴阳之物，咸顺不逆。”又说：“舜既得中，言不易实变名，身兹备惟允，翼翼不懈，……”前面讲“求中”，后面说“得中”，足见贯彻在这一故事的是“中”，也即我们说的中道^④。中道乃是舜的故事的核心，也便是文王所要传流的宝训，是比较容易理解的。

关于微，简文说：“昔微段（假）中于河，以复有易，有易服厥罪。微无害，乃道中于河。微志弗忘，传贻子孙，至于成唐（汤），祇备不懈，用受大命。”这段话仍然贯穿着“中”，前面讲“假中”，后面说“道中”，“中”再次作为故事的核心。这是当然合理的，因为文王讲的舜、微两位人物的史迹，都是为了

说明一点，即简文所谓宝训。舜故事的“中”和微故事的“中”，只能是彼此同一，不能作不同的解释，否则宝训的传流便不存在了^⑤。

微的故事内的“段中”，读为“假中”是不应有问题的。“道中”，我们曾读为“追中”，以“追”为“归”的假借。这样，“假”与“归”相对成文，似乎很是妥当，不过可假可归的只能是一种具体的东西，不会是抽象的中道了。种种推测，皆由此而起。

“道”字释作“追”，我以前说过，同于春秋时陈赙簋、仆儿钟等金文^⑥，这固然没有错，然而我最近忽然悟到，简文的“道”其实并不是一个“追”字。这个想法，是从观察清华简文字的一些特殊现象触发的。

其一是：“道”所从的“𠂔”可以是“自（师）”字。

清华简《系年》第四章两处出现“𠂔”字^⑦。一处是：“周成王、周公既迁殷民于洛邑，乃𠂔念夏商之亡由”，另一处是：“赤翟王𡇗虐起𠂔伐卫，大败卫𠂔于𡇗”。两者的“𠂔”字形全同，却有不同的释读。“𠂔念”的“𠂔”应读为“追”，“起𠂔”、“卫𠂔”的“𠂔”则当读为“师”，由上下文义看，是没有疑问的。

我过去曾有小文说明，古文字中“原来有两个‘自’字，一为古‘堆’字，一为古‘师’字，后来在文字演变中逐渐混淆，……《说文》混二者为一，和对‘追’字的理解有关”^⑧。许慎讲“追”是形声字，认为其所从是作为古“堆”字的“自”，此说的缺点已为罗振玉、杨树达先后指出。杨树达先生在《释追逐》一文里指出“‘追’、‘逐’皆为会意字，在甲骨文中两者用法划然不紊。‘追’所从为‘师’，义为人众，‘逐’所从为‘豕’，推广之为兽，故‘追’字用于人，‘逐’字用于兽”^⑨。现在看清华简，这种混淆在战国时人的理解中已经存在了。

其二是：“逐”也可以视为一个形声字。

清华简《说命下》有一句是“余柔远能逐”^⑩，注释指明，“柔远能迹”一语见于《尚书·舜典》和大克鼎等西周金文。简上的“逐”不是追逐的“逐”字，而是一个从“豕”声的形声字。“豕”古音书母脂部，故可读为日母脂部的“迹”（《说文》“豨”字或作“祿”）。

这就给我们一个暗示，《保训》简文里的“道”字也可能不是“追”，而是一个从“𠂔”声的形声字。“𠂔”在这里读为“师”，这个“道”字也当读为“师”。

现在让我们再依此重读简文。

“昔微假中于河”，是说上甲微因其父王亥被有易害死，依借河伯战胜有易。“假”在这里是凭借、依靠的意思^⑪，“假中于河”即凭靠河伯能秉持中道，公正行事，终能使有易服罪。

“乃道中于河”，是说上甲微从河伯那里传承了中道。“师”字意为学习效法，如《尚书·益稷》“师汝昌言”。

这样，我们便可以确定《保训》所说文王传流的宝训确是中道，与《论语·尧曰》、《礼记·中庸》等儒家文献有一定联系，也正是后世儒学道统说的滥觞。

注释

- ① 李学勤：《清华简中的周文王遗言〈保训〉》，《光明日报》2009年4月13日；又收入《初识清华简》，中西书局，2013年。
- ②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保训〉释文》，《文物》2009年第6期。李学勤：《论清华简〈保训〉的几个问题》，同上；又收入《初识清华简》。
- ③ 梁涛：《清华简〈保训〉的“中”为中道说》，《清华简研究》第1辑，中西书局，2012年；曹峰：《〈保训〉的“中”即“公平公正”之理念说》，同上。
- ④ 同①、②
- ⑤ 相反的意见如郑吉雄：《先秦经典“中”字字义分析》，收入陈致主编《简帛·经典·古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
- ⑥ 李学勤：《清华简〈保训〉释读补正》，《中国史研究》2009年第3期；又收入《初识清华简》。
- ⑦ 见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贰），中西书局，2011年。
- ⑧ 李学勤：《论西周金文的六师、八师》，《华夏考古》1987年第2期；又收入《李学勤文集》，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
- ⑨ 同⑧引。
- ⑩ 见《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叁），中西书局，2012年。
- ⑪ “假”有凭借义，见王力：《古汉语字典》，第39页，中华书局，2000年。

（原载《深圳大学学报》2014年第1期）

再读清华简《周公之琴舞》

清华简整理报告第三辑收录的《周公之琴舞》^①，是一组由十篇联缀合成的乐诗。这十篇诗，只有“成王作”的第一篇有传世本，即《诗·周颂》里的《敬之》，其余九篇就都是前所未见的佚诗，十分古奥费解。我窃以为，要想正确了解《周公之琴舞》的时代和性质，不妨先从《敬之》入手，因为该篇经过注疏讨论，在若干方面可以作为我们研究的参考依据，避免凿空的弊病。

值得注意的是，《敬之》在《诗》中不是孤立的，它被编列于《闵予小子》之什的第三篇，而此什的第一篇《闵予小子》、第二篇《访落》与第四篇《小毖》，同它是结合在一起的。这一点，在这四篇的序中已有暗示：

《闵予小子》，嗣王朝于庙也。

《访落》，嗣王谋于庙也。

《敬之》，群臣进戒嗣王也。

《小毖》，嗣王求助也。

四篇的文句也多有近似之处，例如《闵予小子》云“闵予小子，遭家不造”，《访落》说“维予小子，未堪家多难”，《小毖》也有“未堪家多难”；《闵予小子》云“维予小子，夙夜敬止”，《敬之》有“维予小子，不聪敬止”，简本则作“汔我夙夜，不逸敬之”；《闵予小子》有“陟降庭止”，《访落》云“陟降厥家”，《敬之》说“陟降厥士”，简本作“陟降其事”。《正义》于《闵予小子》下讲：“此及《小毖》四篇俱言嗣王，文势相类”，确是事实。

那么“嗣王”是指谁呢？郑笺于此有明确说明：“嗣王者，谓成王也。”这句话系于《闵予小子》，自然也通用于其他三篇。《汉书·匡衡传》载匡衡上奏，

述及“昔者成王之嗣位，思述文武之道，以养其心”，随即引《闵予小子》，表明他也主张是指成王。匡衡学齐诗，这大约是汉儒共同的想法。现在简本《敬之》在“成王作”之中，便印证了成王之说。

前人对诗内“嗣王”系成王虽无争议，但关于其中所述情事发生在成王什么时期却有不同理解。《闵予小子》郑笺说是成王“除武王之丧，将始即政，朝于庙也。”对此，《正义》解释说：“郑以为成王除武王之丧，将始即政，则是成王十三，周公未居摄，于是之时，成王朝庙，自言敬慎，思继先绪。《访落》与群臣共谋，《敬之》则群臣进戒。文相应和，事在一时，则俱是未摄之前。”

孔颖达虽然申说了郑玄的看法，他自己却并不赞同，他说：“此朝庙早晚，毛无其说。毛无避居之事，此朝庙事，武王崩之明年周公即已摄政，成王未得朝庙，且又无政可谋。此欲夙夜敬慎，继续先绪，必非居摄之年也。王肃以此篇为周公致政，成王嗣位，始朝于庙之乐歌，毛意或当然也。”这充分表明他是支持反对郑玄的王肃的观点。

《周公之琴舞》简文“成王作”中与《敬之》并列的冠以“四启曰”的一篇，有“孺子王矣”之句，与《书·立政》相同，无疑是周公的口气^②。《立政》是周公致政，成王嗣位时事，学者一般是公认的，看来王肃之说真的胜于郑玄。

不仅诗所述时代为成王这一点，关于《敬之》等诗的性质，《诗序》也作了相当准确的概括。特别是《敬之》，前面已说到其序云“群臣进戒嗣王也”，这刚好对应于简文所说“多士敬愍”。《周公之琴舞》整体由周公及群臣口气和成王本人口气两类诗篇合成，《敬之》属于成王口气一类，内容是征求群臣的进戒，而“多士敬愍”正是周公及群臣的进戒。按所谓“多士”，意思就是群臣，《书·秦誓》疏：“士者，男子之大号，故群臣通称之。”“敬愍”即是戒慎的意思，这些都可同《诗序》参照。

简文还有一点，我们应当参据孔颖达《正义》来理解。《正义》在《访落》、《敬之》、《小愍》三篇下都说明是“诗人述其事而作此歌焉”，这是很恰当的。《周公之琴舞》讲“周公作”、“成王作”，不一定是该诗直接出自周公、成王，就像《书序》讲“周公作《立政》”，而《立政》开头便说“周公若曰”，显然是史官的记述一样，我们不可过于拘泥。

在这里还应附带提到朱子的《诗集传》。该传于《闵予小子》等四篇没有讲出多少新的见解，但有一句讲“疑后世遂以为嗣王朝庙之乐”，可谓高见，《周公之琴舞》看来便是这样的乐诗。

注释

- ①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叁），中西书局，2012年。
- ② 参看李学勤：《初识清华简》，第203—204页，中西书局，2013年。

（原载《绍兴文理学院学报》2014年第1期）

《归藏》与清华简《筮法》、《别卦》

清华大学所藏战国竹简中有两篇属于《易》类的书，整理时分别题为《筮法》和《别卦》，已经收入于2013年底出版的整理报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第四辑^①。我在介绍《筮法》的小文里^②，曾指出其内容同《归藏》有密切关系。本文想就此作进一步讨论，说明《筮法》以及《别卦》两者确与《归藏》相关。

传世的《归藏》，长久以来被斥为伪书，到1993年江陵（今荆州）王家台秦简《归藏》出现之后，才受到学者的广泛注意。实际上，早在1978年所谓“数字卦”问题提出不久，饶宗颐先生便有文章引及传世《归藏》，作了比较详细的论述^③。近年有关著作日益增多，然而关于《归藏》还是有不少问题需要探索。

《归藏》的传流，是有迹可寻的。众所周知，《归藏》乃“三易”之一，见于《周礼·大卜》，《礼记·礼运篇》郑注以为就是孔子所见的《坤乾》。汉代有《归藏》存在，只是未收录于《汉书·艺文志》。东汉桓谭《新论》云：“《归藏》藏于太卜”，还说：“《归藏》四千三百言”，可知当时该书的篇幅同《周易》经传相埒。由晋代到隋唐，《归藏》依然存世。《隋志》载《归藏》十三卷，有“晋太尉参军薛贞注”。新旧《唐志》也著录十三卷，而云“司马膺注”，当系不同注本。其后该书散佚，《宋志》只记“薛贞注《归藏》三卷”，应即薛注本的孑遗。不幸的是这三卷本也已亡失不存，今天所能依据的，只有清人的辑佚本。辑本以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为好，也可参照朱彝尊《经义考》，后者我使用的是新问世的《经义考新校》本^④。

《经义考》引《中兴书目》说：“《归藏》隋世有十三篇，今但存《初经》、《齐母》、《本蓍》三篇，文多阙乱，不可训释。”又引郑樵说略同。对照上面引述的

史志，知道晋至隋唐的十三卷卷各一篇，宋代的三卷也是一样。至于篇名，除《中兴书目》等说的三篇外，佚文里面还有《郑母经》和《启筮》，在此不能详论。

辑本引朱震《汉上易集传》云：“《归藏》之书，其《初经》者，庖牺氏之本旨也。卦有初乾、初夷（坤）、初艮、初兑、初羣（坎）、初离、初鼈（震）、初巽，卦皆六画。《周礼》三易‘经卦皆八’，所谓经卦则《初经》之卦也。”以《初经》的这些内容与清华简《筮法》比对，可以看到下列几点：

第一，八经卦的卦名彼此一致。在前述我介绍《筮法》的小文中，已经说过其坤卦简文作“𡙇”，是《归藏》特有写法，也见于《汗简》等，推测也是来自《归藏》，朱震引作“夷”，乃是讹字。坎卦简文作“𡙇（劳）”，同于王家台简《归藏》，朱震云作“羣”。震卦简文有时作“来”，与《归藏》的“鼈”是通假字。总之，《筮法》的八经卦名和《归藏》是极相近，甚至可以讲是相同的。

第二，朱震说《初经》八经卦“卦皆六画”，罗苹的《路史》注也说“《归藏·初经》卦皆六位”。《筮法》也是这样，简内虽有以三画卦组成的“卦位图”，全篇占筮之例却都是六画卦，与《归藏》相似。

第三，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初经》八经卦的次序不是像一般猜想的坤在乾前，而是依次为（用通行《周易》卦名）：乾、坤、艮、兑、坎、离、震、巽。这种次第是所谓“乾坤六子”说的体现。按《易传》里的《说卦》第十章：“乾，天也，故称乎父；坤，地也，故称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谓之长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谓之长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谓之中男；离再索而得女，故谓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谓之少男；兑三索而得女，故谓之少女。”这是“乾坤六子”说的依据，《归藏·初经》的卦名次序即依此说，只是六子按少、中、长排列而已。《筮法》筮例多处运用此说，我在介绍小文中已有举例。

《别卦》简文正是与“乾坤六子”说相关的卦名表，整理报告已作了扼要说明。《别卦》共简8支（缺失1支），以六画卦的上卦、下卦纵横交互，如两者相同则予省略，因此所形成的表内只有别卦五十六个，而没有同于经卦的八个。

《别卦》简没有编号，也未见其他可以推定简次的痕迹。整理报告采用的排列方式，可列表如下（用通行《周易》卦名，不见于简文的经卦加〔〕表示），上面加的一行是上卦，右侧加的一行是下卦：

巽 小畜 观	离 大有 晋	兑 夬 萃	坤 泰 [坤] 谦	震 大壮 豫 小过 归妹	坎 需 比 蹇 节 [坎] 既济 屯 井	艮 大畜 剥 [艮] 损 蒙 贲 颐 蛊	乾 [乾] 否 遯 履 讼 同人 无妄 姤	乾 坤 艮 兑 坎 离 震 巽
渐 中孚 涣 家人 益 [巽]	旅 睽 未济 [离] 噬嗑 鼎	咸 [兑] 困 革 随 大过	临 师 明夷 复 升	解 丰 [震] 恒				

不难看出，其下卦的次序全同于《归藏·初经》，上卦的次序则系乾坤各率三子，而三子仍依少、中、长为次。这种排简方式的结果，是与1973年底发现的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的《周易》经文的六十四卦次序相合^⑤，从而为整理报告所接受。当然，如果调整简的排序，使其上卦也遵照《初经》那样的次第，也不是不可以考虑的。

上文已说到《筮法》经卦之名同《归藏》密合，其实《别卦》也有类似的特点，这里只举出几个特别明显的例子：

一个是辑本《归藏》的豫卦作“分”，见李过《西溪易说》。王家台简作“介”，其整理者以为系“余”字之误^⑥，我也有同样的想法^⑦。现见《别卦》也作“介”，才知道这一猜想是不对的。

再一个是临卦，李过说《归藏》作“林祸”。《别卦》该卦名是一个字，左侧从“言”，右半上从“林”声，下与楚文字“骨”字所从形近，推测“林祸”之说即由该字而来。

随卦，辑本作“规”，《别卦》简上卦名的字下部从“心”，上部左侧似“毛”，右旁从“见”，恐怕本来就是“规”字。

“介”、“林祸”、“规”等卦名，是《归藏》特有的，足以作为简文与《归藏》关系的证据。

注释

- ①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肆),中西书局,2013年。
- ② 李学勤:《清华简〈筮法〉与数字卦问题》,《文物》2013年第8期。
- ③ 饶宗颐:《殷代〈易〉卦及有关占卜诸问题》,《文史》第20辑,中华书局,1983年。
- ④ 林庆彰等主编:《经义考新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
- ⑤ 张政烺:《帛书〈六十四卦〉跋》,《文物》1984年第3期。
- ⑥ 王明钦:《王家台秦墓竹简概述》,收入《新出简帛研究》,文物出版社,2004年。
- ⑦ 李学勤:《周易溯源》,第292页,巴蜀书社,2011年重印本。

(原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4年第1期)

六、学术史研究

从《系年》看《纪年》

最近我们在《中国史研究动态》2011第6期上，看到一篇《百年来〈竹书纪年〉真伪与价值研究述评》，文中对学术界的有关争论做了很好的综合分析。

《竹书纪年》简称《纪年》，是公元三世纪西晋武帝时在汲郡即今河南汲县一座战国墓里出土的竹简书籍。当时学者进行了整理读释，可知是魏国人撰作的通史性的史书，其著成年代是战国晚期的魏襄王时，约公元前298—前297年左右。《纪年》的影响很大，可惜整理出的文本传到唐代便散佚了，只能由各种书所征引辑录出零碎的段落语句，这被称为古本《纪年》。另外，到明代开始流传一种与古本多有不同的完整本子，被称为今本《纪年》。如前面提到的那篇《述评》所说，对于《纪年》古本、今本的真伪、价值，以及彼此的关系，长期以来国内外学者有着不同意见。

关于如何进一步认识《纪年》，现在有一个新的机会。在2008年清华大学入藏的战国竹简（通称清华简）之中，又发现了一部战国人写的史书，整理时题名为《系年》。《系年》不像《纪年》那样自夏商甚至更古讲起，而是从周初记述到战国前期，可以说是周代的断代史。看其内容，应该是楚肃王时（公元前380—前370年）楚人的作品，属于战国中期偏晚，比《纪年》更早。《纪年》和《系年》尽管作者的年代、地域互不相同，却有不少可资对比研究之处。这里我想只举一个例子。

《左传》昭公二十六年《正义》引古本《纪年》云：

平王奔西申，而立伯盘以为太子，与幽王俱死于戏。先是，申侯、鲁侯及许文公立平王于申，以本太子，故称天王。幽王既死，而虢公翰又立王子余臣于携，周二王并立。二十一年，携王为晋文公所杀，以本非适

(嫡)，故称携王。

这是西周末幽王宠爱褒姒，废申后及太子宜臼（后来的平王），导致覆亡的史事，是大家熟悉的。《纪年》所记，多有纠正补充《史记·周本纪》之处。《左传正义》还引用了《纪年》整理者束皙的话，指出褒姒子应从《纪年》作“伯盘”，《周本纪》作“伯服”乃是错字。

《系年》第二章也记这一史事：

王与伯盘逐平王，平王走西申。幽王起师，围平王于西申，申人弗畀，曾（缙）人乃降西戎，以攻幽王，幽王及伯盘乃灭，周乃亡。邦君、诸正乃立幽王之弟余臣于虢，是疇（携）惠王。立二十又一年，晋文侯仇乃杀惠王于虢。

就史事的轮廓来说，与《纪年》所述基本是一样的，甚至有些语句都很相似。这不但证明了古本《纪年》不像有些人讲的出于曹魏遗臣或束皙等人的伪造，而且能够看出《纪年》、《系年》两者应该共有所本。

《纪年》、《系年》叙事的体例也彼此相似，有些像所谓“纪事本末”，而不是如《春秋》那样逐年胪列。今本《纪年》则把古本这一段割裂，分列于幽王五年、八年、十一年和平王二十一年，显然是不对的。其间还将“伯盘”回改为“伯服”，尤为不妥，足见其不可信。

仔细考查，《纪年》、《系年》这一史事的叙述仍有所不同。《纪年》说平王立在前，拥立他的在申侯外还有鲁侯和许文公，而立王子余臣的只是虢公翰，可见在“二王并立”之中，余臣没有法理上的优势，他又因不是周王嫡传，所以只能称“携王”，没有谥法。《系年》的说法则并非如此。

首先，幽王和幽王所定的太子伯盘死后，“邦君、诸正乃立幽王之弟余臣于虢”，“邦君”是诸侯，“诸正”是朝臣，这表示余臣立为王有相当多的支持，不是只有虢公翰一人。余臣立于虢，虢公翰大约是拥立的带头人，这个虢国应即在今河南三门峡市境。

其次，立平王乃是晋文侯的策划。《系年》说：“周亡王九年，邦君、诸侯焉始不朝于周，晋文侯乃逆平王于少鄂，立之于京师。”可见平王并未先立，或者立于申而没有得到公认。

还有，余臣被晋文侯杀后，还是有谥号的，《系年》称他为“携惠王”。

吟味《纪年》、《系年》这方面的差别，我感觉是反映出两书作者立场的差异。《纪年》是三晋之一魏国人所撰，于东迁以下用晋纪年，实即始于晋文侯。他将“晋文侯定天子”，拥立平王，杀死携王一事讲得更有理据，是可以想象的。《系年》的作者估计是楚国人，没有必要为晋文侯说什么好话，落笔自然有区别了。事实上“二王并立”，各有拥戴支持的势力，晋文侯和平王不过是最后的胜利者。合观两书所记，真相就比较清楚，由此也可以看到两书在古史研究上的重要价值。

（原载《光明日报》2012年2月27日）

由清华简《系年》论《纪年》的体例

清华简《系年》已经收入整理报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第二辑发表了^①。在我个人接触这批珍贵竹简的过程中，最早看到的少数简的摹本中就有《系年》里的一支，当时虽不知是什么样的典籍，但读出其内容与古本《竹书纪年》相似，便深感其价值重要。到了近期整理考释这篇长达138支简的《系年》时，由于工作需要，更反复细读古本《纪年》^②，不仅对简文的性质增多了了解，也加深了对《纪年》一书的认识。这里只谈一点，试与大家商榷。

《系年》和《纪年》都是战国时人撰著的史书（《系年》成书稍早于《纪年》），其作者一为楚国人，一为魏国人，所处学术背景不同，写作的目的也未必一样。可是因为时代相距未远，分析《系年》，还是能够对《纪年》提出一些新的想法，这里要说的是《纪年》的体例问题。

《系年》简保存良好，全文俱在，只有个别残损，全书结构不难一目了然。这篇史书分为23章，上起周初武王克商，下至战国中期楚悼王、肃王之世，作了通贯概括的叙述。其间史事不少记有纪年，前略而后详，然而全篇叙事罕有在年代上倒错重复的地方。就其记述覆盖周王朝和各主要诸侯国而言，它不是区域史，而是有周一代的通史。

《纪年》是什么样的史书呢？前人如朱希祖《汲冢书考》说：“此书体例与《春秋》不同，《春秋》为断代编年史，故起于鲁隐；《纪年》为通史式编年史，故上起黄帝。”^③《系年》虽只记有周一代，在一定意义上也可谓通史，特别是它不像《纪年》那样在西周灭亡以后以晋国及随后的魏国为中心。

《系年》完全不是《春秋》那样的编年史，那么《纪年》是不是那样的编年史？如果我们看晚出的今本《纪年》，确实是分年排列的标准的编年史，然而我

们在读过《系年》以后，再来看现存的古本《纪年》佚文，就在许多地方看到相反的迹象，也便是说，古本《纪年》（至少是一部分）恐怕不是像《春秋》那样分年排列，其体例很可能更与《系年》有接近之处。

以下举出几个例子，以做说明。

《太平御览》卷一三五引《纪年》：“后桀伐岷山，岷山女于桀二人，曰琬曰琰。桀受二女，无子，刻其名于苕华之玉，苕是琬，华是琰，而弃其元妃于洛，曰末喜氏。末喜氏以与伊尹交，遂以间夏。”^③《艺文类聚》等也有类似引文，无疑是古本原貌。这段话记述夏桀娶二女无子，弃其元妃末喜的经过，不可能是固定的一年中事。今本《纪年》则系之于桀的十四年，并且把末喜与伊尹交等语弃去^④。

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后序》引《纪年》：“仲壬崩，伊尹放大甲于桐，乃自立也。伊尹即位，放大甲，七年，大甲潜出自桐，杀伊尹，乃立其子伊陟、伊奋，命复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⑤这前后是几年的事，连贯叙述，《尚书·咸有一德》正义所引相同。今本《纪年》将之分割系于大甲元年和七年^⑥。

《御览》卷八三引《纪年》：“河亶甲整即位，自囂迁于相，征蓝夷，再征班方。”^⑦三件史事不会同属一年。今本《纪年》分系于元年、四年、五年^⑧，都是古本没有的。

《开元占经》卷四引《纪年》：“穆王东征天下二亿二千五百里，西征亿有九百里，南征亿有七百三里，北征二亿七里。”^⑨显为综述之语，今本无法处理，只说：“西征还履天下，亿有九万里”，挂在穆王十七年下^⑩。

《左传》昭公二十六年《正义》引《纪年》：“平王奔西申，而立伯盘以为太子，与幽王俱死于戏。先是，申侯、鲁侯及许文公立平王于申，以本太子，故称天王。幽王既死，而虢公翰又立王子余臣于携，周二王并立。二十一年，携王为晋文公（侯）所杀，以本非适（適），故称携王。”^⑪这段话和《系年》在不少地方相似，绝不是孔颖达综括出来的，它很明显是成段的叙述。今本将之分割系于幽王五年、八年、十一年及平王二十一年，甚至把“伯盘”误从《国语》、《史记》改作“伯服”^⑫。古本《纪年》这一段中有“先是”，是追叙的口吻，特别值得注意。

《史记·越世家》索隐有六处连引《纪年》，陈梦家《六国纪年》将之汇录如下：“晋出公十年十一月，於粵子句踐卒，是为莢执。次鹿郢立，六年卒。不寿立十年见杀，是为盲姑；次朱句立。於粵子朱句三十四年灭滕，三十五年灭郢，三十七年朱句卒。翳三十三年迁于吴，三十六年七月太子诸咎弑其君翳；〔十三年〕十月粵杀诸咎粵滑，吴人立子错枝为君；明年，大夫寺区定粵乱，立无余之；十二年寺区弟思弑其君莽安，次无颢立；无颢八年薨，是为莢烛卯。粵子无颢薨，后十年，楚伐徐州。”^③陈先生标以句点之处，是《索隐》所引一条的末尾，可以看出，至少从“翳三十三年”到“是为莢烛卯”是不能分割的一段。今本《纪年》将这些分列于周贞定王、威烈王、烈王和显王^④，显然不同于古本。

《越世家》索隐所引《纪年》文中有“后十年”，还可以对照同书《田齐世家》索隐所引《纪年》：“齐康公五年，田侯午生。二十二年，田侯剡立。后十年，齐田午弑其君及孺子喜而为公。”^⑤有“后十年”这两处，都是无法割裂的，是连续叙事的词语。

在《系年》简文中，正有类似的词语，如其第二十三章云：“（楚）悼哲王即位，郑人侵犍关，阳城桓定君率犍关之师与上国之师以交之，与之战于桂陵，楚师亡功，景之贾与舒子共止而死。明岁，晋董余率晋师与郑师以纳王子定。”同章还有两处“明岁”，都是在连续叙事中标明时序，与上述《纪年》的“后十年”以及前面提到的“先是”作用相似。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关于古本《纪年》的体例，还有大家进一步探讨的余地。它不是像晚出的今本那样标准的编年史，恐怕是肯定的。

注释

- ①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貳），中西书局，2011年。
- ② 朱希祖：《汲冢书考》，中华书局，1960年。
- ③ 方诗铭等：《古本竹书纪年辑证》，第1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
- ④ 同③，第213页。
- ⑤ 同③，第23页。
- ⑥ 同③，第218页。
- ⑦ 同③，第27页。

- ⑧ 同③，第221页。
- ⑨ 同③，第52页。
- ⑩ 同③，第246—247页。
- ⑪ 同③，第59—61页，将引文分置。
- ⑫ 同③，第259—262页。
- ⑬ 陈梦家：《六国纪年》，第99页，学习生活出版社，1955年。
- ⑭ 同③，第275—285页。
- ⑮ 同③，第99—103页。

（原载《深圳大学学报》2012年第2期；《竹书纪年研究，2001—2013》，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

下编 序跋、杂文

读爱因斯坦给后世的信

1938年的历史在爱因斯坦眼中是另外一个方面，这个方面很不好，因为他描写的社会在科学上、在技术上都已经走向非常美好的趋势，取得了丰硕的成就，可是从人类来说，他们并没有从这些成就里得到真正的内心幸福。相反，人类处在一个危机而痛苦的状态，这个矛盾在爱因斯坦这封短短的信里展示得非常清楚。

社会如果仅仅是重视物质的、科学的、技术的这一部分，而不重视才智和品格的部分，那是不合理的，造成的结果就是这样。

科学和人文的融会，人类知识的统一，这些方面应该会有一个新的发展趋势。而且我个人认为，我们大家共同推进这样一个趋势应该说是有益于我们国家、社会和整个人类的。我想这一点很重要。

主持人的话

各位同学，大家好！今天的主讲人是著名的历史学家、我们的老学长李学勤先生。李先生1951年到1952年就读于清华大学哲学系。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他出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所长。二十一世纪初，他从社科院转回到母校来，在历史系出任思想文化所所长。 he 现在是历史系的教授，还担任过清华大学国际汉学研究所所长的职务。

李先生在国内外学界享有很高的声誉。他曾经是国务院历史学科评议组组长。在国外，他是剑桥大学、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等多所名校的客座教授，在国内他也是多所大学的兼职教授。他是中国先秦史学会的理事长、国际欧亚科学院的院士。李先生长期致力于汉代以前历史与文化的研究，注重将文献学与

考古学、古文字学的研究相结合，在甲骨学、青铜器、战国文字、简牍帛书及其相关的历史文化研究领域都有重要建树，是国内外学界公认的简帛研究、古文字研究和古史研究的权威。1996年起，他担任国家“九五”重点攻关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专家组组长；2001年，他获得国家“九五”重点科技攻关计划“突出贡献者”的称号。这个项目是一个科学和人文教育的跨学科项目。他还主持过国家“十五”重点科技攻关项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研究。从去年起，他出任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任，主持非常重要的“清华简”的研究工作。

李先生重视科学和人文的融合、为人为学的一致。今天他将以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给5000年后子孙的信》作为切入点，以他自己切身体会，与大家进行有关“科学和人文”话题的交流和对话。

现在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李先生。

演讲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今天有这样一个机会跟大家在这这么大的教室里见面，我觉得很高兴。在演讲以前我要跟大家道歉，因为我没有时间做ppt（幻灯片）。我记得我们学校有个习惯，就是在这么大的场合之下，应该做个好的ppt。可是最近我忙得没有时间，原因就是胡老师刚才提过的清华的那一批战国竹简，我们现在正在全力以赴做深入的保护工作。大家知道，这个战国竹简可以说是我们国家考古文物里面最难保护的文物。由于这批战国竹简含水量达到400%，所以它看着是个竹简，实际上细胞内部的细胞质几乎全被水所代替了，所以这样的简特别难以保护。不仅是保护的工作，而且目前还在进行红外线的拍照。另外，我们急于把所有的简，一共是2388枚简，全部读一遍，以便知道其大概内容。我们不是说全部内容，而是大概内容。这样的话，不管是上级领导还是社会公众来问我们，我们都好有所答复。这个工作非常紧张，所以不给我时间做ppt。我在这里向大家道歉。

今天为什么选这个题目？胡显章老师给我打电话，要我来做这个讲座，要

谈谈科学与人文的关系。正好和我谈的时候,《光明日报》发表了我们第一篇整理出来的简。这个简叫作《保训》,它的内容是大约3000年以前周文王的遗言。周文王在位50年。当时还是在商朝末年,真正的天子是商朝的王——纣王。纣王把周文王关起来,周文王摆脱监禁之后,回去称王。临死的时候,他给他的儿子——后来的周武王——留了个遗言。我们看这个遗言的时候就想起来,周文王在历史上,不管是从政治上、制度上还是文化上,都是很有影响力的人物,但他的影响和现在一些伟大的科学家相比,是完全不同的。

接到胡老师的邀请,我马上想到爱因斯坦有一个给后世的一封信,这封信也可以说是爱因斯坦的遗言。当然,那时他还在世,这封信不是他最后的遗嘱。这封信谈到了一些问题,我想从这些问题开始,谈一下我个人的想法。至于对不对,我会和各位老师、同学一起讨论,大约20分钟到半个小时的时间。

这封信是怎么回事?老师们可能比较了解,同学们可能不知道。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封信。这封信写于1938年。大家要知道1938年是个什么时间。1938年,从世界的历史来说,很快就会面临一个关键时刻。大家知道,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期,美国开始出现了经济大萧条,这个萧条虽然没有今天的金融危机这么来势凶猛,但是实际上它影响非常深远,影响到美国,也影响到全世界。从那个时候开始,全世界的政治、经济形势都处在动荡之中。我们中国人都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应该从1931年开始,从“九·一八”事变日本侵略东北开始,可是外国人不是这么说。外国人说应该从“欧战”开始。“欧战”是1939年,所以在1938年,世界经济危机的严重影响还没有过去,而政治上的历史性质的危机正要开始。因为一到1939年,纳粹德国进攻波兰,这就是真正的“欧战”的序幕,第二次世界大战从世界的角度全面开始了。所以1938年是很关键的时刻,那时候引起了世界上整个科学界、文化界各方面深刻的思考。

这不是一个普通的事件。恰恰在这个时候,就在1938年10月,在美国纽约的郊区举行世界博览会。这是一件大事,对世界的经济,甚至于文化,都有很深刻的影响。在那个时候,由于很多有识之士心里有一种恐慌、紧张,甚至对未来有种不知所措的感觉,所以很多人都有个想法:这个世界将会怎样发展,危机会不会过去?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就提出一个思想。这个思想是什么

呢？就是能不能把这个世界上的现状和问题留给后世子孙。很多年之后，未来的考古学家，能不能看到我们这个世界。当时，有些基金凑了一笔钱，做了很大的、形状像雪茄烟的圆筒形金属器——两头尖，中间是圆而粗的，像个铅笔筒一样，把这个金属器埋到了纽约地下。这里面保存了当时他们认为是人类的全部成就，包括电影片、唱片等材料。

这个事情，我当时还不能充分认识，因为我是1933年生的，那年我才五周岁，还不知道这件事。可是，就在那之后不久，应该说在七八岁的时候，我就知道这个事情。我在《科学画报》上就看到这个图，里面也提到爱因斯坦的信。《科学画报》现在还继续出版。我推荐我们同学都经常读《科学画报》。《科学画报》是跟我同一年问世的，也是1933年问世的，我在能够读书的时候就读《科学画报》，一直读到今天，我还是读《科学画报》。

当时爱因斯坦为了逃避纳粹德国的迫害，已经移民到了美国。爱因斯坦很有名，大家知道，1905年他发表狭义相对论，这之后，他在当时已经是世界最著名的科学家。所以他要记载一下，说一些话，留在我刚才所说的金属容器里面。这封信具体的时间，署的1938年9月。他写好了之后，不仅埋在了金属器里面，而且还登在了当时的《纽约时报》上，为全世界所知。这样，大家就明白，他不光是要给子孙们看，也是为了给全世界看，所以他才公布了这封信。

这封信很短，因为那个金属器里面东西很多，这不过是其中之一。这个金属器预定在5000年之后才打开，所以那天我一提到这封信，胡老师就说是“给5000年后子孙的信”。

这是封很有名的信。我把这封信的中文翻译给大家念一下，可能大家会有兴趣。爱因斯坦为什么不但要给当时的人说，而且还要给5000年后的子孙说。你看他是怎么描述当时的世界的。我再说一遍，他是描述这个世界，而不是提出问题，因为当时金属器里面装的所有东西都是为了表现当时的世界，这是当时的主题。他是这么写的：

他分成两段。第一段他说：“我们这个时代产生了很多天才人物，他们的发明可以使我们的生活舒适得多，我们早已利用机器的力量横渡海洋，并且利用机器的力量可以使人类从各种辛苦、繁重的体力劳动中最终解放出来。我们学

会了飞行，我们用电磁波从地球的一个角落方便地同另一个角落互通消息。”你们看，他是给了一个很客观的、很简括的描述，是一个很好的、很美妙的描述。这个世界是很好的。

可是在第二段，他把话题就转过来了。他说：“但是商品的生产和分配却是完全无组织的，人人都活在恐惧的阴影里，生怕失业而遭受悲惨的贫困。而且，生活在不同国家里的人民还不时互相残杀。由于这些原因，所有的人一想到将来，都不得不提心吊胆和极端痛苦。所有这一切，都是由于群众的才智和品格，较之那些对社会产生真正价值的少数人的才智和品格来，是无比的低下。”这是社会的另外一面。1938年的历史在爱因斯坦眼中是另外一个方面，这个方面很不好，因为他描写的社会在科学上、在技术上都已经处于非常美好的趋势，取得了丰硕的成就，可是从人类来说，他们并没有从这些成就里得到真正的内心幸福。相反，人类处在一个危机而痛苦的状态。这个矛盾在爱因斯坦这封短短的信里展示得非常清楚。

我们都极其尊敬爱因斯坦。2005年，我们还在清华开会纪念狭义相对论一百周年，我还在介绍他的国际科学史的大会上致辞。我们大家都尊重他，尊重他的成就。在致辞里，我曾特别强调，我们要特别尊重他创造的新的思维方式。这个很重要，可是即使是这样，他展示了当时社会的矛盾。这个矛盾是非常清楚的：从科学技术上说，是非常美好的，是高成就的，是一种发展趋势；而从社会来说，从人的内心来说，从精神来说，或者从整个人文环境来说，是很不好的。

爱因斯坦并没有说出出路，可是最后他还是给出了一个乐观的预计。他最后还有一句话，他说什么呢？他说：“我相信后代会以一种自豪的心情和正当的优越感来读这封信。”他所说的后代是5000年后，打开重新读爱因斯坦这封信的时候会感到非常自豪，因为你看，5000年以前的人是那么痛苦，那么矛盾，那么不好，那个时代不好。你看，我们现在很好，这是自豪而且“正当的优越感”，那当然是了，我们已经过上好日子，你看，他们多么不好，他们是原始的、是野蛮的。所以，爱因斯坦是用乐观的态度来提这个问题。

我想爱因斯坦写这封信是经过深思熟虑的。那天我请教胡老师，胡老师马

上指出，爱因斯坦不仅仅是位伟大的科学家，他在人文方面也有很深的修养，有很多很好的思想。这一点在这里体现了出来。他是把当时社会所展现的科学和人文的分裂进行了展示。从科学的角度来说，是进步的；从人文的环境来说，不但是不理想，而且还存在着大量的问题。这个怎么解决？问题在什么地方？我想这个问题已经展示得很清楚。我是不是可以大胆地问一下，今天爱因斯坦的话是不是还很有道理？从科学技术来说，大大地超过了1938年的水平。这已经是过了七八十年，可是爱因斯坦所揭示的科学和人文环境的对立是相当程度上仍然存在。爱因斯坦并没有说错，我们大家也可以从这个角度来想。我们再深入分析一下，爱因斯坦谈得怎么样？

科学技术为什么得到进步？我想这一方面爱因斯坦是有很多的体会，可是爱因斯坦站在他自己的立场、自己的历史背景上，把这一点归结到我们这个时代产生了很多天才人物，是一些天才的、优越的人物。我想这一点爱因斯坦并没有把他自己排除在外，相反，是从他自己的体会出发，他自己就是一个天才人物。那么，从这一点可以看到，他对于他的时代还是有一定肯定的，就是这个时代是发展的、科学的时代，是摆脱迷信、愚昧的束缚的时代。他所谓的“天才人物”就是在科学技术方面前沿的一切代表人物，像他自己，像玻恩，像海森堡，等等，他都可以举出大量的人物来。这些人在当时的社会里是有贡献的，他们的贡献是在物质方面的，把这个社会从物质方面的角度推向前进，历史是在不断前进之中的。这是一点。

而关于人文环境的不好，他指出了几点，一点是社会本身的问题。这个问题，从某个意义上说，实际上就是个政治问题，而且还特别指出商品的生产和分配是完全无组织的。我不知道爱因斯坦是不是受马克思主义影响。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来看，爱因斯坦这个话也不能算错，资本主义社会从一开始是个庞大的商品堆积，这个说法是一样的。它是无组织的，不是按照人类应有的发展方向来组织和安排的。所以人们生活在恐惧的阴影里，生怕失业会遭受悲惨的流浪，而且生活在不同国家的人类还不时地互相残杀。而所有的这一切根本的一点是由于群众的才智和品格，是才能和品格的问题。这一点大家会不会觉得不够深刻？其实也还相当深刻，因为才智和品格是社会赋予人的一种个性。

品格 (personality) 是种个性, 看起来属于每个人, 实际上它是社会的一个反映。我们如果站在每一个人的角度来说, 特别是从每个人的修养、教育这方面来说, 才智和品格不一样, 这一点特别重要。正是因为这一点做得不够, 爱因斯坦指出来是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它会和科学的发展造成一个相反的、分裂的结果。看起来好像应该是一致的, 可其实它不是一致的。特别是社会如果仅仅是重视物质的、科学的、技术的这一部分, 而不重视才智和品格的部分, 那是不合理的, 造成的结果就是这样。这是我们的分析, 我想这并没有违背爱因斯坦的原意。

这封信发表之后, 引起了很大的影响, 引起了当时很多的讨论, 实际上现在仍然在讨论这个问题。我还记得“文化大革命”之后, 我做了一件事, 就是“文革”之后我能够做点什么事的时候, 我给人民出版社写了封信, 写给王子野, 当时人民出版社恢复后他做社长。我建议出版传记。我特别引了高尔基给列宁的一封信, 建议出版传记。我还特别列举了苏联编的《爱因斯坦传》。我们国家出版的《爱因斯坦文集》在世界各国的《爱因斯坦文集》中算是比较好的。虽然不敢说是最好的, 可是确实是相当好的, 是许良英主持翻译的。

这个问题是在当时那个危机时代提出来的, 所以可以听出来爱因斯坦当时是忧心忡忡的。他信里所提到的这些问题, 就是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和人文环境的不理想, 甚至于走向恶化。这个对立, 是科学与人文的分裂和对立。这个问题后来有人再次提起来。我想在座的, 包括各位同学都应该知道的一个典型例子, 就是英国的斯诺。这不是那个写《西行漫记》的埃德加·斯诺, 而是科学家C.P.斯诺。大家都知道斯诺关于“两种文化”这个著名的演讲, 主题就是“两种文化”。恐怕大家忽略了一点, 他“两种文化”的演讲是在1959年5月7日, 可以说正好在爱因斯坦那封信的20年之后, 已经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大家想想, 由于“二战”的结束, “马歇尔计划”在西欧的推行, 在欧洲的经济已经得到基本恢复的情况下, 美、英也进入很强盛的一个时期。在这种条件之下, 斯诺做了这个演讲。这种情况跟当时爱因斯坦的情况是完全不同的。

他演讲的目的不是要给人文的方面来撑腰打气, 而是要给科学技术撑腰打

气。大家可能不太理解。在我们清华里，文科的学生有点愤愤不平，总觉得我们这儿的工科最大，现在理科也蒸蒸日上，好像大家总觉得文科还有点弱。这种感想、这点怨气总是有的。在我们国家的各个地方，好像都有这个现象。所谓“重理轻文，重工轻理”，类似这样的话总是存在。可是这种情形，在欧洲某些历史悠久的大学里还不尽如此。比方说德国什么时候都要把哲学、历史放在最前面，尽管心里头不那么想，但是一定会这么做。所以当时C.P.斯诺做著名的“两种文化”演讲的时候，他指出科学和人文的分裂时，是要给科学做正确的定位，不是相反。这一点，我们国家很多引用他的人不太理解。

关于“两种文化”的思想，在我们这儿引起很大的反响，特别是对于一些科学界的朋友。在“文革”以前我不敢说，可是在“文革”以后，就是这些朋友谈到C.P.斯诺。在那以前，人们不太好谈，或者是没看见，因为当时比较隔绝，没有看见他这点，可是在“文革”以后，很多人谈到他了。可以说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很长的时间里，大家都在讨论一个问题，就是如何把科学和人文，或者说广义的文化接轨起来。在这项工作上，有不少学者是有意地来推进，也做出了很大成绩。

我个人非常高兴能在这里向在座的同学们推荐一个刊物，这个刊物我不知道清华图书馆有没有，叫作《科学文化评论》。咱们有同学看过这个杂志吗？《科学文化评论》是一个B4大小的杂志。没有一个人看过？那我们图书馆可能没有这个刊物。这个刊物是2004年创办的，已经出版6年了。它是双月刊，每年出版6本，6本的颜色是按照太阳光谱来排的。《科学文化评论》是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和中国科技史学会的一些朋友们主办的。它的创始人之一是上一任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所长刘钝。很对不起，我不知道大家没看到过这本杂志，所以没有带一本过来。我还保存了它的创刊号，可以给大家展示。这个刊物很值得一看。

我们首先就要问，为什么是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和科技史学会来做这个事情？我想这一点可以答复。第一点，这是科学和人文交界的一个学科，科学史是自然科学史，包括技术史，这个研究所就以此得名。这个研究所在朝内大街137号。正是因为刘钝还有其他一批学者都是处在这样一个领域里面，所以他们

想办一个刊物。这个刊物的目的就是要把科学和人文结合起来，用他们的话说，是从文化的角度看科学，从科学的角度联系文化。

刘钝在这个刊物的创刊号有个发刊词，里面特别讲到了当前世界学术的潮流。既然大家都没看过，我就稍微介绍一下。他一开篇就举了希腊史的一个传说。大家都知道，科学史这个学科不是我们中国创造的，也是从西方开始的。从中国开始的没有几个学科，大多数都是从西方学来的，欧洲科学史上的那些经典学科著作都是从古希腊来的，所以他们也是言必称希腊。发刊词里用的也是希腊的典故。他说，在希腊神话里面主管艺术和科学的有九个缪斯女神，这九个缪斯女神一直流传下来，从希腊到文艺复兴，形成了“七艺”——七种艺术、七种技艺——的传统。而这个“七艺”的传统随着文艺复兴回到希腊、罗马的思维，这个趋势就形成了当时文艺复兴的一个特点，那就是把科学和人文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七艺”是什么呢？是逻辑、文法、修辞、音乐、几何、算术和天文。这就是从希腊的九个缪斯女神那儿传下来的，到中世纪就成了“七艺”这个说法。在文艺复兴时代，“七艺”这个说法就成了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来推行。受过高等教育，是成熟的人，应该是什么样呢？应该具备这“七艺”。这个“七艺”你可以看到，科学和人文两方面都包括在内了。所以它是一个整体，这一点很重要。

可是文艺复兴的这种基本思想和概念在后来随着学科的不断细化遭到分裂，后来就不是这个样子了。今天的学科分类，包括我们的学科分类表，不是这样的。它是分门别类，越分越细，而且是一种不断细化和分裂的过程，所以刘钝说，当斯诺在1959年5月7日开始那个演讲的时候，他无疑是怀着一个梦，这个梦就是一种理想，这个理想就是跟近代的分科教育和近代的知识分类是完全不同的“七艺”，或者是九个缪斯女神统一的理想。换句话说就是科学和人文的一致，它们的融合一致变成了一种理想。所以斯诺作为一个受欧洲传统教育的一个人，他的认识，他在做著名的“两种文化”演讲的时候，一定是怀着这么一个梦想。而且据刘钝说，他是带有一种堂吉珂德式的浪漫走上讲台的。他说，尽管是将近有半个世纪过去了，尽管斯诺和他本人的演讲遭到了不可计数的挑剔和责难，他所提出的问题仍然是耐人寻味的。这就是科学与人文的二元

分裂已经使我们的文化受到了损害，现在是采取有力的措施来弥补这个裂痕的时候。这就是《科学文化评论》这本杂志的主旨。

下面这段话非常有意思，我还是按照原文吧，原文说得比我说得要好。刘钝在发刊词接着说：“现代知识人的困境就是我们一面是陷入能够掌握多种知识和技艺的古代的先哲和文艺复兴式巨人，一方面又不得不成为学科、专业、集团和种种社会利益的囚徒。”一方面陷入文艺复兴式的巨人，可是另一方面要成功，还是变成了跟原来方向完全相反，变成分类的囚徒。他说，从世界学术发展潮流来看，至少有三方面的征兆显示出来斯诺的努力应该说现在还是有一定成就的，那就是斯诺谈的“两种文化”，他指出来的科学和人文分裂的重大问题现在还是有逐渐走向好转和解决的征兆。

刘钝的分析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他说由于科学的飞速发展和科学方法的强大示范，在传统的人文知识领域里面，应用科学的成果已经成为了不可抗拒的潮流。他特别举了历史这个学科为例。我看了之后深有感触。历史学是最古老的学科之一，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外国都是一样。大家知道，在古老的文明国家，历史学总是最早兴起的学科之一。我们的经、史、子、集，史在我们中国尤其有传统。有些外国学者说中国人是“历史的民族”，这话也不错，我们中国的历史传统是最为深厚的。可是历史学这个最古老的、有着最传统的、最深厚积累的学科领域，它本身的近代化或者现代化，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它从科学方面学习了很多东西。历史学不是狭义的科学，虽然有人用了一个词叫做“历史科学”，俄国人这么说，德国人也可以这么说，可是在英文来说，历史学就不能叫作science，它属于humanities。无论如何，历史学是个古老的、传统的学科，但它的近代化或者现代化的基础还是从科学学到了很多東西。

从世界的这个角度来说，历史学的近代化或者现代化的一个标志就是德国的“兰克学派”，而德国的“兰克学派”很显著的特点就是强调了描述和数量，而这一点正好是科学的特点。兰克是德国十九世纪的历史学家，提出所谓客观和批判，到李凯尔特提出的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对立。西方史学的一个主脉就是想从现在的科学方法来进行研究。在五四运动时，胡适也提到要把中国传统中的考据历史的方法看成一种科学的方法，把他所了解的科学的方法灌输到

历史考据的方面去。胡适本人就在做这个事。后来他说史料即史学，其实也是一样，强调材料，强调考据。这方面所做的倾向是类似的。这是第一个可能性。因此，自然科学导出的各种观点，特别是通过逻辑学和数学的联合，再引出的本体论和认识论的种种问题，就使哲学研究对象发生巨大改变。跟人文学术密切相关的还有艺术领域，也有科学的渗透，从解剖学、透视学、神经生物学、光学知识的应用，对于视觉艺术的发展和演变水到渠成。至于经济学、政治学、法学采用计量和统计的方法，心理学和语言学应用脑科学与计算机模拟的技术。这里面还有一个“认知科学”的这个词。还有地理学、考古学的学科，应用各种理科的方法，都显示科学在当代学术王国呈现的一种渗透，有一种睥睨群雄的气象。

刘钝他谈了好几点，我就不详细地介绍了。不过他谈的总趋势就是科学和人文本来是非常分裂的领域，各个分得越来越细的学科分支，互相影响，互相渗透，这种过程不但推进了科学和人文的发展，而且也造成了很多新学科分支的出现。新的学科分支，或是在已有学科分支里面产生的根本性的甚至可以说是革命性的变化，这个情景在今天是非常明显的。

在座的同学，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是我们人文学院的。比方说我们的历史系，现在有的学者做的经济史的研究，那种方法就是一种科学的方法，和过去的一般经济史的研究可以说是根本不同的。我举这个是想引起大家的注意，就是看起来当前全世界学术的发展是一个越分越细，科学和人文看起来是越走越分裂的一个过程；可实际上，特别是从二十世纪的后半叶开始，以斯诺的这个演讲作为代表的一种趋势逐渐形成，大家逐渐认识到这种分裂的害处，因此逐渐强调要回到文艺复兴时期提到的“七艺”这种观念所代表的一种总体的、综合的、融合的局面，使大家的知识和学科都得到很大的发展。那么这一点的话是从“七艺”开始的。

大家会说，刘钝这种说法是不是我们中国人这么想的，特别是中国这些年，大家都提到这些问题，有些作品也在讲这些问题，是不是这样？并不如此。刘钝在发刊词谈的这些话，不但引用了刚才讲的五十年代C.P.斯诺的代表性的演讲，而实际上，如果充分地关心整个世界的科学发展趋势的话，大家会发现这

种思想在世界上是相当普遍的，而且逐渐形成了一种潮流。虽然这里面发出的声音在今天来说应该还是比较微弱的，并不是很强，可是这个趋势是很明显的，而且看起来也越来越扩大了。

谈到这个地方，我想起来了最近这几年我经常在清华讲的一个题目，叫作NBIC。这个题目最早我是在信息学院讲的。我在清华大礼堂讲，那时候坐的人比现在多，是信息学院的学生。后来信息学院给我列了一个课程，我讲了六七个学期，新来的研究生都要听这个课。我已经声明今年不再讲了，我不在信息学院讲这个课了，因为已经讲过时了，而现在我们多少再讲讲。

什么叫NBIC？这是怎么回事？2002年，美国出版了一本书，这本书的题目我是这么翻译的，叫作《提高人类性能的聚合技术：纳米技术、生物技术、信息技术和认知科学》。纳米技术、生物技术、信息技术和认知科学凑起来就是N、B、I、C四个字母，他们就用这个来代表。这实际上是一个会议报告。这个会议非常重要，应该说是二十一世纪开端世界上最重要的科学会议之一，可是我们这儿知道的人很少。2002年，这个会议的论文集出版之后，贴在網上，我是在网上看见了这本书。这本书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同时，我们中科院的科技信息研究所也注意到了。当时很多人想翻译这本书，包括我们清华的一些老师也想参与翻译，可是这本书当时没法翻译，因为这本书的版权是分散在几十个作者那里，没有一个单一的版权，所以没法翻译。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吗？翻译的话必须取得翻译权，翻译权就得找那个版权人，而这本书有几十个作者，又没有详细地址，怎么做啊？所以没法翻译。我们中国科学院信息研究所只把导言翻译了一段，就这么一点，引起了注意。告诉大家一个消息，后来这个报告确实成为了一个正式的出版物。这个出版物出了之后，蔡曙山老师和我们商量好，已经把它翻译了，原来我以为可以在去年年底出版，至少现在还没有出，可能很快会出版。

这本书特别重要。这本书的重要性在什么地方呢？因为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学术会议。这个学术会议召开于2001年。大家知道，2001年是二十一世纪的第一年。美国没有科技部，而是有一个美国科学基金会。美国科学基金会和美国的商业部召开了这个会议。这个会议就是要预测二十一世纪开始阶段的

科学发展，所以这个会议很重要。我多次在信息学院做讲座，结束之后总有学生问我这个事情。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在2001年5月11号开了一个筹备会，决定会议的主题和人选，就是刚才我说的这个内容。这个会议是12月3日到4日进行两天，提交了50多篇研究论文。会后，由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专家 Roco 和 Bainbridge 编辑，编成这本书，2002年6月在弗吉尼亚出版。这个会议很重要。这个会议由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出面，具有官方色彩，它的规模虽然不大，但是覆盖面很广。从这个报告里我们可以看到，参加者属于美国政府机构，包括美国的能源部和宇航局，还有国家实验室的就有32个人，美国各个大学的重要单位有28个人，还有一些私营组织，包括一些企业，比如说IBM、惠普等这些，有19个人，是79个学科的学术专家。他们在这个会上都提交论文，最后由 Roco 和 Bainbridge 这两个人把大家的论文综合起来，写成了这个报告。

这个报告实际上就是对二十一世纪前二三十年科学发展进行预测。大家可以想象，虽然这完全是美国的一个会议，可是它强调的方面很重要。他们这个主题非常特别，不是那种所谓“未来学”，讲的是一般的东西，它是很具体的。比方说，它就讨论了包括纳米技术、生物技术、信息技术和认知科学，包括脑科学、神经科学这一类的东西。根据他们的话，是“估计这些学科的发展”。它指出，这些发展在二十一世纪的前10年或者20年，这个世界里面一定会逐渐地综合起来，不是进一步地分裂，而是逐渐地综合。这一点很特别，这是他们的一个推测。这些技术的综合也不是一般的综合，它是用一个四边形为例，做成NBIC这样一个菱形的关系。就是说，纳米科学和生物科学可以互相综合，互相交叉，产生新的内容；生物科学和信息科学也可以这么做，认知科学和信息科学也可以做，然后互相之间也可以这么做。就是NBIC这四种作为四个层次或者四个领域的科学技术，可以综合起来作为一个四边形，这就是NBIC的基本关系。大家如果注意到美国的一些科学杂志的话，就可以发现不少学科都引用这个观念，所以它的影响还是较大的，虽然不像我们想的那么大，它说的那些也不一定全部会实现，可是它的趋向还是很重要。它认为这种综合会影响多方面，这个多方面包括以下九个方面：第一，提高人的工作效率；第二，改善人的体

质和心智；第三，改善通信和教育；第四，改善人的精神健康；第五，提高航天和航空的技术；第六，改善人的食品和农作技术；第七，改善人的可持续的和智能型的环境；第八，提高人的自我表现和提高时尚（注意到时尚就是fashion）；第九，就是引起文明的根本变革。它认为NBIC在二十一世纪可能就像工业革命一样，引起根本性的变革。这是九个观点，而它这种变革最基本的思想是什么呢？就是回到文艺复兴的统一科学。在这个思想上，它和我刚才提的爱因斯坦指出的分裂，C.P.斯诺提的“两种文化”的分裂，就是要改变这个趋势，而回到以文艺复兴为代表的统一科学上。那就是，人的知识作为一个整体来看，不但包括人文的方面，还包括科学的各个方面，然后把这些综合起来，形成一个整体。对于这个整体，科学的发展作为更有序、更有计划的推动，所以叫NBIC。

除了NBIC以外，有的学者还特别提到还有一个社会，就是NBICS，还有个S。关于这个问题，如果注意到美国的这个社会，就会发现，从爱因斯坦、斯诺，还有许许多多重要的学者提出的这些问题，已经为相当多的科学家，包括像美国政府人士注意，而这方面，正在不断地推进，它的影响不断地扩大。但是我们不是说NBIC一定会实现，可是这个趋势大家应该特别注意。我们说，科学和人文的融会，人类知识的统一，这些方面应该会有一个新的发展趋势。而且我个人认为，我们大家共同推进这样的趋势，应该说是有益于我们国家、社会和整个人类的。我想这一点很重要。那么，现在的情况到底怎么样？应该从哪些方面着手？这就不是我能说的。是不是胡老师来讲？您要是来讲，我一定会来好好听，学习学习。

我今天引用了很多，我还想再引一个人。刚才引的那些都不是中国人，我们找一个中国学者，不过不是我们这里。我们引一个台湾的，大家都知道的，就是吴大猷先生。吴大猷是我们物理界的老前辈。他在台湾做过“中央研究院”院长，我个人还有幸见过他。吴先生是1907年出生，2000年去世，他没有到2001年的二十一世纪。

吴大猷先生在很早的时候就写过几篇文章，这几篇文章当然不是针对我们大陆内地的，是针对台湾的。大家知道，吴大猷先生很少写东西，他惜墨如金，著作并不是很多，平常也不是那么多话，可是他写过一些短文，这些短文应该

说针对的是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台湾教育。关于台湾的情况、台湾的教育，他谈了一些话。这些话我也想介绍给大家听，看看跟我们这儿有没有类似之处。他的选集中有一篇短文，题目叫做《社会富裕反导致学术下降》。社会有钱了，学术反而下降了。这是怎么回事？我想，这个题目当时在台湾方面一定会引起注意，尤其是吴大猷的身份，一定会引起注意。他说：“对于学术发展来说，钱是必要，可是，是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这一点很重要，他想谈谈钱和学术的关系。他说的是台湾，“十余年来，台湾的社会较之二十年前富裕多了”。你就知道他是什么时候写的了。他说：“我们在经济上的成就已经获得了国际上的赞誉，也使我们略微抬头。可是我们同时付出了一个极大的代价，就是我们整个社会的价值观也大大改变了，受影响最大的是我们的学术。我们教育的普及、学术的设备和人数，可以说在相当的程度上达到了国际的水准。问题是，我们学术的质反而随社会富裕日增而下降。”这就是他的主题。

大家知道这跟我们现在差了有一段时间，这是台湾社会的情况，学术反而下降。他说：“以学生而言，尽管各级升学竞争激烈（什么叫做各级升学？小升初，初升高，高中再考大学，大学再考研究生，这就叫做升级），但很多人求学的动机是功利性的，比如是为了学历、学位（他没好意思说是为了挣钱），没有高远的志趣，也没有求知的原动力。”“再说，以学术人士而言，其专心致力于学习、学术的研究和教育，固有之。然其借研究补助金为升等为研究的原动力（升等这个词是台湾词，就是升级、提级的意思），以兼职或写作求名利为目标者，亦所在多有。以社会环境及政府政策措施而言，如奖金征文皆系以钱为‘唯一’酬劳。余以为，过于物质性的气氛对学术研究或文艺创作都会有不好的作用。由于工业成长猛速，社会繁荣，对青年及学术人士已经产生重大影响，而政府的政策及措施又过度地偏重功利效益，过度地深信钱为解决科学技术人才的工具，而忽略了基本要求，即发展科技首先需要人才，而人才不能够永远从外面取得，需自己培育。培育人才需要环境和人才，建立环境也需要人才，甚至连了解这一系列老生常谈的滥调也都需要人才。这些人才需要训练、培养才能得来，不能随意买来。培养人才需要环境、设备之外，还需要有学术气氛。这不仅花钱买不来，而且和那种激烈的压力是不相容的。”这就是吴大猷在30年

前对台湾的描述。大家听听就会耳熟能详，并不陌生。

为什么是这样？我想这一点我们还是从历史的角度去看。刚才谈到爱因斯坦，谈到C.P.斯诺，我们都是从他们的历史情况去谈，对于吴大猷先生的话也应从历史的角度去谈。台湾的社会和我们的社会不可同日而语，有根本的不同，这是没问题的。可是还是有一定的共同之处，就是大家都是处在一个转型的社会时期，都是一个走向现代化的社会，而且都是中国的社会，他们的根底是一样的，所以在海峡两岸会出现一些共同的现象也不足为奇。从这些我们看到，这是历史的必然。

前些年，常常有些朋友、同学问我问题，说什么“重理轻文”等这些类似的现象，将来我们该怎么办？我说，我是一个乐观派、乐天主义者，我觉得有些问题最后总会解决，因为这是社会发展到一定时期的必然现象。到一定时期就必然出现这种现象。我举一个很不恰当的例子，这就好像污染。污染是不好的，可是污染是不能完全避免的。你能避免污染吗？你要工业化，你就必须污染。你要一点没有污染的工业化，那根本就没有。我常常举个例子：我20世纪70年代末的时候第一次到了美国，是美国政府的一个学术机构接待，所以他们给我安排了去匹兹堡参观钢铁厂。这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大规模现代化钢铁工厂。我一到工厂，他们就给我看一条河，河里还有鱼在里面游。这是他们的厂河，这条河里的鱼要是死了，工厂就得关门。走到里面，是一个中央控制室。那时是20世纪70年代，中央控制室还没有现代化的设备，有几个穿着制服保安样的人，没有椅子，他们都站着。他们的脸朝向各方向，周围都是电视屏幕。他们看什么呢？看烟囱。因为坐容易犯困，所以他们都站着。哪个烟囱要是冒着有颜色的烟，马上拉警报。当时就是这样。我问这是为什么，他说，这里过去是全美国最脏的地方，污染最甚的地方，匹兹堡不能住人，连匹兹堡大学的50层大楼上都是烟。现在好多了。所以在一定的历史过程之后，像污染这种问题是可以解决的。像伦敦，过去我们看福尔摩斯小说，伦敦的雾很大，福尔摩斯追一个人，那个人一转身，到雾里，就看不见了。可是我去过英国很多次，也住了很长时间，都没有碰到过雾，连污染也没有。为什么呢？伦敦的污染问题已经解决了。可是伦敦的火车站，像国王十字车站，墙上的煤烟，因为熏了多少

年，现在用机器一点点地磨掉，因为用化学药品除不掉。所以在一定时期之后，社会上的这些现象和问题都会得到解决，因为人们总是能从历史的经验教训里面，要加快这个问题的解决，使这些问题带来的损害降到最低程度。这一点应该说是非常重要的。

最后吴先生还写了一点东西，也给同学们介绍一下，因为他直接提出来这个问题，对于科学与人文、社会与人之间的分裂和对立该怎么解决。很重要的一点吴大猷提出来了，我想这也是每一个——他叫“知识人”，我们叫知识分子的想法。他说要通过教育，他用的词是“通识教育”。他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叫做《通识教育》，可能在座的同学也没有看过，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大家听听，看看是不是和我们今天的情况有些类似。

他说：“目前的学生（当时台湾的学生），在国中毕业时（这点要解释，台湾用的是日本式的词，国中就是国民中学，意思是我们现在的初中，国中上面是高级中学）即做了职业教育或高中的选择。其考入高中者即做了人文社会或理工农医的选择（就是文理分科。这个大家都知道，在座的同学也有一定的经验）。其考入大学者，即分入各院系，受专门性的训练。迺来，社会人士都有通识教育的提法。它的通识教育的要义和理想是使一个人有国家的文化、历史、社会问题的知识，有哲学、文学、艺术修养，有科学的基本知识，对事物有客观分析的希望和审判能力。这样一个人，从他个人的观点，来享受比较丰美的人生，从社会的观点，可以对国家、社会有较大的贡献。从这个观点谈通识教育，我们需要在几个观念上做出澄清。第一，在我们大学中，使文学院、理工学院的学生选习若干个学分的某些课程，仅仅这样做，只可以说是浅薄的企图，和通识教育还有极大的差异。第二，目前我们的高中已经分组，考入大学文法学院的学生，在高中阶段不再与理化生物科学等接触。在近十年来，大学所招的文法学生的理科成绩在60分以上的人数只占总人数的1%到2%，而成绩在40分以下的，约占90%。这些学生大学后，他们的理化知识可想而知。对基础训练这样偏的学生，怎么才能够给予有意识的通识教育呢？反之，理工学生也大约是这样，在高中没有养成广阅求知的兴趣和习惯，到大学再来通识，恐怕就太晚了。第三，目前我们大学的科系确系过度偏专狭窄。社会有些人误以为大

学教育是为了学生找职业的教育，也有的学术界人士以为大学应给学生专才训练，这些都是偏狭之见。大学教育的理想是培育学生以接触各种教育机会的处所，他可以选择专门学术，如历史、数学、哲学，或选择医、法律、工程等自由职业的教育，也可以选择通识教育，或者兼专门学术的通识教育。换言之，大学是学者和学生都由自由选择所选择的学术处所。按上面第二点，任何矫正目前过度偏专大学教育的企图，势必由高中着手。这可以说是通识教育的初步企图。”

再一个就是吴大猷先生，他说，我希望文学和社会科学一方面也可以有类似的认识和措施，所以他说一个人从事专心研习之前，使他养成有对广面求知兴趣、态度和习惯，使他有自己继续成长和发展的基础，这是教育本身的目的。吴大猷先生那篇文章是对当时的台湾来说的，差不多是30年以前了，这是当时的情况，我们不可能搬用。不过，有一点，从我个人来说，我觉得是很对的，而且也是很感动的，就是强调要从高中开始。这一点也不是吴大猷先生个人的见解，后来很多的人都是如此。这是由于他们整个教育体系当时已经充分暴露这个问题：就是到大学再教，已经不行了，没有可能做了，晚了，出的都是偏才，特别是在功利的情况之下，再也补救不过来了，因为基础在于高中。这一点，我想在我们这里也有充分的认识，认识比他更深刻，因为我们地域更大，这个问题的影响更深。最近两三年来，在每一年召开的“两会”上，都有这个呼吁。

今天我有这样的机会来介绍一些读书的体会，谈了这些问题，我个人对这些方面了解非常有限。因为我长期是在科学院系统工作，对于教育界我了解不够。在座的各位老师，包括一些老同学，应该说体会和认识比我深刻得多。

是不是还有半个小时的时间？大家有什么问题交流一下，也给我一点儿教育。

问答

问：李老师，你刚才讲到现在关于科学和一些传统文化学科领域的融合当

中，比如说历史，你提了兰克学派。兰克学派有人说它是过于绝对地、过于客观地看待历史了。毕竟历史的很多材料代代相传，比如说有一些作者的主观因素在里面。这些方法在19世纪末遭到一些质疑，然后最终也不太被人看好。您是怎么看的？谢谢。

答：我觉得这个问题很有意义。当然每个学派都有它本身发展的历史，刚才提到的所谓兰克学派，是在欧洲的历史学传统里面一个影响比较大的学派。后来大家对它的批评当然是非常多的，特别是在法国和意大利。这方面的批评我觉得都很正确。无论如何说，把历史学科完全变成像自然科学一样的学科，这是做不到的事，而且也不应该这样做，没有必要这样做。虽然我们可以在理论上使它更精确，更能够像科学一样的发展，达到一个真理性的水平，可是历史学究竟是历史学。刚才举这个例子，目的只是说明，即使是在像历史这样一个古老的文科学科里面，它也有可以向科学学习的方面，而不是对兰克学派做多大的评价。不过有一点我要特别提醒，兰克学派对于亚洲、包括中国过去的历史学影响很大，因为兰克学派首先影响到日本，日本学习历史的人中有很多人受兰克学派影响，包括日本一些研究中国史的人，也受到兰克学派很大的影响。这些影响都过去了，这应该是学术史上的问题。谢谢。

问：刚才李老师讲到很多人文学科，包括社会学科，都采用一些科学的方法来做研究。这个现象就说明人文与科学的结合是有可能的，这也是李老师乐观的理由，我也非常同意。我想从另外一个角度，就是从科学研究或者技术发明的角度来提这个问题。科学技术在发展过程中对人文营养和知识的吸收是个什么样的情况，是不是能请李老师帮助我们分析一下？因为我们现在担心的就是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可能给人类带来的问题。做科学技术的学者也好，或者是专门人士也好，他们会不会对人文有些漠视，会认为人文全无用处？您是不是可以从这个角度启发一下同学和我们在座的听众。谢谢。

答：曹老师提的问题，我想是我们很多知识人共同抱有的问题，特别是我们不是学自然科学出身的，而是学文科出身的，我们怎么去体会。允许我在这里说一下我自己个人的意见。刚才介绍了我在1951年入学，我是1951级的。我在1952年就到科学院去了，所以给我发了一个52届的纪念章，它给我算什么时

候我也说不清了。我们那时候念书的时候并不是那样。说老实话，真不是这样。我们那时候念书的学生，其实生活比今天的同学困难多了，像我家里，吃饭还是保证的，可是困难多了。我们买不起书的。那时候有一个学者叫李书华，很有名的一个科学家，他写了本《科学概论》，是上海的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我想买这本书，就是买不起。为什么买不起呢？因为我没有那么多钱，为了省钱，我就不吃早饭，省了一星期的早饭，还不够这本书的钱。当我去买的时候，北京已经卖完了，结果我就没有买到，没看到这本《科学概论》，就是这样。可是我说我们那时候的同学没有像大家那样，怎么说呢？我不是说所有人都如此，没有现在流行的那样功利化，没有人想学什么学科赚钱。比如说我到清华来，我要报考这个学科哲学系我是第一志愿进来的，我并没有想到将来挣多少钱，没有这个意识。我们那时候很多的理工科的老师对文科非常重视。那个时候思想改造，我们检讨受西方哲学影响，也有物理系的，他们对康德的认识比我们哲学系统的认识都深。

很多人怀念西南联大。西南联大的传统，好处就在于各个学科都是一起，互相没有界限、没有分隔。今天就不是这样了，今天的分隔非常可怕。这个讲座开始以前，我跟胡老师谈一件事，现在很多人不愿意听和学科没有关系的讲座。这完全不对，我们那时完全不是这样啊。我在剑桥，曹老师也在剑桥待过。我在剑桥每天从图书馆出来，马上去买Cambridge Evening News，首先就打开看今天晚上有什么免费演讲，不要钱我不是白听演讲了，为什么我不去呢？我一个人住那儿干什么？我建议，我们清华有那么多演讲，那么好的机会，大家一定要珍惜。我自己听不了，是因为我太忙，要是不忙的话我一定会去听。今天晚上有我们考古学家刘庆柱的演讲，我推荐大家去听。他做过考古研究所所长，专门做田野的，陕西人说话也好懂。为什么不听听呢？这么好的机会哪儿去找啊？等你到了工作岗位，哪有时间去听呢？晚上我跟大家一样去听。谢谢大家。

问：李老师您好！您刚才提到的功利的动机和求学、做学术，更多是不利于研究和学习的一面。从另一方面来说，功利也可以对人类求学或者做学问有正面的刺激，让他去付出更大的努力，去取得更大的成就。那么我们怎么来看

待这个问题？或者怎么来找到更好的出路，来让这种正面的刺激对学术或者求学有更大的发展呢？

答：我觉得这个问题也提得很中肯，很有意思。我个人不认为一种功利的、有所为的这样的一种思想完全没有推动作用，这不会是没有的。有的人可以废寝忘食，他是个有定力的人。为什么？我常常举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就是著名的德国考古学家施里曼，他毅力就特别强。家里分文都没有，为了去考古，他怎么办呢？他是犹太人，去做生意。他做了40年的生意，成了一个百万富翁，然后去发掘特洛伊。你看有意思吗？当然，他有个远大的志向。所以我说区别就在这儿，就是功利不能完全是自私的，可以是有所为的，有所为不等于就是自私的，这是两回事。完全自私的人对于学术不可能有较大的发展，即使是在技术上可以有一定的提高，可是从科学来说，是不同的。真正的伟大的科学的变革不会是由于纯粹的个人功利而达到的。我想到今天为止的科学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不知道对不对？谢谢。

问：李老师你好，我的问题是说，您刚才也讲到，现在内地跟30年前台湾地区的大学比较一致，大学培养的都是偏才。我们中国内地其实也是这种情况，我们同学都处于两难的境地，就是我们一方面跟高中生一样，专业的兴趣几乎是没的，可能也有几个是正好歪打正着的，碰到这个也感兴趣，可能就慢慢地培养出兴趣了，可是一般都是没的。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方面我们强迫自己要把专业学好，现在是市场经济，将来要工作，因此也必须要把专业学好。但是你要是只注重一个专业的话，其他方面就会照顾不到。这样就处于两难的境地：一方面必须把专业学好，另一方面又不是特别感兴趣，然后其他方面也没办法顾及。这种情况您有什么建议？

答：确实是这样。我忍不住要说，对今天的学生，特别是今天的中学生，我有很多同情，太可怜了！我自己也有一个孙子，在附中已经毕业了，现在在德国念大学，他念得不错，还得了奖学金。我看他念中学就可怜得很，跟我那时候念中学完全不一样。我念中学的时候，下午三点半，我们就看电影了，一定可以找到一个便宜的看电影的地儿。我也在念书，我也念了这么厚的《范氏大代》，它是大学的课本，我们中国人拿它当高中课本念，我们也念了。这个

问题我们不讨论它。不过我觉得，对于每个从高中上来的到大学本科的同学来说，至少可以有一个很远大的兴趣和爱好。这一点完全可以做到。一个人的一生里面完全没有时间做自己想做的事，那也不可能，除非这个世界上都是囚徒了，囚徒大概做不到吧。一个人总会在一生里面，有一定比例的时间，能够做自己想做的、喜欢做的事情，或者喜欢学习的东西。有这个志向跟没有这个志向，应该是完全不一样的。谢谢。

问：李老师您好，您刚才提到台湾地区吴大猷先生的两篇文章，第一篇文章讲的是他们当时社会比较功利的现实问题；第二篇文章在我听来您谈的是他提出的第一个问题的解决方法，就是通识教育。通识教育真的可以解决当时社会比较功利的问题吗？如果这样就可以解决的话，那是不是也太简单了一点？我想请问一下您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如果要您提出一个方案的话，您会选择什么？

答：谢谢。我很高兴听到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表示同学对于我刚才讲的听得很仔细，听得很细致。我感谢这个同学。这个同学说得很对。我刚才说了，我谈了我个人的一个看法。我认为这些现象，包括大家的那种苦恼，都是一定历史时期的产物。这一点能不能叫“历史唯物主义”我不知道，可是一定历史时期会造成一定历史时期的一些思想、观念、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向。问题一定会解决。我是个乐天派，因为人类总是会进步，除非人类毁灭了，除非我们遇到永远不能抵抗的流感，可以在几个月之内把人类消灭了(这是没有的事)。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非常有希望。二十一世纪，特别是我们中国今天正处于上升阶段。吴大猷讲这个的时候，台湾有其特有的问题，今天的问题已经不完全是这样的，可是我讲到这个的时候，我觉得还有我们值得借鉴的地方。问题就是我们怎么样把我们今天不理想的情况缩到最小，而更大地促进我们更理想的明天的到来，这点我们大家都可以努力。

主持人：感谢大家的提问，也感谢李学勤教授给我们带来精彩、生动、深刻的演讲。今天李先生从爱因斯坦留给5000年后子孙的信讲起，爱因斯坦主要是针对当时社会背景，指出它的根源在于商品生产和分配的非理性以及人们才智的低下。实际上他指出了一种科学和人文分裂产生的背景，也讲明了他对科

学和人文的这种融合的期望。

爱因斯坦本人就是一个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相融合的典范。就像在1935年，他悼念居里夫人的时候说：“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其道德品质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方面还要大。”所以他非常看重人的品德和才智，而且他这种看法在教育上有深刻的反映。他有这么一个说法——他说：“有的时候，人们把学校简单看作是一种工具，靠它把大量的知识传授给成长中的一代，但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知识是死的，而学校却要为活人服务。它应当发展青年人中那些有益于公共福利的品质和才能。但这并不意味着应当消灭个性，而个人只变成像一只蜜蜂或蚂蚁那样，仅仅是社会的一种工具。因为一个没有个性、个人独创性和个人志愿的规格统一的个人组成的社会，将是一个没有发展可能的不幸的社会。相反，学校的目标应当是培养有独立行动和独立思考的个人，不过他们要把为社会服务看做自己人生的最高目的。”

这段话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刚才那位同学提到的功利作用的差别。爱因斯坦一再强调：“学校的目标始终应当使青年人在离开学校时，是作为一个和谐的人，而不是作为一个专家。”爱因斯坦本人就是这种教育理念的实践者。他是追求自由、独立思考和自我负责、自觉的、全面和谐发展的典范。今天李先生给我们谈了爱因斯坦，我们应当从爱因斯坦的为人治学当中得到启示。

李先生是一个著名的历史学家。他不仅以宽阔的知识面以及对我们中华历史文化的热爱和一种高度的责任感来研究我们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同时，他作为人文学者，一直十分关注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人文文化对科学技术的影响。无论是李先生开始举的爱因斯坦的例子，以及他今天讲的这些和他本人的实践，都能够启迪我们：无论是科学家还是人文学者，凡是有建树的，并且能够以人格的魅力给社会以积极影响的，都是体现了他们的真、善、美，以及他们在真、善、美之间的和谐精神，执着的追求。

这应该是我们举办这个“科学和人文和谐和双赢”系列讲座的真正目的。李先生也提到到底该怎么做。这个问题确确实实我们教育界已经在谈，现在也没有说找到一个非常完整的答案。正如刚才提到的通识教育，通识教育发端于美国。美国在2005年还提出，要通过十年的大讨论，对什么是通识教育和怎么发扬通识

教育的价值开展讨论。所以这个问题在我们国家现在也是刚刚起步不久。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我们谈的文化素质教育，它跟通识教育有相通的地方，正像李先生所讲的，或者说爱因斯坦对今后所期望的，就是经过大家共同的、锲而不舍的努力，我们一定能够找到一个比较好的道路。就是说，我们在座的同学学了文化素质课，听完这么一系列的讲座，能不能提高一种文化的自觉，使自己的科学素养和人文素养能够更加和谐；或者是按照爱因斯坦所讲的，我们给自己定个目标，在自己走出校门的时候，不是以一个专家的身份走出来的，而更应该是一个和谐的人、一个完全的人、一个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人。我想，如果同学们给自己定了这么一些目标的话，就能够抵御一些短期的、功利色彩的诱惑。这样的话，也会像吴大猷先生所讲的，对自己，去享受丰富的人生；对社会，对国家会有更大的贡献。我们希望大家能够以自己的实践做出回答。谢谢大家！

（本文系2009年5月14日于清华大学所作的讲座记录，主持人为胡显章教授。
原载曹莉主编：《科学与人文：双赢与融合》，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年）

李均明等《当代中国简帛学研究》序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李均明研究员和刘国忠教授等新近撰写的这部《当代中国简帛研究》，向广大读者系统展示了中国简帛学这一新兴学科的发展轨迹和丰富内容。

简帛学是二十世纪创建并取得丰硕成果的一门重要学科。如大家知道，竹木制的简牍与丝质的缣帛，是中国人于发明纸以前使用的书写载体，其广泛存在的时间约两千年之久，其在历史文化上关系之重大可想而知，是关注中国文明传统的人们必须了解的。

现代学术界重见古代这类文物，正好是在二十世纪刚刚揭幕的时候。随后种种发现越出越多，考察研究也渐趋深入，对于简帛的性质、材料、形制、用途以及其内涵种类、文字体例等方面的知识，得到逐步积累。对古代简牍帛书的研究作为一个学科的契机，就渐渐成熟了。

纵观简帛学兴起演进的过程，大致可分为这样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二十世纪初西部地区汉晋木简的发现，最早的事例为斯坦因1901年在新疆尼雅的获得。这个时期最重要的研究成果是王国维的《简牍检署考》及他与罗振玉合著的《流沙坠简》，给后来的研究打下了基础。

第二阶段的重心，是1930年西北科学考察团掘获的居延木简和劳榘等先生对之进行的整理考释。由于这批简牍远比其前的发现丰富，在历史、考古学领域造成的影响更为显明。

第三阶段乃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尤其是七十年代以来，随着田野考古工作的铺开，多批简帛陆续发现，无论是时代跨度，还是数量和内容，都远远超越了过去。简帛的保护与整理成为十分紧迫的学术课题，简帛的研究和许多学科建立起联系。适应工作的需要，专业性的整理研究队伍逐渐形成。在高校和研

究生教育里，有关研究也成为培养方向。

进入新的二十一世纪以来，简帛学的进展尤觉迅速。同其他一些学科一样，这个学科的进步表现为学科的细化。

许多学者业已认识到，细化是简帛学步入新的发展阶段的明确表现。事实上，历年出土的大量简牍帛书，依其本身性质，可划分为典籍和文书这样两大类，对两者进行整理研究的方法途径彼此有相当大的差异，所需要的知识手段也互不相同，应该作为两个学科分支看待。以往在有关资料较少的时候，同一位学者对典籍、文书两者尚能统观兼顾，如今发现层出不穷，想一概深入研究已经是几乎不可能的事。具体的例子，如郭店简、上博简、清华简等战国楚文字书写的典籍，里耶简、长沙简等秦汉三国时的文书簿册，任何一项的编排考释都需要专业人员深厚的积累、长期的功夫。很明显，把简帛学划分为简帛典籍、简牍文书这两个学科分支，不仅是发展的趋向，而已经是当前的实际了。

李均明、刘国忠等的这部《当代中国简帛研究》，与其他类似的概述性书籍的不同，正在于将简帛典籍和简牍文书分开来论说。书中为了方便读者，先讲简牍典籍，再谈简牍文书，而以帛书殿后，眉目非常清楚。读者很容易看到，简帛学是怎样起源和形成，又如何走到今天，细化为简帛典籍和文书这两个学科分支的。我们不妨以这部书的出版，作为简帛学进一步细化的标志。

学术史告诉我们，学科总是不断细化的，但细化越繁，各个分支的交叉关系就越强，换句话说即越需要互相关联和结合。希望《当代中国简帛研究》的读者，先总观简帛学领域的全体，再深入了解各个分支以至诸项发现，对于这门学科一定会有较全面的认识。

2011年1月14日

[李均明、刘国忠等《当代中国简帛学研究（1949—2009）》，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

燕昭安《解读朝歌》序言

中国古代文明辉煌灿烂，历史悠久，分布辽阔，实为世所罕有。正因为这样，在文化积淀深厚的各个地方，都会有一些志士仁人，倾其精力，对当地的历史文化进行发掘阐扬。由于他们身历其境，寝馈其间，其感受之深切，资料之丰富，探讨之深入，自有外人不能比拟之处。

这部《解读朝歌》的作者燕昭安先生，就是这样的一位地方学者。他研究朝歌历史文化近三十年，有不少论作。记得1994年，他前来北京，我有机会同他相见，所谈便是这方面的问题。2009年，因要筹备第三次全国鬼谷子学术研讨会，他又两次来我在清华的寓所。几次会谈时间虽短，但对其人品谦和、学风谨慎，获有相当深刻的印象。

古朝歌位于今河南淇县，地势冲要，是中国历史上一处非常重要的都邑。传世文献记载，商朝最末一王帝辛（纣）即居于此，到西周初年又成为卫国的都城。最近发现的清华大学所藏战国竹简《系年》说：“周成王、周公既迁殷民于洛邑，……乃先建卫叔封于康丘，以侯殷之余民，卫人自康丘迁于淇卫。”“淇卫”正是在淇水之滨的朝歌。此后一直到春秋战国，许多历史事件、历史人物都与朝歌相关。我们研究先秦时期的历史文化，往往绕不过朝歌。

我曾多次访问淇县，得到当地领导和学者的帮助，观察种种遗址和文物。1991年，田涛先生著有《纣都朝歌》一书，我应邀为之作序，该书于1995年出版。1994年，“第一届鬼谷子学术研究会”在淇县举行，我提交了论文，后又为其论文集写了序言。1995年7月，更有幸为朝歌题写了这么几句话：“朝歌故地，史称殷都，绿竹猗猗，《卫风》所书。历三千年，终有新图，胜迹叠见，新贤辈出。”词虽不文，还是抒发了一己的心情。

对于朝歌的历史文化，我们历史、考古学界给予的关注还很不够，还有很

多关键性的问题悬而未决，有待探讨和研究。燕昭安先生这部《解读朝歌》，详细系统地介绍了当地的自然环境和历史发展。希望读者以此作为导引，增强对有关研究的兴趣。专业方面的朋友也能进一步开展工作，推进环绕这一地区的各种考察研究。

2011年2月27日

（燕昭安《解读朝歌》，河南人民出版社，2011年；又见同时出版的《朝歌稽古》、《朝歌春秋》）

报纸上的学术文章要力求简明

《光明日报》国学版创刊迄今已五周年，这是一件非常值得祝贺和纪念的事。这几年来，我和众多学术界同人一样，每星期都在期待着读国学版。

在报纸上开辟定期的学术专版，是清末民初有了报纸以来一直持续的优良传统。不妨回想一下，在近现代学术史上，有多少重要关键的成果在报纸上发表，有多少影响深远的讨论在报纸上展开。由于报纸出刊及时，流传普及，给了学术界很大的帮助。《光明日报》国学版在这几年“国学热”中所起重大作用，是大家周知的。

我特别喜欢读国学版上那些简短明快的作品。这使我想到，国学的一个重要传承，就是写简明扼要的学术文字。古远的不说，人人都知道的顾炎武《日知录》，王念孙父子的《读书杂志》、《经义述闻》，真是言简意赅，绝非所谓“短钉”文章可比。近世许多位大家，所撰作也是如此。

学术论著自然有长有短，应该以说明问题为度。列举文献史料，征引前人论点，也没有必要小大不捐，务求全面过细。这样，不少长篇大论的文章，就可以缩短，适合在报纸的专版上刊登，而且不降低内容质量。

因此，希望《光明日报》国学版发扬学术专版的特有风格，多发表短小精当的研究讨论文字，进一步推进国学的建设。

2011年3月6日

（原载《国学访谈录》，商务印书馆，2011年）

陈青荣、赵缙 《海岱古族古国吉金文集》序

《管子学刊》编辑部陈青荣女士和山东理工大学赵缙先生伉俪，与我相识已有不少年。他们的这部《海岱古族古国吉金文集》，纂著研究经历十年之久，几次的修改稿都送来北京，征求我的意见，使我为他们坚持不懈的毅力、虚怀若谷的学风，感到佩服不已。现在全书即将出版，要我赘言几句，自然难以推辞。

在中国古代历史文化上，山东地区所起的特殊重要作用，是学术界众所周知的。前几年我曾应邀在烟台大学作过一次题为《夏商周与山东》的演讲，“概括起来是想说明一点，即山东地区在整个夏商周时期都是极其重要的，山东古文化在整个中国文明史进程中有其特殊的地位”。探寻夏商周古史，必然以山东为重点，而研究当时的山东，又必以金文为核心材料，《海岱古族古国吉金文集》一书的纂著，正是适应这方面的需要。

说到山东金文，大家一定会想到曾毅公先生的《山东金文集存》。该书印行于1940年，尽搜其时所见，当然有筚路蓝缕之功，然而仅有薄薄两册，在内容数量上与陈青荣、赵缙两位的这部书难于相比。这充分反映出近几十年间考古发现和研究已经取得了十分显著的成果，以及陈、赵两位在这方面贡献的苦心 and 精力。

这部书的《后记》中说，他们两位做这项非常艰巨的工作，是抱有一种信念，即：“商周古族古国空间地理的落实与突破，应从海岱山东始，这是由于《春秋》经肇自山东鲁国，后又有《左传》的补充润色，在早期的古国、古邑、古地名上都有比较翔实的记载，再加上后来明清时代史地专家的注疏，更结合今日考古文献资料之昌盛，遵从王国维先生所倡导的‘二重证据’法，廓清商

周古族、国活动空间及范围的工作，山东实在具备得天独厚的条件。”这已经把这部书的目的和纲领讲明白了。这部书不仅是山东金文的辑集和整理，更是对山东出土及与之相关的金文中的古国和族氏进行了一次详细的探索研究。其所采用的方法，他们曾在一封信中告诉我说，是：“以传世文献中明确记载的山东商周古国资料为基本依据，以山东出土的商周青铜器为主要线索，以出土文献（甲骨文、陶文）的相关记载为进一步参照佐证。”我认为这个方向是很正确的。

特别要指出的，是书中关于商周金文中的所谓“族氏”有独特的见解。例如“族氏”金文最习见的鬯，陈、赵两位在来信中讲道：“目前，鬯器的集中出土地点是山东的长清与费县，（滕州）前掌大与桓台也有出土，仅桓台一地零散出土就有五器，所以鬯无疑属东夷”，但鬯又见于不同姓氏的金文，用有的学者力主的族氏分支理论来解释比较困难，“可能是古老东土联盟族团的一个徽识”。这一类新的观点，对有关问题的进一步探讨殊有启发，也表明《海岱古族古国吉金文集》不只是资料汇编，实际对学术研究多有贡献。由这里出发，甚至可以引导到若干富于理论意义的领域。

赵缙先生是著名历史学家赵俪生先生的哲嗣。历史学界的人们都知道，赵俪生先生学识宏深博大。其于过世后出版的文集《桑榆集》，封二对他的介绍就强调他“以理论思维见长”，这是准确的，即在该文集中正有一篇文章题为《光考据不行，还需要思辨》。然而在获知这部《海岱古族古国吉金文集》的编纂计划的时候，赵俪生先生予以充分肯定，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课题”，并且亲笔题写书签，以属厚望，显然他已经洞察到这项工作将具有的价值和意义。

我多年景仰赵俪生先生，绎读过他的大部分作品，也幸有机会亲聆指教。记得八十年代我有一次到兰州大学，赵俪生先生款待我在他家吃饭。那时偶然有一谣传，说在北京大学的王瑶先生逝世了，我向赵先生讲到这件事，他极为惊愕，见于颜色，我急忙解释这不过是风闻，未经证实，才算过去。最近承赵缙、陈青荣两位惠赠《赵俪生高昭一夫妇回忆录》，细读书中关于王瑶先生（还有冯契先生）的回忆，才了解他们在清华读书时的交谊是如何深厚，许多地方为我们后学所不可及。

上面已经说过，赵缙、陈青荣两位完成的这部《海岱古族古国吉金文集》，

只是他们长远研究计划的第一步。据我所闻，下一步他们将转移到甲骨文方面，《甲骨文所见商代东土国族》一书，也已经有了初稿。我在此祝他们取得更大的成功，也呼吁有关领导和单位给他们更多的支持。

2011年4月10日

于清华大学

（陈青荣、赵缙《海岱古族古国吉金文集》，齐鲁书社，2012年）

孙赫男《左氏会笺研究》序

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孙赫男副教授以新著《左氏会笺研究》见示，我翻读之后，认识到这是一部学风严谨、论证详密的好书。因此，尽管我近来工作非常繁忙，还是想在这里写几句话，作为向读者的诚心推荐。

关于《左氏会笺研究》一书的学术意义，我以为至少可以由以下几点来说明。

首先，自然是对研究《左传》本身的意义。

大家可能都会注意到，较长时期以来，《左传》的研究相对比较沉寂，到近年已渐趋兴盛。其重要的标志，是以《左传》作为主题中心的学术研讨会连续两次举行，即“2008《春秋》《左传》学术研讨会”和“2009年两岸四地《春秋》三传与经学文化学术研讨会”^①。由此可说，从多角度、多层面深入研究《左传》的大趋势已经开始形成。

《左传》的研究十分重要。在那两次会议上，我都谈到“《左传》是研究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起点和基础”。探索中国的古代，和其他古代文明国家一样，必须依靠比较晚出的历史文献，作为建立古史系统的依据。例如古埃及史的研究是依据曼涅托的《埃及史》，古希腊史的研究是依据希罗多德的《历史》，而在中国，一般以为是依据司马迁的《史记》。实际上，《史记》的有关内容大多本于《左传》（以及《国语》）。《左传》不仅详细记述着春秋时期的史事，同时也涉及远古以至虞夏商周的古史。应当强调，“这方面的历史，如果今天没有《左传》，我们就没有办法把它整理清楚”。

研究古史须自《左传》出发，然而历代学者注解阐述《左传》的著作，虽然对于我们追溯古史都很有参考价值，因其数量浩瀚，头绪众多，不是任何个人在有限时间内所能掌握了解。《左氏会笺》的特点，恰在于汇集诸家成果，上

起汉晋，下及明清，做到融汇综合，如孙赫男副教授所说，“擅以会通之道，揭橥左氏之大义。综观《左氏会笺》，会通乃是其注释的重要特点之一，它主要是通过发凡起例、归纳总结、叠见互注、引申推衍、瞻前顾后等几种笺注方式体现出来的”。《左氏会笺研究》于此多有阐发，所以如说《左氏会笺》可视为探研《左传》的门径，《左氏会笺研究》则堪为通绎《左氏会笺》的津梁。

其次，是指出了《左氏会笺》在《左传》研究史中的地位。

如上所述，《左氏会笺》成于汉唐至清历代名家之后，能够博采众说，间有创见。在这方面尤其值得称道的，是《会笺》能做到摆脱当时流行的门户之见。谈到《左传》之学，清人注释最著称的，首推刘文淇以至刘师培一家四世的工作，但自刘文淇开端撰成的《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专崇汉学，力斥杜预，失于不够公正^②。《左氏会笺》则避免了这样的问题，对于前人能兼容并蓄，择善而从。

《会笺》自序历叙《左传》种种古本近注，声明于“古今诸家论述涉左氏者，普搜博采，融会贯通，出之以己意，名曰《左氏会笺》，仿杜氏《集解》、朱子《集注》之体也”。序中还专门讲道：“夫经所以载道也，道原于人心之所同然，然则他人说经获我心者，道在斯可知矣。以所同然之心，求所同然之道，何必容彼我之别于其间？集众说折衷之，要在阐明经旨，杜、朱二家解经之法，尤见其求道之诚而秉心之公也。”这段针砭门户之见的话，很值得我们体味。

孙赫男副教授的这部书，也是对国际汉学史的一项贡献。

这里说的“汉学”，不是上面提及的清代“汉学”学风，而是指外国学者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左氏会笺》的作者竹添光鸿，是日本汉学史上的重要人物，《会笺》一书正代表了其时日本汉学所达到的水平。

国际汉学研究是近些年逐渐兴起的一项专门学科，有关方面对于这种意义的“汉学”涉及的范围，理解尚多有不同。一种比较普遍的看法，是将“汉学”等同于西方的汉学，比如最早出版的一本综合性的汉学史，即莫东寅先生的《汉学发达史》，就是这样。其实莫书依据的日本石田干之助的著作，是明确标题为《欧美的中国研究》的。亚洲，特别是邻近中国的国家的汉学，有着悠久的历史、丰富的内涵，非常需要考察研究，可惜迄今从事的学者还不够多。

我建议读者在读孙赫男副教授这部《左氏会笺研究》的时候，先看书的附录《〈左氏会笺〉的述作背景》，这样对于竹添光鸿在日本汉学中的位置，以及在中日文化交流历史上的作用，即可得到更多的认识，做到“知人论世，得其著述之大旨”。

2011年5月12日
于清华大学寓所

注释

- ① 孙绿怡主编：《春秋左传研究：2008〈春秋〉〈左传〉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华书局、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09年；方铭主编：《春秋三传与经学文化》，长春出版社，2009年。
- ② 吴静安：《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李学勤序，第3—6页，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

•
(孙赫男《左氏会笺研究》，光明日报出版社，2011年)

夏商周年代学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夏商周断代工程”是我国第九个五年计划期间国家重点科技攻关计划项目之一，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空前的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多学科结合的大型项目。“工程”的总目标，是将夏商周三代的年代学进一步科学化、量化，制定这一历史时期有科学依据的年代学年表，为深入研究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和早期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

中华民族素以古代文明源远流长、从未中断而自豪，但是传世典籍中可充分信据的绝对年代，只能如西汉司马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所示，上溯到西周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自西汉晚期以来，历代许多学者试图推定共和以前的纪年，提出种种方案，均因材料有限、手段单一而莫衷一是。尽管困难重重，这一工作，特别是推断三代纪年的问题，终究是学术界密切关注的重大任务。随着近年有关各学科迅速发展，多学科综合探索夏商周年代学的条件已趋成熟。

“夏商周断代工程”自1995年秋开始酝酿和筹备，1996年5月正式启动。“工程”在国家的关注支持下，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以多学科交叉合作的方式，集中力量，联合攻关。依照系统工程的科学原则，共设立了9个课题，下分44个专题，涉及历史学、考古学、天文学和科技测年4个学科门类，具体说有10个以上的学科和专业，参加直接研究工作的学者专家约200人。

“工程”根据夏商周三代各历史阶段的研究条件的差异，提出了工作的具体目标，即：（一）西周共和元年以上各王，提出比较准确的年代；（二）商代后期（武丁以下）各王，提出比较准确的年代；（三）商代前期，提出比较详细的年代框架；（四）夏代，提出基本的年代框架。

“工程”的研究途径主要有两条：（一）对传世文献和甲骨文、金文等古文字

材料进行搜集、鉴定和研究，对有关的天文历法记录通过现代天文计算推定其年代；（二）对有典型意义的遗址、墓葬资料进行整理和分期研究，并作必要的发掘，取得系列样品，进行常规和AMS（加速器质谱计）的 ^{14}C 年代测定。最后，对各课题通过以上两条及其他途径得出的结论进行综合，使研究进一步深化。

2000年6月，“工程”各课题、专题相继通过验收。同年9月，在科技部组织下，验收专家组通过了“工程”验收合格的决议。11月，《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出版。

上述《报告·简本》提出了“夏商周年表”。“年表”推定夏代始年约为公元前2070年，夏商分界约为公元前1600年，盘庚迁殷即商代后期开始约为公元前1300年，商周分界即武王伐纣在公元前1046年。“年表”排出了商代后期列王的在位年和西周列王的在位年。“夏商周断工程”的阶段性成果得到国内外有关学术界的重视，并在许多场合采用。

（经编者修改后收入《党建》杂志社策划并编写的《领导中国——120人讲述90年的故事》，学习出版社，2011年，此系原稿）

王世贤《古今文字学博览》序

地处山东海隅的烟台大学，是我近些年多有机会访问的一所高校。烟台大学是由清华、北大援建的新兴学府。上世纪末的1998年，应烟大校领导之约，我同该校江林昌博士一起，在那里建立了中国学术研究所。每当我搭机前来，快于机场降落前，就能俯瞰烟大，总会惊异又有崭新的建设。等到踏进校园，更是觉得一派新的气象扑面而来。这不仅是由于学校面对海洋，眼界无限，风光绮丽，更因为大学发展迅速，很快地集聚了多学科的优秀人士，营造出浓厚的学术氛围，实在可喜。

在烟大我遇到了不少位文科学者，中文系的王世贤教授与我相知稍晚，是经过江林昌教授的介绍。2008年夏季，蒙王世贤教授寄示他在《光明日报》出版社印行的《文字学通论：关于汉字的概述》。这部560多页的大书，我翻读了好几遍，获有深刻印象，认识到王世贤教授知见广博，而且多有独立见解，善于把古奥复杂的学问原原本本地讲述给读者大众。书中“内容概要”讲“具有直观性、简明性、创新性、灵活性和多用性等五大特色”，并没有过分夸大的地方。

王世贤教授治学有自，他出身于东北师范大学中文系，曾从著名学者孙晓野（常叙）先生受业。大家知道，孙先生专长于文字之学，由东北师大出版社出版的《孙常叙古文字学论集》一书，为有关学界所必读。王世贤教授秉承师学，而在研治范围方面更加广阔，其著作据我闻知，已印行的有《说文解字导论》、《汉语史述略》、《古汉语词汇纲要》等，待出版的还有《音韵学讲稿》及《训诂学教程》，可以说学科涉及的诸多分支都已包括了。

孙晓野先生说过：“文字是记录和传达语言的书写符号，是书面语言赖以存在的书写形式。语言是第一性的，文字是第二性的。这就决定了‘字形’是依

存于语言的。在所谓‘字音’‘字义’不过是‘词’的音和义。可知形、音、义三者实为两类：音和义这个形式与内容的对立统一是词，而词和字又是一个对立统一，词是字写的内容，而字是词的书写形式。”（《孙常叙古文字学论集》后记）这样的看法殊有独到之处。王世贤教授的《文字学通论》，虽将重点置于字形的源流演变，实际上也充分兼顾到音和义，与他的其他论著彼此相通。

王世贤教授的著作还有一个明显特点，就是广泛引据甲骨金文等出土古文字材料，这一点我觉得也是由孙晓野先生的学风继承发展而来。从学术史来看，汉魏以来传统的文字学，所谓《说文》之学，到清朝段、桂、朱、王时期已经臻于极致。及至清末，通过吴大澂、孙诒让，于是有罗振玉、王国维，为现代的古文字学开其先路。孙晓野先生曾经问学罗门，对于古文字学研究多有贡献。王世贤教授则广采当世各家学说，尤其注意新的种种发现，使《文字学通论》的内容更为充实和丰富，这也是该书得到读者欢迎的一个重要原因。

现在王世贤教授又将《文字学通论》修订增补，改题为《古今文字学博览》出版，要我在这里写一小序，然而我在反复读了书前辑录的“专家论文字”之后，觉得已将王世贤教授多年纂著这部书的根本志趣表露无遗。特别是“语言文字是一个民族的精神象征，也可以说是一个民族的面貌和灵魂”这一段，真是掷地有声，虽系征引，却足以概领全书。《文字学通论》原版将这段话印在封面上，我希望新订补的《古今文字学博览》仍能于卷首标举这一段话。

2011年6月13日

写于清华园

《炎帝古庙》序

山西高平炎帝研究会最近编成《炎帝古庙》一书，即将交文物出版社印行，这是一件值得欢迎的好事。

这几年，我在几次演讲中提到一个观点，就是我们中国人自称炎黄子孙，以及讲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是彼此密切相关的。大家这样说，都是根据《二十四史》的第一部，即西汉司马迁的《史记》。《史记》开头是《五帝本纪》，而《五帝本纪》是由炎黄二帝的时代发端的，作为文明历史的开始。依照后来历代史家的推算，传说中炎黄二帝的时代距今约五千年，也就是说我们有五千年的文明史。

司马迁写《五帝本纪》，有着丰富的文献依据。要知道司马迁生于史官世家，他所能见到的载籍，无疑比我们后人要多得多。后世传流或发现的一些材料，司马迁很可能都看见过，可是他认为“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与他亲身旅行调查所得不能相合，他所能倚靠的，乃是《左传》、《国语》和现存于《大戴礼记》的《五帝德》、《帝系姓》。根据这些，他把文明历史上溯到炎黄时代，绝不是任意的，如《本纪》篇末所说：“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

《左传》、《国语》多言炎黄时代传说事迹。《国语·晋语四》说明，炎帝、黄帝同出于少典氏：“昔少典娶于有娇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这样的传说含有神话色彩，但足以反映二帝同出一源。参照其他有关记载，炎帝应比黄帝更早一段时期。例如晋代皇甫谧的《帝王世纪》便说炎帝之后有帝临魁、帝承、帝明、帝直、帝厘、帝哀、帝榆罔，一共八代，才同黄帝并世。不管怎样说，炎黄所代表的历史时代，是中国文明开始形成的重要关捩，对这一时代的探索，是古史研究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相当这一时代的

一系列考古发现，正可从一方面予以印证。

有关黄帝历史传说的讨论研究，这些年相对较多，实际上有关炎帝的传说遗迹数量并不算少。使人们高兴的是，不少学者做了辑集调查的工作，成绩显著，有如《炎帝神农氏》、《炎帝汇典》、《炎帝志》等书问世。高平炎帝研究会的这部《炎帝古庙》，独具一格，又与其他不同。

高平地处晋东南上党地区，历史文化底蕴深厚，尤以有关炎帝的传说遗迹最为繁富，如羊头山上的神农城、神农泉、五谷畦、神农庙，以及庄里的炎帝陵、五谷庙，故关的炎帝行宫等，引人瞩目。了解炎帝历史传说，自然不可忽略高平。

《炎帝古庙》一书，广泛收集整理各地现存炎帝庙中碑记一百余通，其间十之八九分布于晋东南地区，而以高平为中心，占其四分之三。查其建立时代，上起魏晋，下至清末民初，纵跨一千五百余年。这充分表明炎帝历史传说在这一地区源远流长，值得深入探索研究。

前些时读到山西省炎帝文化研究会所办《华夏炎帝》季刊的《中国山西高平卷》，其“卷首语”说：“我们每一个人对历史的最初认识，大约来源于儿歌和童话。与此有相对意义的是，历史学家研究的上古史，就像是在研究人类的童年史。上古的传说和神话，就是人类童年时代的儿歌和童话。世界上有无数民族，无数的民族就有无数的历史，但是人类童年的历史却惊人地相似。……公元前三十世纪前后，是古中国的炎黄时代。几乎同时，古埃及诞生了第一王朝，古巴比伦诞生了美索不达米亚城邦，古印度出现了哈巴拉文化。”这段话，尽管个别词语可以修正，精神是非常对的。让我们通过展现传流在高平的炎帝历史文化传说，来仔细思考我们古史上的炎黄时代吧。

2011年7月9日

（《炎帝古庙》，文物出版社，2011年）

《吕思勉研究纪念文集》序

我在年纪很轻的时候，就读过吕思勉先生的作品，仰其大名，但无缘谒见。到改革开放之后，蒙吕翼仁教授不弃，以吕思勉先生《先秦史》等著作新版寄赠，使我有系统绎读的机会，对其学术和人格有进一步的体认，益增敬慕之心。2006年，我特自上海去常州，到十子街瞻仰吕先生故居，在那里得见刘西影馆长，受到许多帮助。随后刘馆长来京，晤谈间知道她对吕先生生平有深入研究，在纪念吕先生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很感钦佩。现在她主持编成这部《吕思勉研究纪念文集》，我能写几句话，是十分欣幸的。

吕思勉先生为历史学界耆宿，在二十世纪学术史上居非常重要的地位。记得前些年，我们刚跨入新世纪的时候，好多不同学科的人在报刊撰文，强调研究二十世纪学术史的重要。当时我追随其后，曾在《人民政协报》上说：“作为学术界中人，我们今天做的工作，无不是在二十世纪发源的，所以要想更好地前进，不能不仔细回顾过去。……现在正是新世纪的初年，我们的祖国充满着希望，加强学术史的研究，一定会使未来的学术事业更健康迅速地前进，创造出崭新的局面。”大家追思吕思勉先生，研究和阐述他一生的学行，正是出于这样的目的。

然而随着时光的无情流逝，二十世纪许多曾经光辉的人物已经逐渐淡出，距离我们越来越远了。现时的年轻学子，在媒体上看到的二十世纪学术人物常常只有那么几位。真正读过吕思勉先生著作，甚至知道吕先生其人的，恐怕已经不多。正因为如此，编著这部《吕思勉研究纪念文集》就更显得必要。

吕先生在二十世纪历史学中的崇高地位，是海内外有关学者所公认的。在这部《吕思勉研究纪念文集》里，有论文提到严耕望先生《治史三书》对吕先生的评价。我刚刚收到的《史学史研究》今年第二期，也有学者引述这本

书。严耕望在书中将吕思勉与陈寅恪、陈垣、钱穆三位合称为“现代史学四大家”，他还说到“吕思勉在民国时期学界的声光不及其余几位”有三点原因，即：“一，近代史学风尚偏向尖端发展，一味地追求新领域，而吕思勉则属通贯博赡一途；二，近代史学研究务以新史料取胜，而吕思勉比较重视传统史料；三，吕思勉为人朴质恬淡，不追名利，不求声气，远离所谓学术中心而默默耕耘。”“四大家”之说是否有当姑且不论，他所言三点，则恰是吕先生一生优长之处，是我辈后学应该学习并以之自勉的，在《吕思勉研究纪念文集》内也有论文谈及。

其实，所说治史通贯博赡，重视传统史料，等等，也是钱穆先生的特点。我们不要忘记，钱穆本是吕思勉先生的学生，他晚年写的《师友杂记》叙及在常州府中学堂就读时的情形，说：“尤为余毕生难忘者，有吕思勉诚之师，亦常州人，任历史、地理两课，……在诸师中最为年轻。诚之师不修边幅，上堂后，……时有鸿议创论，同学争相推敬。”他一直与吕先生联系，例如《师友杂记》所述，为讨论今古文经学问题，“书问往返长函几达十数次”，猜想其事应同钱穆先生成名之作《刘向歆父子年谱》有关，甚为重要。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1940年，钱穆《国史大纲》著成，他从昆明赴香港，找商务印书馆商量出版，商务负责人告以须在上海付印，钱穆认为正好，因为吕思勉先生在上海光华大学，说：“此稿最后校样须由彼过目。”接着便到上海，向吕先生面陈：“盼师作最后一校，……遇错误，请径改定”，获得允可。也是在这件事前后，开明书店约钱先生作《国史长编》，他即转荐吕先生担任。这一类事迹充分表明，吕思勉和钱穆两先生治史，在具体问题上容有不同见解，于总的学术趋向上实属共通。

这里谈到吕、钱两先生学术方面的关系，是想说明在二十世纪学术史上各地学风有其脉络可寻。考察吕思勉先生的学术历程，固然如多位学者所说，应追溯到梁启超倡导的“新史学”潮流，而吕先生学术特点的形成，还离不开清末以来江南地方的文化脉络，吕先生本人的学术成就的影响，也更多表现于江南的学术界。可惜的是，迄今为止我们对二十世纪江南当地的学术发展，详细

深入的研究还嫌太少。或许在若干年后，大家更好地认识江南地方的学术史，才能正确足够地估量吕思勉先生的重大成就。

2011年7月29日

于清华

(《吕思勉研究纪念文集》，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

《常见文物生僻字小字典》序

由四川博物院和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博物馆合作编写的《常见文物生僻字小字典》即将出版，嘱我为序。我看过这本小册子后，感到十分欣慰，他们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工作。

博物馆是收藏、保护、陈列、展示和宣传人类文化和自然遗存的重要场所，是国民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我国博物馆免费开放的进一步推进，作为公益性、公共文化服务机构的博物馆，在公众文化生活中的地位进一步凸显，博物馆已经成为传播先进文化、传承民族优良传统的重要场所。

我国的古代文物多收藏在各级博物馆中，浩若星汉的各种文物是我国悠久历史和灿烂文明的物质载体，其数量浩瀚，种类繁多，许多文物多有专业名称。以青铜器为例，器物的名称多为专指，而且所用汉字在日常生活中很少出现，对于公众来说已经成为生僻字。在大家参观博物馆时，这些文物中经常出现的生僻字，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公众认识和理解文物的障碍。如何更好地为公众服务，将辉煌的中华文明通过一件件具体的文物展示出来，是新形势下我国博物馆需要积极探索的课题，也就有必要克服这种生僻字的困难。

《常见文物生僻字小字典》旨在解决公众在认识和理解文物过程中所遇到的生僻字问题，是一个具有开创性的探索和尝试。其涉及文物内容包括青铜器、陶瓷器、书画、玉器、兵器、农具、旗帜、车部件名称、古建部位名称、碑刻、全国文物保护单位等。每字附有简单义项，并尽可能配以图片进行说明，可谓文物爱好者和文博基层工作者的一本非常实用的工具书。

迄今为止，我国还没有一本关于文物生僻字方面的专著。由于是首次编写，在体例、内容等方面没有可以借鉴的成例，难免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足，然而瑕不掩瑜，他们的成绩和精神令人钦佩。

我国的文物数量十分巨大，文物中所见生僻字又何止百千。不难想见，编写一本权威、全面、翔实的文物生僻字专著是一个十分浩大的工程，所幸《常见文物生僻字小字典》的编写已经为我们走出了可贵的第一步。在全国多位有关专家和学者的关心指导下，经过全体工作人员的辛勤努力，《常见文物生僻字小字典》即将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在此书付梓之际，我们应该对四川博物馆、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博物馆的这种开创精神，和“以观众为本”的办馆理念，给以高度的赞誉，同时也期待他们能够有更多更好的工作成果。

2011年9月3日

（《常见文物生僻字小字典》，文物出版社，2012年）

关于“中国文化从这里走来”的感想

听安阳的朋友告诉我“中国文化从这里走来”这句话，我感到很对。

我们中国人的祖先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是举世公认的。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从跨入文明门槛算起，已经历五千年的岁月，仍然绵延不绝，传播今世，不能说不是世界上的奇迹。

中国文化从萌生到繁盛，通过了几个大的发展阶段。由传说中的炎黄时代，历经虞、夏、商、周等朝代，达到了文化进步的第一个高峰。这中间以周朝年世最长，所谓“八百载，最长久”。但在东迁以后，国家趋于分裂战乱，而在周朝前面的商朝，“载祀六百”，实际上是年祚最长的统一王朝。过去王国维先生作《殷周制度论》，学者多强调商周的区别差异，但近年的历史、考古研究反复表明，周代的文化很多地方是沿袭自商，特别是商代晚期，也就是安阳殷墟所代表的那段历史时期。

商代晚期，中国历史文化出现了很明显的进步，尤其在高宗武丁之世，疆域的拓展、制度的建设、文化的促进，对于国家的发展进程有很重要的作用，为后来西周早期的盛世局面预设了基础。孟子称高宗为“天下之盛君”，绝不是偶然的。集中反映商代晚期的文化遗址，正是安阳殷墟。因此，我们在这安阳，确实可以说“中国文化从这里走来”。

我想，我们还可以讲：我们对古代中国文化的认识，也是“从这里走来”。在安阳无人不知王懿荣发现和鉴定甲骨文的故事。这一发现是了不起的，我常说，1899年甲骨文的发现，在世界科学史上的意义足与1799年古埃及罗塞塔石的发现相比美。甲骨文的发现，导致了殷墟的认定，带来了殷墟的发掘，这成为中国现代考古学发轫的重要标志。在这以后屡屡震惊世界学术界的中国考古发现，工作的理论、方法、技术和人才，在在受到殷墟工作的引导和启发。我

们从殷墟上溯，探索和发现了更早的文化，揭示了许多奥秘。

安阳殷墟已经是考古学史上连续发掘考察时间最长的古代遗址之一，但是殷墟及其种种遗存，还蕴藏着不知多少秘密。我们对甲骨文、对殷墟、对殷商文化已有的工作，至今只是揭开了帷幕的一角。我在此敢于预言，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有更新更多更重要的发现和知识“从这里走来”。

以上所说，敬请大家指教。

2011年9月16日

文化传承创新的重大责任

4月24日，我有幸在人民大会堂参加“庆祝清华大学建校100周年大会”，直接聆听了胡锦涛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整个讲话时间，我一直感到十分激动，不能自己。回到学校以后，几天来我反复研读胡锦涛同志讲话全文，对讲话的丰富内涵、深刻寓意，得以有进一步的体会和认识。经过再三思考，我深深感觉到，这篇讲话确实是高瞻远瞩，意义重大。

胡锦涛同志的讲话虽然是在清华校庆大会上作的，但正如讲话中阐明的，我们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科技是关键，人才是核心，教育是基础”，而“高等教育作为科技第一生产力和人才第一资源的重要结合点，在国家发展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因此，讲话紧紧把握这一点，提出了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四个方面和对全国青年学生的三点希望。显然，讲话的意义和影响非常深远，一定会在今后几十年甚至一百年间逐步体现出来。不难设想，到大家聚集庆祝清华大学150年、200年校庆的时候，肯定会纪念和回顾胡锦涛同志的这篇重要讲话。

在学习和体认这篇讲话的思想和涵义的过程中，我发现有不少问题是我自己以前没有很好考虑过的，现在深受讲话内容的启发。由于我的专业是关于历史文化的，这里想只谈一点，就是讲话所提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四个方面里讲的“文化传承创新”的问题。汤一介先生已讲，我不会像他那样讲得好，请大家指正。

胡锦涛同志在讲话中，把“文化传承创新”作为高等教育的一项主要工作，也就是一项重要任务，我觉得非常关键和重要。大概是由于我长期在社科院工作，转来高教界时间较短，过去没有充分体会到文化的传承和创新在高等教育中应有的重要位置。讲话中所说“高等教育是优秀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和思想

文化创新的重要源泉”，我们应该仔细思量体认。

说到文化传承，使我联想到明清之际重要学者方以智所说的一句话：“古今以智相积。”方以智讲的“智”，其实便是我们现在说的文化。人类自脱离动物界以来，不再像一般动物那样仅依自然规律地进化，人类的进化主要是文化的进步，体现为文化的继承和发展，而教育正是人类世代间文化的传递，高等教育尤其是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认识了这一点，更使我们知道肩负责任的重大。

讲话准确而且深刻地阐明了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之间的辩证关系。认识清楚这种关系，正确处理这种关系，我认为是非常必要的。

对于前人的文化传统不去传承，是不行的。“文化大革命”就是最好的教训。“文革”打倒“封资修”，中国过去的都算“封”，外国的都算“资”，马克思主义的则被打成“修”，那就什么都传承不了，结果成了“大革文化命”，谈不到什么创新。假如反过来，不管中国的、外国的，一律传承，泥沙俱下，结果也不可能做到创新。

传承前人积累的文化，目的应该是创新，创出新时代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讲话中说得极好，我们必须“掌握前人积累的文化成果，扬弃旧义，创立新知”。

这使我想起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大问题。大家知道，从十六七世纪欧洲势力东渐，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开始接触、碰撞，特别是中国进入近代以后，每逢历史转折时期，总会出现中西文化问题的大讨论，包括怎样看待中国传统文化（中学、国学），怎样看待西方文化（西学）的问题，其原因在于这与国家向何处去这一重大问题有关。多少志士仁人，尤其是教育界的前辈，在这方面给我们留下许多经验教训。胡锦涛同志的讲话明确指出，作为我们的希望的青年一代要“认真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人类文明成果”，要“努力用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丰富自己”，这可说是对有关问题最正确的答案。

特别说一下，胡锦涛同志讲话中多次说到“人类文明成果”、“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我觉得大家应该仔细体会其中的深意。说“人类文明成果”，就不分国家民族，只要是优秀的、先进的，有利于我们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都应当学习和吸取。这对于当前还在走向多元化的世界，尤其重要。我更觉得，

过去我们在这方面，做得恐怕有些狭窄了，建议今后要更多与以往文化交流不多的国家联系和交流，吸取他们文化中优秀的内涵，在我们的教学中也应该注意这一点。

胡锦涛同志在讲话中正是强调“要积极开展对外文化交流”的。我体会，讲“交流”当然是双向的，不但如讲话所说，要了解“国外文化科技发展趋势和最新成果”，我们还要走出去，“增强我国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努力为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做出积极贡献”。这才是我们“大力推进文化传承创新”的根本目的。

（删节后刊于《光明日报》2011年5月6日）

《西部美术考古丛书》总序

上海大学美术学院罗宏才教授主编的《西部美术考古丛书》即将问世，要我写一篇总序，尽管我近日非常忙碌，身体还有些不适，还是答应下来。这固然是因为罗宏才教授出身西北大学，与我颇有渊源，但更主要的是我深觉这部丛书的立意甚好，符合当前学术发展的趋向。至于我能否体会丛书的宗旨，也就在所不计了。

我想分三个层次来说，首先是西部考古，然后是美术考古，最后再试谈西部美术考古作为学术前沿的地位。

现代意义的考古学开始传到中国，是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那时不少外国学者及所谓探险家曾进入中国西部。在此刺激之下，中国有关学术界也对西部地区的历史文化给予特殊的关切。然而在中国自己的考古学工作展开之后，更多的注意是集中在作为古代王朝核心的中原一带，对广大西部的探究相对说来要少些，有大量没有解决的课题存留至今。

实际上，西部在中国悠久历史上的重要性是用不着论说的，周秦汉唐的发展过程，已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以长达八百年的周朝而论，其早年的兴起，正是背靠西北，继之而来的秦人也走着类似的道路。不深入考索西部的文化，便谈不上认识中国古代历史的全貌，而由于传世文献内容的限制，这方面研究不得不更多地依靠于考古学。

美术考古则是当前中国考古学亟待进一步促进发展的部分。从学科的历史来看，中国的考古学和西方的考古学本来有着先天的一些差异。如很多考古学史的专家所指出的，发轫于十九世纪早期的西方考古学，原系自欧洲传统的古物学演变而成，而后者从来是和美术的鉴赏和论析相结合的。作为中国考古学的基础的，则是源远流长的金石学，其成形为一门学问，至少可追溯到北

宋，而金石学的特点是以“证经补史”为职志，最重视有文字的遗物，以致同专研文字的所谓小学密不可分。因此，中国的考古学始终与研究文献的历史学彼此配合，恰如夏鼐先生所形容，似车之两轮、鸟之双翼，成为认识古代的必要途径，是我们今后仍然要继续的。

然而，我们想有更大的进步，还应该学习西方考古学较我们优长之处，其中很有价值的一点，就是要重视与美术史的结合。比如我自己是研究古代青铜器的，常说考察青铜器当有五个方面，即：形制、纹饰、文字、功能和工艺，现在想来一定要加上一点：青铜器的美术性质，这样我们的研究便更臻于全面。这个例子不一定妥当，但似足以例其他。

近年，已有一些学者在推广美术考古方向做了有益的工作，这使我回忆起山东大学已故的刘敦愿先生。刘先生一生为振兴中国的美术考古反复呼吁，功绩卓著。收入1998年出版的《刘敦愿先生纪念文集》的他的《传略》说：美术考古是一个跨学科性质的科研领域，要搞美术考古的研究，必须既具备考古专业知识与技能，又具备美术专业知识与技能。刘敦愿先生对此寄以厚望，他如果得知今天这方面的进展，是一定会感到欣慰的罢。

中国西部的历史条件与中原等地区不同，不仅保存着地下地上大量的美术品，而且是与境外文化交流沟通的必经通道，从而美术考古，特别是强调跨文化比较研究方法的美术考古，在此有着十分广阔的用武之地。需要强调的是，中国的古代文化有其自己的起源和独立的发展，然而其进程从来不是完全封闭的。中国古代文化与境外文化的接触，主要的路径是通过西部，包括西北和西南。所谓“丝绸之路”的原始，很可能应大为上溯，其间蕴藏着许多奥秘，有待大家来开发。

“丝绸之路”的研究，现在已经从根本观点上拓展了，这个观点是把欧亚大陆看作一个整体。以这样的观点作为基础，形成了二十世纪后期逐渐推广的欧亚学。欧亚学的刊物和著述，在外国已有不少，国内如《欧亚学刊》也已经出版了好几年。假如我们把中国的西部考古，尤其是西部美术考古，同欧亚学的探究适当地配合起来，我认为肯定会产生非常重要的新成果。

翻阅《西部美术考古丛书》第一种《从中亚到长安》所收论文，已可看到

各位学者都在努力拓广自己的眼界，采用最新的方法，再看丛书今后各种拟议中的目录，更足见主编罗宏才教授的志向。谨趁此机会，祝愿这部富于学术价值的丛书取得预期的成功。

2011年9月19日

于北京清华园

（罗宏才主编《从中亚到长安》，上海大学出版社，2011年）

在“重走孔子周游列国路”新闻发布会上的致辞

今天我有幸应邀来参加这次“重走孔子周游列国路”的活动，心中感到非常振奋。我之所以来，正是由于这次活动是非常有意义、非常有创意的。我虽然没有能做什么事，还是愿意在这里说几句话。

我想说的，其实主要是一点，就是我们今天要走孔子周游列国的路，必须要积极地、正确地体认两千多年前孔子和他的贤弟子们周游列国（也就是他们当时能走到的世界）所体现的精神和境界。“重走孔子周游列国路”，这不是简单的旅行，更不是走马观花、走过场，而是对中华民族传统优良文化的一种继承、学习和亲身体认。

大家都知道，孔子辞鲁出游，始于鲁定公十三年（有异说），即公元前497年，最后返鲁终老，是在鲁哀公十一年，公元前484年，一共经历了十四年之久。不要忘记，孔子在定公朝中已经取得了高贵重要的地位，他如果不走，肯于与朝内外恶势力同流合污，他是不必要走的。再退一步说，孔子若辞官而不去鲁，就在家乡隐居教学，也是要安乐得多。然而他不这样做，他选择的是艰苦难的道路，而且确实陷入危难，厄于陈蔡，仍然弦歌不辍。这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他平生追求的美好的理想、远大的目标，所以孔子和他的门人体现了一种精神、一种境界，我们一定要从积极方面去认识，去体会。

在周游列国，确实证明了其道不行之之后，孔子回归鲁国，这也不是失败，因为孔子晚年不仅整理了诗书礼乐，而且传承《周易》，笔削《春秋》，完成了六经的大业。这和他十几年周游列国间的提高积累，当然是不可分的。这一点，后世恐怕只有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又备受折磨的司马迁才真正体认到。他作

《孔子世家》，最后说：“《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到今天，孔子已离世两千几百年，我们仍然在这里追寻他的行迹，这难道是偶然的吗？

今天“重走孔子周游列国路”的活动，副标题是“构建和谐社会，推崇仁爱思想”，这是非常正确的。这几年，大家都在引用北宋张横渠的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绝学主于仁爱，太平就在和谐。请容许我在这里预祝这次活动圆满成功！

谢谢大家！

2011年9月21日

《周易溯源》重印附记

《周易溯源》这本书的增订本，2006年1月由巴蜀书社第一次印行，有幸得到读者肯定，不久在书店里就不易找到，友人向我索观，也无以应对。今蒙书社各先生不弃，即付重印，趁机在此写几句话，对大家表示感谢之意。

这本小书所收各文，撰写过程有二十多年，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想通过以文献研究和考古学、古文字学互相配合的方法，论证《周易》经文与十翼的形成时代。这样考察问题的路径，似可说是对王国维先生倡导的“二重证据法”的学习和实践。当然因为我的学识有限，书中误谬不妥之处在所难免，学术界先进和各方面读者如能惠予批评，盛情殊不敢忘。

最近一段时期，我的工作重心转移，异常忙碌，然而在《周易溯源》书中曾涉及的一些疑难问题，仍不时在我心间萦绕。最突出的一点，是很多学者关注的筮数（或称数字卦）的性质和解释。在本书第四章第三节《出土筮数与三易研究》和第四节《论战国简的卦画》中，我提出战国简惟有卦画，没有筮数的大胆猜测，这仅属假说，反复思考，颇觉不安。

应该说，解开有关谜团的可能契机，现在已经存在了。2008年，清华大学入藏一批战国简，通称清华简，其中正有一篇专述筮法，给我们带来了新的光明。这方面的详情，要待该篇简文整理考释工作完竣，才能向大家报告。

至于更早的筮数，近期也有重要发现。如陕西岐山周公庙遗址所出西周甲骨文^①，为了解西周前期有关问题提供了更多依据。在山东高青陈庄，也发现了记筮数的西周甲骨文^②。这一类讯息，使我们对研究的进展满抱希望。

2011年9月23日

注释

- ① 参看种建荣:《岐山周公庙遗址新出西周甲骨文》,《收藏》2004年第9期。
- ② 郑同修等:《山东高青陈庄西周遗址考古发掘获重大成果》,《中国文物报》2010年2月5日。

(《周易溯源》,巴蜀书社,2011年重印)

袁俊杰《两周射礼研究》序

袁俊杰博士就学于郑州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受到考古学的基础训练，任职于河南大学后，参与文博专业的筹建，又值河大同中国历史博物馆（今中国国家博物馆）联合培养博士学位研究生，成为朱凤瀚先生的弟子。朱凤瀚先生秉承南开大学王玉哲先生学风，精研古史，尤对古代青铜器及金文之学有甚深造诣。袁俊杰博士在其指导下，发表《作册般铜鬲所记史事的性质》、《柞伯鼎铭补论》等多篇论文，已引起学术界的重视。现在他完成的专著《两周射礼研究》，以金文的考释论析为核心，结合传世典籍文献，是一部内容充实而且富于创意的力作，相信在由科学出版社印行之后，一定会博得大家的欢迎。

我国的青铜器及金文的研究，萌芽于汉代而形成在北宋，当时作为收藏和研究青铜器先驱之一的著名学者刘敞，在其《先秦古器记》文中谈到金文的研究方法必须有三个方面，即“礼家明其制度，小学正其文字，谱牒次其世谥”，他首先举出的“礼家明其制度”，便是以古代礼制的研究成果移用于金文内容的诠释说明。刘敞的这种论点，可以讲已经意识到古代礼制与青铜器及金文之间的密切关系，是很有启发意义的。

古代所谓“礼”，涵义相当广泛。绎读《周礼》、《仪礼》、大小戴《礼记》等文献，可知那时的“礼”绝不仅指具体的行为仪式，而是综言社会的典章规范，包括种种制度所体现的思想精神。因此，我们强调从“礼”的角度去考察青铜器及金文，实际就是将他们还原到当时当地的一定历史背景之中。况且大多数青铜器本来便属于礼器，大多数金文也是在叙述礼制下的史实。正由于如此，袁俊杰博士的这部《两周射礼研究》既是以礼制说明青铜器及金文，也是以青铜器及金文印证礼制，确有相辅相成之效。

射礼是周代十分繁缛的礼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用今人的想法看，射

礼似乎无关大事，但在古代，特别是在周朝，却具有突出的地位和意义。如袁俊杰博士于本书《绪论》中所说：“射礼为古代六艺之一，在礼书中属于嘉礼，被列为五礼、六礼或八礼之一。它是两周时代重要的礼仪制度，也是先秦礼制史、文化史、社会史以及政治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随着礼学研究的发展和考古新资料的不断发现，它已成为先秦史研究领域中一个不能回避的课题，也是先秦史乃至古代社会生活史、礼制史，以及学校教育制度、人才选拔制度、分封制度等方面极有意义的课题。”这已经把研究周代射礼的学术价值说清楚了。

值得注意的是，袁俊杰博士的这部书虽以周代射礼作为主体，事实上对我国射礼的始源及其发展演变做了相当详细的探讨。书的第二章题为《射礼溯源》，在扼要论述有关古史传说的文献记载之后，用了相当大的篇幅，介绍和讨论了商代的射礼。其间尤其引人注意的，在殷墟甲骨文方面，着重分析了花园庄东地非王卜辞所见射礼的种种记述。在青铜器铭文方面，深入研究了近年新出现的作册般铜鬲，辨明其为真器，并就这件罕见文物的性质和意义提出自己的见解，是很值得一读的。

写到这里，我回忆到一件事。198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王宇信先生所撰《甲骨学通论》一书成稿，要我作序。其中谈到甲骨文研究迫切需要解决的课题，他以为我肯定会强调甲骨的分期研究，然而我于分期、排谱等工作之外，所想到的是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就是甲骨文所反映的礼制的研究。我在那篇小序中说：“殷墟甲骨是商朝占卜的遗物，卜辞内涵无一不与古代礼制有关。在甲骨发现的早期，有些学者曾试探由之探讨‘殷礼’，后来从事这种研究的人逐渐减少，对于卜辞中体现的当时制度，每每脱离礼制，甚至凭想象去解释。……不少人觉得，甲骨文的研究不像金文那样离不开文献知识，……所以研究甲骨似乎不必有深厚的文献基础。这样看，割断了商周两朝制度和文化的连续性。”孔子早即指出，夏商周三代的礼制是相因袭的，彼此之间只是损益的关系。由周代的礼制出发，追溯商代的礼制，再从之推及更早的礼制起源，不只可行，而且是必要的。

袁俊杰博士的这部《两周射礼研究》，正是采取着自材料比较丰富的周代上

溯商代以至更早时期的方法。其实即使在关于周代的论说之中，许多地方也是从多有传世文献足依的东周，进而上推到参照材料较少的西周的。因此，我们读这部书，从第一、二章开始，由《射礼的起源》、《殷商时期射礼的形成》，读到《春秋、战国时期的射礼》及《东周礼书所见之射礼》，是纵览这一礼制产生演变的轨迹。如果再倒过来看，不难了解书中对古代射礼的探究，实际是采取自后及前这样的“上溯”途径，其所以言能有据，正在于此。

《两周射礼研究》的著作是成功的，有裨于古代礼制以至整个古代历史文化的研究。希望袁俊杰博士今后继续深入和拓宽有关礼制的探索，取得更新更多的成果。

2011年10月8日

（袁俊杰《两周射礼研究》，科学出版社，2013年）

李兴盛《中国流人史》增订本序

在中国古代社会中，流人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群体与社会现象，伴随着国家的流放制度（流刑）的发展而扩大增多。流人绝大多数被强制迁徙到僻远的边疆地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不乏受屈辱之士。其间名人辈出，早如屈原、苏武，以至明清杨慎、林则徐等，不胜枚举。这类流人在荒凉的边疆传播了文明，成了开发拓荒者，也是中原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交流的桥梁。对流人群体进行综合研究，有很重要的学术意义。

李兴盛研究员专事流人研究，已三十余年，开始即得著名学者谢国桢先生启迪指导，后又有罗继祖、钱仲联、来新夏等先生支持，对历史上的流人做了系统的探讨研究。他首先撰有地区性的专著《东北流人史》，继加扩充，写出了第一部全国性的《中国流人史》，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和欢迎。他还从理论上探讨流人问题，撰写了《中国流人史与流人文化概论》。在这样的基础上，对《中国流人史》做了大幅度的补充修改，完成了二百万字的《中国流人史》增订本。我认为，这一专著的出版，将对我国有关历史研究，特别是法律史、边疆史、民族关系史等方面多有裨益。

2011年10月14日

（李兴盛《中国流人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2年）

《中国 56 个民族神话故事典藏》序

神话是人类童年最珍贵的记忆，是人类社会共有的文化现象。对于历史学家、文学家以及人类学家来说，神话是研究人类历史和文化的珍贵资料，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来说，神话则是其重要的精神财富。

中国有56个民族，除了汉族外，其他55个少数民族也都有悠久的历史 and 丰富灿烂的文化。各个民族的神话故事丰富多彩，是历史文化传统中最神奇最迷人的一部分。

人们习知的盘古开天辟地、女娲补天、大禹治水等，都是著名的神话故事。这些神话故事，形成于远古时代，经过口耳相传，传流至今，其精神内成为中华民族的象征。神话中的人物，可以上天入地，可以腾云驾雾，可以长生不老，还可以穿越时空……他们虽然超凡脱俗，但诸神之间居然也有类似人间的那种喜怒哀乐，甚至儿女情结。

有些神话，超越自然，完全不符合现代人的思维和逻辑；有些神话，则有明确的历史痕迹，包含真实历史的素地；有些神话，仅仅流传在某一个地区的某个民族或某些民族中间，而有些神话则不仅出现在中国，在世界其他地区也有类似传说广泛流行。

研究者认为，神话是人类童年时期对于大自然、对人类自身历史的一种模糊认识的反映，他们还根据神话的内容，将其分为开辟神话、自然神话和英雄神话三个类型，或进一步细分为创世神话、始祖神话（含事物起源）、洪水神话、战争神话、创造神话等。

《中国56个民族神话故事典藏（名家绘本）》，以图文并茂的形式系统介绍56个民族代表性的神话故事，为小读者提供了一套具有收藏价值的读物。

神话故事的择取，精挑细选，采众家之长；画家的创作，独具匠心；英文

的翻译和审定，由卢百柯（Patrick Lucas）博士把关。因此，这个中英文对照的绘本，不仅有收藏价值，还将会成为小读者的珍贵记忆，值得推荐。

2011年11月12日

（《中国56个民族神话故事典藏》，新蕾出版社，2013年）

《马愉手札》序

山东临朐县史志办公室诸位先生一贯关注地方历史文献，以多年心力搜集明代乡贤马愉传遗文物，收得诗文多篇，将以原貌印裱，有重要的学术和鉴赏价值，弥足珍贵。承蒙不弃，要我在这里写几句话，殊觉欣幸。

马愉字性和，临朐人，《明史》有传。他于明宣宗宣德二年廷试进士第一。当时科举江南文风蔚盛，马愉竟以北人夺魁，以致民间誉为“江北第一状元”，流传至今。英宗继位后，他在朝中任显职，但不阿附宦官王振，气节可谓难得。其于经筵进讲强调仁政，议事也力主宽厚，在同列大臣间有特别值得肯定之处。

近年社会上流行讲说历史，最受注意的是距离现代较近的清朝，这当然是可以理解的，不过在清代展开扩大的种种内外矛盾，大都在明朝已有萌芽潜在，明代的人物和文化，尤其有许多问题需要深入探究，但是由于清朝以来出现的一些限制与成见，不曾得到适当的对待。像马愉这样，事迹显赫，文采也很可观，可是他的著作《澹轩文集》却长期湮没了。我读到的乃是1987年临朐内部排印的本子，题作《马学士文集》，恐怕学术界很少人有机会读到。

临朐各位先生给我看了不少有关马愉的资料。在深表谢忱之余，我很为他们重视地方历史文化的保存、发掘的热忱所感动。真希望各地的地方史志单位都能这样做，这对于进一步发扬我们国家的优秀文化传统，会有重大的贡献。

2011年11月18日

于北京清华园

（《马愉手札》，临朐县史志办公室，2011年）

阎晓君《秦汉法律研究》序

陕西政法大学阎晓君教授的新著《秦汉法律研究》即将交法律出版社印行，这是他继2005年出版的《出土文献与古代司法检验史研究》一书之后的又一力作，内容仍是以近年发现的简帛为依据，对秦汉时期的法律史做创造性的探索，而涉及的问题更为广泛和深入，有多方面的贡献，我在翻读之后认为应当在此作一推荐。

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古代简帛的连续大量发现，已被誉为我国考古学史以至整个学术史上的重大事件之一。由之展开的简帛整理和研究，对许多学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促使这些学科取得预料不及的重要成果，法律史就是这样的学科领域。

简帛的发现与研究之与法律史搭界，是自1975年末湖北云梦睡虎地11号墓秦简的出土和第二年的整理工作开始的。我有幸自始至终参加这批竹简的整理考释，事后回想起来，其间曾感受三次意外的惊奇。

第一次惊奇是在刚刚接触睡虎地简的时候。当时好多位学者都在设于沙滩红楼的“整理小组”，看到竹简的一部分照片，大多数以为应该是汉简，因为那时谁也没有看见过秦代的墨书竹简是什么样子。1976年初，我到了发掘现场，看过墓地出土器物，对竹简浏览几遍之后，怀疑才得去除。

第二次惊奇是在释读睡虎地简的过程中，认识到秦代法律竟然如此系统严密，实在超越了前估计的水平。为了工作，我反复阅读沈家本、程树德等前人关于汉律的著作，猜测秦律当较之简单原始，仔细考察，竟觉大谬不然，汉律固然是秦律的发展，但秦律的成熟性实际已甚明显。

第三次惊奇是在研究睡虎地简《封诊式》等篇时产生的。简文记录的案例多涉及侦查检验，其方法的缜密，手续的细致，充分表明是基于丰富的工作经

验。我曾戏言，若干地方竟有似柯南道尔的小说。有关这一方面，大家只要一读阎晓君教授那部《出土文献与古代司法检验史研究》，必能有深刻的印象。

没有想到，及至八十年代，我又遇到第四个惊奇，这便是1983年底发现的湖北江陵张家山247号墓汉简。1988年，我在为日本堀毅先生的《秦汉法制史论考》写序时说过：“在云梦秦律整理告竣的时候，不少参加工作的人觉得这种发现太珍奇了，恐怕今生此世不会再遇到类似的发现。当时持这个想法是有道理的，因为自秦至今，两千年来，出现秦简是第一次，怎能要求再次找到竹简秦律呢？谁想到事隔几年，在江陵又发现时代同秦律接近的汉律！”

张家山247号墓汉律的发现，使秦汉律的比较研究，以及秦汉律与以唐律为代表的后世法律的比较研究，成为可能，这都是在以前难于想象的。阎晓君教授的这部《秦汉法律研究》，正是在这样全新的学术条件下，做出卓有成效的成果。

继睡虎地秦律和张家山247号墓汉律之后，近些年又有一系列秦汉律竹简发现，有关研究方兴未艾。相信阎晓君教授一定会再接再厉，不断有更新的论作呈献到广大读者面前，我们在期待着。

2011年11月20日

（阎晓君《秦汉法律研究》，法律出版社，2012年）

《李学勤讲演录》前言

这是宫长为博士第二次选编我的书了。2008年，长为曾辑录我有关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若干小文，编成《李学勤说先秦》一书，经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出版，现在又应长春出版社盛情约请，将我从世纪之交以来的一些演讲汇集起来，多费心力，实在应当感谢。

这些年间，于工作教学之余，我有幸在各种场合演讲。我始终觉得，做演讲和写文章不一样，是自己的思想观点同大家直接见面，从而得到检验和指教的大好机会。不过，由于我个人的学识和技巧有限，在演讲时所能涉及的，只能是经常关注并认为有价值向大家说起的少数学术问题。有时在这里讲，不久又在那里讲，内容难免有所重复，甚至出现互相不一致之处，这只能请求读者原谅。

翻看长为选辑的这本演讲集，大家不难发现我讲到的中心问题实际非常单一，就是中国古代文明的研究。

这里说的中国古代文明研究，是指古代文明的起源及其早期发展，再往下则非我视野所及。我曾提出，这样讲的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应该作为一个多学科交叉的学术领域。众所习知，研究古埃及文明的是埃及学，研究古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是亚述学，研究古希腊、古罗马文明的是西方说的古典学，而研究中国古代文明却没有专门的学科名称（“汉学”一词包容太广），这是不公平的。

于此也牵涉到中国古代文明的评价，也即是在整个人类文明历史中的地位问题。在有的演讲里，我试图从文明发展的长度、广度和高度等来阐述这个问题，不知是否有当。当然，真想就此做出深入的研究论述，需要世界历史的眼光和比较研究的能力，我只是心向往之而已。

其实，中国古代文明的内涵已经够复杂广大了，比较研究的方法同样是必

要的。我的有些演讲是在各个地方的会议或论坛上作的，例如关于楚文化、巴蜀文化、赵文化等，也有时换一个角度切入，讨论现今某一省份、地区在古代文明发展中的历史状况。我希望能够说明，中国自古以来是多民族、多地区的，而灿烂辉煌的古代文明，乃是各民族、各地区共同缔造的，这恐怕是近年我在演讲里反复最多的一句话了。

中国先秦史学会自成立以来，长期与各地方合作，举办了许许多多的学术会议和不同类型的活动，我的一部分演讲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进行的。在这里我要说，多年间我从各地方的学术界学习到很多，确实可说是终身受益。司马迁写《史记》，不仅依靠文献典籍，还去四方学习体会，是我经常引述的史例。

司马迁作他的《五帝本纪》，曾经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当前我们考察各地方，也常遇到如何研究对待当地古史传说的问题。我在这方面赞同王国维先生的主张，认为传说背后存在史实的素地，而在研究的方法论上也坚持王先生首倡的“二重证据法”为必要的趋向。上面谈到的多学科结合的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其滥觞还是要追溯到“二重证据法”，“二重证据法”的学术史意义不容否认。

以上所说，也显示出研究学术史，特别是二十世纪学术史的重要。二十世纪的学术史与我们密切相关，有利于我们认识现前和瞻视将来。我在一些演讲里也谈及这一点，盼读者赐予批评。

2011年11月25日夜

（《李学勤讲演录》，长春出版社，2012年）

《缙云第三届黄帝文化学术研讨会》序

2010年的金秋时节，大家企盼已久的“中国·缙云第三届黄帝文化学术研讨会”如期在山水如画的仙都举行。较之前两届研讨会，这次盛会规模更大，水准更高，来自全国各地的众多专家学者，围绕着“黄帝文化”这一主题，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交流讨论。展现在读者面前的这部研讨会的论文集，可以说胜义迭出，精彩纷呈，充分反映了会议取得的成果。

黄帝为五帝之首，属于我国古史的传说时代，而对传说时代的研究，在理论和方法上应与狭义的历史时代有所不同。这里十分重要的一点，是传说不可避免含有神话的因素，但又不能由此将传说背后的史实素地加以抹杀。1925年，王国维先生的《古史新证》已经强调了这个问题，而就此有详细精当的讨论的，是徐炳昶先生的《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徐先生指出，上古“神权极盛，大家离开神话的方式就不容易思想，所以这些传说里面掺杂的神话很多，想在这些掺杂神话的传说里面找出历史的核心也颇不容易。由于这些原因，所以任何民族历史开始的时候全是颇渺茫的、多矛盾的。这是各民族公同的和无可奈何的事情。可是，把这一切说完以后，无论如何，很古时代的传说总有它历史方面的质素、核心，并不是向壁虚造的。”这段话正是对《古史新证》所讲“上古之事传说与史实混而不分，史实之中固不免有所缘饰，与传说无异，而传说之中亦往往有史实为之素地，二者不易区别，此世界各国之所同也”等的引申，只是徐先生把“传说”（legend）和“神话”（myth）明确分开，意思便更为明显了。

《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初版于1943年，同年还有一部有关的著作，即尹达先生的《中国原始社会》。作为考古学家，尹先生说明：“考古学对于中国原始社会史上的贡献固然不少，但是只依靠着考古学上的材料，还不能够看出中国原始社会的全面，……中国的古史向来有不少神话似的传说，它们固然不尽可

靠，但其中还是隐约的影射着一些过去的史实。依据着考古学上所提供的提纲，配备着世界原始社会史上研究的成果，从中国古代传说里钩稽中国原始社会的史料，自然是一个比较妥善的办法。”他那本书，就是依照如此的方向来探究上古的历史。

黄帝的传说，集中的代表是《史记》的《五帝本纪》，而该《本纪》的这一部分，司马迁明说是以现存于《大戴礼记》内的《五帝德》、《帝系姓》为张本。他之所以依据这两篇的记述，不仅是因为“观《春秋》、《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即以《左传》、《国语》等古籍内容来印证，还曾周游各地，“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对照民间遗留的传说，才使他摒弃“百家言黄帝”那些“不雅驯”的文字。太史公这种谨慎务实的学风，是我们应该学习的。

自改革开放以来，考古工作广泛开展，新的发现不断公布，为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研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线索和希望。“黄帝文化”的探索，关系到中华古代文明的起源和早期发展，是当前非常重要的学术课题。

缙云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于南方的黄帝传说有特殊地位。当地领导与学者长期致力于阐扬优秀传统文化，多次与中国先秦史学会、浙江省历史学会等合作，深入开展“黄帝文化”研究。在本届研讨会期间，中国先秦史学会还建立了“缙云黄帝文化研究基地”，并向缙云县委、县政府提出了六点倡议。相信以此次研讨会的圆满成功为契机，在缙云县委、县政府的关怀下，缙云的学术、文化事业会得到进一步的可喜发展。

2011年11月27日

于北京

彭适凡《中国南方青铜器研究》序

彭适凡先生近年寓居沪上，将历年论作辑成一集，以《中国南方青铜器研究》为题。作为老友，我非常高兴有机会在这里写几句话。

中国南方青铜器的研究，在考古学领域中是一个相当专门而不易着手的重要课题。彭适凡先生以其特有的丰富经验和深厚学养，集中于这一课题，多年锲而不舍，终能获得令人瞩目的卓越成果，是值得我们尊敬的。今天关于南方青铜器研究的许多方面，大家都必须求之于彭适凡先生的工作，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我觉得，如果把南方青铜器研究这个课题的产生和进展放到新中国成立以来学术史的大背景里面来考察，就更能看到彭适凡先生的造诣和贡献。

如所周知，中国古代青铜器的著录和研究有着悠久的历史，其始源不妨说早在汉代，到宋朝已颇称发达，但若说真正科学的研究，自然是在现代意义的考古学传入之后。1928年发轫的殷墟发掘，是中国青铜器时代田野考古的肇端，在所探索的时间和空间范围上，都形成了起点。其后，就时代而言，学者们的工作自殷墟所代表的殷商晚期逐步上溯，直探中国文明的起源；就地域而言，学者们的目光由殷墟所在的黄河流域逐步外推，以至于遥远的非中原地带。青铜器时代中国的历史文化面貌，于是一步一步地被揭示出来。这样的过程，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多年间，表现得尤为清楚。

大河长江是中国最突出的地理标志。当大家对非中原地带的考古工作寄以更大关注之时，首先得到重视的无疑包括长江流域。经过众多学者的努力，长江流域青铜器时代的考古工作迅速开展。长江上游的巴蜀地区，中游的荆楚地区，下游的吴越地区，以至更辽远的诸多地方，陆续有一系列重大的考古发现，有的甚至可以不夸张地讲震惊了国内外学术界，这是近年学术史上值得大书特

书的事件。

应该指出的是，在万里长江的中下游之间，有一块地势非常冲要的地区，在传世文献材料内却最缺乏可资征引的记述，这便是号称“吴头楚尾”的今江西省赣江一带地区。这个地区夹处于吴越、荆楚之间，理应在历史上起重要的影响作用，然而直到春秋时期，史书间才只见个别地名，真正成为古史的空白点。至于西周以上，就更不用说起。然而，事情每每是两面的，这一地区的考古工作也正因此而更显得必要。彭适凡先生的南方青铜器和青铜器文化的研究，正是以这里作为基点的。

1989年秋，赣江沿岸的新干大洋洲发现商代大墓，很快轰动了有关学术界。彭适凡先生主持了大墓的发掘清理和研究，对大墓的诸多问题做出深入的探索、详尽的讨论，成为这部《中国南方古代青铜器》论文集的主要内容。

大洋洲大墓发掘完成后不久，我有幸蒙彭先生之邀，前往观摩大墓出土的珍贵文物。其中青铜器群数量的庞大、品种的繁多、纹饰的精美、工艺的超卓，在在都出乎我的预想之外。其特别使我惊异之处，至少有这样三点：

第一，体现出商代后期当地的青铜器不亚于殷墟的高度水准。

第二，显示出以殷墟为代表的商王朝核心地区对当地文化的深刻影响。

第三，在青铜器的某些方面，例如农具，甚至超过了商王朝核心地区。

这些都为进一步研究南方青铜器带来新的启示，彭适凡先生在这部书的多篇论文里，已经为我们做了细致的解释说明，富有拓新意义，可谓胜义纷呈。

这里我还想说，彭适凡先生在2008年出版的《江西通史1：先秦卷》一书中，不仅有两章专门论述“商代吴城方国文明”，多与青铜器研究相关，而且上溯下延，全面论述了江西境内的文化谱系，谨此推荐给《中国南方古代青铜器》的读者参看。

2011年12月25日

于北京清华园

（彭适凡《中国南方青铜器研究》，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年）

《贾文忠金石传拓集》序

贾文忠先生精选其全形墨拓作品，辑成一集，将由文物出版社印行，我非常高兴能有机会在这里写几句话。

墨拓技艺是我国古人的一项重要发明，其起源可能很早，至少到北宋已经相当成熟和普遍了，翟耆年《籀史》所记仁宗皇祐三年（公元1051年）诏即是证明。曾有学者以为墨拓与印刷术的发展有密切关系，是不无道理的。这种技艺的流行，在文化的传承方面起了不小的作用，直到今天，尽管有了摄影等现代技术，墨拓由于具有特殊不可替代的优点，仍然为考古文物工作所不可缺。特别是在青铜器、甲骨、石刻等项目的著录和研究中，断然离不开墨拓。

全形拓在墨拓技艺中要求最高，不妨说是其最高的境界，一贯为学术界、艺术界共同重视。有文章指出：“因全形拓是一种以墨拓作为主要手段，要求传拓者具备素描、剪纸等技术，将青铜器的立体形状复制表现在纸面上的特殊传拓技法。传拓青铜器物立体全形是各类传拓技法中最难的一种，它要求拓工具有丰富的平面传拓经验，因此历来善拓者不多。”全形拓之受人尊重，缘由正在于此，也因为这样，全形拓在墨拓技艺中的出现是最晚的。

是谁最早做到了全形拓，在一些论作里有不同说法。比较流行的传说，是清中叶嘉庆时的僧侣达受。达受号六舟，确以精于墨拓著称，有“金石僧”之目，但他不是全形拓的创始者。容庚先生在他于1941年出版的名著《商周彝器通考》中，早就指出：“彝器拓全形始于嘉兴马起凤”，并引《金石屑》所收汉洗拓本，马氏题于嘉庆三年戊午（公元1798年）六月十八日，足证这种技艺实起于乾嘉之际。1988年出版的马子云先生《金石传拓技法》叙述“传拓铜器略史”，也有同样的记载，六舟不过得其传授而已。

至于全形拓的具体技法，晚清金石大家陈介祺在致潘祖荫的书札中有详论，

见潘氏刊刻的《传古别录》。2004年，陈氏裔孙陈继揆先生将之录入《簠斋鉴古与传古》一书，大家很容易读到。

《商周彝器通考》说：“近日拓全形者首推周康元”，实是公论。马子云先生也讲到周氏“研究传拓铜器器形，因他学了透视，故拓的器形较为合理”。周康元先生字希丁，对全形拓技艺多有改进，在文物界有盛名。贾文忠先生正是周氏及其弟子傅大卣先生一脉的继承人，对全形拓作出了创新性的发展。

容庚先生还说：“全形拓本之长处，在能依原器之大小，使形状花纹展现于纸上。加以题识，补以花卉，即成一轴最佳之美术品。”贾文忠先生的全形拓即是技艺和艺术兼臻上乘的创作。记得2008年，农历值戊子，贾文忠先生以陕西眉县出土西周逯盘全形拓为中心，邀名家题跋，裱为“鼠年大吉”立幅，一时轰动。嗣后几年之始，其类似作品都刊在《中国文物报》，见者无不欢喜赞叹。

今天我应命草此小序，适值2011年之末，等候着贾文忠先生新作“龙年大吉”的到来，同时期待这部全形拓精彩结集的问世。

2011年12月31日

（贾树《贾文忠金石传拓集》，文物出版社，2012年；贾树《贾文忠全形拓精选集》，文物出版社，2013年；《北京日报》2012年12月28日；《中国文物报》2013年2月13日；《收藏快报》2013年第3期）

《柯俊传》题辞

百年以来，中国和世界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剧烈变迁。《柯俊传》这部书，以生动的文学笔触，忠实而深刻地记述了一位杰出的科学家如何在这样的历史洪流里，以他高贵的品德、丰富的学识和坚卓的毅力，对祖国、对科学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读之令人起敬。谨借此机会，祝颂柯先生健康永寿。

2012年2月8日

于清华

（韩汝玠、石新明《柯俊传》，科学出版社，2012年）

张守中《张家山汉简文字编》序

中国古文字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文字系统之一，自其萌芽产生，已经过了几千年的演进变化。这一发展过程可以划分为若干大的段落，而由春秋末开始，历经战国、秦代以至汉初，是其间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即传统上说的从“古籀”转变到“今文”的时期，在古文字学研究中有着特别的意义。然而长久以来，直到上世纪的中叶，大家对该时期的认识了解还很有限，这主要是由于材料缺乏的限制，致使研究难于着手，不能取得明显的突破。

及至七十年代以后，随着文物考古工作的铺开进展，属于该时期的古文字材料有一系列新的发现，这方面的情况于是有根本改观。许多前所未见的文物出土，在数量和质量上都超出以往人们的想像，使学者的眼界大为开拓，古文字学得到长足进步，并且影响到考古学、历史学等有关学科。这在古文字学甚至整个学术史上，都称得起是值得大书的盛事。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研究员张守中先生，在这几十年间的研究工作中有非常重要的贡献。关心古文字学的大家都记得，早在“文革”期间的1973、1974年，张守中先生就参加张颌先生主持的《侯马盟书》的编著，对盟书文字做了精心摹写，准确且能传神，成绩之卓越为学者交口称道。随后1977年，平山战国中山王墓发掘，发现大量有铭文青铜器，守中先生即用硬笔摹写，辑成《中山王罍器文字编》，于1981年印行。这部书体例美善，极便读者，深为学术界所欢迎，最近还出了重订版。

与此同时，战国至秦汉的简牍帛书也有多次重大发现，有的毫不夸张地说，确实震惊了国内外学术界。张守中先生对于其间几批最重要者，以积年功力逐一摹写，纂成文字编，如1994年问世的《睡虎地秦简文字编》、1996年出版的《包山楚简文字编》和2000年的《郭店楚简文字编》，使他在摹写文字编方面成

为效绩最丰的一位学者。

历数张守中先生这些著作，是为了说明他所涉及古文字的范围。侯马盟书的时代是春秋晚期，平山中山王墓青铜器与包山简、郭店简的时代是战国中晚期，睡虎地简属于秦代，而张守中先生最新完成的这部《张家山汉简文字编》所录张家山简则为汉初。这样，守中先生已经将春秋晚期到西汉初年这个中国古文字演进中的特定阶段覆盖了。浏览上述各书，便能对当时古文字的变迁大势有概要的了解，其重要性不只是作为工具书提供便利而已。

《张家山汉简文字编》收录的是1983年底在江陵张家山247号汉墓出土的竹简。关于这批简的性质和意义，我曾有机会在《江陵张家山汉简概述》（《文物》1985年第1期）和《张家山汉简研究的几个问题》[《郑州大学学报》（哲社版）2002年第3期]两篇小文中作过介绍。这批简有一个特别珍贵的特点，就是作为简中最重要部分的《二年律令》的年代明确，如我后一篇小文所说：“这个‘二年’，有明显证据是吕后二年，即公元前186年。比如律文中有：‘吕宣王内孙、外孙、内耳孙、玄孙，诸侯王子、内孙、耳孙，彻侯子、内孙有罪……’云云，所谓‘吕宣王’是吕后元年所上吕后父吕公的谥号，见《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惠景间侯者年表》和《汉书·外戚传》。简内还再三涉及鲁国，是指吕后外孙鲁王张偃，其元年即吕后元年。到诸吕被诛，文帝即位，这类优待吕氏的律文自然不会存在下去了。”近时英国著名学者鲁惟一先生（Michael Loewe）还在《中国早期帝国》（Michael Nylan and Michael Loewe ed., *China's Early Empires*, Cambridge, 2010）书内专写一章讨论《二年律令》，标题便是《公元前186年的法律》。因此，我们要研究汉初文字，这正是一个最好的年代定点。

当然，张家山247号墓汉简还包括《奏谏书》、《盖庐》、《脉书》、《引书》、《算数书》等内容，关系到政法、军事、医学、数学等方面，对之有兴趣的读者都可利用张守中先生的文字编，这是我愿竭诚推荐的。

在这里我还想说一下，或许有人以为今天我们有了发达的电脑技术，容易从照片上提取任何一个古文字，随之组织成文字编，那么为什么还要用摹写这种费时费力的方式呢？我认为这只说到了摹写工作效能的一个方面。摹写固然必须像真，在这一点上可能电脑是有优势，但是我们观察分析古文字，于辨明

形体结构之外，还每每须体会其笔画的运行走势，这便只有通过摹写才能充分获得。对于一些残泐模糊的文字，情形更是如此。至于摹写本身也是书法性质的艺术实践，就不必再说了。

张守中先生2010年冬为《中山王璽文字编》新版撰一后记，讲到《张家山汉简文字编》业已成书：“我愿尽快脱稿，早日奉献学人。古人留下这许多丰厚的文化遗产，经我辈整理，提炼加工再创作，其工作实践之机会实属难得。”这是他的心声，读之令人感动，不应忘记他已年过七旬了。

2012年2月14日

于清华大学

（张守中《张家山汉简文字编》，文物出版社，2012年）

刘绍刚《孔子论学八体书册二种》

序言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刘绍刚先生以其新作《孔子论学八体书册》赐示，力嘱为序，使我于感谢之余，甚觉惶恐。我素来不谙书法，只能处身门外，絮言几句，能否有当也就在所不计了。

我得识刘绍刚先生已有年所。他曾从学于山东大学名师蒋维崧先生门下，出自天分，当时即在全国大学生书法竞赛中获奖。后随蒋先生临写商周金文，辑有专集行世，于是进入古文字书法的殿堂，不惟尽得师传，更能发扬光大，多有创作，知名于学术界、艺术界。即将付梓的这部《孔子论学八体书册》，历用殷虚卜辞、西周金文、东周金文、石鼓文、楚简、古隶、秦篆与汉碑八种文字书体，尽显灵心妙手，俱能形神兼似，实在是古文字书法中难得的成果。

以上我用了“古文字书法”一词，关于什么是“古文字”，什么是“古文字书法”，这里想作一解释。

中国古文字学所讲的“古文字”，是指汉字发展的早期阶段，从文字的萌芽产生开始，下限现在学者一般断到汉初。中国古文字是世界上多种起源古远的文字系统之一，而且是仅有的一种迄今仍在传流使用的文字系统，有其独具的特色。我以前几次说过，中国古文字的一个特色，就是从文字一产生起，就与书法密相结合，而且文字发展的每一阶段，都有着与该阶段相对应的书法风格。比如殷商甲骨文的书法，西周至春秋早期的书法，春秋中晚期以至战国的书法，秦汉的书法，各有明显的不同。不过这只是文字发展各阶段自有的书法，还不是这里说的“古文字书法”。

我们说的“古文字书法”，是在“古文字”本来隶属的历史阶段业已过去，

后来阶段的书法家通过古文字的鉴赏研究而模拟形成的特殊书法。这是中国书法一种特有的分支，在书法史上有其特殊的传统和地位。

古文字书法的滥觞，是对古文字的摹写，这种摹写古文字的行为，推想在古文字刚刚“作古”的时候，便已经开始了。大家熟悉，秦人兼并六国，建立统一王朝，其重大的行政措施之一即是统一文字，“罢其不与秦文合者”。这项措施推行一段时间之后，被禁止使用的前代文字成了与通行文字对立的“古文”，在社会民众中间已不能识读，也就是说成为“古文字”了。到了汉代，为了传承受到秦代焚书沉重打击的文化学术，征集释读古文旧书的历史任务落在当世学者的肩上。比如汉景武之间，曲阜孔壁发现古文典籍，博士孔安国“以今文读之”，还创始了“为隶古定”（后称“隶定”）的工作方法。那时没有摄影，惟一保存古文字形体的办法，无疑只有摹写。西晋武帝时，汲冢出土战国竹简，其时学者整理的《穆天子传》，至今仍留有“古文”一栏，猜想原有内容就是摹写的。

到西汉末年的新莽时期，古文一度列为官定的“六书”之一，但是仍不在社会上通行，只是通过一代一代的传承摹写存在下去。这种摹写主要是要求形体的准确，与艺术性的书法仍然相去一间。其中最著名的人物，如三国魏时的邯郸淳、张揖等人，能否称为古文字书法家，还是有待讨论的。

真正的古文字书法，要迟到近代才确实形成。晚清以下操此技艺的著名书法家，诸如吴大澂之写金文，吴昌硕之写石鼓，罗振玉之写甲骨文，各有新创独到，脍炙人口。尤其应提到董作宾先生，在推广甲骨文书法方面极有建树，种种作品播布海外，有非常大的影响。不过这些位著名的古文字书法家，所学各有专长，能够像刘绍刚先生这样上下纵横，兼擅各种古文字书体的，尚属罕见。

刘绍刚先生之所以有不同于前人的造诣，也是时代际会使然。正如一位刘绍刚书法的评论者所说，其间有双重的因缘：既缘于当世新出土的古文字资料大大超于前代，同时也缘于当今古文字研究的水平大大超于前代。刘绍刚先生本人就是古文字研究的专家，长时期从事简牍、帛书、玺印等方面的整理研究，在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任古文献室的主任，并主编《出土文献研究》，这为他推

进古文字书法的创作实践提供了基础和条件。

了解刘绍刚学者兼书法家的身份，有裨于我们更好地认识这部《孔子论学八体书册》的神韵以及寓意。

2012年3月4日

作于清华园

（刘绍刚《孔子论学八体书册二种》，中华书局，2012年；《中国文物报》2012年7月27日；又在略加修改后用为《刘绍刚书法篆刻作品集》序，上海书店，2013年）

《〈史记·五帝本纪〉讲稿》后记

这篇《史记·五帝本纪》的讲课记录稿，幸蒙三联书店不弃，即将惠予出版，我是非常感谢的。编辑先生要我在书末写几句话，向读者推荐一些可供进一步阅读的书籍，这件事我未必能做好，有挂漏失当之处，还要请大家鉴谅。

在讲课中，我强调了中国古史的“五帝”一段乃是中国文明起源并初步发展的时代，因此，对“五帝”时期历史的追溯，在一定意义上也就是对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研究。应该认识到，中国文明起源及其早期发展，是整个人类文明形成演进过程的一个重要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具有重大的学术意义。正由于如此，在现代学术史上已经有相当多的学者对之试行探索，出现了不少有不同方面贡献的论作，要想逐一介绍给读者，是相当困难的。好在近年我们已经有了—本便于检索的工具书，即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编著的《中国文明起源研究要览》（文物出版社，2003年）。

《中国文明起源研究要览》—书，如该书卷首考古研究所“学术委员会评审意见”所说：“既是一部专题研究工具书，又是我国第一部全面反映有关中国文明起源研究成果与观点的学术著作。该书全面收集、摘编了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各种论著，……并将摘编的约八百篇论著分为三十个研究专题编排，集中展示了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历史和现状。”这三十个专题被划作五大部分：

- 、综论中国文明的起源
- 二、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专题研究
- 三、中国几个主要区域的文明起源研究
- 四、中国文明起源与古史研究
- 五、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成果评介与回顾

我建议读者先选择几种综论性质的代表著作，例如李济的《中国文明的开始》（商务印书馆，1970年；又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1年）、夏鼐的《中国文明的起源》（文物出版社，1985年）、苏秉琦的《中国文明起源新探》（香港商务印书馆，1997年；又三联书店，1999年；辽宁人民出版社，2009年）和张光直的《中国古代文明之起源与发展》（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这几种书《中国文明起源研究要览》均已著录，在《要览》出版之后的新作，可读李伯谦的《文明探源与三代考古论集》（文物出版社，2011年）。

许顺湛有《黄河文明的曙光》（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见于《要览》著录。其近年新作《五帝时代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2005年）则标明“五帝”。与之类似的，还有郭大顺的《追寻五帝》（辽宁人民出版社，2010年）。

标出“五帝”，即涉及古史传说。专论古史传说的，建议读徐旭生（炳昶）的《中国古代史的传说时代》（增订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并可参看他与苏秉琦合作的论文《试论传说材料的整理与传说时代的研究》（《史学集刊》第5期，1947年）。《中国古代史的传说时代》书首天石所写的序说：“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号称五帝。徐老指出，这个时代，生产力有较大的发展，是已由量变达到质变的时代。”所说“质变”，应即指跨入文明的门槛。

根据三联编辑先生的要求，我这篇讲课记录稿后附印了我过去发表的《走出疑古时代》和《谈“信古、疑古、释古”》两文，我想这是因为在讲课时有听众提起有关问题的缘故。不过，编辑先生在电话中指出，《走出疑古时代》的成文，迄今已有二十年，这确是我没有意识到的，使我为之一惊。

可能有的读者了解，《走出疑古时代》原来是1992年我在北京大学一次小规模学术座谈会上的发言，经李零等先生记录，刊登在刘梦溪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化》杂志上。其间谈到的几点陋见，其实尚可回溯到1981年我在西安“先秦史座谈会”上讲的《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如果从那时算起，竟已经过了三十年了。

《走出疑古时代》和《谈“信古、疑古、释古”》所涉及的，是怎样看待和研究中国古史的问题，特别与“五帝”时期相关。读者如关注我在两文中讲到的“疑古”思潮，想对之有所探讨，当然最好是去读顾颉刚主编的《古史辨》，

容易得到的是198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印行的本子。若欲概观这一思潮的缘起，以及有关讨论的始末，可看吴少珉、赵金昭主编的《二十世纪疑古思潮》（学苑出版社，2003年），还有张京华的《古史辨派与中国现代学术走向》（厦门大学出版社，2009年）。

徐葆耕《释古与清华学派》（清华大学出版社，1997年）一书，关于“信古、疑古、释古”有值得注意的申述，大家也可以参读。

2012年3月27日

（《〈史记·五帝本纪〉讲稿》，三联书店，2012年）

礼学在今天的价值和意义

——首届礼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致辞

尊敬的谢校长，各位领导，各位女士、先生：

今天能有机会应邀参加这个盛会，来庆祝礼学中心的成立，我心里非常高兴，也深感荣幸。大会让我在这里说几句话，在表示热烈祝贺之余，我想就礼学在今天的价值和意义来谈一下我个人的粗浅的一些见解。

刚才谢校长谈到，我们清华大学的文科建设，要以中国文化最根本的中心作为引导，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我常常说，在中国的传统学术里面，儒学是主流，这并不是说其他的学问不好或不重要，而是从历史而言，儒学实在是主流。这是个历史的事实判断，而不是价值判断。而在以“六经”为核心的儒学里面，礼学又有它特别重要的地位。刚才大家纪念了礼学界的前辈杨天宇先生，我跟他很熟。我还想提到另外一位礼学家，就是南京的钱玄先生。在1996年，当时已年届九十的钱先生，出版了他的著作《三礼通论》。在这本书的前言里面，他引用了清代礼学大家凌廷堪《校礼堂诗集》里的一首诗：“儒者不明礼，六籍皆茫然。于此苟有得，自可通其全。”最后他说：“如衣之有领，如官之有联。稽古期有获，用志须精专。”我想凌廷堪的意思是说礼学是作为中国文化主流的儒学的核心，是“六经”的锁钥，如果不通“礼”，就不能通“六经”。我想这代表了整个清代汉学一派对于礼学的基本观点。

但这些汉学家的观点还是有一定局限的，对于这一观点及清代的礼学，我们的前辈学者钱宾四（穆）先生曾有很中肯的批评。钱先生在其晚年大著《朱子新学案》里，专门有一部分论述以朱子为代表的礼学，他说：“清儒考礼，其所用心，仅在故纸堆中；朱子之礼，则以社会风教、实际应用为主。”我想钱先

生这个批评是切中要害的，清代的考据学在一定程度上脱离“社会风教、实际应用”，这是其不足之处。今天讲习礼学，我觉得我们应该兼取汉宋，力拒偏见，而以“社会风教、实际应用”为主，这应该是我们以后礼学研究工作的一部分。

近些年，报刊媒体上常常说中国是“礼仪之邦”。在这里我要向大家请教，我从小听说中国是“礼义之邦”，那时“义”字没有单立人，不知道为什么这些年把这个单立人加进去了。我觉得还是应该称作“礼义之邦”为宜。不管怎么说，“礼义之邦”是中国文化传统的一个概括性表现，这应该是正确的。可是今天实际上在我们社会生活中看到的风气，常常有与“礼义”或“礼仪”相反相悖之处，有的是不合礼，有的甚至是“非礼”。这就使我们意识到，礼学以“社会风教、实际应用”为主，这个方向和路线应该说是非常重要的，具有它的实际意义。怎么样使礼学研究结合当前我们文化风教方面的建设，值得我们思量，也是我期望在这次会议上向各位专家学者请教之处。

正如刚才谢校长所说的，清华大学实际上多年以来注意礼学的研究与探索，特别是彭林教授，可以说是多年于此不遗余力，而且多有著述。我们都很熟悉，彭林教授的研究最先从《周礼》入手，随后遍及“三礼”和礼学史，还从中外关系史的角度，在其亲自的考察下，写成《中国礼学在古代朝鲜的播迁》这样一部大作，可说别开生面。以彭林教授和他的学生为主体，在清华形成一个礼学研究的重要据点，受到校领导和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和支持，取得了良好的成绩，这是非常值得我们大家学习的。

刚才谢校长也提到，我们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当前的主要任务是整理清华简。可以向大家报告的是，清华简里面有“礼书”，这是我们已经看到的，虽然我们还没有释读清楚，但一定是“礼书”，这是没有问题的。这方面的材料应该说还是不少，实际上清华简的大部分内容都属于经典方面，所谓的“六经”以“礼”为锁钥，这一点在我们这里也有充分的体现和证明。我们很愿意提供我们的材料，请礼学中心以及在座的诸位专家学者共同来研究。

今天我们在这里成立礼学中心，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跃进，我觉得这对我们

清华大学的文科建设也是件大事。

以上就是我的个人见解，可能有不当之处，希望大家批评指正。

（《礼乐中国》，上海书店出版社，2013年）

钟林《金文解析字典》序

我有机会读到钟林先生《金文解析字典》的文稿，是经过清华大学自动化系慕春棣先生介绍。其后钟林先生曾来访北京，惜因我家中事务缘由，没有能够把晤，实在遗憾。但通过译读书稿，我还是对钟林先生的识见功力获有印象。

钟林先生是陕北子洲县人，多年于延安地区担任行政工作，且在经济、体制等方面有一系列论作发表，得有奖项。出人意外的是，他业余对金文研究投入了很大精力，竟能撰成如此规模的《金文解析字典》，其意志之坚卓难能可贵。

金文研究是中国古文字学中历史最为长久的一个分支，其萌芽早至汉代，到宋朝已臻兴盛，历来学者既多，成果更称丰富。记得1985年我为广东的陈初生教授《金文常用字典》作序，即说明金文具有的特点有三，是时代长、变化多、书法好。这个看法，现在考虑仍是成立的。

金文在历史上存在的时间，于各类古文字中跨度最大。前些年，台北“故宫博物院”张光远先生著文，力主金文的起源早于甲骨文，是有一定道理的。这是金文出现的上限，目前可溯至商朝早中期。至于金文时代的下限，学者常以秦始皇再统一中国，罢文字不与秦文合者为断，实则秦汉金文也是金文研究不应缺少的。这样，金文研究的对象，所居时代就几乎达到两千年了。时间如此漫长中的金文，演进过程自然有许多发展变化，这也正是金文研究所要探讨的主要方面之一。

钟林先生纂著这部《金文解析字典》，还对金文书法做了特别的强调。他本人是书法家，作品多次获奖，并收入多种书画集。其所以深入研究金文，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想从书法的角度切入。我过去讨论过，中国古文字自形成产生

时起，便与书法分不开。古人称文字为“书契”，书是以毛笔书写，契是用锋刃契刻，二者同时共起，并行不悖，而书法即寓于其间。至少运笔写字，是必然有狭义的书法的。今天经考古发掘见到的上古陶器符号，有些肯定与文字相关，同样有书契二途。至于甲骨文，虽然有极少数先写后刻或只写不刻的实例，总的说来是出于契刻。金文则与之不同，尤其是商代到春秋的金文，镌刻的极少，绝大多数系铸成，而底本为毛笔书写，能够较好地体现当时书法的真相。

由于金文有上述三个特点，凡涉及研究中国古代历史文化，关注古文字演进发展，以及鉴赏学习金文书法的读者，都可从钟林先生的《金文解析字典》得益。

《金文解析字典》有一个优长之处，是在博采众说的基础上，能力求平实稳当。1924年，王国维先生为容庚先生《金文编》作序，首标孔子“多闻阙疑”之旨，如今我辈后学考释金文，每每强不知以为知，思之不禁汗下。我常说道不远人，对古文字真正做到识释，论证一定是畅达通顺的。为广大读者编著字典，更应以学界共同承认的说法为本。我读到的钟林先生文稿，确有这方面的长处，是我愿在这里力加推荐的原因。

2012年4月25日

于北京清华园

张国骥《清嘉庆道光时期 政治危机研究》序

湖南师范大学张国骥博士所著《清嘉庆道光时期政治危机研究》，即将由岳麓书社出版，要我写几句话，深觉责无旁贷。

国骥博士的这本书，是以他在湖南大学岳麓书院的学位论文为基础，加以补充修改而成，而其论文是我和朱汉民教授担任指导的。熟悉我与朱教授的朋友都知道，我们两人共通的学科范围是学术史、思想史，这次何以安排出一篇清代政治、社会史方面的题目来呢？

其实，在国骥向我提出他计划专门研究嘉道时期政治危机这个课题的时候，我在内心里还是从学术史、思想史工作的角度来考虑衡量的。近年学术界多谈康雍乾盛世，做学术史、思想史研究的也常讲乾嘉学派，然而从康雍乾下至嘉道，清朝的历史局面确有巨大的转变，学术、思想风气同样大有不同。如何认识和分析其间的变迁实质，很需要我们仔细思量。

当时我回想起多年前反复读过的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书的一开头总论学术思潮，引述“佛说一切流转相，例分四期，曰：生、住、异、灭。思潮之流转也正然，例分四期：一、启蒙期（生），二、全盛期（住），三、蜕分期（异），四、衰落期（灭）。无论何国何时代之思潮，其发展变迁，多循斯轨”。清代的主要思潮是汉学，汉学于乾隆朝达到极盛，至嘉庆而转衰，道光以下渐归结束，为新学所取代。嘉道时期正是一大关捩，应该特别考察。

梁启超讲学术史，强调“政治的影响”，我们更当把嘉道时期思潮的演进放到政治、社会的大背景中来审视，将后者作为研究的前提。张国骥博士本书的贡献，正在于充分揭示了嘉道这五十年间危难重重的国家大势。他把那一历史

时期的危机分为四个方面，即吏治危机、社会危机、民族危机和政改失败，令今天的我们读之仍不免生震撼之感，原来中国竟是这样进入十九世纪的。

当然，嘉道时期不仅是清朝政治由盛转衰的转折关口，更是中国几千年来君主国家政制走向终结的前夕。如本书所陈述的，政治危机的剧烈和深刻，甚至蛰伏于书室之中的纯学者，也不能无闻不见。写到这里，我想起前几天看过一篇论段玉裁晚年自悔的文章。大家知道，段玉裁为戴震门弟子，是标准的汉学家，其《说文解字注》堪称不朽名作，然而他到终老之时，竟自云“归里后所读书，喜言训诂考核，寻其枝叶，略其本根，老大无成，追悔已晚”，叹息“读书竟无成也，余之八十年不付诸逝水中乎？”其如此自责，毋宁说是针对流行的汉学学风而言，批评其无益于世致用。段氏卒于嘉庆二十年（公元1815年），我们已经可以由他的话中感受风气移转的信息了。

国骥博士在本书结论中说：“中国清朝嘉庆、道光时期这五十年的政治危机，是中国历史转型期的政治危机。”他指出：“此时中国的君主专制开始动摇，落后的农业经济，落后的科学技术，落后的思想文化，以及落后腐朽的君主专制制度，都不能照常运转下去，……虽然六十年后的1911年辛亥革命才推翻帝制，但毕竟出现了历史的转机。”这样，通过危机的剖析找到转机，于漫漫长夜中发现一线曙光，说明了历史的辩证法。因此，我认为《清嘉庆道光时期政治危机研究》这本书，对于探讨政治史、社会史固然很有价值，对于学术史、思想史，以至当时整个历史转型过程的研究，都大有意义。

在此我还想说一下，国骥博士这本书还有一个优长之处。书中涉及的问题很多，领域很宽，引用的中外文献也颇广博，然而行文概括，无繁琐堆砌之弊，有较强的可读性，我觉得这种文风是好的。学术论著贵有创新识见，本来不在篇幅长短。清初顾炎武曾说：“今人所纂辑之书，正如今人之铸钱，古人采铜于山，今人则买旧钱，名之曰废铜，以充铸而已。”（《亭林文集》卷四《与人书十》）所著《日知录》可谓言简思精的典范。这也是中国文化优秀传统之一端，足供我们借鉴。

2012年4月27日

（张国骥《清嘉庆道光时期政治危机研究》，岳麓书社，2012年）

《邵望平史学、考古学文选》序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邵望平先生近些年隐居美国波士顿，我们许久没有晤面了。去年夏天，获闻邵先生的论文集正在编辑，并承以部分文稿见示，我认为这是一件大好事。这部论文集的出版将在学术界有很深远的影响，凡关注中国考古学及古代历史文化的读者，都会从中得益。

邵望平先生1954年从读于当时还成立未久的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今考古文博学院），开始献身于考古学工作和研究，迄今已逾半个世纪。她曾经主持和参加多处史前至殷商时期遗址的考古发掘，并于云南、海南等地进行民族调查，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做出了优异的成绩。她长期研究的中心，是中国文明起源这一意义非常重大的学术课题，前后发表论文有近百篇之多，即将问世的论文集即由之精选辑成。

我说多方面的读者会由邵望平先生的论作得益，是因为我自己有实际的体会。在此不妨举出两个例子，说明我怎样从她的文章取得启示和帮助。

邵望平先生著作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其于1987年发表的《〈禹贡〉九州的考古学研究——兼说中国文明起源的多源性》。我收到刊登这一名文的《九州学刊》，马上就被这篇论文的标题吸引住了。大家知道，《尚书》中的《禹贡》自疑古思潮兴起即被指为晚周时人伪作，怎样能由考古学角度加以解读，确是令人感到震撼的。我怀着质疑的心情，将论文反复读了几遍，深深为邵先生的识见和勇气所折服。

《〈禹贡〉九州的考古学研究》的论断使我不能忘记，从而2002年我初次看到西周中期青铜器夔（我主张读为遂）公盨时，读出其铭文首行是“天命禹敷土，随山浚川”，我立即联想到邵先生那篇论文，因为“禹敷土”语见《禹贡》，“随山浚川”也见于《禹贡》序。盨铭表明，正如邵文揭示的那样，《禹贡》有

着古远的根源。现在又在她论文集的文稿中读到一篇《新获西周铜盨盨铭三题》，是专门讨论这件盨的，文中由盨铭的考释谈到古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尽管篇幅不长，涉及的范围却相当广泛。特别是她指出盨铭突出体现了民本思想，“可以视为《尚书》遗漏了的（或被孔夫子删去的）一篇诰词，一篇典型的德政宣言”，“盨铭颇具王气，读之犹如《康诰》、《梓材》、《召诰》之类对王（或高层贵族）的训导之词。此铭必出自最高统治层之口。”这样的真知灼见，读之只有再三击节。

再有一个例子。2006年，我为了纠正自己早年在《殷代地理简论》里提出的商代夷方（或释人方）地理方位的误说，根据殷墟小屯南地出土的甲骨卜辞等新见材料，推想属于商朝的攸侯的都邑攸和夷方所居的售位于今山东的淄、潍之间，那里乃是商与夷的分界。这个想法能否得到考古学方面的支持，自然是我没有能力断言的。

为了解决这一疑难，我惟一的办法就是重读邵望平先生和高广仁先生的专著《海岱文化与齐鲁文明》。这部书非常详细地从考古学角度论述了“以潍、淄流域为中心，包括惠民地区在内的鲁北小区”，说明“这一地区商代晚期的遗址分布相当密集，……由于该区，特别是潍水流域，主要是在商代后期才受到商文化浸润的，因此呈现出一种复杂的文化面貌。……从地理上看，商文化因素所占比例由西而东递减、土著文化因素递增；从社会层次看，商礼的浸润随社会层次的降低而递减”。这使我进一步认识到淄、潍一带确实是商王朝与夷人间的界面，于是草出《商代夷方的名号和地望》、《帝辛征夷方卜辞的扩大》等小文。

以上我亲自感受的事例足以说明，邵望平先生论作之所以给人以导引启发，是由于她在研究中不局限于一物一事，而能由小见大，由微知著，换句话说，是站得高，看得远。最近在《南方文物》（2011年第3期）上见到邵先生的访谈录，提及她的“史观及学术观点的形成有三个主要来源：一是苏秉琦先生的区系类型理论；二是徐旭生（炳昶）先生的《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三是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恰当地解释了她何以在学术的发展前进中居于前沿。

在访谈最后，邵先生非常谦虚地说：“我深知，不论是我对文明起源、中国

早期文明发展道路的探讨，对天文学起源的研习，还是对民俗、民族材料、古环境变迁史料在考古学研究中运用，都只走出一两步而已。自以为是的‘小有所得’，很快会在汹涌澎湃、后浪推前浪的学术大潮之下湮灭、逝去。”我想每一位这部论文集的读者都不会这样看的，邵先生五十多年的辛勤工作，包括论文集展现的种种创见，不会被人们所遗忘。我们更盼望她继续做出新的研究，以更多更大的成果和大家见面。

2012年5月1日

于北京清华园

（《邵望平史学、考古学文选》，山东大学出版社，2013年）

华表《善斋集》序

华表先生将他的《善斋集》诗稿拿给我看，坚嘱一定要写几句话，但说实在的，我很不懂诗，更不作诗，哪里有资格为一部丰富多彩的诗集撰序？然而固辞不获，只好陈述一些诗以外的感想，聊表心意吧。

华表先生长期执教于清华历史系，近因工作需要，才转至学校的马克思主义学院，仍讲授历史。马克思主义学院设于老清华的善斋，是他给诗集署题的缘由。华表先生乃历史学者，而又兼为诗人，这里我就从史与诗的关系谈起。

先说由史看诗。我很赞赏华表先生于本书自序中所讲，这部诗集所收诗篇“大多是生活的写照和感悟”，虽然“有的是琐碎生活写真，强调的是真情实感”。我觉得这几句话道出了作诗的真谛，中国自古诗的传统本来即是这样的。据我所知，古代典籍最早论诗的，要推《尚书》里的《舜典》（《舜典》原与《尧典》为一篇，居《尚书》之首），其中记载虞舜命夔典乐，说：“诗言志，歌永（咏）言，声依永（咏），律和声。”“诗言志”三字，可谓古人评诗的根本准则。前些年发表的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简《孔子诗论》，记述孔子教《诗》的言论，归结于“诗亡（无）隐志，乐亡（无）隐情，文亡（无）隐意”，正与《舜典》相关。后来《毛诗序》对此又有引申，这里便不详说了。

诗言志，志不止是现在说的志趣、志向，实际是包括了人的思想、情感以及心灵一切的趋向，这等于说诗是诗人心灵或者说生命的外现，而诗人的心灵或生命又必然不能不植根于当时的历史。在这里，诗和史不可分开，当然我们说的乃是好诗、真正的诗。

由史看诗，会使我们对诗多一分理解和认识，同样道理，我们还可以由诗见史。前人常讲杜甫等大家之诗是诗史，实则任何诗作，只要不是强说愁的无病呻吟，总是在不同程度上映现出历史的一个侧面，而且有时会比枯燥的历史

记载更深刻、更鲜活些。

中国古书分为经、史、子、集，诗词一般归入集部。关注历史学工作的都知道，研索一个时代的历史，必须绎读那个时代的诗文集。我们读现代人的诗集，特别是像华表先生《善斋集》这样强调抒发真情实感的诗，更可说是读其诗如见其人，也一定会引发内心对时代变迁的种种回忆。

曾住宿善斋的清华学生

李学勤

2012年5月20日

（华表《善斋集》，白山出版社，2013年）

吴镇烽《商周青铜器铭文暨 图像集成》序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吴镇烽先生以十余年的心力，纂就《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一书，将交上海古籍出版社印行。这部巨作的问世，无疑会对中国古代青铜器及其铭文（通称金文）的研究起重要的推进作用，并且有裨于一系列有关学科——包括考古学、古文字学及古史研究等的发展，是一项非常有价值的贡献。

中国青铜器源远流长，现知最早的青铜器物实例，可上至公元前3000年，而在公元前二十一、二世纪开创的夏朝，应该说已进入青铜时代了。到了商朝前期，有的青铜器上出现简单的铭文。及至以殷墟为代表的商朝后期，铭文逐渐增多。进入西周以后，更有了所谓足抵《尚书》一篇的长篇金文。金文的时代下限，研究者一般划在秦统一以前，从商到战国末有一千四五百年。如果像有的学者主张的，下延到两汉，就约近两千年了。金文在历史上意义的重大，自然是不言而喻。

青铜器和金文研究的历史，也是相当漫长的。根据典籍记载，其萌芽竟可追溯到西汉。到了宋代，这方面已经称得起是一门专门学问了。尤其是清朝考据学风大兴以来，有许多著名专家和著作，蔚为风气，形成现代青铜器与金文研究的良好基础。至于今天的青铜器和金文的研究，乃是考古学、古文字学等学科交叉结合的学术领域，这种性质在吴镇烽先生的工作中即已充分体现出来。

我读了吴镇烽先生这部《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认为至少有三点值得我们特别称道。

首先，是内容丰富齐备，超越前人。

从北宋以下，青铜器与金文的著录繁多，各个时期都有学者企图综合辑集，例如宋代吕大临的《考古图》、薛尚功的《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清代阮元的《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等。二十世纪中叶，刘体智的《小校经阁金文拓本》、罗振玉的《三代吉金文存》搜罗最为宏富。后者系罗氏毕生所积墨拓，鉴别谨严，印制也较精好，自1937年出版，长时间成为研究者不可缺的要籍。不过《小校》也罢，《三代》也罢，作为一家收藏的材料，总尚有其不足之处。

五十年代之后，田野考古工作逐步开展，各地新出青铜器和金文陆续涌现，经过学术界呼吁，编纂更为美富的著录的条件渐趋成熟。1982年，台湾严一萍先生所编《金文总集》由艺文印书馆出版，收录金文8035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发挥集体优势，编出《殷周金文集成》，自1984年由中华书局开始印行，至1994年出齐，收录金文达11984号。以上两书的异同，有季旭昇先生所主编的《〈金文总集〉与〈殷周金文集成〉铭文器号对照表》详细说明。继《集成》之后，刘雨等先生有《近出殷周金文集录》及其二编，台湾钟柏生等先生有《新收殷周青铜器铭文暨器影汇编》，均系统补《集成》不及收入的材料。

吴镇烽先生于九十年代曾作有《商周金文资料通鉴》电子版，虽未正式发行，已使一些学者大为受益。现在其基础上做了很大的补充修改，收录时限扩至2011年底，共有16655号，确足称为洋洋大观的集大成之作。

其次，是广搜流散材料，多属希见。

青铜器品种数量繁多，发现后收藏传流情况每每非常复杂，致使材料的辑集殊非易事。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前，处于大家了解的原因，许多青铜器，包括有珍贵铭文的重器，流散到境外众多国家和地区。近一时期，出现盗掘偷运，又有不少器物流散，更是不易访求。

搜辑流散境外的青铜器和金文，曾是几代学者投入大量精力的工作。早在1922年，罗振玉即有《海外吉金录》及其《补遗》。其后容庚先生有《海外吉金图录》，陈梦家先生有《海外中国铜器图录》和《殷周铜器集录》，还应当提到日本京都大学梅原末治先生的《支那古铜精华》与林已奈夫先生的《殷周青铜器综览》，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巴纳、张光裕先生的《中日欧美澳纽所见所拓所摹金文汇编》，等等。近期出版的，又有现在美国达默思大学的艾兰教授和我编的

《欧洲所藏中国青铜器遗珠》，刘雨和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汪涛先生编的《流散欧美殷周有铭青铜器集录》。尽管已经有了这一系列著录，这方面工作仍然需要继续进行下去，吴镇烽先生于此一贯充分关注。

国内藏家的材料，同样是十分分散而难于辑集的。吴镇烽先生在这方面做出了众所周知的成果。他多年来承担青铜器鉴定的任务，注意流散材料的取得，真是见多识广。其所经眼的种种器物，很多是一般人没有机会见到的。《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新著录的青铜器，有相当一部分是流散海内外的器物，拓宽了大家的眼界。

再有，是提供图像数据，便于研究。

前已提到的宋朝《考古图》等青铜器著录，本来有着一个非常好的传统，就是附有器物的图像，同时记有出土地点、流传过程、当时藏家，以及器物的尺寸、重量等项，一直到今天还是对研究有很大帮助。然而随着金石学的演进越来越偏重于文字，后出的著录多数只录铭文，甚至成为单纯的拓本（或摹本）集，以致很多重要的金文没有原器的图形可查，对深入研究造成很大障碍。

从现代的考古学来说，青铜器乃是考古遗物的一种，应该按照考古学的方法去考察研究。即使是金文的研究也不能孤立进行，必须结合青铜器的形制、纹饰、功能、组合、工艺等方面，做出全面的分析。最明显的例子是著名的毛公鼎，只读释铭文，容易认为气象弘伟，从而推断为西周开国时作，事实上如此主张的颇有名家学者，但只要观察器形和花纹，便会知道其说不能成立，有关的论证已经由郭沫若先生完成了。现在我们可以说，要想正确地判断金文的时代和地域，必需对其器物图像做出研究。吴镇烽先生编纂的这部书，正是尽量满足了研究的需求。

这是我向学术界和广大读者推荐这部书的理由。

2012年5月24日

于北京清华园

（吴镇烽《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

致曲春皓谈石鼓文函

曲春皓先生：

得闻您关于石鼓文的大作即将付梓，且系“一部诗、书、影三艺合卷”的巨著，既感欣幸，又觉敬佩。石鼓文是我国古代文物中独具特色的瑰宝，虽其发现已逾千年，历经无数学者论说探讨，仍有不少问题未得解决，许多奥蕴有待抉发。我自己在石鼓文方面没有下过多少工夫，乏善足陈，对尊作提不出什么意见，只能在这里祝愿此书及早问世。

多年来我很想就石鼓文写一点个人见解，总是迟疑不敢下笔。这主要是由于我一直认为石鼓文研究有与其他文物不同的“三难”，对于我来说不易克服。

第一“难”是从考古学角度说的。石鼓固然是先秦遗物，却原处地上，没有出土层位，也不见共出器物，实际上连发现地点也不能明确知道。对于这样特殊的对象，一般考古学习用的方法几无用武之地。

第二“难”是从古文字学角度说的。石鼓文的时代，自其为世人所知以来，真是聚讼纷纭，早到西周、东周（包括春秋、战国），晚到汉、北魏甚至北周，都有人主张过。近几十年，古文字的分域断代研究发达，学术界逐渐公认其为东周时的秦国文字，算是重大的进步。不过东周有五百余年之长，各阶段不都有秦文字的标本，也就是说，目前还没有可能建立较为详细的秦文字发展演变的标尺，以致石鼓文究属春秋还是战国，学者见解尚未统一。

再有第三“难”是从书法艺术角度说的。石鼓文是先秦最重要的篆书石刻名作，为天下所公认，而且对近世篆书诸家起有绝大影响。我对书法夙所不谙，于石鼓文自然不可信口雌黄。

正因为我怀有这样的想法，所以当我知道您做出的创造性成果时深觉高兴。尤其是“石鼓新诗”，对我殊有启发，在此谨表感谢。

2012年9月3日

（曲春皓《春曲：诗书影卷》，九州出版社，2013年）

李文放《秦始皇巡游纪功 颂德刻石》序

李文放同志的《秦始皇巡游纪功颂德刻石》一书，即将由人民武警出版社印行。蒙中国秦文研究会贾雪阳会长不弃，要我在这里写几句话，使我感到非常荣幸。

李文放同志是中国秦文研究会的创始人。研究会的前身为中国秦篆研究组，初建于1979年，是改革开放伊始最早成立的民间学术团体之一。李文放同志长期担任研究会的会长、名誉会长，兼研究会所属秦文研究所所长，全面组织和主持了研究会丰富多彩的学术活动。秦始皇刻石的研究和复原，是研究会一开始便启动的核心课题。刻石写本全系李文放同志亲笔，经过众多学者和书法家讨论修改，于2002年完成，前后历时二十多年，现在终能问世，实在是应当庆贺的事。

我认为，这部秦刻石写本的完成和出版，具有三重的重要意义。

首先，是学术上的重要意义。

上面说过，中国秦文研究会始创于1979年，这在中国古文字学界，与1978年冬成立的中国古文字研究会差不多是同时的，而其研究对象专注于古文字中秦文字这一专门领域，在当时乃是创举。其后几十年间，古文字学不断前进发展，更证明了对秦文字作系统深入研究有多么关键和重要。

大家知道，中国古文字发源甚早，在殷商和西周时期本来是统一的。及至周室东迁之后的春秋时期，王朝式微，诸侯力政，国家逐渐走向分裂，相应的文字也区分为东土列国与西土秦国两系。到了七国称雄的战国时期，竟成为所谓“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的纷乱局面，在很大程度上妨碍了国家的统一。秦始皇兼并

六国，在政治上恢复了统一大局，一个必要而急迫的措施，就是统一文字。

秦始皇统一文字，“罢其不与秦文合者”，这自然是出于秦国是兼并战争最后胜利者的缘故，然而我们应该承认，统一于秦文字的选择是正确的、有利的，因为从春秋、战国以来，各国文字的演进嬗变，只有秦文字最为稳定和规范。可能正因为如此，秦朝统一文字的政令取得成功，并为后来的汉代所沿袭。自汉以下的文字（汉字），包括真草隶篆各种书体，都是从秦文字发展而来。我们集中研究秦文字，即能把握住古代文字演变进程的转折枢纽。

不过，秦文字的研究实际上是很不容易的。秦文字本身相当复杂，在秦始皇时已有“八体”，即许慎《说文解字》所说：“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虫书，五曰摹印，六曰署书，七曰殳书，八曰隶书。”这里面小篆为李斯等“取史籀大篆”而省改，南唐徐锴等学者称之为秦篆，于八体中最有代表性，而传为李斯所书的秦始皇刻石正是秦篆的典型。李文放同志和中国秦文研究会把多年精力投入秦刻石的研究，可称切中肯綮。

其次，是艺术上的重要意义。

李文放同志是著名的书法家，多有为书法界称道的创作。她在上世纪70年代末，也就是与组织中国秦文研究会同时，率先倡导设立中国书法家协会。那时由舒同同志手写的书法家协会“发起书”，撰写者便是李文放同志，她还倡议并主持了第一次全国书法展览。

精于篆书，是李文放同志的特点，她还特别注意将这方面的优长同其在古文字研究的造诣结合起来。她晚年又上溯到甲骨文字，有许多精粹作品，于1999年举行了“李文放甲骨文书法展”，琳琅满目，得到有关书法界同仁及参观公众的肯定。

秦刻石写本尤为李文放同志篆书作品的绝作，充分体现出她几十年涵泳于秦篆的功力，读者披阅自见，不需要在这里以笔墨形容了。

再者，我觉得也许是比学术上、艺术上的意义更为重要的，是这部秦刻石写本完成出版所蕴含的精神教育上的意义。

建议读者看一下本书最后的《秦刻石秦篆文复原研究论证工作总结》，不难看到这项工作实施过程的漫长艰难。如童超先生在回忆李文放同志的文章中描

述的：“李老从五十五岁至七十九岁高龄，一直担任秦刻石复原研究项目的主持人与秦篆写本的主笔，日以继夜，冬去春来，废寝忘食，勤奋工作，以至将双腿坐坏，健康严重受损。即便如此，她仍然在紧张工作之余，拄着拐杖，或坐上轮椅，为求教学者和筹措经费而四处奔走，不知疲倦。”我可以在此补充一句，由我亲眼所见，以上的话完全真实。

李文放同志是怎么样的人，柴泽民同志作为老友，曾撰写《纪念李文放同志》给予评价。他说：“文放同志在激情燃烧战争年代，是一位战士。在火红的建设年代，是一位优秀的干部。更可贵的是她离休以后，在传承、研究、挖掘和保护中华民族文化遗产事业上，老当益壮。她那种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精神，令人钦佩，感人至深。”让我们透过这部《秦始皇巡游纪功颂德刻石》，认识和体验贯彻她一生的这种精神，向她表示怀念和钦敬。

2012年10月5日

欧阳红国学“口袋书”系列序

长沙的欧阳红先生与我结识，已经有不少年了。我对他能在公务繁重之余，潜心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考察研究，在《周易》、《老子》等方面都有著作，富于创见，一直深为敬佩，认为在当前的“国学热”中做出贡献。最近承他告我，他所倡议和撰著的国学“口袋书”系列，即将陆续问世。其间《周易》、《老子》和《庄子》三种很快就可印行，年底《论语》也会出版。这真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

“国学热”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兴起，跨入新世纪而更盛，是学术界以及社会公众都知道而且感受到的。当前许多人，不分老中青，皆希望对国学有所了解，所以“国学热”已经不只是专业圈子里的现象。在这样的情况下，把国学的有益内涵正确地普及于公众，是适时的，也是必要的。欧阳红先生“口袋书”系列的设计，刚好适应了这样的需要。

这里说的“口袋书”一词，是英语 pocket book 的直译，指的是开本很小、能够放在口袋里随时阅读的书。这个词在国际上通行已久，我们听起来或许还有点新鲜。其实，这一类的书籍在我们中国历史上早已有了，其原始甚至可以追溯到纸本书籍刚刚出现的时代。那时候通称为巾箱本，或者袖珍本，到现在人们不再用巾箱，衣袖里也装不下什么东西，巾箱本、袖珍本这样的名词竟被外来的“口袋书”取而代之。

特别适合采用“口袋书”形式的，首先是一些众多读者都需要随身携带、反复精读的书，这便是传世文化中的经典之作。文化传承里的基本经典，草草读那么几遍是绝对不够的，必须长时间深读细读，才可能真正了解和体认，大家或许知道，孔子本人就是这样做的。196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珍贵帛书，有一种是解说《周易》的，标题为《要》，篇中记载：“夫子老而好《易》，

居则在席，行则在橐”，“橐”是装书的口袋。孔子喜好《周易》一书，居处时将《周易》放在身边席上，出行时将之置于随带书袋之中，这简直可以说是古代的“口袋书”了。正因为孔子如此好《易》，后来有了充满哲理的《易传》，是大家容易理解的。

人生有涯，不可能遍读群书，对于博大浩瀚的国学，我们只能“取一瓢饮”。这便需要首先选择足以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性质的书，确实做到深读细读。由于这些书籍产生于遥远的古代，文字语句艰深难懂，最好又有好的学者结合大家的需要，做出导读讲解，才能使当前的社会读者真正从中获益。

欧阳红先生的“口袋书”系列正符合这样的要求。以他寄给我看的《庄子》一册为例，内容包括内篇七篇，每篇首录原文，然后有“破题”、“提示”、“译文”和“解读”，可谓不厌其详，对读者给予了尽心的引导和帮助，也使读者了解了作者的观点和功力。

希望欧阳红先生这一系列的工作早日圆满完成。

2012年10月7日

于北京

（欧阳红《劝世忠言》、《启世箴言》、《究世恒言》、《观世喻言》，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

俞筱尧、沈芝盈《诸侯异政和百家异说》序

俞筱尧、沈芝盈两位先生是我的多年老友，他们最近共同撰写了《诸侯异政和百家异说》一书，即将由中华书局印行，特意拿校样给我看。我再三翻阅之下，觉得这是一部非常适合公众需要的好书，有一些突出的特点，应该在这里向读者介绍推荐。

《诸侯异政和百家异说》这部书论说的，是春秋战国这个大时代。大家都知道，西周覆灭、周室东迁之后的春秋战国时期，我国社会历史出现了剧烈深刻的变革，尽管国家于政治上趋于分裂混乱，战祸连绵不绝，在思想学术领域却出现了空前的百家争鸣，成为中华传统文化发展历程上的第一个高峰。尤其是后世称作经典性著作的种种文献，大都产生或定型于这一时期，所造成的影响十分深远重大。

俞、沈两位先生巧妙地借引荀子的话作为这部书的标题，恰当地表明了书的体裁性质。说“诸侯异政和百家异说”，“异政”指的是社会政治，“异说”指的是学术思想。全书的主体是对春秋战国时期思想学术方面的众多代表人物，逐一做出深入而概要的叙述分析，同时又就这个时期的社会政治历史给出了综合的说明论断，确实把“异政”同“异说”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可以看出来，俞、沈两位作者是力图将春秋战国时期丰富多彩的学术思想局面，放到当时整个社会历史变迁的总背景中去考察。他们为了便于读者理解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政治状况，还特地在书末设有“附篇”，追叙远古传说以及夏商西周的史事大略，使大家能够溯本求源，这是一般讲春秋战国的书籍里罕有的。

把学术思想史的研究与社会政治史的研究密切联系起来，是历史学界著名

前辈们开拓的正确方向。在此我们想起郭沫若先生，他在1930年出版《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在学术界起了重大影响以后，即进而探索古代思想文化，写出了《青铜时代》和《十批判书》。继郭沫若先生之后的侯外庐先生，也是先完成《中国古代社会史论》，随后编著了《中国思想通史》，并且明确说明是要通过研究思想史来反观社会史。《诸侯异政和百家异说》也正是贯穿着这样的观点和方法。

应该指出，俞、沈两位的书是讲春秋战国诸子百家，而所涉及的范围实际比常见的同类作品更为宽广。比如俞筱尧先生专门向我谈到他怎样注意兵家的地位和意义。大家容易看见，这部书中是为兵家提供了不少篇幅的，而本于西汉刘向、刘歆父子的《汉书·艺文志》，在《诸子略》后另设《兵书略》，是把兵家排除于“诸子十家”以外的。后代的目录书，包括常见的《四库全书总目》、《书目答问》之类，兵书是在子部了，但也没有同所谓周秦诸子并列。至于本书还列入“开明政治家”子产、晏婴，“早期的文史大家”左丘明、屈原，同诸子相提并论，更是作者创见，为读者展宽了眼界。

书中还有许多值得称道的地方，如采用了近年发现的一系列出土文献及其研究成果，不能在这里一一举例说明了。总之，读者会理解，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和思想学术，是一个特别大的题目，俞、沈两位把浩瀚的文献史料、繁多的研究观点，精心剪裁，综括在这二百页的一册书中，便于读者阅看体会，只能说是煞费苦心。

俞、沈两位退休后，我们相见的机会少了，披读这部《诸侯异政和百家异说》书稿，情同面对，有倍觉亲切之感。以往我得益于他们之处甚多，特别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我到文物出版社参加竹简帛书整理小组工作的那段时间，常有机缘向那时任出版社领导的俞先生请教，也亲眼看到他是如何全心全意投入工作的。上个月我在《中国文物报》（2012年9月7日）上面读到张囤生先生的文章《故宫城隍庙忆旧》，文中说及俞先生：“他每天除了马不停蹄地处理总编室业务，还要抽时间为编辑部审稿。我记得有一篇稿件，作者是某省著名专家，可文字很差，难以发表，老俞于是将全文重新改写，发表时仍署作者之名。我比照原稿看重写稿，专业内容一点没伤及，但文字条理清晰，且增添了几分文采。老

俞告诉我，在他的编辑生涯中，这是常事。”我在这里可以补充说，俞先生不仅认认真真从事眼前的工作，还十分关心出版社的发展远景。他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就曾在中华书局创刊《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加强了学术交流，到文物出版社又用心制订了编辑出版文物考古书籍的长远规划。他在几十年编辑工作中做出的学术贡献，确实是无法缕数的。沈先生则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和几位学者一起发起和编辑《中国哲学》集刊，得到侯外庐先生支持，使学术思想方面的专业论文有了发表的园地，并多次组织讨论会，活跃学术空气，在当时实开风气之先。她所校勘标点的黄宗羲著《明儒学案》，也是至今为止较好的本子。所有这些都说明他们两位都既是资深望重的编辑，又是功力深厚的学者。摆在读者面前的这部《诸侯异政和百家异说》，也是他们学识修养的证验。

2012年10月11日

于清华园

（俞筱尧、沈芝盈《诸侯异政和百家异说》，中华书局，2013年）

在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成立 大会上的致辞

各位领导、各位老师和同学：

今天人文学院成立挂牌，这是一个不平凡的日子，我有机会在这里说几句话，心中感觉非常荣幸。不过看日程表上说我是教师代表，我自问没有代表大家的资格，下面我想说的，还是作为清华的一名老学生在这个十分值得纪念的时刻的一些感想。说得对与不对，还望大家批评指正。

许多人知道，我是清华老文科最后一班的学生。我是1951年考进清华哲学系的。那个时候，我确实是怀着十分仰慕的心情投奔到清华的文科，这是我最高的志愿，所以我一如愿考取，心里就充满了自豪和喜悦。确实地，那时候的清华文科声闻海内外，我们有最好的教授、最好的图书馆，我们有良好的传统，良好的声誉，因此能够吸引学生，吸引人才，连我当时那样十六七岁的小孩都衷心向往。

事实就是如此，清华文科就是有声望，有传统，而且有着至今人们仍然不断传颂的所谓“奇迹”。清华文科的“奇迹”是什么呢？大家都熟悉，这首先是1925年清华建立的以国学为主的研究院，即通称的清华国学研究院。国学研究院拥有名在史册的四大导师（或加上李济先生为五大导师），居然在短短四年多中间，培育出那么一大批著名学者。这当然无愧是我们学术史、教育史上的“奇迹”。

随后，在1928年以来的十年中间，也就是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在这样短短的期间，清华大学不但建设成了相当完整又相当现代化的文科体系，而且在文科的各个学科，包括文史哲和外文等方面，都在全国占有了前列的地位，

这应该说又是一个罕有的“奇迹”。这个“奇迹”还延伸到后来的西南联大，在西南联大的文科中，清华人所起的作用，也是众所周知的。这是我们文科历史上的第二个“奇迹”。

以上两个奇迹，说起来大家都了解，不需要我多说了。今天我特别要说的，是第三个“奇迹”，就是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尤其是九十年代以来，我们清华在恢复成为综合性大学，并且争取建成一流大学的进程中，文科——人文学科的重建。早在八十年代，重建工作刚刚开始之际，我的几位老学长便来找我。今天我讲老实话，当时我内心对这件工作是有不少怀疑的，觉得可能做不到，至少是做不好。清华已经那么多年是多学科的工科大学了，再想重新起家，恢复文科，那做得到吗？据我所知，颇有人持这样意见。然而，当我有机会直接投入这方面工作时，就体会到学校的坚定决心，校领导的有力推动，特别是同人大家的群策群力，忘我的投入，实在是难能可贵的。我们在一所著名的、成型的工科大学中，再建起有自己特色的文科，包括多学科的系所，都在学术界站住脚，而且陆续重新占有了前列的地位，这是多么不容易的创举。真的又是在不长的十几年间，我们清华人真正兑现了我们的期望和允诺。这难道不又是一个“奇迹”吗？不又是一个值得充分肯定和称道的“奇迹”吗？

今天人文学院成立，我觉得这次挂牌，其实就是树立了一个里程碑。以文史哲外文等为核心的基础文科，组成了自己的学院，这是再一次新的开始。我们要在传承过去优秀传统的基础上，走向不断的创新。当然，这又是不容易的事，如万俊人院长在《清华大学文史哲谱系》一书序言里所说的，我们这一代人，面对清华的文科传统（他称之为学统），要想“续接前贤，光大学统”，该是何等艰难的事。但是传统或者学统，终究是有可能续接的。从今天开始，我们将去创造又一个“奇迹”，我们一定会做得更好，为清华的事业，为学术的进展，为国家文化建设的繁荣昌盛，做出更新更多的贡献。

谢谢大家。

2012年10月20日

《张永初读吴太伯世家》序

周代的吴国是长江下游最大的诸侯国，其兴起衰亡关系到当时大局，在古史上有关键的意义。吴国的始建由于周太王长次二子太伯、仲雍让国，南迁至荆蛮之地，与那里的土著结合，更是罕见的事例，传为美谈。司马迁作《史记》，列有世家三十篇，特以《吴太伯世家》冠首，实有其深意在。

《吴太伯世家》概述吴国历史，内容主要本于所谓“《春秋》古文”即《春秋左传》，同时博采众说，是探究吴国历史文化最重要的文献依据。关注古史，特别是吴国历史的，都有必要深入阅读和理解《吴太伯世家》。

无锡张永初先生多年致力于吴国历史的研究，富有成果。他是我们中国先秦史学会的老成员。十五年前，我曾为他主编的《勾吴史集》作序；十年前，我又曾为他撰著的《泰伯遗迹志》作序。现在他有鉴于《吴太伯世家》的重要，著成《读吴太伯世家》一书，再次要我写几句话，自然不能推辞。

相信《读吴太伯世家》的出版，能够促动更多的人士来探究吴国的历史文化，阐明古代江南的文明进程。

2012年12月2日
于北京清华园寓所

（《张永初读吴太伯世家》，文汇出版社，2013年）

《字源》序

追本溯源是人类共同的兴趣。在汉字研究领域，对于字源的探求，同样令人着迷。

在先秦文献里，已经留下人们探求字源的印迹。《左传》宣公十二年：“夫文，止戈为武。”昭公元年：“于文，皿虫为蛊。”《韩非子·五蠹》：“古者仓颉之作书也，自环者谓之私，背私谓之公。”都是通过分析字形结构，追溯造字意图，来阐明某种理念的。这种风气，对于六书理论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系统的、大规模的字源探索，是从《说文解字》开始的。许慎立足小篆，借助六书理论，从形音义三个方面，对9353个汉字逐个进行分析，对字源的认识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对后世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

由于汉字发展到小篆经历了很长的演变过程，字形结构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而据小篆探究字源受到一定的局限。宋代以来，金文资料不断涌现，这些比小篆更早的文字，为字源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林义光的《文源》一书，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宋至清代利用金文探求字源的成果。

十九世纪末开始，河南安阳殷墟发现了大量的甲骨文字；二十世纪中叶以后，不少地点陆续出土了多批战国时期的简牍帛书。这些文字进一步补充了汉字发展史的缺环，对字源的探讨产生了重大的促进。学者们运用这些资料，在字源探究上取得了许多新的成果，大大改变了有关研究的面貌。

纵观字源研究的历史，有两条成功的经验值得我们认真吸取。一是要充分地、正确地利用字形资料；二是要有科学的、严谨的研究方法。依据的字形必须是未经讹变的，而分析造字意图必须结合语言，形音义三者兼顾。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要通过梳理汉字的演进序列，找到字的源头，并且通过归纳字的用

法，理清其本义和引申义，然后结合早期的形体和用法，探求造字的意图。

可是这一点其实是不容易做到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随着国内出现汉字文化研究的热潮，字源研究方面则有些趋于庸俗化的倾向。在这种背景下，学术界和出版界渐渐形成一种共识，即必须集合有关力量，编纂一部能够反映时代水平的大型字源工具书，机缘巧合，这项工作落到了我们的肩上。

为了编好这部书，我们曾征询不少位专家学者的意见，其中以裘锡圭先生、吴振武先生指导最多。各位编委、作者都倾注了巨大的心力。编委会先后召开三次研讨会，核心编委两度集中通稿，各位作者对稿本反复修改多次。整个编纂过程，断断续续，前后十余年，大家的毅力、耐心和团队精神都经受了很大的考验。

我和赵平安教授作为这一工作的组织者，多有愧疚，深深感谢各方面对《字源》工作的支持，感谢每一位团队成员的合作和努力。

衷心希望这部凝聚着我们十余年心血的书能够释放出正能量。

是为序。

2012年12月10日

（《字源》，天津古籍出版社、辽宁人民出版社，2013年；《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11月13日，收入时略有修改。）

邢文《前经学时代》序

邢文教授现于美国达默思大学执教，他的新著《前经学时代》即将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印行。我得见书稿，深觉是一部富有创见的好书，因而在这里写几句话，既作推荐，也表达我自己的一点感想。

中国学术思想史或哲学史上有“经学时代”，这个观点是哪位学界前辈首先提出来的，一时不易定论，但是将这一观点广泛传布于学界，特别是为西方汉学家所熟知的，肯定是冯友兰先生。大家知道，冯友兰先生在其《中国哲学史》一书中，明确划分了“子学时代”和“经学时代”。由于这一名著长期流行，并且有美国卜德教授的英译本远播于世，“经学时代”一词便在国内外都广为人知了。

《中国哲学史》“谓自孔子至淮南王为子学时代，自董仲舒至康有为为经学时代”。冯先生特别指出，“在经学时代中，诸哲学家无论有无新见，皆须依傍古代即子学时代哲学家之名，大部分依傍经学之名，以发布其所见。其所见亦多以古代即子学时代之哲学中之术语表出之。此时诸哲学家所酿之酒，无论新旧，皆装于古代哲学，大部分为经学之旧瓶内。而此旧瓶，直至最近始破焉”。冯友兰先生这一“旧瓶新酒”之喻，可谓妙于形容，然而在所谓“经学时代”之前，是否就没有“经”与“经学”，没有在学术思想上地位崇高的学问典籍，为当世学者所共同依傍？后世普遍引据的那些典籍文献，又是如何产生形成的？类似的一系列问题，还值得大家推敲探讨。

很多人会熟悉《国语·楚语》所记春秋时楚国贤大夫申叔时的那段话。楚庄王命士亹任太子傅，士亹向申叔时请问教学的方法，申叔时一口气讲了对太子应该“教之春秋”、“教之世”、“教之诗”、“教之礼”、“教之乐”、“教之令”、“教之语”、“教之故志”、“教之训典”等（这段话，冯先生《中国哲学史》也曾引用）。

大家不难看到，申叔时说的“令”、“故志”、“训典”可属于《书》，“春秋”和“世”则属于《春秋》，加上《诗》、《礼》、《乐》，秦以前已有的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这里已得其五。至于《周易》，春秋时仍主要为卜筮之书，从义理角度理解《周易》，真正建立起《易》学的，那要到孔子及其门弟子了。

由《楚语》申叔时所说，已经足以看到春秋中叶所谓“经”与“经学”已有一定的规模。“经”训为常，被称为“经”的文献典籍，也就是当世教育的基本内容。孔子作为古代学术的集大成者，删定诸经以教授弟子，确是述而不作。到了晚周战国之世，百家群起，究其实际，也大都对这些典籍有所引述或阐发。“经”和“经学”的起源和早期发展的状况，是非常值得探索的课题。

邢文教授的这部《前经学时代》，正是讨论这方面课题的。全书自“史前之乐”、“史前之数”起始，历论《易》、《书》、《诗》、《礼》、《春秋》，而以“走向经学”作结，为读者提供了“前经学时代”的概观。

《前经学时代》的引言中说：“考古材料与出土简帛，是早期经学研究不可缺少的材料；考古学、简帛学、文献学与思想史的方法，是早期经学研究不可忽视的方法。”他还强调：“没有中国简帛学的介入，就不能真正认识‘前经学时代’的经学；没有‘前经学时代’的经学，中国经学就不会成为完整的经学。”这段话，我是很赞成的。邢文教授长于简帛学研究，读过他的《帛书周易研究》、《著乎竹帛：中国古代思想与学派》的都会有深刻的印象。近年有关的简帛连续发现，内涵十分丰富，相信邢文教授继《前经学时代》之后，会不断作出新的探讨，达成更大成果。

2013年1月16日
于清华园

周建亚《甘露堂藏战国箴言玺》序

世界几大古代文明多有玺印发现，中国玺印的起源也相当久远，有一些出土实例证明，至迟在商代晚期业已存在了。不过当时应用还不甚普遍，及至东周战国时代骤然兴盛，到秦汉更是大为流行，成为古文字文物中数量最大的门类之一，对于研究古代历史文化，特别是文字的发展演变，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秦朝以前的玺印，特称作古玺，自宋元以来颇受学者注意，但长期和后世印章混列一起，没有得到识别。只是到了清代中叶，伴随古文字研究的进展，古玺才被分划出来。清末民初，已有学者辑集古玺的专门谱录，如吴大澂的《千鈐（玺）斋古鈐（玺）选》等，古玺的种种特点于是逐步为学界所认识。

古玺既然主要是战国时代的，古玺文字的研究自然是战国文字研究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上世纪二十年代，王国维先生首倡战国文字研究，即以古玺作为重要的依据。其后战国文字研究之所以能建成古文字学的一个独立分支，也同古玺研究的深入密切相关。由于古玺涵盖战国时代东西方列国的各种字体，文字结构又极富于变化，近年许多学者对战国文字的学习研索，都是从古玺方面开始着手的。

需要在此一说的是，尽管很多人重视古玺，有志于古玺的学习研究，实际接触古玺，掌握这方面的知识，却还是有不少困难的。古玺数量繁多，收藏又零细分散，大多数谱录乃是钤本，不是正式的印刷出版物，从而传流不广，有的极难见到。我们当然要感谢罗福颐先生，他以多年精力，纂成名作《古玺汇编》，所参用谱录大部为一般学人所不能见，然而在《汇编》之外、之后，还有难于尽计的谱录和零散钤本，有待进一步搜辑纂录。

研究古玺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传世材料大多只存文字钤本，没有古玺的形制可见，这对于考察古玺的性质、时代和地域是十分不利的。况且古玺的研究

还应有工艺和美术的层面，仅凭铃本，这些便谈不到了。

周建亚先生长期关注古玺，收藏甚丰，最近选录精品，编成《甘露堂藏战国箴言玺》一书。所载古玺，除铃本外，都有器形图片和文字模印，记出尺寸，附以详细描述。这样的体例，当能满足读者的要求。值得注意的是，周建亚先生还对古玺文字的内涵和所反映的思想，做出讨论阐发，富有新意。这部书将在文物出版社出版，谨赘此数语为序。

2013年1月17日

（周建亚《甘露堂藏战国箴言玺》，文物出版社，2013年）

《嬴秦始源》序

2011年秋季在山东莱芜召开的“首届中国嬴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是一次成功的学术会议，其主题明确，讨论深入，成果明显。现在会议上提交的论文，经过作者修订补充，已经辑集完竣，即将交付出版，相信对嬴秦始源及其早期发展的研究是一项重要的贡献。

秦人的始源究竟是在东方，还是在西方，长期以来是学术界争论的问题。争论双方各执一词，但仔细考察，所引用的材料证据，都是以《史记》的《秦本纪》及《赵世家》为主。考虑到秦朝并兼六国之后，列国文献大都沦丧，而秦人自己的史籍，即所谓“秦记”自然不会受到影响。司马迁的记述本于“秦记”，当非虚妄，引为典据是合理的，关键只在于持不同意见学者的理解互有差异而已。

《秦本纪》叙述秦的世系，上溯到古史传说时期的颛顼，不少学者不予采信。然而前些年陕西凤翔南指挥一号秦景公大墓，所出土石磬铭文有云：“高阳有灵，四方以鼐（弭）平”，高阳正是颛顼，可见秦以颛顼为所自出的远祖是真实的。我们对于《本纪》秦世系的有据，不应采取过分怀疑的态度。

这里应作说明的是，《本纪》世系所述，只是秦人君长历世的名号和史迹，这与秦人所属整个氏族的演变发展，是密切关联，但又有所区别的。比如《本纪》说秦先祖大费为虞舜驯鸟兽，佐禹平水土；费昌为汤御，参预伐灭夏桀；中衍又为商王大戊之御，等等，这些人物都在王朝任职。到商代晚期，戎胥轩娶郕山女，生中湣，“在西戎，保西垂”，而其子飞廉，孙子恶来，又为官王朝，助纣为虐。这些都是历史人物个人或家族性质的行为。至于当时整个嬴姓的诸氏族，其流徙分布的状况，应当是另一回事。如《本纪》所讲嬴姓氏族：“有徐氏、郯氏、莒氏、终黎氏、运奄氏、菟裘氏、将梁氏、黄氏、江氏、脩鱼氏、

白冥氏、蜚廉氏、秦氏”等，所处时代不同，然其间可考者大多偏在东方，是不争的事实。

“首届中国嬴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举行的时候，刚好清华大学所藏战国竹简《系年》经过整理考释，内容在媒体上得到介绍公布。《系年》是战国中期人撰写的一部史书，其中有一章相当详细地记述了有关秦人先世的史事。原来在周武王伐纣后，飞廉东逃到商盖即传世古书里的商奄，商奄反周，周成王征伐商奄，杀了飞廉，把反叛的商奄之民西迁到朱圉去戍防戎族，“是秦先人”。商奄是中心在今山东曲阜一带的嬴姓大国，商奄遗民也是周代鲁国的民众，而朱圉则位于渭水上游的甘肃甘谷境内，其南不远正是近年备受瞩目的礼县大堡子山等地。被强制迁徙的商奄之民乃是秦人的先人，这是以前大家都不知道的。《系年》的这方面发现，在研讨会上引起了热烈的讨论，有关研究一定会继续深入下去。

我们期待着下一届“中国嬴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的举行。

2013年1月20日

[《嬴秦始源：首届中国（莱芜）嬴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嬴秦文化研究》总第6期]

《中原文化研究》创刊贺辞

在中国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上，中原地区有着特别重要的地位，作出过非常巨大的贡献。尽管由于近年历史学、考古学的进展，我们对国内各个地区的历史文化有了新的认识和估计，然而不能忘记，中原在我国古代文明的形成与演进中，实具有不同于其他地区的特殊作用。正是中原，首先跨进了文明时代的门槛，成为自虞夏商周以来的王朝核心，对全国各地都有深刻的影响。这一观点或者说是信念，三十年前我在为一位郑州学者的著作写序时曾经表述过，至今持之未变，始终认为重点研究中原文化有十分重大的学术意义。欣闻河南省社会科学院《中原文化研究》创刊，谨志此数语，以表热烈祝贺。

2013年1月23日

于清华园

（原载《中原文化研究》2013年第1期）

赵平安《秦西汉印章研究》序

1995年，赵平安教授自河北大学来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做博士后研究，三年后出站，所撰文稿题为《秦汉玺印研究》，内容则以系统考察秦至西汉的印章为主。当时我写了评审意见，其中说：

印章是秦汉考古文物中的一个重要门类，出土较多，但以往缺乏深入而全面的辑集探讨，分期和考释均存在问题，影响到当时历史和考古的研究。赵平安博士的论文，以发掘出土材料为基础，充分搜集各家著录的其他材料，以严谨的古文字学方法进行分析释读，然后结合传世文献和各种出土文字材料，就印章的性质、用途、特点及其在历史文化研究中的意义，做了深入的研究讨论。这一工作是有突破性的，对秦汉制度的研究也有很大价值。

这些话今天看来，并无溢美夸大之处。

我本以为赵平安教授这一文稿很快便会出版，没想到他过分矜慎，不断对之补订修改，过程竟长达十几年。现在呈交给读者的这部《秦西汉印章研究》，已经是更丰富、更充实的高水准专著了。

近世以毕生精力投入玺印研究的，首推在故宫博物院工作多年的罗福颐先生。他在其代表著作《古玺印概论》中曾经慨叹：“历来对古玺印作专门研究的人太少，一般人只认为青铜器铭文及历代石刻是重要的古文字和历史资料，而忽视古代玺印也具有同样的价值。”最近的二三十年，情况略有好转，古玺印的研究者逐渐增多，也出现了若干值得称道的论著，但由于战国文字研究成为学科的热门，大家将更多的注意力倾注于秦以前的古玺，秦汉印章尽管有大量

发现（包括封泥），有关研究相对说来还是太少，许多长期积累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非常希望赵平安教授这部书的问世，能够引起学术界对这一方面的更多重视。

赵平安教授研究秦至西汉的印章，有他特有的优势。他长时期从事中国古代文字发展的探索，重点集中于“隶变”，于二十年前就出版了《隶变研究》，迄今仍是关于这一课题最有前沿性的专书。所谓“隶变”，是指由先秦的“古文”演变到汉代的“今文”，其关键在于秦并兼六国后推行的“书同文”政策，以秦文字作为规范，出现了“秦书八体”，而其间最重要的，是隶书的流行，整个历程下延到西汉中叶。《隶变研究》详细描述了这一历程的方方面面，而《秦西汉印章研究》在一定意义上正是这样研究的延伸和发展。

记得著名古文字学家陈梦家先生曾经说过，学习和研究古文字的理想途径，应该是由《说文》入手，先研习秦汉文字，然后再上溯春秋、战国，以至西周与殷商。仔细想来，《说文》的作者许慎就是这样做的，他在《说文·叙》中自述：“今叙篆文，合以古籀，博采通人，至于小大，信而有证，稽诂其说。”段玉裁于此注云：“许重复古，而其体例不先古文、籀文者，欲人由近古以考古也。小篆因古籀而不变者多，故先篆文正所以说古籀也。”这里所讲的“由近古以考古”的方法，可以称作上溯法，即以汉代的“今文”为起点，逆转发展次第，逐步上溯先秦“古文”的演变。这样做，有利于避免研究中陷于种种无根臆说的弊病。从这个角度来看，赵平安教授的《隶变研究》和现在这部《秦西汉印章研究》，都是整个古文字学领域的基础工作，有着很重要的学术意义。

当然，《秦西汉印章研究》的价值不仅在其对古文字学研究的影响。印章制度的考订，文字的释读，密切关系到这一历史时代的官制、族氏、地理等方面；同时，这些印章又是美术史上评价绝高的艺术品。因此，我认为赵平安教授这部书会博得众多读者的欢迎。

2013年2月3日

农历小年

（赵平安《秦西汉印章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

王震中《中国古代国家的起源与王权的形成》序

王震中博士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研究员，专门研究中国古代历史文化已有多年。他特别集中于文明起源问题的探索，做出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早在1994年就出版了《中国文明起源的比较研究》一书，已为学术界所熟悉，以其独到见解，引起了不少反响。《中国古代国家的起源与王权的形成》是他近期又一力作，得到国家社科基金的支持，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重点项目，从内容性质来说，可以视为《中国文明起源的比较研究》的延续和发展。

《中国古代国家的起源与王权的形成》是一部约50万字的大书，今年初我看了其中一部分章节，已深感其论说专业而有创新性。及至春节过后，震中博士寄示全稿，得以了解这部书的整体构思，更对其观点的新颖特异之处有更进一步的认识。承他不弃，再三要我写一篇小序，由于付印在即，时间紧迫，只能随便谈一些绎读之余的感想，能否有当便在所不计了。

首先我想说，震中博士这部书论述的主题，即中国国家的起源问题，乃是探索中国文明起源这个重大学术课题的核心环节，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现在大家都知道，中国有五千多年的文明史，然而辉煌灿烂的中国文明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经历了什么样的历程产生形成的？回答这个疑问，关键要看国家。有了国家，才是进入了文明时代，这一点凡读过恩格斯《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的人都会记得。考古学家夏鼐先生在《中国文明的起源》里便说“文明”是“指一个社会已由氏族制度解体而进入有了国家组织的阶级社会的阶段”。

许多学术界前辈曾探讨中国古代国家的起源问题。郭沫若先生在1929年撰著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该书于1930年印行，其“自序”表明他认为这本书

“可以说就是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续篇。研究的方法便是以他为向导，而于他所知道了的美洲的印第安人，欧洲的古代希腊、罗马之外，提供出来了他曾提及一字的中国的古代。”郭沫若先生是历史研究所首任所长，继他为第二任所长的侯外庐先生，在1943年出版过《中国古典社会史论》（后改名《中国古代社会史论》），讨论了中国国家的形成途径及其早期形态的演变。再有长期担任历史研究所领导工作的尹达先生，1943年在《中国原始社会》书中同样论说了氏族社会的崩溃和国家的初期形态。一直到1983年，他为《史前研究》创刊写题为《衷心的愿望》的代序，仍然涉及到这方面问题，而这已是他最后的学术文章了。从这些我们不难看到，历史研究所有重视古代文明和国家起源研究的传统，王震中博士正是继承了这个传统，做出了自己的创新。

王震中博士的这部《中国古代国家的起源与王权的形成》，采取了多学科交叉结合的研究方法，从大量考古学发现材料的整理分析开始，对传世典籍内的种种古史传说试做整合解释，提出了一系列富于新意的观点。许多人知道，自1925年王国维先生倡导古史研究要实行古书记载与地下材料彼此印证的“二重证据法”以来，多数研究古代的学者都努力以历史学与考古学相互配合，相互补充，那种对古史传说一律抹杀，以为全不可信的看法，已被认为是不正确的。尹达先生的《中国原始社会》说得好：“古代的传说并不是毫无史实凭借的谰言，并不是荒唐无稽的神话，其中一定会影射着不少的具体事实，一定会有其不可缺少的史实作为素地。这是我们对于中国古代传说的一个总的估计。”王震中博士书中属于这方面的不少见解，都足以引发大家深思。

我还想建议，这部《中国古代国家的起源与王权的形成》的读者，在打开书以后不妨先读一下全书的“结语”。作者在“结语”开头讲道：“国家与文明起源的研究，既是一个考古学实践问题，亦是一个理论问题，而且还需二者紧密地结合。”我觉得这说得很对，古代国家与文明的起源形成，归根到底是一个理论问题。对这样重大课题的研究，如果没有提高到理论的高度，就不能说有真正的成果。

王震中博士在给我的一封信里，叙说了他写作这部书时对“理论创新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追求。他说他的这部书是对他“近年来提出的‘文明和国家

起源路径的聚落三形态演进’说，进入国家社会之后所经过的‘邦国—王国—帝国’说，以及‘夏商周三代为复合制国家结构’说这些学术体系的进一步深化和完善”。在书中，他还对近年学术界流行的酋邦理论和社会分层理论等做了分析和批评，提出应“以聚落形态和社会形态为主，去整合酋邦理论和社会分层理论”。王震中博士的这些理论观点，是贯彻在他全书中的，希望读者能予以注意。

2013年2月28日

（王震中《中国古代国家的起源与王权的形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

《初识清华简》后记

遵照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同仁们的盛意安排，我将自己近几年有关清华简的文字辑集起来，成为这样一本小书，得获中西书局各位先生的支持，能于很短时间内出版，在此深表感谢。

书内所收一共是36篇，有的是论文、讲稿，有的是介绍、序言，还有一些只是在整理清华简过程中写的札记，原来是仅供中心大家参考的。各篇依照写成的时间次第排列，读者可以由之看出我在若干方面想法的前后变化，赐予应有的批评。

这36篇文字大多数是发表过的，均已注明出处。前面的几篇，还曾收入我在商务印书馆印行的文集《通向文明之路》和《三代文明研究》，这是必须说明的。

清华简的内容多属珍贵典籍，古奥费解，需要长时期的读释研究。我几次强调过，我们所编写的整理报告，只是也只能是为学术界提供材料和深入研究的基础。我个人学识有限，对清华简的理解更是粗浅。在这批简入藏清华后不久，我写的最早一篇介绍性小文题为《初识清华简》，其实一直到几年后的现在，如读者在本书中所见，我仍然是处于对简“初识”的阶段。因此，当这本小书编好，我就以《初识清华简》作为书的标题了。

在准备书稿的过程中，中心的程薇女士做了很多帮助的工作，谨致谢忱。

2013年3月2日

（《初识清华简》，中西书局，2013年）

《华夏文明在甘肃》序

甘肃位于祖国版图的几何中心，区位优势明显。悠久的历史传统文化，深厚的文化底蕴，多样的民族融合与伟大的社会实践，孕育了甘肃特有的精神气质，创造了发达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这些宝贵的精神财富，成为华夏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保护传承和弘扬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国家战略安全建设国家安全生态屏障，促进民族团结发展和甘肃转型崛起，乃是当前时代的需求。

甘肃是中华民族重要的文化资源宝库，是华夏文明重要发祥地，是“彰显华夏文明的重要历史文化基地”。早在20万年前，甘肃境内就有人类生息。七八千年前，甘肃先民创造了灿烂的大地湾文化。大地湾文化是传说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开创辉煌时代的真实展现，是甘肃远古时期文明的代表。周王朝的先祖从陇东高原崛起，以农为本，以德治国，奠定了中华民族的礼仪与道德传统。秦王朝的先祖从陇南山地崛起，称霸西戎，依法立国，铸造了中国两千多年的中央集权政治、经济格局。

从汉朝开始，甘肃地区整体正式融入中国大历史之中。随着西汉张骞“凿空”，闻名世界的“丝绸之路”由东向西横贯甘肃全境，甘肃成为中西陆路交通的孔道和门户，成为中原王朝经略西域的前沿阵地。十六国时期，在整个北方“胡风”劲吹的大趋势下，凉州成为汉文化的三个中心之一，而五凉文化则成为隋唐盛世文化制度的源头之一。隋唐时期，甘肃进入辉煌时期，民族和睦，社会繁荣，经济鼎盛，史载“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胡商贩客，往返如织，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空前兴盛。中西方文明在纵横千余里的甘肃大地交流碰撞，开创了华夏文明的新篇章。

宋代以来，由于历史、自然、地理等客观因素，甘肃的历史辉煌渐趋消退，

经济发展逐渐落伍。近代以来,与东南地区相比,甘肃尤显贫瘠、闭塞、落后。目前,甘肃还处在资源丰富而经济后进、文化厚重但有待开发的境地。寻找突破口,追求大发展,成为两千多万陇人的现实追求。事实表明,甘肃是文物的集中点、华夏文明的闪光点。与发达省份拼经济、拼人才、拼科技,暂时没有太多的出路,可以拼的就是资源、特色,还有文化。因此,发展文化产业是实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支撑点和新的经济增长点。

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维护国家文化安全任务更加艰巨,增加国家文化软实力、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的要求更加紧迫。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支持甘肃经济社会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家发改委《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中共甘肃省委关于贯彻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进一步加快文化大省建设的意见》等,为甘肃开展华夏文明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的奠定了坚实的政策基础,为甘肃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作出了全面的战略部署。在这一大背景下,甘肃打造“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推动文化大省建设这一重大战略应运而生。

建设“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对全国具有典型性和示范性,对甘肃具有牵动性和长远性。据闻“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将围绕“一带”,建设“三基地”,打造“十三板块”,简称“1313工程”。“一带”,就是丝绸之路文化发展带;“三基地”,就是以伏羲文化为核心的陇东南文化历史基地、以敦煌文化为核心的河西走廊文化生态基地、以黄河文化为核心的兰州都市圈文化产业基地;“十三板块”,就是文物保护、大遗址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历史文化名城名镇保护、民族文化遗产、古籍整理出版、红色文化弘扬、城乡文化一体化发展试点、文化与生态旅游深度融合、文化产业发展、文化品牌打造、文化人才培养、节庆赛事会展等。相信通过传承创新区建设,加快发展甘肃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探索经济欠发达但文化资源富集地区实现转型跨越发展的新路子,将为同类地区与全国同步进入小康社会提供

示范。

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提高综合竞争力的重要支撑。甘肃建设“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是一项宏伟的系统工程，前景广阔，“华夏文明资源”的价值提升和内涵挖掘将成为重要的突破口。发掘历史文化资源，当着眼于根本——传承保护，立足于开拓——创新发展。只有这样，才能开发新价值，发挥新能力。

由西北师范大学主持编纂的《华夏文明在甘肃》这部书，在华夏文明大背景下，全面展示甘肃历史文化资源的宝贵价值，对甘肃历史文化做了全新定位，内容充实，学风朴实，且可读性强。书中梳理了甘肃系列特色文化：远古神话与伏羲文化、大地湾文化、彩陶文化、早期周文化、早期秦文化、简牍文化、石窟文化、长城文化、五凉文化、西夏文化、敦煌文化、民族文化、丝路文化、黄河文化等，规划了一批重大文化产业项目：报刊发行、广播影视、演艺娱乐、出版印刷、戏剧动漫、节庆赛事、特色文化产业园区和文化企业等，构思了全新的发展思路：增强文化自我发展能力，提升文化竞争力，提高文化传播力，扩大文化影响力，推动文化产业跨越式发展，打好文化资源富集牌，推进文化与旅游深度融合等。这些论述和分析，有助于以更大的力度全面提升甘肃文化的凝聚力、影响力和竞争力，切实做好文化资源的传承保护和创新发展，使华夏文明博大精深的内涵更加丰富璀璨。

是为序。

2013年4月9日

于北京清华园

（刘基主编《华夏文明在甘肃》历史文化卷、创新发展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6月24日）

李均明《耕耘录》序

《耕耘录》一书，副标题“简牍研究丛稿”，是李均明先生最近辑成的学术论文集，共收录28篇，涉及学科诸多方面，无疑将博得有关学术界的肯定和欢迎。

以中国古代简牍为研究对象的简牍学，或将帛书包括在内而称作简帛学，是二十世纪新兴的专门学科。最早为现代人所见的简牍实物，恰好是于上世纪刚开始的1901年，在新疆尼雅发现的，这标志着简帛学的肇端。

前几年，我曾在骈宇騫等先生所著《二十世纪出土简帛综述》的小序中提到，上世纪简帛学的发展有过三次高潮。1930年甘肃居延汉简的大发现及其整理研究，是其第一次高潮。其次第二个高潮，出现在1972年临沂银雀山汉简出土之后，陆续发现的有长沙马王堆帛书、新居延汉简、云梦睡虎地秦简、阜阳双古堆汉简，还有随县擂鼓墩与江陵天星观的楚简，等等，都受到学者的重视。90年代形成的第三次高潮，开始在1991年《包山楚简》出版，随后有1992年的敦煌悬泉汉简、1993年的荆门郭店楚简、1994年入藏的上海博物馆楚简、1996年的长沙走马楼吴简及2002年的龙山里耶秦简，等等，足可称一时之盛。

里耶秦简的发现，已经处于新世纪了。最近这十几年，简帛学的工作又有很大进步。这段时期，上世纪第三个高潮期间出土的新材料大多仍在继续刊布，例如上博简、走马楼简、里耶简等，而新的发现又接踵而来，更觉新颖珍异，如清华大学入藏的战国简、湖南大学和北京大学入藏的秦汉简，整理报告都已问世。新的简帛吸引了更多学者，成为学科迅速前进的基础和动力。

我觉得，简帛学这一学科当前已取得的进展，至少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出土简帛所属时代的延长。当上世纪早年开始有简牍发现，到这个学科进入第一个高潮的阶段，大家所能见的只限汉晋遗物。1942年虽出现了长

沙子弹库的楚帛书，但由于那时对楚文字的认识有限，未能造成较大影响。及至五十年代，于长沙发掘中得见楚简，1956年信阳长台关楚墓里还出土了真正的“竹书”；1995年末，云梦睡虎地又掘获了秦简。于是发现日多，现在上起战国，下及魏晋，各段历史时期都有了为数较多的标本实例。当然，简帛的使用时代还可上溯，今后发现更早的实物不是不可能的。

其次是发现简帛地区的扩大。在上述简帛学第一个高潮的时候，得到的简牍大都出自西北地带、丝路之上。到第二个高潮，内地便有了一系列发现，开拓了人们的眼界。后来又流行一种成见，以为内地简帛只能出于相当先秦楚国疆域的地方，这有一定道理，然而近来已为一些新的发现逐渐打破了。应该记得，历史上著名的孔壁、汲冢等重要发现乃是在中原（广义的）地区，位置和环境均和楚地（狭义的）不同。

其三是简帛内容性质的丰富。早年西北地带发现的简牍，性质主要是有关屯戍交通等的文书之类。50年代长沙五里牌、仰天湖的楚简，使我们看到了随葬的遣策，后来发掘的江陵望山等楚墓里，更找到关于墓主的祭祷记录。如果这些还可以附属于文书类别的话，信阳长台关“竹书”以及近年脍炙人口的郭店简、上博简、清华简等，则完全是严格意义的书籍了。

正因为简帛性质多样化，研究的途径和方法也有必要区分开来，这促进了简帛学学科分支的形成。今天的简帛学已相当细化，至少可把典籍的研究和文书的研究区分开来，已是有关学者的共识。

简帛学的进展还有一方面体现，就是释读研究能力的增强。材料的扩充，工作的深入，为掌握简帛及其文字的种种特征与规律积累了许多知识和经验。现今的整理研究工作，都较上世纪有比较显著的进步。

在这里我还想说到也许是更重要的一点：我们已经有简帛学研究工作能力较强的学者队伍，出现了成绩卓异的简帛学专家。

这部《耕耘录》的作者李均明先生，正是这样的专家。五年前，我为他所著《秦汉简牍文书分类辑解》写序，已经介绍过“李均明先生是少数精通简牍学全部的学者中的一位，堪称当之无愧的专家”。他自上世纪七十年代起步，“三十余年一直全力以赴，投身于简牍帛书的整理研究。应该说，这些年来陆

发现的简帛，罕有李均明先生不曾过目的，而其中价值最高、数量最多的各批，整理考释不少有李均明先生参加。他在这门学科的造诣和贡献，已为学术界所公认”。《耕耘录》书中所收学术论文，在领域的广度和探索的深度上，都显示出李均明先生最新的研究成绩。

2013年4月17日

单周尧《勉斋论学杂著》序

上年即2012年，香港单周尧先生来访北京，得再聚首，临别时承他以新辑成的这部论文集稿本赐示，殷殷嘱为作序。单先生是我多年知友，我又曾为他的几种大著写过序，自以为对其治学大要略窥涯涘，便一口应承下来。未想到随后数月，反复绎读论文集中各篇，深觉涉及学术方面广博重要，所作论析更是深入精审，不少问题竟非粗浅如我得以置喙，因而序文再三辍笔，难于惬意。现在论文集出版在即，只能在这里说一些感想，不知是否有负单先生的雅意。

记得2000年初，为单周尧先生的《左传学论集》作序，已说明“他治学力深湛，规模宏远，尤能于小中见大，发前人所未发”。这里说的“小中见大”，主要是讲单先生治学为文，长于在广阔的学术史视野中，抉发和考察具体的学术问题，并由此具体的学术问题，返回来探索学术史上有重要意义的一些关捩。这也就是说，对待学术上的具体问题，即使小至一字一义，也一定要放到有关学术史的宏大背景中去思考，去论析。正由于具有这样的眼光，对这一具体问题的性质和意义，所得到的认识自然会与一般不同，在见解上有其独到之处。

这种方法论层面的特点，在这部论文集中有众多的体现。例如上海博物馆所藏战国楚简《诗论》，自公布以来，学者群起讨论，已历有年所，文章积累甚多。单周尧先生却从简文的分析出发，对在清代《诗》学中影响甚大的陈启源《毛诗稽古编》重加评价，实可称别具慧眼。他还据《诗论》简有“文王惟谷”之句，联系到阮元《揅经室集》关于《大雅·桑柔》“进退维谷”的解读，也是难能可贵。如此以新见材料重新评述前贤，若非于学术史源流能上下通贯，是不可能做到的。

我们还可以看到，这部论文集有若干篇，本身便是学术史性质的工作。单周尧先生怎样根据新的材料和研究成果，去评论近现代学术史上的前辈名家，

从章太炎、王国维，到钱锺书、饶宗颐，这里表现出单先生的积学灼见，也反映了他对学术史传统的绍续和发展。

中华五千年的文化学术，绵延不绝，本来重视传统的接续继承。整个学术史的进展，各时代皆有特色，仔细考虑，也必有因有革，有一贯的脉络可寻。众多的学人学派，虽或自称无所依傍，但是究其本源，在某种程度上也必是前人学术的继续推衍。只有明辨前人的优点与其不足，去其短而取其长，才真正谈得上推陈出新。单周尧先生长期精治《左传》，著有《左传学论集》，本于前贤专一经而通群经的旨趣；深研小学，著有《文字训诂丛稿》、《勉斋小学论丛》，又正合朴学由小学而入经学、史学的途径。在深厚的传统基础上发展创新，乃是单先生著述优长之处。

我还想提到，单周尧先生不仅深于中华文化传统，对于西方汉学更有甚深造诣。他执教于香港大学多年，主持中文系教务，而香港从来是中西两大文化体系遇合交融之地，与汉学的兴起和传播有相当密切的关系。单先生的学术研究，不拘是《左传》之学还是小学，也都对西方汉学界的有关著作做出深入的评述。读过他前述几部论集的，不会忘记他怎样谈论英国理雅各的《左传》译本、瑞典高本汉的修订本《汉文典》等精彩文字。在新编的这部论文集里，又有《高本汉的经籍研究》等几篇大文，使我们对单先生学贯中西的博识有更多的了解。

在《文字训诂丛稿》我所草序中，曾说到单周尧先生鉴于战国文字上承商周，下启秦汉，在文字流变间居重要环节地位，有意关注研究，现看新辑论文集，其中已经有不少篇这方面的论作了。最近这几年，《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正在分辑出版，已获单先生的注意。这批简中有些重要内容，如《系年》一篇，同《左传》关系密切，并在文字训诂方面有其特点，十分希望单周尧先生拨冗研究，赐以指教。

2013年5月14日
于清华大学荷清苑

《多视角的赵文化研究》序

2009年，邯郸学院杨金廷院长和《邯郸学院学报》康香阁先生主编的《赵文化与华夏文明》一书由人民出版社印行。这部论文集汇集了《邯郸学院学报》2005年以来有关赵文化的论作，丰富多彩，甚受读者欢迎。我于反复阅读之下，也很感获益。现在杨、康两先生再接再厉，在不到四年之后，又编成这部《多视角的赵文化研究》，我有幸得见书稿，对邯郸学院推进赵文化研究的不遗余力，更是深觉钦敬。

以前在“全国第二届赵文化研讨会”上，我曾说赵文化研究是近年在“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多地区的国家”这一思想指引下开展的区域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如今我们还可以说，是区域文化研究中非常成功的一个方面。通过《多视角的赵文化研究》，大家不难看到，赵文化研究这几年又有不小进展，取得了若干新的成果，接触了一些新的问题。相对于《赵文化与华夏文明》，这部书所收各篇主题更较集中，论析更较深入，涉及的学科范围也更较广泛，这都是赵文化研究进一步发展的明显体现。

赵文化本来是华夏文化与戎狄文化的结合，已成为多数学者的共识。其实周王朝自身的兴起，何尝不与西北戎狄部族有其密切关系？我以前谈到过，纵观西周一代历史，似若其推进扩张的大方向全在南方和东南。仔细想来，这种现象的原因，正在于周王朝在西北有比较稳固的后方。新整理发表的清华简《系年》告诉人们，直到西周末年，幽王之后乃是西申之女，而西申同戎有着难于分割的联系。由此可见，周王朝长期背靠西北，及至西戎入侵，平王东迁，王朝的根本动摇，统治的力量也即大部丧失了。

在西周，与戎狄关系最密切的诸侯，首推晋国。唐叔的封国，境内除虞夏遗民外，就是一些戎狄部族，所谓“启以夏政，疆以戎索”。到了三家分晋，接

续这样传统的便是赵国。一直到赵国的中心移至邯郸，情况依然如此。

读《史记》本纪、世家，都知道秦、赵同祖。这讲的是秦、赵两诸侯国君主世系本出一源，最古可上溯到颛顼。到伯翳佐舜，与禹同平水土，受赐姓嬴。后来分立的嬴姓族氏，大都居于东方。只有商代晚期的戎胥轩，娶酈山之女，和戎人发生联系，他的儿子中湣更是“在西戎，保西土”，在血缘和地缘上都同戎相关。不过，中湣之子飞廉和飞廉之子恶来，都执事于商王朝，助纣为虐。清华简《系年》说明，周武王伐纣以后，飞廉逃归东方，鼓动同姓大国商奄反周，结果失败，周公把反周的“商奄之民”西迁到朱圉（今甘肃甘谷），命他们防御戎人，这就是秦的先人。这段前所未知的史事，指示我们后来雄霸西戎的秦国的文化，原来应含有东方的因素。至于飞廉的另一子季胜，则居留于山西一带，到周穆王时造父封赵，为赵国先人，则与“商奄之民”无关。这样看来，秦、赵固然同祖，但其文化可能有同有不同，于历史上的影响也不一样。这个问题，希望今后能有更多的研究。

相信《多视角的赵文化研究》这部书的出版，会将赵文化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度和广度。

2013年5月19日

于北京

（《多视角的赵文化研究》，人民出版社，2013年；《邯郸学院学报》2013年第3期）

嬴秦始源与秦文化特点

尊敬的各位领导、在座的各位先生：

刚才听了各位领导和本书主编介绍了本书的重大价值和学术意义，不少地方涵盖了一些我想说的话。下面我想补充一点感想式的意见，这个意见不一定对，仅给在座各位提供参考。

我们常常讨论一个问题，什么叫作历史研究的重大发现，或者说考古学的重大发现？这些问题的探讨研究怎么样才算重大？我个人的观点认为，一个重大的探讨、一个重大的发现，应该说它是关系到一个历史时代、一个民族、一个重要地区历史上的一种文化，我们对它的认识有一个根本性的改变，这样才是重大的，否则不能算是重大的探讨和发现。

我认为，关于嬴秦文化起源的探讨应该是一个重大的事情。为什么这么说？刚才我们的老领导王久祐先生已经谈到了秦文化在中国整个历史上所起的作用。外国人常常说秦始皇是第一个统一中国的皇帝，我不赞成这种说法。为什么？夏商周时期（地域）可能没有（秦代）那么大，但同样是一个统一的朝代。（所以）秦不是第一个统一的朝代，（秦始皇）也不是第一个统一的君主，应该是再统一中国、建立中国长期的中央专制集权这样一个国家的历史时期。这个时期是由于秦的霸政造成的，秦文化在当时不是一种最先进、最发达的文化，而是一种比较落后、比较保守封闭的、通过武力来征服的文化，这些观点是很长时期存在的，现在更需要研究讨论。

秦文化究竟是怎样一种文化？究竟怎么样认识当时的秦文化？经过什么样的历史形成了秦的国家政权以及它与它相对应的文化特点？这个问题就是我们探讨秦文化始源和它的发展历程的基本问题。秦文化由种种特征融合而来，它

是不是一种地方性的文化，是不是一种落后的落后的文化？如果我们把秦文化看成了仅仅是在西方的戎狄族里产生的一种文化，仅仅是一种戎狄以暴力武力为基础的文化，那么它就是一个比较落后、比较封闭的文化。秦的统一说起来的话，用秦文化来统一全国，从整个历史上来看就没有一种进步发展的作用，这一点是值得我们现在特别考虑的。

我非常感谢刚才各位先生，包括《嬴秦始源》这本书的主编关于清华简发表的观点，清华简里面很多内容都有，并不是没有，唯一一点特别的地方就是它告诉我们秦人最早的先人，当然我说的不仅仅限于秦人的君主，包括秦人一些核心的成分，是从东方来的。从东方怎么来的呢？是由于“商奄之民”当时曾经反过周朝体制，然后被强迫迁到这里来。这一点是过去任何史料都没有的，是过去我们谁也想象不到的。“商奄之民”，大家想一想这有什么意义？在座的宋镇豪先生可以告诉我们，迁殷以前的商朝首都就在奄，商奄这个地方本来就是殷商的首都，后来他们起来反周，我觉得这是很自然的。而把“商奄之民”作为秦人的核心，迁到了西方，这是非常大的一件事，就是说保持殷商基本传统的人到了秦，他们的文化里一定包括着殷商文化的因素，因为迁来的就是反周的那些人，而到了西方之后，又形成了西方的文化，特别是也吸收了周的文化，所以整个嬴秦文化的发展过程应该说是一个文化大融合的过程，这是过去我们没有充分意识到的。它是一个大融合的过程，它的人民是以东方包括殷商和一部分东夷文化为基础，然后吸收了一些戎的文化，再吸收了周的文化，最后移到了宗周的废墟之上，继承了周人的传统。这个过程反映了我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最大的特点，这是一个互相融合包容、而且有多元化特点的文化传统。所以秦的统一全国不是偶然的，特别是从文化组成来看不是偶然的，也不是仅仅武力的战胜，而是继续了我们整个中华民族发展延续和进步的一个过程。这一点我们《嬴秦始源》已有探讨。

我在这本书的“序”中最后说到，我们希望关于嬴秦文化始源这个问题的讨论还会继续进行，我们也特别希望山东省莱芜市在这方面能再组织大家做进一步的研究工作。

我就说这些，谢谢。

（本文根据李学勤先生2013年6月8日在《嬴秦始源》首发式暨出版座谈会上的讲话录音整理。）

（《嬴秦学刊》2013年2—3期；《嬴秦文化研究》总第6期）

《汉镜文化研究》序

清华大学“汉镜文化研究”课题组集中数年精力，完成了《汉镜文化研究》一书的纂著。这部大书分为“研究篇”和“图录篇”，论说精详，材料丰富，二美兼而有之，其出版堪称铜镜研究领域中的盛事。

汉镜从来是铜镜研究的中心。我在近日印行的一本小书《青铜器入门》里曾谈到，一般青铜器的历史发展有两个高峰，而铜镜的发展则有三个高峰，就是战国镜、汉镜和唐镜。在这三个高峰中间，汉镜承前启后，存在品种最繁，发现数量也最多，乃是铜镜研究的重中之重，历来成为研究和收藏的基点。

细读《汉镜文化研究》，内容广泛涉及汉镜研究有关的各个方面，多有新知创见。特别是对于这方面研究探讨的几个有根本性的问题多有推进，是很重要的贡献。

什么是汉镜研究有根本性的问题呢，依照陋见，至少有这样几点，都是当前迫切需要做的：

首先，也是最切要的一点，是对汉镜的分域、分期做细化的研究。

对于一类考古文化遗物来说，分别其存在区域，再依照科学方法进行分期，是研究工作的基本要求。汉镜出土范围十分广阔，尽管是容易转移流动的器物，不同地区所出还是有足以辨别的一些特点。如以考古发掘的材料为基础，经过细致工作，应能做出若干地区的具体分期标尺。

其次，是对汉镜的形制、纹饰做深入的分析。

铜镜物虽不大，其形态即形制与纹饰的变化却似无穷尽。对于汉镜的形制，如其尺寸、造型，以至钮制、缘形等，都需要做仔细的记录考察，以得出其演变的过程和规律。至于纹饰，除了细致的分类外，自然还应做出图像学的说明解释。

第三，是对汉镜的铭文作多角度的研究。

铜镜之有铭文，正式的形成是在西汉，这一点虽曾有学者驳难，近年已成为研究界的共识。实际上，镜铭虽自汉代始有，其最发达的时期也正在汉代。近年汉镜的发现越来越多，不少具有前所未有的铭文，使大家进一步领略到当时镜铭的丰富多彩，超出我们以往所能想象。

汉镜铭文的辑集，很早便是汉镜研究的重要侧面，其标志性著作可推罗振玉《汉两京以来镜铭集录》。随后其弟子容庚先生作《秦汉金文录》，虽然未能收入镜铭，但与之配合的《金文续编》却将镜铭包括在内。他为《金文续编》写的序言，所举“篆隶嬗变之时”文字简化的实例，也有镜铭文字。今后如能纂辑材料齐备的汉镜文字编，对文字学研究的帮助必非浅鲜。

对汉镜铭文还应做书法史的研究。我常说，中国文字同其书法乃系孪生，各个历史时期的文字都相应具有特色的书法。汉镜铭文从美术角度看，总是追求与镜上纹饰的高度调谐，每同汉印有异曲同工之妙，值得体认研求。

镜铭又常是相当好的文学作品，譬如七言诗，就很可能渊源于镜铭，至少若干镜铭本身是这么讲的。如何使镜铭在文学史研究中有其位置，也是当予促进的。

第四，是对汉镜的工艺作进一步的探讨。

汉代青铜器由立朝以来上承战国遗留的传统，曾产生许多精美优良的作品，然而总的趋势，青铜器工艺是在逐渐衰落，在社会生活的多方面为其他器种所取代。惟有那时的铜镜处于兴盛时期，反而得到突出的发展。通过实物检测以及有关制镜遗存的考察，必将揭示这方面科技史的秘蕴。

以上拉杂说了四点，未必有当，其实《汉镜文化研究》这部书的内容，在这四点上都已有精彩的讨论。这也正是我在这里饶舌，向大家推介这部书的原因。

2013年6月9日

于清华园

（《汉镜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

丘光明展览序

丘光明先生，安徽全椒人，1936年出生于江苏南京。1957年毕业于江苏无锡华东艺术专科学校美术系（今南京艺术学院）。1964年调至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1969年开始从事计量史研究。

40多年来，在计量史研究过程中，丘先生不断刻苦钻研，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先后出版十余部学术专著，在权威期刊上发表了数十篇论文，对我国计量史研究做出重要贡献。1993年，她荣获国务院颁发的首届政府特殊津贴。

2007年，丘先生在一次聚会中认识了修正药业的总经理修来富先生，因对古代度量衡器物的共同兴趣，他们成为朋友，进而开启了理论研究与文物收藏的接轨和交流。此后，丘先生与通化药业频繁交流，她也因各种学术活动而多次前来通化市，逐渐对这个人杰地灵的山城留下美好的印象，产生了深厚的感情。2012年丘先生作出一个非同寻常的决定，她带上毕生学术研究的全部资料和宝贵的书籍，只身一人来到修正药业，在修正药业修总丰富的文物收藏的基础上，开展度量衡史的研究和宣传。同时，修正方面也为她工作安排了居所，提供了必要的生活设施，让这位国内外知名的专家得以享受东北恬静淡雅的老年生活。

这个展览分两部分。

第一部分是丘光明先生40多年来在计量史方面的研究成果，让山城人民更多地了解中华计量史的光辉成就，以及修正展览馆度量衡展厅的文化内涵。

第二部分是她的油画风景作品。丘先生虽然并未从事美术专业，但是对艺术的爱好和关注却并没有因此而消失。她来到修正半年多时间，很快融入了这里优美的环境和朴实的传统文化，艺术家的热情喷涌而出。她在研究之余，兴之所至，竟又重新拿起画笔，表达她对50余年前学校学习的一种回顾和追溯。

虽然她自称是习作，但大胆的用笔、丰富的色彩，表现出她对新生活的憧憬和对大自然的热爱。

2013年7月10日

在首届汉语人文学学术写作终身成就奖 颁奖典礼上的致辞

尊敬的各位领导，尊敬的各位女士、先生：

今天是最感光荣和欣幸的日子，在这里谨向您们大家表示深深的感谢！

我生于1933年。1952年，也就是我19岁的时候，开始进入中国科学院，从事学术研究工作，到现在已有60来年了。可是我从未想到有今天这样一个机会，蒙受这样的荣幸。大家给我的荣誉，刚才会上对我的介绍，多有溢美之处，我实不敢当，只能再次向大家致谢。

今天给我的荣誉，是对我多年努力的高度肯定。若干年来，我对来访问的朋友总是说，我的前半生“乏善可陈”，“不足为训”。我没有受过多少专业教育，又学无常师，但我一直是幸运的，多年来得到许多位前辈学者的支持、教导和帮助。我的点滴成就，都和前辈学者的关怀分不开。今天我想乘这个机会，怀想他们，纪念他们。

曾有人说我有“家学渊源”，是不合事实的。我是独子，没有兄弟姐妹，从小身体不太好，惟一的爱好就是看书。父亲虽是知识分子，但与我走的专业道路全无关涉。从小他没有教过我任何知识，他英文很好，也没教过我一个字。可是他一向支持我走自己想走的路，给我充分的自由。最近人们常提到“虎妈”，我的父母可不是那样，这是我的一大幸事。

我受高等教育时间甚短，只念了一年。1951年我以第一志愿考进清华大学哲学系，当时是因为读过金岳霖先生的书。这一年没有上多少课，还经历了“思想改造运动”，到1952年夏天，便由于自己学了甲骨文，有一些成果，去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这在当时也是不寻常的事，得到金岳霖先生和古文字

学家陈梦家先生的帮助，这又是我的一大幸事。

我的幸运尚不止此。1953年底，由于偶然机缘，我见到了著名历史学家侯外庐先生，从而到了新建立的历史研究所，做了侯先生的助手，专攻中国思想史，当时工作重心在隋唐宋明一段。“文革”后，才又转回先秦史、考古和古文字学。在历史所50年间，换了多种学科，杂而不纯，所以我只好自称“杂学”。直到2003年，我才调回母校清华。

回想几十年来，道路复杂曲折，由哲学到考古，从逻辑到古文字，对象或虚或实，时代有古有近，但我自觉每一转折，都能从中得益。在这里我个人特别的体会是，学术本是统一的、一体的，总是互相贯通。我们对客观世界、主观世界的接触、认识和体认，本来是一个整体，而正是在这样接触、认识和体认的过程中，形成了一代又一代的学术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个学术界的一个因子、一个链环。

这几天，我第一次读到四川大学哲学研究所“六年前的宣言”，很为之震撼。这篇“宣言”说人文学科的学术界已经（或至少是已濒于）“土崩瓦解”，因此其设立的目标，就是要“重建因为阅读的流失而销声匿迹的学术界”。我认为这一点确实非常重要，值得我们仔细品味和思考。

这里讲到的“阅读”，我想了很久，认为所指的乃是凭借文字而实现的文化、思想、学术的传播、融合和交流。要知道，文字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有文字，才会有文化、思想、学术在空间和时间上的传布，而所谓“阅读”，应该即是承续和发展前人所奠立的文化、思想、学术，特别是贯穿于文化、思想、学术中间的精神。有了这样的承续和发展，或者说传承与创新，才有真正的学术界，才有可能实现北宋张载所讲的“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对不起，我可能已经说得太多了。请再允许我在这里表明，永远不会忘记大家给我的荣誉和鼓励，一定不负各位对我的关注和肯定。

谢谢大家！

2013年7月8日

李玉洁《黄河文化与日本》序

河南大学李玉洁教授与我初识是在1983年，到现在正好是30年了。她长期沉潜于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研究，著述甚多，我大都读过，还为她的两种专著写过小序。然而出我意外的是，2007至2008年，她应邀赴日本皇学馆大学研究，费尽一年精力，对日本的历史文化作细致系统的考察，归国后将其知见感想整理出来，撰成这样一部洋洋洒洒的《黄河文化与日本》。

大家知道，自晚清以来，中国学人前往日本游学访问的不可胜数，有的还曾在日本久居，然而能利用机会，从中日文化交流史的观点，专心探究当地的文化内涵，并且形成自己的见解的，却实在不多。从这一点来说，李玉洁教授的这部书是值得推荐的。

我一贯认为，中国学术界对周围邻近国家的历史文化，应该有正确的了解、深入的研究。这既是学术的需要，也是现实的要求。近些年，大家在努力推进国际汉学的研究，已经可以说是粗具规模，成了气候了，然而多数人讲的国际汉学，主要是指西方的汉学，对于同中国有着悠久的文化交流历史的日本的汉学，研究和介绍却很有限，这不能不说是憾事。

接触过日本汉学的人，都不会不知道著名的吉川幸次郎教授。他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留学中国，著有《我的留学记》，有钱婉约中译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年）。该书收有他的讲演《中国人的日本观和日本人的中国观》，强调指出中国人和日本人关于对方的历史文化都存在误解，“日中两国之间要产生真正的友情，第一步必须是互相真正地对方，必须舍弃过去那种双方只从自己方面来解释对方的天真态度”。他还特别说到“学问是社会理性的中心”，讨论了学术界在这方面的重要性。这番话当然有当时的时代背景，但还是有可以借鉴之处。

李玉洁教授在本书“绪论”开头说：“中国与日本是一衣带水的邻邦。在日本，对于我们这个研究历史的人来说，满眼见到的都是历史。”这段话讲得极好。吉川幸次郎的书中译本封面有副题：“日本人眼中的近代中国”，李玉洁教授这部书也可说是：一位中国历史学家眼中的日本。相信李玉洁教授会与日本学术界有更多交流，对日本历史文化有更进一步的研究和论述。

2013年7月23日

于北京清华园

（李玉洁《黄河文化与日本》，科学出版社，2013年）

杜勇《中国早期国家的形成与国家结构》序

天津师范大学杜勇教授的新著《中国早期国家的形成与国家结构》即将付印，蒙他示以全稿，力嘱写一小序。我绎读之下，深感这是通论先秦历史的好书，多有精辟见解，因而愿在这里赘言几句。

熟悉先秦史这一学科分支的读者，对杜勇教授的大名不会陌生。他在上世纪末出版的专著《〈尚书〉周初八诰研究》，已成为有关范围学者的必读书。那部书的特点是分析细密、论证周详，在学术界有很好的影响，但我要说，该书的特殊优长之处，在于书中贯穿的方法论观点。尤其是其“绪论”部分关于考证作为研究基本方法之一的论说，要言不烦，却又针对一些流行意见，很值得注意。

至于杜勇教授这部新书《中国早期国家的形成与国家结构》，所涵盖时代更广，牵涉问题更多，可是我以为特别值得提出的，仍然是作者关于研究方法的见解。请容许我在这里建议，读者看这部书应先关注其中涉及方法论的部分。比如书的第二章第一节“关于历史上是否存在夏朝的问题”，看来似若只是论述夏代这一具体朝代，实际上则包含着作者对古史研究方法论的一系列看法。读者先看了这一部分，对杜勇教授在全书中采取的途径，以及所达成的结果，就容易认识和理解了。

中国的古史研究，自二十世纪前期即是学术界关切的热点课题。1923年以来风靡一时的“古史辨”疑古思潮，1925年王国维先生提出的“古史新证”，以及后来李济先生提出的“古史重建”，归根结底都环绕着方法论问题。杜勇教授在谈夏朝是否存在时说：“我以为，要解决这个问题，先不妨在方法论上作

些检讨，或可消却心中的疑云。就夏史研究来说，有两个方法论方面的问题尤其值得我们反思：一是如何看待晚出文献资料的真实性问题，二是如何对待夏代考古资料有无文字的问题。”这两个问题都可以扩大为整个古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杜勇教授是北京师范大学著名学者赵光贤先生的高弟。2010年出版的《赵光贤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收有他的《悼念吾师赵光贤先生》一文，文中说“先生治学，理论上高屋建瓴，考证上疑信有据，始终贯穿着求真的科学精神”，读杜勇教授的书，他在这方面确实可谓克绍箕裘了。

2013年7月24日

（杜勇《中国早期国家的形成与国家结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

《美成在久》题辞

承唐际根先生赐告，*Orientations*的中文版定名为《美成在久》，即将创刊问世，我认为这是一个值得欣喜的好消息。

很多朋友知道，*Orientations*以英文在香港出版多年，其内容专注于亚洲地区的文物与艺术，广泛受到有关人士的赞许欢迎。我自己开始读到这一内涵丰富、印制精美的刊物，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之末，颇觉获益。随后在出访境外期间，我还特地找到以往出版的*Orientations*，一一浏览。

亚洲各个国家地区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亚洲的文物、艺术范围博大，品类繁多，一贯受到举世重视。中国的文物与艺术，在其间居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是人所周知的，但中国光辉灿烂的文化从来不是孤立隔绝的。在几千年的历史流变中，中国文化大量吸收了境外，特别是周围地区国家与民族的文化因素，更对周围地区国家与民族的文化起了重大的影响作用。因此，即使我们只想研究中国的文化，中国的文物与艺术，我们也有必要了解亚洲其他国家、民族的历史文化，包括其文物和艺术。

记得1991年，我在由香港中华书局印行的一本小书《比较考古学随笔》的“引言”中说过，“由于地理的接近，人民的往来，同中国文化关系最密切的，自当推中国周围的国家地区。不少学者在这方面作过探讨，例如以中国北方以青铜短剑为特征的文化与西伯利亚的文化比较，以中国南方发现的靴形钺、铜鼓与东南亚的文化比较”，都取得了有价值的成果。

《美成在久》将为读者带来新的视野和新的观点，祝愿这一刊物越办越好。

2013年8月16日

（《美成在久》总第1期，2014年9月）

《科学画报》是我的良师

《科学画报》编辑部的先生们来信，要我为《科学画报》创刊八十周年纪念题辞，我仔细考虑了一下，就写出这样两句：“广开知识眼界，永作科普良师。”我想声明的是，这不是门面套话，更决非阿谀之词，而是我作为《科学画报》一名老读者的深刻体会和感恩。

记得在十年前，《科学画报》七十周年的时候，我写过一篇回忆短文，题为《我是〈科学画报〉的同龄人》（在《画报》刊出时改作《从“半个人”到“一个人”》），记述了自己自少年时代与《科学画报》结下的缘分，其中已说到由于长期读《画报》，得以“开拓知识，扩充眼界”，然而语焉未详。有些看过那篇小文的朋友问我：你的专业工作不在科学技术领域，而是一个人文学术工作者，专做古代历史文化研究的，你几十年读《科学画报》，到底获得了什么益处？

其实，我由读《画报》得益甚多，真是不胜枚举。我觉得，至少可以说出以下几点：

第一，多年读《科学画报》，学习各种科学的基本知识，使我虽然不属于有关专业，却还是一个有些科学常识的人。具有科学常识，使我不会被一时流行的形形色色奇谈怪论所欺骗，这在现代社会光怪陆离的现象之中，是少不得的防身本领。

第二，多年读《画报》，涵泳于各种科学的推理思维，使我逐渐养成在学术工作中随时注意逻辑理路的习惯。做研究课题，写学术文章，努力做到有必要的论证依据，而且要尽可能将论证过程展示清楚。

第三，多年读《画报》，接触到各种科学的精深内涵，使我有机会体会到学术知识的博大复杂，即使是一种很具体对象的研究，也可能牵涉多种学科，因而多学科的交叉配合，在今天常常是必需而且重要的。我自己在参加组织国家

重点科技攻关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的时候，对这一问题有不少体会。

第四，多年读《画报》，经常获得各种科学发现、发明的信息，能够感受到科学的快速进步，真称得起日新月异。这就促使我们必须力求了解和把握各学科当前的发展趋向，才有可能站到有关领域的前沿。上世纪末，我在美国一所大学授课，有暇做了一点调查了解，发现认知科学正处于迅猛发展的前沿。这当然不是我从事的专业范围，但出于兴趣，回国后做了一段力所能及的推动促进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总之，我由《科学画报》得益是说不尽的，《画报》我还每期都读，一定继续读下去，祝愿《画报》越办越好，永为我的“良师”。

（《科学画报》2013年第10期）

孔子文化奖获奖感言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女士、先生：

今天我能够在孔子和儒学的故乡曲阜，承受这样的荣誉和奖励，是我有生以来最重要的一大幸事。我生于1933年，1952年开始从事学术工作，如大家所了解，几十年间有种种曲折经历，当然有不少值得纪念的事情，然而在今天获得的荣誉，却是我未曾预料到的。

我大胆地认为，我今天的获奖，是大家对我几十年来所做点滴工作的高度肯定，尽管会上对我的介绍，有许多溢美之处，是我实在不敢接受的。近来我在几次不同的场合都说过，我这个人过去的大半生，所学甚浅，工作很杂，实在乏善可陈，不足为训。这不是故作谦虚的客套话。我本来是清华大学哲学系的学生，老师有金岳霖、冯友兰等先生，可是1952年我到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做殷墟甲骨的整理。1953年底，又转到历史研究所，担当侯外庐先生的助手，参加《中国思想通史》。直到“文化大革命”后期，又转去整理新出土的简牍帛书，回到考古和古文字学的行当。几经转折，称为“杂学”是最合宜的。

不过，在多年的“杂学”涵泳中，我逐渐形成了一个认识、一个想望。这个认识就是我们中国的传统优秀文化，由于种种历史的原因，被低估被矮化了，而我的想望就是通过客观的论证、正确的评价，使传统文化得到继承和阐扬。因此，我在1981年提出要“重新估价中国的古代文明”，以期对国家的文化建设有益。

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即现在大家说的“国学”，我的体会是“国学的主流是儒学，儒学的核心是经学”。仔细思考，儒学、经学的开创者，自然是古代文明的集大成者孔子，是孔子总结了唐虞三代的文化传统，创立了儒学，特别是

其经学，成为传统优秀文化的中心和象征。我多年以来所企往、所追求的，多年以来所致力、所工作的，如果在阐扬民族文化方面有一点效用，我便感到深深满足了。这也正是我能在曲阜获奖感到特别荣幸、特别激动的原因。

我的努力还要继续下去，希望得到大家的批评、指点和教导。请容许我对大会、对各位表示衷心的、热诚的感谢！

谢谢大家！

2013年9月27日

为往圣继绝学

北宋大儒张载的名言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是大家都熟悉的。然而这字数寥寥的四句话中，实包含有深邃的哲理，今天限于时间，不能深入阐述，只就“为往圣继绝学”一句，略说些个人粗浅的感悟。

“为往圣继绝学”，实际讲的是文化传统的传承与创新的问题。“往圣”是历史上极高造诣的学术人物，他们所创立的学统，由于种种原因，在时间的长河间湮没断绝，必须有新兴的学人予以恢复承续，并将之推向新的高度，方能达到张载四句下面的“为万世开太平”的效果。

纵观中国的思想学术史，所谓“为往圣继绝学”不仅是抽象的口号，而是有几次具体的实际。

最明显而典型的“为往圣继绝学”实例，出现在西汉时期。大家都知道，秦始皇统并六国后，颁行了焚书令，由此形成的“挟书律”实行了多年，直到汉惠帝时才废止。秦法这一条，由近年考古发现的当时随葬书籍看，十分有效，其结果是先秦“往圣”的学术文化几乎断绝，这迫使西汉的文化学术以全力搜求能保存下来的佚籍，训释解读，重新编辑，从孔安国到刘向、刘歆，作出了繁重而多贡献的成果。其结局是形成了后人称之为“汉学”的一代学风，占领学界数百年之久。

到了魏晋以下，“汉学”的发展已到极致，承古籍佚的工作也没什么可做了，学术界逐渐发现，先秦“往圣”的思想性的、哲理性的“学”，汉儒并未能继承下来，于是学风逐渐改变。到了唐宋，建立了“道统”说，以“四书”的研究诠释为中心，再次进行了“为往圣继绝学”，形成了所谓“宋学”。

“宋学”发展迅速，到明中叶又到其极致，虽有王阳明“心学”出现，其基

本风格，即学术以思想哲理为重，侈谈天道性命，终未变化，从而引起有识之士的诟病。及入清代，学风再次丕变，乾嘉学者又回到“汉学”门径，期待通过文字考证，重新认识“往圣”的真实面貌，这又是一次“为往圣继绝学”。

由上述三次“为往圣继绝学”的学术史变迁来看，在文化学术的发展史里，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十分重要，没有这种传承，就不会有新的文化的基础，但是每次做到传承，都在事实上是真正的创新，不去创新，实际也做不到真正的传承。

希望我这一点陋见，能供大家参考。

（2013年9月27日在第六届世界儒学大会上的演讲）

在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学术 研讨会上的讲话

今天我们这次学术研讨会在长沙成功召开，是今年有关学术界的一件盛事。我在这里谨代表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对蒞会各位表示欢迎和感激，对承办这次会议的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文物》编辑部表示衷心的感谢。

说这次研讨会是一件盛事，不是空洞的套话，而是因为研讨会所要讨论的五一广场简牍是一次考古文物的重要发现，对简帛学的发展，对有关历史学、考古学的研究，都有着相当重要的意义。

大家知道，简帛学（或称简牍学）的起源可上溯到二十世纪之初，但这一学科的真正形成和发达要晚得多，直到上世纪后半才真正发展起来。今天，简帛学已经成为出土文献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独立的分支学科了。

“出土文献”、“出土文献研究”这样的词，是什么时候，由什么人提倡和普及使用的，我不大清楚，但我认为这个词比过去一概称之为“中国古文字学”更好一些，因为“古文字”一词是有严格定义的，无论如何，像五一广场东汉简牍，是不好称作“古文字”的。

谈到简帛学的发展，今天的简帛学已分成两个很大的分支了，这是这门学问发展的重要标志。我建议这两个分支，一个叫“简帛典籍研究”，一个叫“简牍文书研究”，而“文书研究”还可以分为边陲屯戍文书研究与内地地方文书研究两类。到了这些年，不管是典籍研究，还是文书研究，都有了自己的材料、成果和专家队伍，做出了很大的成绩，而五一广场东汉简的发现，刚好在文书研究上填补了本来非常薄弱，甚至可说是空白的环节。因此，称之为一次重要

发现，是当之无愧的。

我以为，简牍文书的研究有几个基本的要求，这包括（1）简牍年代的判定，（2）简牍性质的判定，（3）职官制度的研究，（4）文书格式和词语的研究，等等。过去邓广铭先生讲研究历史的四把钥匙，即目录、年代、地理、职官，看来都适用于简牍文书的研究。我们已经知道，各位在这次研讨会上，就这些方面都会有较深入的探讨，推动研究工作的进展，我们准备洗耳恭听。

这里我还想谈一下简帛学（以及类似的出土文献研究）当前存在的问题：

当前，简帛（从战国到魏晋）正在大量而且多次地发现。这种趋势，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就开始了。由于我们的力量有限，这种趋势不可避免地带来一些问题。

首先是整理发表的问题。简帛出土，开始是保护清理，然后考释发表，这每每赶不上形势。甚至上世纪七十年代出现的一些重要材料，迄今已经约40年，还有些未能出版与大家见面。

其次是研究消化的问题。简帛这么多，内容这么重要，但在发表后，往往缺少专门学者作长时间深入的分析研究，停留于浅尝即止。其实这样的材料，没有足够的研究，其真实价值是不可能显现的。

我们要讨论的五一广场简牍，简报已及时刊登在《文物》杂志上。听说一部分重要材料，也准备在最近公布。我们要谢谢发掘者、保护管理者、研究考释者，也要感谢文物出版社。只有像在这次研讨会上一样，大家通力合作，我们才能把工作做好，不负这次重大发现。

谢谢大家！

2013年9月21日

《中国易经哲学研究》试刊号贺词

尊敬的马宝善院长，各位专家，女士们，先生们：

《中国易经哲学研究》在马老以及各位专家学者的倡导之下，今天跟大家见面了。这对于我们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思想研究是一件值得祝贺的事情。

《系辞》云：“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这已经概括了易道的根本。易道本于天地，并体现于人的践行，所以孔子说：“易其至矣乎！夫易，圣人所以崇德而广业也。”“天地设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易经》的研究，意义确实重大。

希望这本刊物能成为大家学术交流探讨的平台，祝这本刊物越办越好！

2013年9月

（华夏国际易道研究院《中国易经哲学研究》总第01期，2013年9月）

《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丛书》

前言

“出土文献”是与“传世文献”相对的概念，包括甲骨文、金文、战国文字、简牍帛书等。出土文献的整理研究始于汉代，至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

在这两千多年里，出土文献层见叠出，研究工作不断走向深入。孔壁中经、汲冢竹书、殷墟甲骨……每一次重大的发现，都不同程度地影响到那个时代的学术生态。

1925年，清华研究院的王国维先生在《古史新证》中首倡“二重证据法”。他说：“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他所谓的“纸上之材料”即传世文献，“地下之材料”就是出土文献。通过出土文献来印证补正传世文献，开辟研究中国古史的新途径，是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真谛。“二重证据法”是出土文献乃至考古学考据研究方法上的一次重大革新，对近代学术的影响至为深远。

2008年7月，清华大学从境外抢救入藏了一批战国时期的竹简，总数约2500枚，其中有多种经、史典籍，非常珍贵，其重要性堪与孔壁中经、汲冢竹书相媲美。

该年9月，清华大学成立了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中心的定位是：通过开展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交叉性和合作性研究，深入探讨出土文献的保护、整理、研究的前沿课题，把中心建设成为具有世界领先水准的出土文献研究和保护中心。当前，中心的主要工作是对清华简进行保护、整理与研究，同时开

展其他出土文献的保护和研究工作。中心自成立以来，已经取得了一系列成果，特别是在清华简的保护、整理和研究方面所做的工作，受到了领导的高度肯定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2011年4月，在清华百年校庆前夕，中心领衔申报的“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中心”获批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2012年5月，为回应教育部2011计划，中心联合国内共11家兄弟单位组织筹建“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协同创新中心”，2013年1月5日，正式揭牌成立。

在短短的五年内，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经历了跨越式的发展，在领导的关怀支持和同人的集体努力下，做出了一些工作成果，然而不足之处仍然是明显的。我们的学识经验都很有限，面对任务的要求，时时感到自己存在的缺憾。我们深切期待着各方面的帮助和指教。

不管中心如何发展，我们始终围绕着“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这个主旋律。

为了集中展示近年来出土文献研究的最新成果，推进出土文献的研究工作，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辑了这套《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丛书》。丛书将陆续推出，作者包括中心和其他单位人员，都是活跃于一线的中青年学者，所涉及的出土文献时间跨度很大，所涉及的学科领域相当宽广，都有自己的独到见解，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当今出土文献研究的主流面貌，相信广大读者朋友能从中得到有益的启示。

这套丛书的编辑，得到了各位作者的积极响应，还得到了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在此表示由衷的谢意。

2013年10月15日

（苏辉《秦三晋纪年兵器研究》等，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

后 记

蒙商务印书馆各位先生不弃，近几年陆续印行了我一系列论文集，即2008年的《文物中的古文明》，2010年的《通向文明之路》，2011年的《三代文明研究》，现在这本《夏商周文明研究》已经是第四本。

记得我在少年时读过金受申先生的自述文章，他说他治学的一大愿望就是在商务印书馆出一本书，后来居然出了《公孙龙子考》等两本，觉得喜出望外。金受申先生出身于民初北大，博学多闻，尤以“北京通”名世，非我所敢比拟，但我一直也以能在商务出书引为个人的荣幸。

这四本论文集收录了我从2003年调回母校清华工作以来的种种小文。这本《夏商周文明研究》所辑各篇的时限，是2011到2013这三年，仍分上下两编，上编为论文、演讲，下编是序跋和杂文，体例与《三代文明研究》一样，因此经过同商务丁波先生商量，书题略作改易，便叫作《夏商周文明研究》了。

翻阅我这几本集子的读者，会发现我近几年工作的范围在逐渐变窄，主要的题目集中到清华简及与之相关的方面上来。这是由于清华简确实重要而又十分古奥费解，有不少地方应该说非我的学识所能及，不尽力以赴是不能做好自己所负的责任的。虽然有不少别的问题我非常有兴趣，也只好放弃而不再涉足。

对于因书的性质给编辑事务带来的麻烦，在此又一次向商务各位先生深致歉意，并表感谢。

李学勤

2014年4月15日

<http://www.cp.com.cn>



ISBN 978-7-100-09102-2



9 787100 091022 >

定价：96.00元

上架建议：古代文化史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夏商周文明研究

作者=李学勤著

页数=450

SS号=13708278

出版日期=2015.01

出版社=北京：商务印书馆

ISBN号=978-7-100-09102-2

中图法分类号=K221.03

原书定价=96.00

主题词=文化史-中国-三代时期-文集

参考文献格式=李学勤著.夏商周文明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01.

内容提要=本书包含了古史研究、甲骨文研究、青铜器研究、战国文学研究、简帛学研究、学术史研究等。主要包括：由清华简《金縢》看周初史事、清华简关于秦人始源的重要发现等。